

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 李銳近作

——世紀之交留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自述

濁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曾經波浪闊，不怕火爐紅。  
詩賦龍膽紫，文章太史公。所望加餐飯，愈老愈英雄。

——黎澍

廬山霧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詩。

——朱正

自由不是無情物，化雨隨風入萬家。草草荆冠何處戴，  
驚心奪目自由花。

——邵燕祥

明明五官端正，骨挺腸直；朝左歪的人，偏要說他右了。

——陳四益

ISBN 988-97107-1-4



9 789889 710712 >

ISBN 988-97107-1-4

定價：七十八元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自述

濁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曾經波浪間，不怕火爐紅。詩賦龍騰紫，文章太史公。所望加餐飯，愈老愈英雄。

——黎澍

廬山霧濤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詩。

——朱正

自由不是無情物，化雨隨風入萬家。草草荆冠何處戴？驚心奪目自由花。

——邵燕祥

明明五官端正，骨挺腸直；朝左歪的人，偏要說他右了。

——陳四益

李銳◎著



# 世紀之交留言

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李銳** 國內外知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曾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戰爭年代在湖南、延安和東北等地從事青年工作和新聞工作。1949—1952年任新湖南報社社長、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1952年轉業到工業部門，主管水電建設工作。1958年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任毛澤東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期關在秦城監獄8年。1979年平反復職，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1982—1984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被選為中顧委委員。著述甚豐。



■ 1989年4月5日胡耀邦在家中與李銳長談



■ 李銳在“十六大”會議期間

# 序言

記得一九六三年同田家英的話別詩中有一聯：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爲壁上觀。那時正在流放勞改中。一九八五年離開工作崗位後，此種心情同樣存在。我這一生，自一九三五年參加一二九運動後，就成爲一個“政治動物”，無論順境逆境，青年老年，總是陷在這一聯語之中。

過去的彎路與時代的發展，逼得我們不得不思考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即從意識形態到國家管理，從馬恩列斯毛鄧到政治經濟文化。不管自己能起什麼作用，總是受歷史責任感的驅使，一有機會就從文字上表達出來；不論在什麼崗位，處於何種地位，已養成一種好用文字發表意見的習慣。文革期間在秦城八年時，有過這樣的聯句：平生文字難成獄，自我批評總過頭。這就是說，雖然好說好寫，我從不信口開河，只圖痛快，而是一個比較踏實而且嚴謹的人。

收集在這本書中的六十來篇長短文章，絕大部分是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三年之作，都在報刊發表過。較早的一篇是一九九七年十五大的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由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建議總結這二十年的經驗教訓，作出第三個《歷史決議》。十六大時，我又向中央常委寫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書，就黨內生活民主化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各提出五點建議，關鍵在實施憲政民主。引起較大的反響。“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篇二萬字的

長文，即說明由於體制沒有改革，政治沒有民主，終於導致耀邦的下臺。

其他幾組文章的內容，不外這幾方面：

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反“左”防“左”。

有關毛澤東論著的序言，對毛的歷史評價。

有關黨史和當代人物著作寫的序言，數量近半，雖多是應命而作，但其內容都同我們所處的時代緊密相聯。

還有幾篇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的文章。這是攸關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前途最重要的問題，過去的彎路與錯誤同此密切相關，今後的發展是否順利也同此密切相關。

最後是幾篇有關三峽的文章，還附錄四十三位專家最近對三峽工程的重要建議。去年五月，我曾應三峽工程負責人的邀請，到工地逗留三天，有過談話，還寫了三首詩相贈。同工程有關的報刊作了報導，行業系統內似也傳開：我這個反對派已樂觀其成。其實並非如此，我的談話主要講到，工程完成後一切可能發生的大小後患和惡果，國家有關方面必須做好準備，加以預防和消除，減少其為害。我的三首詩收入書中，其中委婉道出我的憂慮。第一首的後兩句是：但願無憂更無恙，巫山神女總開顏。

二〇〇三年八月一日



# 目錄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 .....	1
附：1. 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 .....	6
2.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 普遍贊成” .....	20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	30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	64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 .....	86
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	100
迎接新世紀要四講 .....	105
要認真總結這二十年的經驗教訓 .....	108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	111
做人與當黨員 .....	129
對“左”的東西決不可掉以輕心 .....	137
如何不再扭秧歌 .....	139
又談德先生 .....	143
民營經濟與中國 .....	145
應大力支持理論方面的新探索 .....	149
從蘇東坡談起 .....	152
訪談錄：中國的中心問題是民主政治問題 .....	156

《毛澤東執政春秋》序言 .....	161
如何看待毛澤東 .....	168
《觀海樓讀書筆記》序言 .....	171
讀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 .....	175
日譯《廬山會議實錄》序 .....	179
《世紀悲歌》序 .....	181
《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序 .....	184
《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 .....	189
《烏“畫”啼》序 .....	193
《走過五十年》序言 .....	196
《一九五七：新湖南報人》序 .....	199
“信陽事件”及其教訓——《信陽事件》序言 .....	203
《歷史的評說》序 .....	212
《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序言 .....	219
《湘濱往事》序言 .....	228
《劉順元傳》序言 .....	231
懷念帥大姐 .....	235
誰人不仰原前老 .....	239
《孫大光文選》序言 .....	244
記住溫濟澤的最後留言 .....	249
繼承歐遠方遺志 .....	255
哭慎之 .....	257
附：慎之來信兩封 .....	258
《千紀相迎總是春——馮蘭瑞傳記》序言 .....	260
《一個老共產黨人的世紀思索》序言 .....	265

《黎澍集外集》序言 .....	272
附：關於黎澍幾篇詩稿的解釋 .....	276
感懷趙樸老的厚愛 .....	279
幾面之交懷鄧老 .....	282
施嘉燭老前輩百歲大慶 .....	285
祝賀黃乃的文集出版 .....	290
《道奇隨筆》序 .....	295
《趙師梅先生傳略》序言 .....	297
《IDF之父——黃孝宗的人生時代》大陸版序 .....	300
《古詩詞名篇誦讀》序 .....	303
《李銳論說文選》自序 .....	305
《李銳日記》(出訪卷)序言 .....	307
《“大躍進”親歷記》前記 .....	309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前言 .....	312
憂慮三峽 .....	319
附：1. 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卸不了的! .....	348
2. 談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問題 .....	362
3. 三峽工地之行(三首) .....	369
4. 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 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	370
《莫讓江河空自流》序言 .....	382
羅西北水電生涯——《我嫁了個烈士遺孤》序 .....	389
《程學敏水電論文選集》序言 .....	394
《王伊復水電論文集》序言 .....	398

#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

澤民同志並常委諸同志：

十六大就要召開，回顧前瞻，喜憂交集。走上市場經濟軌道之後，國力日漸強大，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問題仍在政治體制改革步伐過慢，民主滯後，法治難張，腐敗之風得以盛行。澤民同志年來幾次講話，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過，要真正保持穩定，要“與時俱進”、“全球接軌”，要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持續發展，關鍵還在改革不合時宜的舊政治體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設，使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的長治久安之道。中外歷史證明，專制極權乃動亂之源；如蘇聯自潰，總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現代化，這是二十世紀尤其二戰後的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個國家如此，一個黨也如此。

毛澤東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大家都記得，當年在延安他同黃炎培關於民主的著名談話。可惜，他的晚年悲劇就在搞個人崇拜與極權專制，上下推波助瀾，影響全黨推崇，導致十年文革災難。鄧小平有鑑於此，一九八〇年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認為“總病根”在權力過分集中，“一把手”說了算；並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遺憾的是，這個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

報告被胡喬木所阻，束之高閣，鄧自己也未能實踐，且導致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辭職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風波。

戰爭年代，我們倡導過三三制政權。關於黨的領導作用，一九四〇年，毛澤東說過：“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一九四一年，鄧小平撰文說：“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應“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認為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與民主的常識。“幾年來，‘以黨治國’的思想曾經統治了某些區域，甚至有些區域的領導同志還長期存在著這種頑固的思想。”“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結果非黨幹部稱黨為‘最高當局’（這是最嚴酷的諷刺，不幸有人聞之沾沾自喜！）”六十年過去了，他們講的這些話仍有現實意義，即國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實行黨的民主化，否則一切都是空的；黨的民主化又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各級要從“一把手”做起），否則也是空的。由於我們黨是“一黨專政”的執政黨，改革幾十年的積習，難於一步到位，須分階段、有步驟進行。黨的民主化與國家民主化自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

關於黨的民主化，提出幾點建議，請予考慮。

一、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幹部廢除終身制，實行任期制，是一項重大決策。應從十六大開始，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屆任期五年，可以連選連任一屆，即在位以十年為限。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四大機構輪流轉的現象，也應早日予以終止。

二、改革領導幹部的選拔制度，從堅持差額選舉到逐步實行競選制。從十六大起堅持差額選舉，各級委員候選人至少應多於當選人四分之一。然後逐步實行競選制，如到黨的

十七大以後，政治局委員、常委與總書記都在黨代會上競選產生。

三、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在它閉會期間是最高權力機關。故“全黨服從中央”的表達不妥，應為“全黨服從黨的代表大會，地方服從中央”。可如人大、政協，實行代表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代表在任期內發揮作用。

為了實現黨內的有效監督，中央與各級黨的紀律檢查（或監察）委員會同中央並各級委員會應為平行機構，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兩個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兩個委員會之間實施制約和監督。

四、充分保證黨內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產生正確決策的基礎。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和報刊上對黨的重大決策發表不同意見，有權在上述場合批評任何黨員直至黨的最高領導人。凡重大問題必須由集體討論實行表決，從中央到各級組織，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說了算。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必須尊重少數；少數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所作決定的同時，有權保留並發表自己的意見。

五、黨章已規定黨必須在憲法許可的範圍內活動，憲法也已有相應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超越於憲法之上。司法獨立乃憲法原則。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政法委是黨內機關，由書記統管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的方針相抵觸。現在還是“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

關於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幾點建議，其中有的關係到憲法的修改，請予考慮。

一、五十年來，國內階級關係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憲法序言中所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

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提法應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實際，即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結構，並符合黨代表人民利益，同時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應擺正黨同人大的關係，不能以黨的名義直接領導和指揮人大，而是通過黨組和黨員在其中發揮作用。關於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額大大壓縮，減少官員比例，代表專職化以提高立法質量，代表選舉辦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專門立法機關。

二、現在我們的國家有憲法而無憲政。我黨責無旁貸，必須帶頭遵憲、行憲、護憲。應迅速成立“憲法院”，並抓緊制定《保護公民利益法》、《社團法》、《新聞出版法》等，使憲法本身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特別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能及時有效的監督政府權力的濫用，必須得到充分保證。黨的宣傳部門應當貫徹雙百方針，活躍自由討論，以此促進社會穩定和進步，而不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輿論，成為新聞出版監控部，這也不准說那也不准講，甚至動輒“查封”、“上名單”，這些錯誤作法，起著破壞憲法和損害黨的信譽的作用。

三、改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職權。應制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各級黨的領導尤其不可干預司法部門的工作，司法獨立審判應貫徹於整個司法系統。各級人民代表由競選產生，並建立同選民經常聯系的制度，隨時接受選民的監督。總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如何嚴格地在憲法範圍內活動，這是關係改革和穩定的根本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規定。

四、作為執政黨，只有自我監督是不夠的。既是多黨合

作制，就應當通過政治協商，實行相互監督。一九五六年曾宣布“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方針，可惜這一方針隨即被反右派鬥爭淹沒；文革期間，民主黨派更是名存實亡。要制定《監督法》，真正實現毛澤東曾經講過的主動樹立對立面、“唱對臺戲”的主張。人事制度方面，應破除現在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只任副職的陳規。

五、現在已經注意三農問題。農民仍窮苦，增產不增收，基層幹部作風不正，引發鬧事風潮，各地時有所聞。村民自治現已推廣，應盡快實行鄉級政權的直接選舉，認真落實鄉民、村民自治，真正實行政務公開，自我管理，並恢復農會組織，讓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與此同時，依據納稅人負擔能力，大幅度精簡各級尤其縣以下公職人員。

最後，關於一九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如何善後，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不追究個人責任，但必須澄清歷史，明辨是非。務望慎重考慮，妥善處理，平服民心。

我今年已滿八十五歲，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憂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當，還望見諒。

十五大召開時，我有過長篇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建議開始總結二十年來（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經驗教訓，談到有些問題不能回避討論（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其中第五個是“胡耀邦辭職問題”。我於前年為此寫出一篇二萬字文章，基本是耀邦自己的述說（題為“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已刊《懷念耀邦》第四集）。現特復印附上，請予過目。另附上中央黨校教授杜光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長文（我不認識作者），內容很是充實，值得參考。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



## 附：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sup>①</sup>

近來從報上看到江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的報道及有關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問題。這確是我們黨有史以來的一個大難題，必須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否則今後還可能出現麻煩，甚至再走彎路。

離職十多年來，我主管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從一大到十三大）的編纂工作（省地縣三級已出版，中央卷近期將面世）；同時自己也寫了一些五十年代的經歷和有關研究毛澤東的書。因此回顧歷史，感想頗多。古人說得好：“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我今年已滿八十，來日無多，本著知無不言之旨（卻難言盡），就回顧歷史談一點感想和意見。

### 一、黨的七十六年歷史最難改的錯誤是什麼？ 一個字，“左”！

王明的“左”傾路線，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經過遵義會

---

<sup>①</sup> 此文為一九九七年九月列席中共十五大時的書面發言，曾在會前寄中央常委。在書刊發表時文字小有更動。

議，到一九四一年延安整風，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總結，從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黨認識，取得了革命勝利。但一些根據地的“肅托事件”，一九四二年審幹搶救運動，解放戰爭期間的土改，仍出現過嚴重的“左”。

建國頭七年，經濟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等方面，成績很大，但也有改造過快等“左”的東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來，走了一條漫長的“左”的錯誤道路：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災難。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走上社會主義初級段的道路。但直到現在，“左”的陰魂從未散去。有鑑於此，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特別講了“左”的根深蒂固的問題。最近流傳的幾個《萬言書》和某些署名意見書，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或即將復關，實質上都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版。可以說，鄧小平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狠抓“一個中心”，堅持“三個有利於”，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和理論，近二十年來，相對的種種“左”的干擾始終沒有停止過。

歷史上“左”造成的惡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裡整）是最大惡果之一。江西時期從富田事變前後開始“肅反”，打“AB團”、打“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托派”、“羅章龍派”等等，直到長征結束才停止。我接觸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三個地區誤殺了四五萬人，加上中央蘇區、湘贛、閩西、閩浙贛等，直到陝北，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十萬人。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只剩下四個黨員。許多地區是自己殺得站不住腳的。

延安搶救運動，康生為主要執行人，說“特務如麻”。

毛澤東也說“特務之多，不足為怪。”幸虧他接受了蘇區肅反的主要教訓，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宣布九條方針，才沒有再開殺戒。但也殺了幾個，如王實味。可是《唐縱日記》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寫到：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唐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二把手，當年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一九五〇年在長沙時，我翻過他的全部日記原件（《日記》現已出版）。

建國之後，肅反發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劃階級。一九五七年前後反胡風，反右派，反地方主義，尤其反右，整了當時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內多高級知識分子與精英人物。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傷及三百八十萬人。“四清”運動，認為有多數基層組織不在我們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敵情，如山冤案，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

一九七八年，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基本結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長歷史。但是積習猶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爺們時有表演，如借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整得周揚抑郁而死；後來還演化為“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搞了二十八天，才被制止。

為什麼會反復出現上述歷史情況？首先是理論與認識問題。

革命時期，“左”的教條主義盛行，同共產國際、斯大林有關，對中國革命的問題在認識上有偏差，包括肅反政策也受蘇共影響。七大前總結歷史教訓的第一個《決議》，討論時雖然平反了一些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但從富田事變開始的“肅反”運動，並沒有做全面徹底的總結。審幹搶救運動，也沒有認真總結教訓。康生這個“肅反大師”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間同“四人幫”結合，在黨內黨外，從上到下，全國各地，制造了千千萬萬冤假錯案。

建國初期，土改完成，認為封建主義已經解決。開始建

設，爭取蘇聯援助，沿用蘇聯模式。毛澤東著的《論十大關係》想擺脫蘇聯某些影響，走自己的道路，但總的方向仍是列寧那裡來的：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時刻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認為今後的鬥爭對象與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且又急於求成。反右結合“反冒進”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搞“一大二公”，平均主義；三年“大躍進”，超英趕美，一度幻想向共產主義過度。結果經濟大倒退，餓死幾千萬人。仍然不接受教訓，轉而從經濟運動完全轉向政治運動；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期間為整個過渡時期，一直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造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終於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清除“身邊的赫魯曉夫”，發動“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亂”。

回顧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中講的“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將中國建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真是感慨萬端。

上述情況同當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有關係。曾爭相輸出革命，兩大陣營對抗競賽，總認為東風壓倒了西風，資本主義已到垂死階段，帝國主義日落西山。赫魯曉夫揭開斯大林蓋子的後果，導致我們長期的反修防修，同國內“左”的路線緊密結合。

總之，如鄧小平所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根本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儘管近二十年來，我們從實踐中解決了“一個中心”，改革開放，農村聯產承包，經濟多元化，發展三資企業等等。同過去路線相比，可說“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步履蹣跚，遲遲未能突破，導致幾次失業高峰。這方面從實踐到理論都有待新的發展——前無古人的發展，必須突破馬恩列斯毛不適用於當今世界實際的過時或失效的論

附：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

迹。這方面我們要學習當年毛澤東的氣概，不要怕馬克思，我們做的已超過了馬克思。

## 二、發生以上革命和建設兩個階段長期“左”的錯誤，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經提到，首先是理論和認識問題。說的簡單一點，兩個時期都吃虧於“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長期局限於階級鬥爭和“消滅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馬恩的學說產生於十九世紀的西歐，他們根據西方社會歷史的發展和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得出來的結論，怎麼可能一概適用於一百多年後的東方與全世界呢？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是發展的，是不能停滯的（真理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有同有異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不能怪馬克思，也不要怪列寧、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況我們並沒有遵從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人類歷史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和經濟制度，而不是上層建築，後者對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我們全部顛倒了。

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是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理想提出來的。西方早期社會主義者囿於小生產的狹隘眼光，只能從道德上抨擊初期資本主義的丑惡現象，無法找到實現自己理想的物質基礎。馬恩繼承了早期社會主義者追求的社會公正的價值觀，根據產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與社會兩級分化，看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力量所在，從而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是“消滅一切私有制”。他們對社會主義如何實現公有制，不可能作具體設想。列寧急於消滅私有制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碰了釘子後，改行新經濟政策，而且認為過渡到社會主義將是長期的過程。斯大林沒有繼承列寧

的路線，反而批判布哈林，從理論到實踐，認為只有採取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完全的計劃經濟（消滅商品），才能實現社會主義。蘇聯幾次宣布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了。可是歷史證明，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還在經濟的失敗（現在還有百分之四十的國有制），民心不滿，首在商品的匱乏。國有制經濟並非社會主義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種教訓。

我們走過長期的痛苦的彎路，終於認識清楚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適用於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總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強，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只有通過市場經濟，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鄧小平理論上的一大突破。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規定為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級分化（追求社會公正）。近二十年的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的正確。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這一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要繼續發展。

過去我們講慣了“興無滅資”，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惡的東西，只能永遠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近二十年的對外開放，來往交流，終於提出“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相信馬克思如還活著也會這樣說的）。因為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殖民制度的崩潰，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誕生，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全球市場的統一，冷戰的結束，世界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資本與市場，階級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藍領縮小，“白領”擴大）。總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在變化，生產關係也在變化，更不要說社會保障制度（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條件）的日趨健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及其生產關係並沒有固定下來，還在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更是如此。他們兩者之間生產關係的變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種共性與交叉之處呢（西方有一種“趨同論”，我們理論界有

人批判過）。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包括股份制）發展，就包含有社會主義因素。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馬恩也說過）。我們從來反對“改良主義”，但能夠逐漸改良，用和平的手段發展、變化，究竟有什麼不好呢？蘇聯“和平演變”了，究竟是他自己之過，還是人家“演變”的呢？應該弄個清楚，立場只應當是一個：走共同富裕道路，手段各自為之。

除開思想認識的理論問題外，根本原因還有一個體制問題，即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還沒有做好，這就同民主化的問題有關。

我國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長達二千多年的國家，儒家命根三綱六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從秦始皇到蔣介石，一直是一個個人專斷、家長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國家；當然也是一個權力無限，濫用權力，沒有監督與法治的國家。這種專制傳統也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黨與我們的新中國。

革命和戰爭年代，地下黨與根據地的黨，對敵鬥爭尖銳，戰爭環境、軍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黨政不分順理成章。但當年也還有某些值得回憶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風開始，廣泛填寫“小廣播表”，就逐漸不敢隨便說話了。建國之後，戰爭年代的這些傳統不僅繼承下來，而且歷次運動有所發展。因為敵人變成了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有文化的人，於是階級鬥爭更轉入思想意識領域。毛澤東毫不諱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不過坑了四五百個儒生，我們打了幾十萬。一個以反封建專制主義為天然職志的共產黨，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一句頂一萬句”；“四人幫”搞封建法西斯主義，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不能不令我們深思。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極其重要的講話，講話著重講了“權力不宜過分集中的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的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度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

“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我們的組織原則中有一條，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說的是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之間的平等關係。不論是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或者是普通黨員，都應以平等態度互相對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



應當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當履行的義務。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向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一些同志犯嚴重錯誤，同這種家長制作風有關，就是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所以能夠形成，也同殘存在黨內的這種家長制作風分不開。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

“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

摘引這麼多鄧小平《講話》的原文，是以其正確性和權威性來說明，經過十七年之後，《講話》中所批判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影響，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作風，特權思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備和很不受重視等等方面，都還沒有很好解決。政治體制改革不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必然影響經濟的更好發展，尤其使得國有企業的改革遲滯不前。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生活準則》，十二個問題中有四個問題同上述《講話》是一致的：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要講真話，言行一致；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准搞特權。“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見，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對人對事要開誠布公，有什麼意見，有什麼批評，擺

在桌面上。”“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做實事求是的模範。在工作中，各種不同意見都要聽，成績、缺點都要了解。要鼓勵下級同志講心裡話，反映真實情況。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讓人當面提意見包括尖銳意見而進行從容討論的氣氛。”“發揚黨內民主，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對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所謂不抓辮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誇大一個人的錯誤，羅織成罪狀，並給予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甚至迫害。”“黨內在思想上理論上有不同認識，有爭論是正常的。對待思想上理論上的是非，只能採取擺事實、講道理、民主討論的辦法求得解決，決不能採取壓服的辦法。有些思想理論是非一時解決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現實性的問題以外，不要匆忙作結論，留待以後進一步研究和經過實踐來解決。”

這個《生活準則》規定得多麼好！可是十八年來，這些《準則》實行得如何？周揚事件就是這個《準則》通過不久之後發生的。

正確路線制定與執行，黨及其領導威信的建立，國家各方面事業的正常發展，除開要解決民主化的問題外，還必須解決科學化、知識化和法治化的問題，這四化也是互相關聯的。我們黨幾十年來，領導革命與建設，尤其後者，這四化的建設與貫徹，一直在曲折中前進；歷史教訓我們，沒有這四化的保證，我們的事業是不能取得勝利的。

### 三、建議開始總結這二十年來（一九七八到一九九八年）的經驗教訓

本世紀前徹底弄清楚我們走過的道路，以及世界整體發

展的趨勢；總結最主要的成功經驗，更要記住最關鍵的錯誤教訓，從而避免再走彎路，二十一世紀走上康莊大道。因此，建議像總結前兩個《歷史決議》一樣，作出我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當然，什麼時候辦這件大事，要由時機成熟而定，但這件事是非辦不可的。要允許個人思考，也要讓學術機構研究；是自發進行，還是有組織領導內部“動態參考”，還是允許報刊討論；總之，要積極進行，爭取主動。其實許多事境外議論甚多，書刊出得不少；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前兩個《歷史決議》，當年都進行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尤其第二個《歷史決議》全國四千人參加，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去掉一切個人恩怨，以黨和國家的前途為重，指導思想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相信這件事終能辦好。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二十年能這樣走過來嗎？何況這二十年中並非沒有曲折，沒有艱難，沒有干擾。

粗粗想一下，有些問題不能回避討論：

——是否存在、為什麼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問題？這二十年‘左’的表現有哪些？今後如何防“左”？如果說這二十年有“右”，又在何處？

——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是否即引進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否已經復關或存在嚴重復關的危險？在我們社會主義政權領導控制下的資本主義企業、集團，其發展同西方是否會有同有異？革命時期就有“紅色”資本家幫我們的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資本家、企業家是否會多少帶些“紅色”？

——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區別或關係，如何以公有企業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資”的問題，我們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異何在？

——社會主義初級段怎樣具體定性，主要是政治、經濟和理論三個方面，以及同歷史上人家（前蘇聯、東歐）與自己（一九七八年前）及馬恩列理論的同異何在？初級階段將經歷多長時間？幾代人，幾十年，一百年？還是更長或說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胡耀那辭職問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風波與趙紫陽下台問題。

——鄧小平南巡前後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

以上幾個問題同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其辛酸痛苦的歷史過程，同兩者能否和平共處、如何和平共處、相互發展，以及兩者同人類前途命運的關係等等，都密切相關，應當對之作出科學的解答。

#### 四、中國今後的危險是什麼？

從保證黨今後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使我國經濟與社會生活更加順利發展，考慮我們有哪些存在和潛在的危險，這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粗粗想來，是否有這樣幾個問題：

1．封建專制主義的余毒是否在各級幹部中還不同程度存在？家長制、搞特權、個人專斷、聽不得不同意見，等等，情況如何？最近看到一份《一九九六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報告》，一共二十六起，多逼得農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也有打死人的。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縣、鄉幹部共一百三十五人。

2．人們都議論黨的威信下降，腐敗蔓延，失去民心，情況究竟如何，怎樣界定？過去罵蔣介石是“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恐怕從來是實情。記得反右前，

附：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

毛說過，要鼓勵民主黨派同我們唱對臺戲。隨後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當時可能真是這個念頭。無奈波匈事件，“右派鳴放”，整個歷史就走入彎道了。我們黨如何進一步健全民主和法治？除了任期制、選舉制、民主生活制度，還應有什麼制度？自己是難以很好地監督自己的。中紀委（監察部）如何加強權力，發揮作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黨管什麼？《國際歌》唱“沒有救世主”。多黨制，輪流執政，當然談不上；但如何能保證黨不犯錯誤？過去我們是吃盡這方面苦頭的。黨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種限制的（恩格斯說三條：歷史時代、知識經驗、思維能力），還應當加一條：個人品德。

3·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如何防止新的資產階級作爲一個左右社會力量的階級的出現？如何防止這個階級對社會生活發生嚴重的副作用，國家如何從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種經濟成分如何服從“三個有利於”，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如何相得益彰？

4·國外威脅問題。對國際形勢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種怎樣的理解與認識，如何對付？蘇聯的外部教訓何在？美國爲首的西方對蘇聯的崩潰起了哪些作用？這方面我們要注意些什麼？我們搞過“反對和平演變”，應當怎樣認識和估計這一舉措？

5·香港與臺灣問題。要充分認識香港尤其在經濟上的國際地位。爭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歸。如何發揮香港的正面作用？大陸、港、臺經濟能否做到“一體化”？如何分化臺獨，爭取民心？解決臺灣問題關鍵何在？

6·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水土流失已佔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導致洪水災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壞事？有關系統應該總結治水的經驗教訓。三峽工程要接受三門峽教訓，水庫

形成後，可能出現哪些嚴重問題，怎樣防范？

7·教育乃立國之本。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多又素質不高，社會無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經出現過三次失業高峰。普及義務教育，如何提高全體公民的素質？世界今後的競爭主要是經濟實力與科學技術的競爭，也即是人才競爭。關於提高素質的教育，人的素質靠什麼保證？我想起《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還使我想起魯迅說的一段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於北京醫院

##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

### 普遍贊成”<sup>①</sup>

二月二十日下午，八十六歲的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記者的獨家專訪，圍繞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談了一系列敏感話題。

#### 曾經打算聯名寫建議書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給中央常委的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在今年第一期《炎黃春秋》上以《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為題發表，具體情況怎麼樣？

李銳：《炎黃春秋》發表時，將最後一段刪節。我先講講這個意見書的過程。我們有些老同志，平時碰面時很關心當前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十五大我不是做過長篇書面發言嗎？十六大要召開了，因此就想到再寫個東西。曾經打算找幾個中顧委委員、中科院院士，聯名寫建議書。後來考慮這個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見還是各人提吧。

<sup>①</sup> 原刊二〇〇三年三月三日《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採訪者：E 永治。

## 五 小平為何未能實踐自己的講話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在建議中提到，鑑於毛澤東晚年錯誤導致文革浩劫，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報告，認為過去總病根在權力過分集中，一把手說了算；並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但講話被人所阻，沒能貫徹下去，這人是誰？

李銳：當年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信中我是寫了名字的，即胡喬木。那時出了波蘭團結工會的事情，他堅持“左”的立場，趁機做文章。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小平講話很明確，但您說他自己也未能認真實踐，給歷史留下了遺憾，為什麼？

李銳：十五大的書面意見中，我曾建議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到七個問題。包括胡耀邦辭職問題。我講這麼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據說，第三代領導接班的時候，小平講了這樣三句話：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個歷史決議是四十年代在延安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認為在經濟上小平是抓得很緊很正確的：“不要問姓社姓資”，“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從理論到實踐都很正確。試問：不搞市場經濟，不進入WTO，中國經濟怎能出現當前的局面？小平在經濟上堅決反對過去“左”的一套，看到苗頭不對，才有一九九二年的南巡嘛，將經濟滑坡向左轉的局勢挽救過來了。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



但是在政治體制上，領導體制上，他認為中國這麼大，這麼多人，七嘴八舌，沒有一個權威是不行的。對資本主義政治體制，所謂三權分立，他是堅決反對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後，又接受“左爺”建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認為胡耀邦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後臺。

中顧委沒有解散的時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間，有一年，薄一波還傳達過小平關於權威主義的講話。這來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贊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認為沒有權威不行。胡耀邦辭職，實質上是政治體制不改革上出了問題。

一九八〇年小平那篇擲地有聲的文章，是由於當時李維漢跟他一次長談，講我們過去的問題還是封建專制主義。毛搞個人崇拜，專斷獨裁，根深蒂固，政治體制不改革不行。實際上蘇聯垮臺，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獨裁所致。

爲什麼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閣？歸根結底，除了胡喬木等影響外，還是他自己擺脫不了舊的認識，舊的習慣。我十五大那篇書面發言，要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經驗教訓，就包括總結小平的錯誤在內。犯錯誤難免，重要的是要總結教訓，才能避免重犯錯誤。

## 建議得到高層回應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你們認為《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領導所接受？

李銳：我的建議，好像接受得比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我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必須民主化、法治化的問題，證明是一個普遍的大家都關心的問題。現在傳出來，中央領導都贊成這種意見。這當然給大家一個希望。

## 常委任期五年，十二大後已經解決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建議中央常委任期五年，連任一屆。有實現的可能嗎？

李銳：這實際上是廢除領導幹部的終身制。這個問題，十二大後已經基本解決。後來小平退出常委，已經身體力行。胡耀邦早就講過，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來。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還提出領導幹部不能在黨、政、人大、政協輪流轉。

李銳：我認爲這個不太好。這意味著領導幹部並沒有完全退嘛，實際上把人大、政協變成很次要的崗位，只有黨的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對現在各省、市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怎麼看？

李銳：兼任的利弊到底怎麼樣？我說不清楚。如果把人大當作立法機構，它區別於執政，那麼一個地方黨的書記兼任人大主任還是可以的。如果爲了一把手說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將來還是要用選舉的辦法來解決。現在，我們的幹部還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決定制，並不是真正的選舉制。黨內也好，人大也好，各級政權班子，應該實行真正的選舉制，這可以從基層開始。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建議十七大以後，政治局委員、常委和總書記都在黨代會上競選產生，有可能嗎？

李銳：這個很難講，也許有這個可能。五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變化。如果真正按憲法辦事，即逐步實施憲政，當然有希望。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有報刊討論人大和政協實行代表職業化制度，您認爲其難度在什麼地方？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

李銳：現在的問題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數太多。人大是立法機關，代表應具備相應的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當然，代表要代表各個階層，工人、農民都得有。如果難以一下子改變，那麼人大常委會常任制，實行職業化，應該好一點。

### 政法委書記統管公檢法不合理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關於司法獨立，目前議論比較多，黨委直接干預公檢法的事很多。您怎麼看？

李銳：政法委是黨內機關。黨的政法委書記統管國家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的方針相抵觸，是不合理的，等於黨直接干預司法。十四大還是十五大時討論過這個問題。問題在我們沒有真正把黨政分開。我們還是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所以講來講去，根本的問題還是在黨。這個不改善，一切無從談起。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觸過執政黨和一黨執政好不好的問題。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在建議中提出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五個措施，其中提出搞《政黨法》和《參政法》。您是怎麼考慮的？

李銳：就講一個問題。現在搞這麼多幹部，都是吃國家財政飯。一個政黨在國家、社會和全體人民中，處於一個什麼位置，負什麼責任，怎樣操作，包括其經費來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談到執政，我們國家現在是兩張皮，黨政不分、難分。上上下下還是“一把手”說了算。權大於法，“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所以我的意見書開篇即說：“問題仍在政治體制改革步伐過慢，民主滯後，法治難張，腐

敗之風日益盛行。”

## 毛澤東七大講話未公開的內容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黨派只任副職的陳規，可能嗎？

李銳：民主黨派任副職，實際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個擺設。任正職就不同了，有個責任問題。在開國之初還有民主黨派任正職。但後來就沒有了，特別是反右以後，到“文革”就更不用講了。

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現在已經出了書。他的口頭報告，我當年聽到的傳達，講有這樣的話，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口頭講話，跟後來的文字稿，也截然是兩回事。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這麼說，反右並不開始於一九五七年，實際上醞釀於延安時期？

李銳：在延安時期，從對人對黨員的思想控制（做馴服工具），到樹立毛的個人絕對權威，是通過整風運動完成的。毛的心態是：領導這個黨（這個國家），非我莫屬，都要聽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劃界線。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革”，可以說是延安整風的繼續和發展。最近，答羅稷南問，“魯迅反右時處境如何”的答復揭露出來後，大家對毛的作風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決不放過一個“異己分子”。（注：羅稷南當年與趙丹、黃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請。宴會中，他問主席，如果魯迅活著，在反右運動中會怎樣，主席回答，要麼他不說話，要麼關在監獄裡。黃宗英在會議記錄中對此有專文記載。）

這個問題，我一九九二年寫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

誤思想初探》一文，八萬多字，說得比較清楚。當時《橋》雜誌整期刊登，後來收到《李銳反“左”文選》一書裡。

## 中國最大的危險是人治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還是在十五大的書面發言裡，您當時認為中國面臨七個危險：封建專制主義余毒依舊存在；黨的威信下降，腐敗蔓延，自己難以監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資產階級作為左右社會的力量出現；國外威脅；香港與臺灣問題；自然生態環境問題；中國人多而素質不高的問題。現在，這七個危險是否依舊？

李銳：最大的危險是人治。只談一件事情，現在全國錯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經濟案件。有一個省的一件經濟案，牽扯到香港的投資。上一屆的幾位省領導，將案件材料寄我，讓我轉交中央有關領導處理。從一九九八年開始，直到現在，轉上去十幾次信件，由於牽涉到現在的省領導，至今解決不了，錯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書，提出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國，是有自己幾十年的切身體會而言的。

黨內沒有民主，國家也就難有民主。所以不能搞黨高於一切，“一把手”高於一切。我為什麼在十六大建議中引鄧小平的話呢？他一九四一年撰文說：“應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那時共產黨沒有得天下嘛，小平講得比較合理。此文是《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提議的總結改革開放的二十年的經驗教訓，做出“第三個歷史決議”，估計何時能搞呢？

李銳：那要看以後形勢的發展了。當然，教訓都接受了，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實現了，不做出這個決議也沒有關係。

## 憲法是防止權力濫用的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這些建議的突破點是什麼？

李銳：胡錦濤總書記上任後，第一次公開講話是談憲法，紀念新憲法頒布二十周年。他在講話中說：“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能及時得到糾正。”

憲法首先有一個修改問題，如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還沒有正式明確列入憲法。憲法的實質是監督政府，就是賦予公民監督政府權。西方幾百年是這樣走過來的。在我們革命過程的習慣上，執政幾十年，權力在黨的手上。

憲法是防止權力濫用的。我們黨權高高在上，個人說了算，這實際上是權力的異化。我們號稱來自群眾中間的黨，不能變成統治群眾的黨。所以我提出制定《政黨法》和《執政法》，成立憲法法院，就是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政黨怎麼執政，要有法律。政黨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報告提黨政分開，十五大報告提出依法治國，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問題在實幹，要說到做到。

## 對毛澤東繼續造神，對黨史繼續造假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您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參與討論第二個“歷史決議”時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後，如何監督黨的領袖，防止搞獨斷專行，國際國內都沒解決好。您現在怎樣看這個問題？

李銳：一九八九年後，出現過“毛澤東熱”，至今並未衰竭。如有關宣傳毛澤東個人的各種著作，現在不下幾百上千種。現在基本上在繼續造神；在黨史上也還在繼續造假，

訪談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

把許多真實情況隱瞞，繼續擦胭脂抹粉。例如，有關“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區。許多有關毛和黨史及反右派、大躍進直到“文革”的書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們這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家，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做法，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是不容易徹底清除的。在西方，“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文革”那一套，難道不就是邪教嗎？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搖小紅書，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馬、恩、列、斯、毛、鄧，從理論到實踐，他們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要發展，都必須搞清楚。毛澤東的陰影現在仍然籠罩著我們。我們必須把毛澤東搞清楚。這樣才心中有數，以後就不會再重復錯誤。

總而言之，一個黨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必須講自由民主，講科學，必須法治，不能人治。黨不能搞“一把手”說了算，把個人抬得高高的。

要講信仰，只能信仰科學，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個個人及其學說。信仰屬於宗教。馬克思的名言是“懷疑一切”。科學與真理的發展是無止境的。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繼續反思、總結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會不會導致像蘇聯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樣的問題？

李銳：不會，毛澤東的正確東西不會丟。中國的農民不會起來推翻共產黨。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較聽話，比較照顧大局。現在國際國內環境同過去大大不同了。現在的領導同過去毛的時代也相對不同了。

### 中央領導談憲法是個信號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政治體制改革遲緩，會不會導致洋務運動的後果？

李銳：也不能說政治體制完全沒有改革。比如現在我就可以這樣自由講話。人大、政協還有不同的聲音。估計各級領導到中央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聲音才能有進步。

過去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劉少奇、周恩來都難有發言權。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有不同的聲音，就導致了那樣悲慘的結局。這種歷史當然不會重演了。因為時代不同了。現在各級領導幹部都是“幹部四化”以後上來的，盡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但都是改革開放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目前最大的任務是經濟發展。現在私有經濟的產值已經佔全國一多半了。

不過，根本問題是要解決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體制不改革，人治的問題不變，經濟上也會有問題。腐敗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為基數的縣以上的幹部犯罪，省部級幹部犯罪，已經上百了。這真不得了。問題就是領導的權力太大，黨和國家沒有很好的監督機制，尤其輿論一律，沒有輿論監督。

現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關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憲法，要有言論自由。

中央領導談憲法，是個信號。《炎黃春秋》沒有挨批評，反受到稱贊，希望這也是一個信號，言論有了點自由的信號。



##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當天就得到噩耗，真如晴天霹靂，因前天鄰居秦川還告知，危險已經過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靈堂行禮，不禁淚水盈眶，將一首悼詩交德平。歸途我們還到人大會堂習仲勛住處，了解喪事規格確定經過，有種擔心，怕出亂子。晚上，為《新觀察》草小文一篇，題為《活在人心便永生》，為悼詩末句。

就在十天前的四月五日，我應邀到耀邦家中做過一次長談，從下午兩點半談到九點半，他精神很好，記憶清楚，毫無倦容。晚餐還特為我做了家鄉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談了十個問題，其中涉及許多分歧。在這些分歧中，他並沒有什麼錯誤，執行的是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在那個“生活會”上卻被逼得做檢討。他最後談到，“如果中央重新給我做個符合實際的結論就好，不做也沒有什麼，去見馬克思也是安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顧委為悼念耀邦開支部會，我最先發言，講了同耀邦的談話，說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後一次如此長談。我說，由於突然去世，他的要求重新結論便帶有遺囑的性質。因此，請中顧委將我的這個意見正式轉告中央。我簡要說完後，張光年發言為耀邦鳴不平，霍士廉等贊同我的意見。陳丕顯問我：你們談話時旁邊有人沒有？我說，有一

個幹部子弟始終在場，後半截德平參加了。由於十點鐘我還要趕去參加《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報導》聯合召開的悼念耀邦的座談會，就提前退席了。

四月十五日夜寫的那首悼詩，是這樣四句：

天下奇冤一掃清，神州莫再有冤靈。

此情此景張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寫耀邦堅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之舉。第二句語帶雙關：即是耀邦的心願與在位時的作為，又為耀邦訴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個冤靈！第三句是寫他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張家界時，成千游人濟濟於道，爭相握手，要求留影；隨後到南寧，只好足不出戶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靈”。多年來，這七個字在我的腦中時常縈回著，他同我最後的長談、他的遺願，也總想將它公之於世。我覺得這是一份責任——不可推卸的責任。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開始整理談話記錄，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完稿。現在特將他同我的三次長談按時序整理出來，並將其間有關交往寫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靈。歲屆耄耋，總有“汨余若將不及”的感覺，及至整理完畢，才像卸下了一副擔子。

### 對耀邦的認識加深

我的老伴有兩個很熟的幹部子弟夫婦延濱和元元，他們的父母同耀邦夫婦關係密切，元元的母親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學。在耀邦的追悼會上，我見到他們兩人同家屬站在一起。他們常來我家，於是元元有時就成為我同耀邦之

間某種交流的“中介”，即交流必要的信息，也從她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觀點和為人處世的特點。現在還零零碎碎記得一些：

耀邦否定“文革”最徹底，真理標準討論最堅定。他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於“左”禍的肆虐，可謂刻骨銘心。

他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原則，熟悉西方這方面的發展歷史，很願意接受外來的新思想。

他對毛澤東的認識是全面的，還在“文革”時便不盲從，心中有數，常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獨立思考。

粉碎“四人幫”後，他有三個建議：停止批鄧，平反冤假錯案，抓生產。真理標準討論時，阻力不僅來自華國鋒、汪東興，胡喬木就反對。平反冤假錯案，汪東興不交一、二、三專案辦檔案，一些專案的甄別，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爐灶搞調查。

在中紀委時，他力主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應健康發展，一定要避免過去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的錯誤，並主持了《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起草。耀邦是在這個最根本方面抓黨的建設的。

抓年輕人的選拔，他比誰都積極，緊抓不放（在選拔第三梯隊工作中，我有親身體會。有些人不過是口頭講講而已，有些人只重視幹部子弟或過分關心自己兒女，有些人還硬要“老中青三結合”、“扶上馬走一程”）。當年趙紫陽、紀登奎被上面重視。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薦過紫陽到團中央接班。

他沒有任何拉幫結派思想，很反感“誰是誰的人”這種說法。他常說“我是黨的人”。“毛澤東、朱德、葉劍英、賀龍、譚政……對我都幫助過；林彪對我也很好，抗戰勝利後，爭取我同去前線。”林彪事件後，他更加深了對山頭、

宗派的認識，說：“這最脫離群眾。”

他一生好讀書，重視知識，尤重視有知識的人。“思想敏銳，口若懸河”，在延安得到毛主席這樣的贊賞。

他常講要愛護知識分子，並盡力保護他們中受過整的人。“文革”後，堅決反對過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張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不是停在口頭上，而是認真貫徹於一切方面，要見諸行動。

當然，他也不是沒有缺點、弱點。雖然遇事總經過深思熟慮，但有時過於熱心，講話多了，難免有失。他同權術無緣，從不設防，遭人暗算而不覺。“文革”後，“多換思想少換人”的幹部政策，對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過意見的。

耀邦下臺之後，聽到他在“生活會”上受到的那種攻擊，大家憤憤不平，同時極其關心他的情況。我當即寫了這樣一首七絕送他，表示某種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右逢源仇又親。  
黑白紋枰輸後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並讓元元帶去一本錢鐘書的《談藝錄》，將末句寫在扉頁上，供他翻翻，移情養性。同時還將我的《龍膽紫集》和《論三峽工程》送上，請他一閱。後者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該書序言交《人民日報》後，清樣送到書記處，有人說我的閑話，耀邦沒讓發表。原來我並不知道他也喜好舊詩詞。不久以後，元元帶來他寫的三首詩讓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兩首五言古風《贈李銳》、《戲題李銳同志不贊成修三峽水庫論著》。看來他比較了解我這個人了，也知道三峽工程的詳情與要害了。詩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後兩句委婉道出莫立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斷流想，斷流永使妾哀傷”。三首詩我作了些格律上的修正，讓元元還去時，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順便送了他十來本舊詩詞和有關格律的書。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元元來家，告訴我，耀邦叔叔明顯瘦了。聽家人說，那些檢討的、被指責的東西，其實很多是小平說過的。我們當時也都奇怪，何必匆匆做這種檢討。

七月十九日，我的日記記道：（括弧內的話是筆者按語）：

元元夫婦來。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單獨談話。元元一開始向耀邦講了我們大家對他的關心，談了我們對他的看法：黨有史以來最民主的（領班人），選中了；要從全局考慮自己的問題。元元轉述的耀邦談話要點，有以下這些：

下來這幾個月，不看電視，專心閱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是“文革”時讀的），作了一些筆記；並將過去幾年自己寫過或講過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過的記錄，好幾百萬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並沒有什麼錯誤。

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sup>①</sup>。這是小平同我倆人私下談話，當時很贊同。總書記的職務辭過幾次。六中全會時向中央寫過報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一九八七年紫陽代理總書記後，在議論幾位老人中誰全下、誰半下時，紫陽提出小平還是留在常委好，因為大事還得他管，這樣名正言順。於是因此有人說耀邦不聰明。耀邦曾因此大聲說：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

沒想到開“生活會”，竟採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號文件”是羞辱（一九八七年中央發的“十九號文件”，羅列了耀邦“在經濟工作方面的一些嚴重

① 一九八六年五月，鄧小平約胡耀邦來家談論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說，我已過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可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錯誤”、一月二日給鄧小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十五日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上的《我的檢討》、《我的表態》)其中許多話並不是我說的，有的是造謠。如請日本青年三千人來，是外交部申請件：到一九八九年末一萬人，常委都圈閱過，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總書記這點權力都沒有？(此事在中顧委的支部會上，我也聽到過對耀邦的攻擊。)

我還是謹慎的。領導人的退休制過去小平、紫陽都講過，我就沒講過。那時考慮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線制。搞退休，傷老同志的感情。

香港的東西，過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擾。

今後四個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兩條：一是自己已經七十一歲多，自然規律不行了。二是希望黨好起來，但是否可能？(元元說，耀邦叔叔有極度失望之感。說過去一起鬥爭幾十年、互相信得過的老朋友，如王鶴壽的揭發，當然傷心之至。)

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種歷史現象的發生，要尋找根源，發現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

“文革”當然不好，發生了之後，其結果好：不會再發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觀。

(粉碎“四人幫”後，關於中國的前途，陳雲曾找耀邦談過三天，談到的一系列問題，之後在《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中，都有過反映。元元說，耀邦叔叔對陳雲一直很尊敬。)

在黨校負責時，提出是按當時的中央文件<sup>①</sup>講課，還

① 指“兩個凡是”那些東西，如說“四人幫”也是“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胡耀邦不同意這個判斷，他提出一個問題：“在思想政治或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

是按馬克思主義講課？

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六中全會前在北戴河討論時，陸定一就建議在文件中刪掉，萬里贊成。全會討論時，他們兩人仍堅持這個意見。我只說求其穩妥，現在還是保留為好，將來再考慮是否去掉。最後都歸咎於我（全會中這一幕，我是親身經歷的，定一和萬裡的發言，引起全場熱烈掌聲，尤以右側中顧委席掌聲持久。最後鄧小平講了不多的話，要害是：“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後來我被逼得做檢討。

元元說，她幾次聽耀邦談到，在原則問題上他是沒有錯誤的。元元感到耀邦叔叔的心靈受到很大傷害，於是對他說過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說，不管你是總書記也好，不是總書記也好，我們感到最親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無愧於世，對得起歷史；你十四歲參加共青團，經過那麼多黨內鬥爭和政治風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誠。這都是為人最寶貴的東西。耀邦聽後笑了，說：對的，馬克思也講赤子之心。

### 在組織部時的一次長談

耀邦從總書記職務下來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關係，沒有歷史淵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時，聽說過胡耀邦其人，都是稱贊的話。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周總理帶隊查勘三峽壩址時，同坐在船上，有人在下圍棋，我們都是旁觀者。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不在一個組，《簡報》上似乎沒有見到他有什麼發言。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從秦城監獄釋放，仍回到安徽磨子壩水電站過勞動生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清晨，我從廣播中聽到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

組織部部長的消息後，連夜寫好要求平反的長信，第二天發出。與此同時，我的二姐李英華（三八式）和女兒李南央，幾次找到耀邦家。於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醫院治病，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我回到北京復職。這年寫《懷念田家英》文時，田還沒有平反開追悼會，文章寄《人民日報》擔心難以發表，特先寄給耀邦審閱。他立即批示：沒有什麼不可以發表，還贊許有魯迅文風。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調到中央組織部，五月就參加了十二大的人事小組。耀邦是組長，副組長是余秋里、程子華，日常實際工作由秋里負責。組員有十多人，我負責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人員由中組部辦公廳主任等組成，同各系統和地方聯系，編輯《簡報》供中央參閱。工作地點在玉泉山，大家都住在那裡。十二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小組也由耀邦負責（胡喬木副），也住在玉泉山。耀邦來參加人事小組會的次數不多。人事小組的任務是準備十二大的三個名單：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在玉泉山住了三四個月，工作當然是繁重復雜也很艱難的，有時進新退舊一個人，要作許久調查，反覆研究，花很長時間才能定案。記得我向耀邦作過兩次或三次系統匯報，他平易近人，交談很是隨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一個原十一大中央委員的去留問題，是煤炭系統的，在“文革”中欠了賬，當年頗有點名氣的中青年。我們同耀邦來回爭論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後他服從了大家的意見，這個人不保留了。

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五歲，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定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將這個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員入選特別嚴格。據說這件事中組部曾拖了一年沒辦，原因在部內地方、經濟、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統幹部，當然也包括選拔青年幹部，單獨成立這樣一個局，豈不像當年國家計委內有過的“小計委”。我知道這是



一件極其艱巨的工作，自己有過當年在中央漩渦中翻滾過的經驗，不願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陳雲的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能上不能下”，只當個局長，而非部一級名義。於是我就只好服從了。中央定的“幹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以及據此選拔接班人即培養後備幹部隊伍（當年稱建立第三梯隊），我是衷心擁護、堅決執行的。中組部青幹局具體任務是選拔省部級後備幹部（最終考察了一千來人）。這個任務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自己當時似有這點感覺，從耀邦（他是總書記）這方面來看，我大概還是可以信任的吧（由於“我行我素”，後來我終於遭遇到“解鈴還是系鈴人”的一幕，這裡就不談了，因為文章是寫耀邦）！在那個人事小組上，我也被推選並被批准進入中央委員的名單，這是絲毫沒有精神準備的。接著就開十二大，其歷史意義大家都清楚的。我曾應《詩刊》之命，寫過歌頌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後一幕，報紙沒有作過報道，也沒有留下一個鏡頭、一張照片。大會就要結束了，傳來耀邦的話：新當選的中央委員中的中青年，要我選三四十人向政治局作介紹，先印出個簡歷。此事可說駕輕就熟，很快就辦好了。大會閉幕當天在人大會堂的一個廳，記得葉帥、小平、陳雲、先念、鄧大姐、彭真等都到了（廬山下來後沒見過葉帥，老人還認得我），耀邦主持，讓我一一介紹。老人們笑容滿面，很是高興。

十二大之後到一九八四年歲末離職之前，由於工作關係有時列席書記處會議，親眼目睹書記處開會情況，以及總書記如何主持會議並處理一些事務。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我也列席過中央的一些大小會議，曾親眼目睹過毛澤東執政時的情景，使我感到我們確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言

堂開始變為群言堂了（不過書記處的會，兩位老人是不參加的，新時期我無緣列席常委會）。總書記在人們面前是平等的一員，他個子矮，有時發言似乎比別人還矮一點。胡喬木總是挨著耀邦坐著，顯出某種監護的樣子，令人不快。有關人事處理記得兩件事。一件是，討論到有關問題，胡喬木發言，聲色俱厲地說道：周揚、夏衍、巴金是三個自由化頭子（聽說王震在中央黨校也罵過“那個姓巴的……”）當時大家都不搭腔，也就過去了。耀邦能保護好巴金，卻保護不了周揚。第二件事是有關《人民日報》的人事。自批判“兩個凡是”，耀邦還在中央黨校時，就同《人民日報》合作得很好，報紙真正起到了貫徹改革開放路線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喬木、鄧力群的攻擊，這是他們指揮範圍內沒能控制住的最後一個重要陣地。大家知道，自胡績偉、王若水被整下去後，報社不聽他們的指揮的剩下一個秦川。這件有關《人民日報》人事處理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對我這個人的印象。

就在這個時候，耀邦同我作過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一九八二年到中組部後，我沒有間斷過寫日記，所以許多事都還可以如實寫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日，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廿一日下午三點，耀邦約我談話。當時想到可能是要聽聽我對人事等方面的意見。前幾天參加書記處討論廣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調整問題和“文革”遺留問題時，耀邦談到柳宗元的文章《駁復仇議》，其中有句：“親親相仇，共亂誰救？”要向古人學習。回家後找到原文，覺得同當前廣西形勢並不相關，於是向耀邦寫了封短信，說明此意。這之後的幾天，就是十九日，書記處會議討論《人民日報》人事問題。中宣部擬派王忍之等四人進入報社領導班子，將舊班子“一鍋端”。中組部有的領導準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備批准。這時聽說王在二中全會上激昂慷慨地說：各條戰線都已受到嚴重精神污染，似乎資本主義已全面復甦了。於是我同陳野苹（部長）商量，這個名單都是搞理論的人，恐怕不合適。一月七日在習仲勛處談到此事時，在座的喬石、宋任窮、陳野苹都不贊成。我還為胡績偉說了話，並說胡喬木不能容人。於是我們回到部裡開會，頂住了這個方案。十二日，中宣部的幹部局長來催辦此事；野苹還告訴我，接到鄧力群的電話，說我反對此事。十九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好幾位同志說到王忍之二中全會發言過左，決不能去管報紙，耀邦則談到報紙不能辦成理論刊物。我最後發言：這個名單不合適，報紙是對著現實情況的，重擔壓著，無日能卸。書生不能辦報。耀邦加了一句：書生要打引號。鄧力群在座，一言未發。這個名單就被否決了。

下面是一月廿日和廿一日兩天的日記中有關記錄。

一月廿日。擬明日談話提綱：

（一）希望中央生活正常（回顧當年）。鄧力群要幹什麼？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報》事。

對喬木認識、看法：沒有管過柴米油鹽，沒有單獨挑過擔子。總是一支筆。有時不認賬。不能容人。權威自居。

（二）認識人之不易，關鍵在用人。人各有局限與特點、缺點（毛的教訓）。耀邦自己。中組部。兩位老人。

（三）秘書與子弟問題。謹慎小心，注意傳話。

（四）科學技術第一（專家治國問題）。科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好大喜功問題（三峽）。水利部“一水三核”

(錢正英到美國，爭取美國援助貸款建三峽工程和三個核電站)。

(五) “偏離社會主義”的擔心問題。

(六) 湖南問題(省部級機構改革後，湖南遺留的人事問題比較重，還有“文革”遺留的派性問題)。

(七) 談丁玲事(中組部擬為丁玲徹底平反)。

這天的日記中，最後有一句話：

大局在支持耀邦，黃老有同感(當年我常去看望黃克誠)。

一月廿一日。下午三點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談到六點，整整三個小時，惜無錄音也。我大體按準備的幾個問題談自己意見。下面是耀邦所談：

關於八一年、八二年爭論<sup>①</sup>：經濟上講得尖銳些，關鍵是速度問題。說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於是引起陳雲、紫陽誤會。

生產目的討論<sup>②</sup>，並非批評什麼人。

翻兩番問題。一九八〇年夏，在武漢討論經濟，到二〇〇〇年翻兩番。紫陽、姚依林心中都無數。小平問：怎樣達到兩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點二，力爭百分之七，不能少於百分之六。姚說只能定百分之六，一九

---

① 一九八〇年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關於一九八一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爭論。一九八一年底又一次發生了爭論。

② 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報》在耀邦的重視和支持下，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但是有人誤認為這是針對某人的，胡喬木更說這樣會靠造成緊張，“可能引起爆炸”，向耀邦施加壓力，使這場討論被迫中止。

八一年爭五保四。我發急了，講了難聽的話，並非對誰過意不去。這時互相不能說服。於是每到地方時，我就在下面鼓氣。準備十二大報告時，爭論爆發。有人告狀，說我在下面講了要百分之十，向喬木反映，喬木向小平反映了。於是小平找我去問：（1）是否搞高指標？答未超過百分之七。（2）是否說不要去搞重點建設？答無此事。（3）不要整黨？答要整，是文件怎樣寫的問題，實際上報告中寫了。

二中全會後，在中顧委講：我吃幾碗飯長大的，大家還不知道？（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上來的，這種說法大家服氣。）

胡啟立是小平看中的，問過我兩次，第三次又問，才講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說法很多，說我用團中央幹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喬木，黨的一支筆，不是政治家。一九八三年一月，我關於《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內中談到要全面改革。喬木時在昆明，送給他看了，他說全文很好，略有增刪。結果又向小平告狀，說是刮改革風，等等。喬木認為鄧力群並不會寫文章。（我談了對此人看法後）對鄧力群現在摸不透。

自己準備一九八七年下來。喬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內要新上幾十人。書記處還要進四十幾歲的，下五個，換五個年輕的上。

要敢於實踐。列寧一九二〇年（？）講的。這是首位問題。要打開新局面。撥亂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是開創，無所謂撥亂反正。

自己就是堅守兩條：毫不謀私，大事請示。各方面尤其地方要敢於創造，現在是創造性不足。否則，如老的都不在了，會惶惶無主。地方要分權，權不能過於集中。

秦始皇亡在轉業幹部，軍人三十六郡分封，於是在地方鬧事。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一切權力集中到朝廷。“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現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有了綱：

(一) 外事方針、政策有了一套。

(二) 黨內生活、人事。有了《生活準則》。幹部要“四化”，老同志安排好。

(三) 農業，還在發展。責任制到專業分工，又一大發展。里程碑式。

(四) 統一戰線。臺灣、港澳、民族、宗教（讓鄭必堅寫宗教問題，三個月了，看了歷史文件，有互相矛盾處。）

文化部長四平八穩，無新局面。

計委過穩，大家不滿搞老框框。司局級換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可以到省裡去，合適的當副省長亦可。

這次談話，有些是泛談泛論，但也有屬於組織部業務範圍的事。

### 約到家中長談

一九八五年後，我雖然不在職了，仍然關心風雲變化，耀邦的處境是大體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會上我還發發言，有時還說得比較尖銳。後來在中顧委每周一次的支部會上，發言也不大有顧忌，該講的還是講，胡喬木的問題我就談過。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會議後，關於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聽到一些傳聞。年尾的顧委支部會上，就有對耀邦說長道短乃至攻擊的言辭了，如“搞青紅幫”之類（用青年團幹部和紅衛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之變，我並不感到意外。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的日記，按時序，有以下可錄之事：

元旦。于光遠電話：被點名批評，批他的“大公有私”，“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他擬申訴，怎能同“全盤西化”聯得起來？

二日。有人告知，凌晨兩點，長安大街由西向東，有幾百人游行，高呼“自由萬歲”。“嚴懲凶手，愛國無罪”。當是昨日天安門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電話：必須疏導，不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李普來，同去黎澍家，漫談形勢，不勝感嘆：蘇聯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擾，知識分子待遇一直拉開，因此基礎比我們好得多。

三日。項南來，再談假藥事經過。他已見過耀邦。耀邦說，他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並說誰能無過失，自己過失還多些，還談到自己日子難過得多。

下午，顧委傳達十二月卅日小平約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六人的談話文件，頗似當年“夏季形勢”：當前學生鬧事乃幾年來反對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所致，否定“清污”過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應予開除，過去軟弱。關於王若望，上海有開除和保護兩說，中央也有保護層。波蘭教訓，專政必要。上天安門，有多少抓多少。鞏固文藝宣傳陣地。整肅要開個名單，但不急於處理。

四日。傳言頗多：紫陽轉總書記，耀邦到顧委等。陳雲說贊成開放，但基建不能過大，要個籠子。計委很難改老一套作風。

五日。上午顧委支部會，調門都高，黃火青幾乎點了耀邦的名。說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責陸定一和于光遠。倒是提出物價問題，關係千家萬戶也。下午到醫

院，向黃克誠遺體告別。

六日。高揚說：由來已久，幾年矛盾；少開常委會，書記處專斷；專職書記分開開會，不合黨章。囑我不要發表意見。

七日。黎澍電話：他的鄰居自天津回，學生臥軌，要求中有物價問題。下午參加黃克誠追悼會，不見耀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鶴壽通知錢李仁：方勵之、劉賓雁開除黨籍。錢問是否符合黨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禮堂，參加“華夏研究院”成立大會，頗為隆重，避免講話。遇胡績偉、于光遠、蘇紹智等。說點了一串名字，王震還點了巴金。

十二日。上午參加顧委一支部會，揭批耀邦了。多人發言講具體人事。最激烈者說：要擠小平下臺，有野心；要當軍委主席；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總後臺；同中曾根打得火熱；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態。

十四日。續開支部會。曾志大姐也說了一篇，但最後講了公道話：還得全面看，三中全會後做了許多好事。大家最後意見是：小平決不能下。黎澍夫婦、李普、秦川來，都有憂慮，要注意國外反映。

十五日。得到電話：耀邦停職檢查；檢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員。

十六日。電視新聞，耀邦下臺，保留常委。多日來的不安，告一段落。來日方長也。有人談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滯十年，但願我們不步此後塵。廠長制貫徹甚難；企業都有潛力；都知道作為生產力發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廿一日的日記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絕，是贈



耀邦的。（此詩刊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龍膽紫集》新編本中，題目為：《丁卯幾首贈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的日記：

晚上延濱、元元夫婦來，告知耀邦最近的一些言談和他們聽到的傳說：

小平處打來幾次電話，大概是十二月三十日才去了一次，只是打橋牌，什麼也沒談。鄧家後來又約去，以身體不好，謝絕了。自己也沒想好今後做點什麼（秦川曾勸他寫回憶錄）。現在就是參加政治局會議，讀書學習，思考問題，情緒尚好。“陳雲說我不懂經濟。其實他們還是過去老一套。”總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詐，去年初下臺時才有所醒悟。關於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的問題，是很後悔的，小平問到時，沒有講清楚三人情況，沒能正式進言，只說不理會好了（以致後來挽回不了）。

看來耀邦對自己大小遺忌之處尚未深思，也沒有一個得力的左右做幫手。延濱聽說，王震向人訴冤，他並沒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關的老人表示，沒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們意見如此之多，說“我也是被授意的”；於是要兒女們自己奮鬥，不能靠老子。

延濱還告訴我，耀邦很想同我談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來電話，耀邦約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延濱下午來，同我一起到耀邦家。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剛一走進客廳，耀邦張開雙手對我說：歡迎你，你是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犟脾氣。從下午兩點四十分談到八點二十分。留我

吃晚飯，是同家人分開單吃的。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本記的最後幾頁，記下了耀邦談話的要點。原來記得較亂，是憑記憶記的，現在大體按內容作了調整（括弧中原筆者按語）。

（一九八七年一月這樣的“生活會”）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為辭職書送上去後，事情就結束了。（“生活會”上）薄一波的開場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談談，相互之間有什麼意見，從耀邦開始。第一個放炮的是余秋里。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呈了。

（就是這次“生活會”也是專門布置的。習仲勛事先不知道，一進會場見到這個態勢，就大發脾氣：這樣重要的會為什麼預先不告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開始，中央有一個由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穹、姚依林、王震、伍修權、高揚等組成的七人小組，分頭找到有關人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對耀邦的意見。周惠同我談過這個情況。此事耀邦全不知道。）他們還到各省收集資料，並沒有收獲。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講了點過頭話。生平不背後議論人，否則會更不得了。下來後，通看了自己在這七、八年中的全部講話、談話和文章，都是已經印出來的，好幾百萬字。看了三個月，問心無愧（這同我們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全會後的正確路線，都是關係黨和國家的安危、如何健康發展、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因此我們這批同耀邦有交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都談到他不應當辭職，也不應當做這種檢討）。

檢討中自己大包大攬、上綱上線。下來後，尊重新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的領導（沒講服從），維護黨的團結。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由於這樣一種心態，聽說耀邦在會上被迫做了檢查之後，離開會場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哭的，尤其在這種場合。耀邦是紅小鬼出身，經過蘇區肅反、長征、戰爭烽火，十年“文革”，受盡磨難，歷次運動從不整人。三中全會後，以無私無長、大智大勇的精神，開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道路。他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各種阻撓。終於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常委會很少開。（談話時我問到，有意見分歧，為什麼不召開常委會呢？）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我一年去一次陳家（感到耀邦有許多難言苦衷，也不便深問下去）。小平耳朵軟（指有時也聽進去兩個“左王”的一些話）。關於（全退、半退）下來事，是我同小平兩個人私下談的，交換意見的性質（據說鄧後來問過萬裡：為什麼讓我下？萬答：也許是失言。鄧說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見，當年鄧小平對胡耀邦誤會之深。這太令人遺憾）！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同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到武漢，向鄧匯報，談五年計劃的盤子，年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五（這是當時定的）。鄧以為這樣翻兩番困難，問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沒答。我答百分之七點二。三人臉都很沉，都沒講話。因為陳雲原來擬降到百分之四。鄧又問，五十年翻兩番，是什麼速度？只有我能答出百分之二點五。平時這些數字都注意並記牢了的（曾

聽到陳周圍的人說過，陳對耀邦兩條大意見：不懂經濟，用人不當。後來大家對耀邦的責難之一是搞高速度）。

（國務院）三十幾個部匯報，是想讓書記處的人熟悉經濟情況。（我在電力部時，參加過這種匯報。耀邦問過，我們的電何時能趕上美國？我說：如按人均，永遠趕不上。耀邦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擊他要搞“大躍進”，就太過分了。）後來覺得趙有意見，就停止了。選為總書記是幾位老人商量的結果。只有葉帥還提過讓華國鋒再過渡一下，看看再說，後來也同意了（在延安時，葉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會後，葉對耀邦說：副主席你當一個。耀邦答：那怎麼可以）。十二大的政治局、書記處名單是由幾老商定的。

（我到組織部以後，接觸一些人事，我這個過來人當然敏感些，陳同耀邦之間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陳對耀邦有大不滿處。）一九八三年初常委會，陳雲批評了我（搞亂經濟）九條（當年耀邦到各地調查研究時，常講小平的“翻兩番”，鄧力群就向陳雲講經濟過熱是耀邦造成的。其實一九八二年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七，計劃卻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為然，當時就說：到此為止。並疾言厲色地說：中央工作會議不要開（借著陳雲的批評，胡喬木當即建議開省市書記會議。鄧力群會後即在他管轄的兩個宣傳口幹部會議上傳達了陳雲的批評。一時上下沸沸揚揚，不知道中央出了什麼大事）。小平後來將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質問：你們要幹什麼？（一九八七年的“生活在”會上，鄧力群在發言中就此事作了點輕描淡寫的檢討。）

在組織部工作任上時，要撤換張平化中宣部部長，曾經讓我推荐人。推荐過胡喬木（據家人和我熟悉的人

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喬木的）。小平不同意，說無行政能力，是一支筆（鄧早就說過胡喬木骨頭軟，固執等，這是傳開了的）。一星期後，又兩次問到，只好毛遂自荐。當宣傳部長後，先念曾經說過，威信不如組織部長時高。為《人民日報》事，沉住了氣，總會有磕碰的（這是胡喬木、鄧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個部門，逼得胡績偉辭職後，除掉王若水，後又撤換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覺到，兩個“左王”從黨校組織真理標準討論開始，一直搞“清君側”的活動）。

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似乎是一句總的評語）。一天幾個條子，老打電話，不堪其擾。胡啟立剛宣布為常務書記後，就遇到這種情況，訴過苦。小平也不堪其擾。一九八三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感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應過來後，又破涕為笑，談別的了。以前喬木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思想很開闊，以後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紀念毛澤東九十誕辰的文章，我憋了一個星期寫出來了（沒有交喬木改），喬木自己卻不寫。喬木還說，鄧力群不會寫文章（耀邦隨即談到這樣一件事）。書記處會上討論喬木兒子事件<sup>①</sup>時，鄧力群第一個發言，贊成法辦。

改革開放、安定團結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更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按：這是當年黃克誠建議的）；啟立在山西講話，這樣兩邊都提到，這不能解決問題。（接著耀邦談到三件事）將一個

<sup>①</sup> 一九八四年，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乃經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逮捕法辦。後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

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這樣繼續傷害知識分子（將不合己意的“眼中釘”，不實事求是，隨意開除黨籍），如何求得安定團結？學生總是比較激進的，對學生鬧事的看法與處理方針的問題。這三件事實際是未了的。對歷史責任，應當提出來，必須強調實事求是，這是根本之根本。還應當堅持這個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三件事尤其後一件，耀邦是有預見性的，是預言家）。

生平對兩個人有虧心：一是蘇進，寧都暴動後，長期被懷疑，一九四〇年才入黨。“文革”時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蘇的問題，只說有思想意識毛病。二是項南，一九五九年後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延安搶救運動時，在總政沒打過一個特務。曾做過幾次試驗，找根本不會有問題的幾個人，一審問一遍供，就都承認了。毛主席找去匯報時，講出這個情況和對搶救的看法（當時毛還聽到其他人的反映），才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九條方針。

在延安時，同陶鑄、王鶴壽關係好，曾被稱爲是“桃園三結義”（耀邦曾對鶴壽講過一些心裡話，在“生活會”上被鶴壽揭發了，非常傷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贊成。一九四九年以後，他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時，有次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對總的形勢很是憂慮。世風日下，人心渙散，物價指數居高不下，經濟最關緊要。黨風不正，有些幹部胡作非為，不講真話，無維系中心，講真話最重要。

下來後，小平多次讓去打橋牌。十二月三十日去了，也沒有談什麼。

（談了談自己一生）家鄉成了紅區。瀏陽中學讀了半年初中，同楊勇（表哥）同班。在湘贛邊區，編兒童報，自刻蠟版。開始殺“AB團”，被懷疑。中央蘇區來人，馮文彬把我（救了）帶走了。一次聽到顧作霖（團中央書記）同馮文彬談，說我不像反革命。於是要求留在團中央工作。延安時，最初在“抗大”一大隊當支部書記。一次開會發言，談改進工作，定要深入群眾。受到毛主席贊賞。提拔我當“抗大”政治部總支書記。有人不同意。毛就讓再提一級，當副主任。“抗大”辦報，自己寫文章。還請毛主席寫，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對自由主義》。一九五五年前，同毛主席有過七次談話（於是談到毛並其他一些人事，從略）。

江西時，任弼時並不贊成肅反，朱德也不贊成。毛多疑。延安寫有十封信，說服弼時（關於清算“左”傾路線歷史）。弼時善於獨立思考，不盲從，不同意“王明路線”的說法。

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鄧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如廖志高調離福建，馬文瑞調離陝西，胡啟立調中央，等等。也有些工作上的事，引起多年結怨。如黃火青，三年困難時，我被派到沈陽去了解情況，只差二十億斤糧，硬要三十億斤，當時沒有同意（按：黃火青在中顧委會上，對耀邦意見很大，講的也多）。

## 去世前十天的長談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下午兩點，元元來，同去耀邦家，談到九點半。

一月九日至二月廿日，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我以訪問學者身份在美國逗留了四十天；一半時間在哈佛，另一半在西裡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斯坦福五所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關於中國革命回顧和改革開放形勢，作了多次講演，並同這些中心研究中國的學者、專家和部分留學生座談，交流看法，回答問題，尤其是關於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談了自己的觀點。在美國遇到留在日本的學者楊中美，他將所著的《胡耀邦傳》中文版贈我，回來後即讓元元交與耀邦。

其時胡喬木應李政道邀請擬訪問美國，知道我剛從美國回來，三月五日，特讓鄭惠來找我談談美國之行的觀感。鄭惠是喬木多年助手，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同喬木的歷史關係，個人之間並無恩怨，尤其清楚是喬木建議我寫《廬山會議實錄》並予幫助的。四月四日又見到鄭惠，喬木聽到我的介紹和意見後，甚為感動。

於是同耀邦交談開始，便先提到喬木訪美前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國”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形象，是否真有改變，還得察其言觀其行。接著我就談訪美之行的經過，談到不僅許多留學生而且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都關心他的情況。關於美國的情況和我的看法，談得較多。如美國歷史沒有什麼傳統又有傳統，移民國家的特點，兩黨輪流執政問題，對個人自由與平等的尊重，社會生活與社會保障情況，資本的社會化，稅收政策，黑人問題等等。在哈佛時曾住在傅格爾（Vogel）教授（《日本第一》作者）家中，同也住在此處的劉賓雁有過接觸，劉到過四十所大學講演，想辦一份有別於《中國之春》的刊物，“小罵大幫忙”。我勸他還是同國內取得聯系為好（這個刊物後來沒有辦成）。關於美國民主，也談了自己的看法。還談到參觀許多博物館，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也見到馬克思全身銅像，西方將馬看做是一個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我談完之後，耀邦談了十個問題，記錄如下：

我的四月五日日記中，有這樣幾句話：談了十條分歧。“要樹自己”。導火線在“同意全下”，“自己半下”（兩人對話）。這肯定是我當時的觀感。事實是否如此，當由歷史評定。

（一）關於華國鋒的問題。（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時，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同華國鋒有過一段共事經歷，在黨校也合作過，比較了解其人。當年在黨的高層議論華的問題時，鄧小平認為：華是坐直升機上來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認為，其主要問題在繼續搞“兩個凡是”個人崇拜，受了汪東興身邊那個秀才班子的影響；處理不要過急，要寬一點，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幫”，華和汪東興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的贊同。他講了很長一段話。彭真還特別稱贊：講得好。處理華國鋒的決議，喬木起草，經他修改，措辭較和緩。華下臺後，本人也一直沒有說過什麼過頭話。）

（二）處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有個別人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並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雲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最後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

（三）清理“三種人”的問題。從寬還是從嚴，一直爭論到一九八三年整黨。有些省矛盾很尖銳，如山東、廣西、江西、湖南、內蒙等。處理不好，又會發生內亂。我頂住了過急的一面，堅持冷處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歷史上有過功績的人，更要慎重，從寬為好。（他談到劉建勛、劉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

情況)保與不保,在高層中是有爭論的。有一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會時,陳雲談到“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我很是贊同,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和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的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住。認為這三個人決不能整。(大家知道:這二位“左王”是怎樣利用所謂“異化”問題整周揚和王若水的。鄧後來被這二位說動了,於是十二屆二中全會發難:清除精神污染。)我曾批評過王兆國不該發言:“你又不知道周揚的歷史情況,發這個言幹什麼。”喬木還擬了個文件,全國發下去,要人人過關作檢查。我於是給喬木打電話:不能這麼搞了,並且將原件退了回去(這也說明,耀邦胸無城府,從無抓人家小辮子的習慣,並不把這樣的文件留在手裡)。當時鄧力群氣勢洶洶,逼得《人民日報》、新華社都發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鬥爭》。由於我和紫陽聯手抵制,其他書記處成員都不贊成,大家知道,這場類似“文革”的“清污”運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來。趙紫陽在人代會講到,此事中央有責任。但是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對此不滿,耿耿於懷,於是接著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訪問日本時,日本記者故意提問“清污”問題,於是我回答:“日本軍國主義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說,“他們兩位總是要在文藝界挑起爭端。如批白樺的問題,《解放軍報》的文章,幸虧喬木也不大贊成,否則我頂不住。”

(五)外事問題。一九八二年前,講聯美反蘇,徐總不贊成。我作過兩次系統發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紫陽找我談,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東德昂納克來時,請他傳口信到蘇聯。(耀邦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說：)我們兩人各講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還談過東歐、中日關係等。一九八〇年四月，意大利貝林格來時，耀邦談)蘇聯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別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脫不掉。贊成意大利的提法，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話講得較早)。“我是老鼠上秤鉤，自己稱自己。”當年於是傳來上面一句很厲害的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〇年一月，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共講了二十八條。一九八〇年鄧小平長篇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過黨政要分開(但辦不到)。這個說法，毛主席批評過：黨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講話中，黨政職能要明確劃分，全黨都要懂經濟。喜歡講四個字：“藏富於民”。這二十八條，書記處都看過。喬木當時在雲南，改了幾個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說：文件很好，沒提不同意見。趙紫陽認為，現在不忙毛裏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體改革，向小平反映。喬木後來又說不知道這個文件，沒經過書記處。於是只好向小平談：文件經過書記處的，這樣才沒生氣。於是定個協議：文件暫不發表。(此事又關係到“你要樹立自己形象問題”。)

一九八四年開三中全會，開始沒有題目。後來想到兩個：還是談改革；或者一年工作報告，講七、八個問題。小平認為改革綱領存在困難，爭取講第一個問題。這就又一百八十度轉彎過來。同時取得紫陽的支持，列出十二條，仔細交代，提綱也向紫陽談了。本來想講點理論問題，二、三、四條合並，理論也不能講得太多了。我從來不同意“理順物價”的說法。紫陽提出“物價是改革關鍵”。這個報告大家都贊成，說成是中國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上面這段話是耀邦的原話，可見他是一直堅決支持鄧小平一九八〇年講話，搞經濟與政治全面改革的，兩者要同步。問題就出在兩位老人之間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矛盾。同時兩位“左王”實際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條，如僱工七個即是搞資本主義，主要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等，並不贊成改革開放。他們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在兩位老人之間鑽空子，謊報軍情，借以得逞。於是出現“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剛剛過去的史事可說並未結束，根深蒂固的“左”害也還時在發作，人們對之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因此對這些未了之事，應當徹底弄清實情，總結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這就是列席十五大時，我為什麼要寫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的原因。）

（七）經濟工作中的問題。給我戴過一頂帽子：提倡高消費。我反對高消費，主張適當刺激消費，促進生產。馬克思談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辯證關係，有其同一性（“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後，耀邦曾支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被胡喬木強行制止）。我一直強調農業、基礎設施、原材料問題；要發展第三產業，引進外資和技術；同時要限制高消費商品進口。有人卻想以進口高檔商品回籠貨幣，一元換八元。頭十年和後十年的問題。頭十年定要有個速度。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六日武昌談話，鄧談到翻兩番的速度問題，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點二。當時陳定的百分之四，鄧也同意。這就翻不了一番。我說我們這些人頂多還搞十年（耀邦多次談過，自己一九八七年下來），不能將麻煩留給後代。鄧問過我：“你說了這個話？不能將麻煩留給啟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馬風太冷，他們要負責。一九八〇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利用一個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話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鄧力群主持的書記處研究處研究室印發的材料)：“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作為經濟上的綱領，得到陳的認可（這就是要採取緊縮措施，壓制當年“經濟過熱”現象，說否則財政赤字無法彌補，要爆發經濟危機）。我為此發了脾氣，引得陳很不滿（一九八二年全國經濟形勢看好，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二，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七）。一九八三年那次會<sup>①</sup>本來準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歷來不贊成大調整物價，不贊成提所謂理順，沒有充分有說服力的材料，物價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討論五年計劃報告，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胡喬木、鄧力群都不贊成（據我所知，還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一九八八年耀邦到湖南時，鄧力群竟來找他，要同他聯手反對趙紫陽，被耀邦嚴辭拒絕）。

(八) 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開始時不贊成這種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責任。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對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書記處都不贊成，不能不停下來（這個問題只提了一下，接著講下面最要害的問題）。

(九) “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在六中全會上陸定一發言，堅持取消“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於是就鬧大了。

這個最後導致耀邦下臺的最大問題，談話時他只說了這樣一句，就沒有再說下去了。這可能是他知道我們這些人對此事首尾很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觸動自己感情不願多談。為了讀者便於理解，特就此導致耀邦下臺的問題做一扼要說

<sup>①</sup> 即胡喬木準備發動召開而被鄧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會議。

明。關鍵就在改革開放以後，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掛帥”的路線，實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理論務虛會喬木並不贊成，反而誇張當時形勢“像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還說“不要逼華主席反右派”。於是代鄧小平起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大講專政、貶斥民主，使會議虎頭蛇尾，草草收場。一九八〇年八月，政治局剛通過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批判封建專制思想，強調國家政治、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胡喬木立即利用當時發生的波蘭事件，上書告誡，使這個講話置之高閣。此後就不斷以“不堅持四項原則”、“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罪名，大整堅持經濟改革尤其堅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黨校事件<sup>①</sup>、特區事件<sup>②</sup>、周揚事件、《人民日報》事件等等，接連不斷，矛頭指向耀邦：是這些人的總後臺。事情發展到一九八六年，耀邦主持起草的將提交六中全會討論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文件避開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即“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特別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要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總結了“我們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文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沒

① 一九八一年，有人向陳雲進言：中央黨校校刊《理論動態》有篇文章是影射攻擊你的。從而耀邦受到指責，陳雲查詢。耀邦答沒有此事，可以調查。於是中央組織部派調查組進駐黨校，審查校刊編輯負責人吳江、阮銘、孫長江，結果並無攻擊陳雲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黨校校長，即宣布這三人調離黨校，並且下令將阮銘開除出黨。

② 當時廣東、福建的領導人挨批挨整。

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等，並且規定要“在全體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識、增強公民意識”。“在法紀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紀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憲法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造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自由。”最後反對這個文件的是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提出了一個修正稿給鄧小平與陳雲，其中仍是宣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調。陳批示贊成修正稿；鄧批示贊成原來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隨後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二人極力活動，引起激烈爭論，耀邦作了妥協，在草稿中加了這樣一段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以這樣的話來限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解釋。但是這段話遭到陸定一的堅決反對。他三次發言，從歷史角度論述“反自由化”這一提法的荒謬和危害。指出這是當年蘇聯反對我們“雙百方針”時提出的；後來“文革”時“四人幫”也使用這一提法批判過陸定一、周揚和鄧小平；籠統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同憲法規定的各項人民的自由權利相沖突，而且對繁榮我國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極為不利。這場爭論最後一幕出現在九月廿八日六中全會閉幕會上，我親身經歷了這個場面。對《決議》進行表決前，陸定一又站起來發言，堅持他的意見，在《決議》中去掉這一段話，引起全場的掌聲，我們中顧委這一邊席位的掌聲最熱烈。萬里發言支持陸定一的意見。余秋里、楊尚昆等發言反對陸的意見。胡耀邦採取調和立場，主張暫時仍保留這一段落。接著鄧小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講得最多，而且最堅持；說現在年輕人中有一種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最後說，

反對自由化，還要講十年二十年。耀邦會後布置傳達時，說不要將這個爭論傳達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然而胡喬木、鄧力群卻借此機會來整倒耀邦。王震在中央黨校帶頭發難，印發鄧小平的講話，在全校大會上責難耀邦，說道：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說，在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現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世紀。於是這件事和年底發生的學生上街，成為迫使耀邦辭職的一個導火線。

（十）政治問題。主張從理論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國。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樣，強調專政。依法打擊刑事犯罪。不贊成搞什麼“幾大戰役”，不要搞新的冤案錯案。彭真說過我：“四個堅持”，你時而說，時而不說。留學生反映，再搞“四個堅持”，就回不去了。鄧幾次講，“反右派”沒錯，只是擴大化了。

（最後，耀邦談到自己的事情：）有苦惱，但不是個人問題，是歷史不公平（改革開放以來，主持工作這七八年中的作為），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希望有個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新的結論，沒有，也不能強求，去見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無所謂。當然，死了什麼也不知道。

（耀邦還談到，）當時作檢討，是為了照顧大局，為了保護一批幹部（也為了保護這個家，是他同別人談到的）。

（最後談到：）再出來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兩三年，又能做些什麼？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個新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以上整理的這個記錄，是根據元元的記錄，我曾讓她簡要記個要點。耀邦如此正式談自己的“十大分歧”問題時，

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我也在一個小本子上記了一點。我同元元相互校對過兩次。我不能保證以上所記同耀邦講的完全無誤。其不合耀邦原意之處，自然由筆者負責。

關於耀邦一生的評價，一九八九年四月廿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作的悼詞，是經過鄧小平和中央負責同志討論過的，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由於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上強加給他的那些不實之詞，以及迫使他下臺的做法，曾使得黨內外廣大黨員和群眾為之憤憤不平，以致一九八九年四月他辭世時，引發一場政治風波。對耀邦在改革開放和總書記期間的作為，有一個全面公正符合實際的總結，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我們黨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問題。要知道不能正確認識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 結束語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選舉，“是非公道在人心”是言中了的。大會選舉中央委員，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幾十票。隨後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委員，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後來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鄧力群落選了。據說為了照顧，違反程序，臨時將他放到中顧委候選名單中（無差額），以最少票入選。在中顧委選舉常委時，又想讓他進常委，氣氛很是緊張（我是親臨其境的）。一共有二百八十七人投票，鄧力群只得八十五票，連零頭都不夠，又落選了。胡喬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得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選舉完後照相，臨時撤去鄧力群的前排座（事先為當選常委準備的）。胡喬木最後走過來，一臉死色，無人同他打招呼。早在六七

月間，就聽說王震等極力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後來有人向鄧小平寫信揭發此事，並檢舉鄧力群之種種劣跡；小平批示，撤銷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開時，我是列席代表，曾寫了一個近萬字的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其中第三段：“應當開始總結這二十年來（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的經驗教訓”。談到應當像總結前兩個《歷史決議》一樣，作出我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是自發進行，還是組織領導；是內部動態參考，還是允許報刊討論？其實許多事境外議論甚多，書刊出得不少。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二十年能這樣走過來嗎？何況這二十年中並非沒有曲折，沒有艱難，沒有干擾。”隨後就提出七個問題，不能回避討論。其中第五個就是“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辭職問題”。

多年來，有關耀邦的書出版甚少。最近收到的港版《懷念耀邦》一、二兩集，共五十二篇文章，近六十萬字，作者六十人，是耀邦在各個時期的戰友、同事和部屬。所有這些書刊文章，當然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黨史的資料，我寫的這篇文章資料當然也可歸入其中。

二〇〇〇年八月中旬

##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

### 座談會發言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新觀察》雜誌和《世界經濟導報》在北京聯合舉行悼念活動。應邀參加的有耀邦的家屬、生前好友、老部下、老同事和有關各界的代表五十人，戈揚主持。首先大家為耀邦默哀，並向耀邦遺像三鞠躬。遺像下面的一幅大字標語是“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

耀邦的兒子胡德平代表家屬致詞：“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親雖猝然病逝，但是我們所有的家屬都不會墮入不可自拔的悲哀中去。我們希望在悼念活動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種祥和的環境和心態來度過。祝祖國吉祥！”因喪事在身，德平提前離會。

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有二十多人。有關的報導和發言刊登在《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百六十九期）。以下是與會者的發言（有刪節）。

中顧委委員李昌作為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回憶了終生難忘的往事之後說，耀邦早在延安時期就同知識分子交心，是青年很貼心的一位朋友。他發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立下了巨大的功績。當然，在社會主義改革和新舊體制交替的復雜的局面中間，任何人都是有缺點錯誤的，我不是說耀邦任何事都正確，但他確實是我們黨一個偉

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豐富多彩的一生。我想我們文化界把他的事跡紀錄下來，可以成爲中國人和中國青年的一部有很高思想水平的教科書。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韶華：要評價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要看他是在推進還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耀邦在黨的關鍵時刻推進了歷史。首先，像我們這樣背著叛徒、特務、走資派罪名的人，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尤其拯救了一大批老幹部，這是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無可比擬的偉大功勳。在黨校，他點燃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火炬，爲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很好的輿論準備，大大推動了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觸及了許多老人家晚年的一些失誤，這種討論是需要勇氣的。沒有馬列主義的水平，沒有這樣的一種膽略是不敢率先發起這樣的討論的。我們文藝界、文學界非常懷念耀邦同志，因爲率先提出創作自由的正是耀邦，這對文藝的思想解放、文藝史的發展又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創作自由這四個字就永垂不朽，而且在文學史上開創了新的里程碑。民心是杆秤，那麼多人自發地去悼念，在天安門送花圈，說明耀邦是深得民心的。

理論家吳江：耀邦是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黨和國家重建、復興的重要關頭，走上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爲我們黨和國家一位傑出領導人。我講的“關頭”，大體上可指從黨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中間，也可以指撥亂反正時期，特別是前期。十一大後，小平雖已復出，但當時的政治局勢是不明朗的，有的冤案還沒有平反，好多同志沒解決問題，已經出來的人也不願出面講話，其中有些人是腳踩兩只船的，要看形勢再行動。耀邦正是在此時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做了撥亂反正的工作。當時耀邦擔任黨校副校長，上面還有校長和第一副校長在主持工作，他的處境是

不那麼順當的。要給耀邦當時工作作一個評價的話，要考慮當時的政治局勢，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耀邦雖然下來了，他所擔心的還是我們黨和國家、民族的命運。這可能是使他原本很好的身體垮下來的原因。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特別要由人民、由歷史來做出，越往後越可以看得清楚，人民和歷史是公正的。我昨天看一張香港報紙，有些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努力改革、正直、誠實、深入民心。”

原人民日報社長秦川說：耀邦的突然去世，大家既悲痛，也非常惋惜。我們現在在這裡舉行紀念性悼念活動的時候，全國廣大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心是很不平靜的。我們希望學生也適當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希望不要重新再發生天安門事件。我是在人民日報的工作崗位上才和耀邦認識熟悉的。三中全會以後的這十來年，正是勇敢的馬克思主義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最生氣勃勃的、最輝煌的時期。對人民日報來講，我們有說不盡的話，我們不僅把他看成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把他看成一個最知心的朋友。在改革開放前進或遭受困難的時候，最能夠支持、關心人民日報的首先是耀邦同志。許多事情，當時不是耀邦的支持，是不可能辦到的。遼寧的《共產黨人》月刊為張志新平反昭雪，文章到人民日報後一個月才登出來，而且馬上受到抵制。當時中宣部三位部長，兩位副部長不同意，新華社不發統稿。就在這麼困難的時刻，耀邦挺身而出，說張志新是當之無愧的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尤其在理論問題上，耀邦給予報社很多支持。我說他勇敢，是因為他不信邪不信“棍”，最信的是民心。三中全會後耀邦能那麼領導人民起來搞改革，沒有大無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前些天，臺灣記者徐璐問我對胡耀邦的印象怎麼樣？我沒講別的；我說他是最好的人，最純潔的人，最寬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再高明，卻得不到人心，不是那麼仁愛，不是那樣純

潔，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下來後這幾年，我有幾次專門找他，看望他。他雖不在其位了，但是對國家、對人民、對整個世界還在思考，充滿了憂慮。一次他問我，怎麼評價我們現在的黨風？我說，我們不是講現在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嗎。他最後只是講：“可惜啊，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恢復、發展了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黨風，現在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他下來後幾次講，我們絕不能錯誤地對待知識分子，不能整知識分子。再一個我們絕不能錯誤地對待年輕人，絕不能整學生。這兩年來，他的心情並不好，他總覺得，我們現在缺乏一種什麼東西，把人民的精神真正振奮起來。現在中央提出要振奮精神，到底用什麼來振作人民的精神呢？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這是我們當前最現實的問題，也是我們悼念、紀念、評價耀邦尤其有關繼承所要思考的問題。

馬列主義研究專家蘇紹智：胡耀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思想開明、尊重知識、重視理論，是和知識分子心連心的一位領導人。我個人和他接觸比較少，但我對他一直是尊重的。一九八六年我們討論第七個五年計劃社會科學規劃的時候，耀邦和其他一些領導人接見我們。他講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沒有打棍子。很多人，當時我記得是李洪林第一個講的，怎麼沒有打棍子呢？有的人被開除出黨了嘛；吳明瑜說還有被撤職的呢！當時我也插話，還有人被驅逐出了北京。但是耀邦根本不在乎他講話時別人這麼多插話，他非常重視大家的意見，說你們可以打報告來，我們可以批嘛。這種氣度，在我們領導人中是比較少的。

國務院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大家最稱道的是在撥亂反正中表現出的非凡勇氣，這種勇氣來源於理論上的堅定性，而這種堅定性又是來源於實踐，來源於群眾。深入群眾是耀邦最突出的特點。我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

有幾次列席書記處會議，討論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彼此可以爭論。而過去在省裡也列席一些常委會，領導人的講話佔了很長時間。真正的討論，不同意見的爭論，是比較少的。而當時書記處確實真正地讓大家暢所欲言，能聽到不同意見。而耀邦本人對有些問題也發表非常尖銳的意見，很明確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如對“二道販子”的問題，他指出這個提法就不對，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就需要運輸啊，需要流通啊，在宣傳上如此反對二道販子，沒有好處。他平易近人，個別交談時，能引導你把話都說出來。他在總書記任上，到各地去了解情況視察工作最多，去的地方最多，下去的時間最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章立凡：一九八〇年，我曾為父親章乃器的右派錯案多次向中央申訴。大約四五月間我聽到消息，父親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於是我帶上反右時印發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訪，請求中央對父親的言論作出重新估價。當時小平不在北京，耀邦把我的申訴專門轉送小平，通過這種下情上達的方式，小平、陳雲表了態，對文件作了改動。在後來下達的中央六十號文件上，父親被列入改正的二十一名右派的首位。這事是我終生難忘的。

古人云，哀兵必勝。耀邦的逝世，可以說給了中國共產黨一次歷史機會，如果想加強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糾正錯誤，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歷史的時機稍縱即逝。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希望黨中央珍惜這個機會，作出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抉擇。

詩人、翻譯家、《詩刊》副主編劉湛秋：對耀邦的去世表示無比的痛惜；我在天安門廣場又看到了“中國魂”這樣三個字時，我流出了眼淚。如果我們錯過這個機會，把人民的激情再次拋入谷底，那我們就要犯重大錯誤。我覺得，對耀邦的不公正待遇應該重新評估。作為詩人，劉還在會上朗

誦了獻給耀邦家人的長詩《他——死在崗位上》。

報告文學作家戴晴女士：剛才諸位前輩發言，都是自己和耀邦的交往，我和他沒有任何親自交往，想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來講講。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執政黨，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的執政黨。政治體制改革定要往前推進，當前最關鍵的是黨內民主。

大家剛才講了，耀邦是在一個非常時期，採取完全違反組織原則和組織程序的手段，讓他被迫提出辭呈書，而且被迫地作違心的檢討。我覺得耀邦一生中最悲慘的事就是作這種違心的檢討。建黨七十年了，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為什麼代表了所有黨員來主持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都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拿掉了？這裡面大有問題，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民主就這麼殘缺？

今天我們悼念耀邦，不僅僅是懷念他的偉大人格，而且應該按照他的心願，把他已經開始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很多問題不可以再回遑了。剛才一些同志的講話使人非常痛心，也讓人深思。你們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先生，但我感到必須提出：“就是對黨內不正當的事情，無論你是一個普通黨員，還是中層幹部，特別是高層幹部，你不能坦然處之。我覺得一定要分出個是非來，要使得黨內好的作風不僅僅是由個人好的品格來保證，而要靠建立一套機制來保證。我們的希望，中國的前途，黨和國家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個別領導人的人格上，而應該建立在機制的保證上。”

中顧委委員于光遠：耀邦和我在三十年代作為青年工作者彼此認識，但是成為朋友是在批鄧前後，我們一起反對江青，也一起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受批挨鬥。在唐山大地震期間，我到他家作客，他用“難兄難弟”概括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沒想到一九八七年初，我們又成為“難兄難弟”。他“下臺”以後，我曾經對他講過這麼一段話，我說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兩個人之間可以是朋友而非同志，或者同志而非朋友。只要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彼此就會以同志相稱。但是成爲朋友，彼此還要有交友的願望，只有具備這兩方面的條件，才成爲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我和耀邦是同志加朋友這樣一種關係，我珍視這種友誼，我們之間的友情是真誠的。他的去世使我深深悲痛，但光是悲痛不行，還要作進一步的思索，還要進行工作，該做什麼還要做什麼，特別是我們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對“中國訃告學”沒有研究，不知在座的有沒有這方面的專家。什麼人可以在死的時候加上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耀邦連這個也沒有，他“到不了”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規格。這本來是沒有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觀的存在。黎澍去世的時候很反對表現在八寶山靈堂裡面的等級主義，但它是存在著的。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來判斷，耀邦當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說，耀邦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想講兩件事：一件事是一九七五年紀念長征四十周年，耀邦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主持召開了一個青年的大會，在展覽館劇場。在大會上，他講了很多語重心長的話，講到在延安時期的艱苦奮鬥，鼓勵青年人學習長征的英雄業績，特別講了這麼一段話：“我現在將近六十歲，我今天在臺上講話，也許到二十五年以後公元二〇〇〇年，我希望我這個身體能勉勉強強地到那一天（言及此時，吳明瑜泣不成聲，與會者無不爲此悲痛萬分），希望在那個時候再開一次大會，那時你們青年人成爲主人來講話，我就能有一個椅子，坐在主席臺的邊上。能看到這局面，我就很高興。”怎麼也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去世了。他在科學院這個講話，對科學院青年有很大的影響。有很多造反派，在四人幫統治的時候走錯了路，但就是這次會，耀邦的講話感動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在臺上、

臺下都流眼淚。後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科學院搞不起來，當然有很多因素，其中這個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想不到，他對中國人民、對改革作了那麼大的貢獻，會有這樣的結果（又泣不成聲）。第二件事，一九八七年以後有一次去看耀邦，講到我們歷史上的許許多多冤假錯案。耀邦早先給我們說過，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很多的特務，當時毛主席讓他下去調查。他回來匯報，很多特務都是假的，毛一邊聽他的匯報，一邊就討論起草了審幹九條的規定（後來又有“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等等）。這對延安時期搶救運動能及早糾正，起過作用。可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他這樣為大家做工作，別人卻在背後放暗箭搞他（泣不成聲）。他當時跟我講，他一生在兩件事情上感到遺憾：一件事情是項南的事情，他當時在團中央沒有處理好，沒有能夠保護好項南同志；第二件事說自己反自由化中間的檢討，他說“我也傷害了個別同志，我托人帶話給他”。耀邦同志都是爲了別人在做事情，冤案都得到平反，而自己最後是含恨而去。

政治學家、《文革十年史》作者嚴家其：記得三年前，潘維明在上海召開發展戰略討論會，有一天晚上，正好是“五·一六”通知發表的二十周年，當時有朱厚澤、高占祥、孫長江、胡德平，我們幾個人一個房間談話。記得非常牢的是胡德平講了這樣的一句話，他說如果文化革命再發生的話，這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如果文化革命的災難不能總結教訓的話，這也是個災難；如果沒有從制度上防止文化革命產生的話，中國也是個災難。後來回到家中，恰好那幾天《文化革命史》要交稿，我就寫了一句話“一個不能從災難裡面吸取和總結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這句話實際是出於胡德平同志的，我把它寫進前言裡面去了。但是沒有想到，僅過了半年的時間，胡耀邦同志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對待，離開了總書記這樣一個職務，我認爲是被迫辭去職務的，而不是自己願意辭職的。

中顧委委員李銳：四月十五日上午新華社記者電話告訴我耀邦的噩耗，我絕對不相信。四月五日，他發病的前三天，我應約到他家去。我二點半鐘到的，我們談話一直談到晚上九點半，在那裡吃晚飯，他精神很好，並且很愉快，吃飯也吃得比較香。所以這消息對我來講的確是晴天霹靂。十六日晚，應戈揚之約我寫了一篇短文，介紹了我與耀邦的來往。

今年我到美國呆了一個半月，哈佛費正清中心請我去，發現出了英文版的《胡耀邦傳》，作者大概是個紅衛兵，離開哈佛時我請管圖書的人員同作者取得聯繫，問是否已出中文版，因爲我知道耀邦不能直接看英文。後來作者在我離美之前，寄給我英文版，把中文版的清樣也寄給了我。四月五日前我就都轉給耀邦了。那天去，我談了許多美國的情況，談到了劉賓雁在美國的情況。他還是很關心劉賓雁的。我也講到了美國留學生對他的關心，對八七年的事件留學生是一直記在心裡的，留學生和我對話，總是要提到這件事情。

四月十五日我寫了四句詩：“天下奇冤一掃清”，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由在組織部工作的耀邦批准才有資格從流放地到醫院去治病，然後於七九年一月六日回到北京，這也是耀邦直接批准的，一回來很容易就解決平反了；第二句，“神州莫再有冤靈”，即我們的國家不應該再有受冤枉的人了，也可作各種理解；第三、四句，“此情此景張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人活在人的心裡面會永遠生存下去的，他在張家界游覽的時候，有兩千人擁擠著要同他握手，要同他合影，水泄不通，他到南寧之後，他只好足不出戶了。他很嘆息地跟我講，假如我在廣西再出門，再碰到張家界這種事情，而這種情景傳到北京有什麼好處呢？從這

件事看到，為照顧大局，耀邦在八七年後這兩年半的痛苦心情。第二天有個攝影家經秦川介紹，去耀邦同志家中照像。拍照時，攝影師按慣例叫他笑一笑，耀邦有這麼一句話：“我怎麼笑得起來。”所以，這是一張苦笑的照片。那天我們談得時間很長，談到怎麼度過晚年的問題，我送給他那個傳記了，其實那個傳記我也沒細看，當然很多要害的東西作者也不會知道。盡管作者作了很多調查研究，包括去過耀邦的家鄉。我建議耀邦晚年“不管怎麼樣，你自己的一生應該有點回憶，給後人留下點好東西，你的一生還是非常值得回憶，是非常值得留給後人的。特別是有兩段，你是怎麼受毛主席欣賞的。”他是老紅軍中最年輕的，是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生的，現在紅軍長征留下來的最年輕的一代人，在延安擔任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才二十幾歲，雖比我大一歲半，那應該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指出錯誤，防止擴大化方面作出的貢獻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黨是在一個頑固的左的運動中間過來的，在這種左的運動高潮的時候，能夠頭腦清醒，能夠設法制止其擴大，這個是千難萬難的。作為耀邦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品質：敢於頂住這種左的狂浪，這種品質是最難得的。四月五日那天我們也談到青年，他非常感慨：“青年是我們的希望，怎麼我們現在這麼害怕青年呢！”

我與他比較密切的關係是從八二年開始的，我到組織部工作，特別是十二大召開之前，接觸比較多，看到了他另一種優秀品質：確確實實貨真價實的自我批評，在我黨歷史上，這也是一個人最難得、最可貴的品質。他是我在幾十年黨內生活中第二個可以交心的人：第一個是黃克誠。在十二大上關於一個同志的人事安排，在一個小型的會議上，前後我頂了他三次，不同意這個同志的安排。他堅持，我頂，頂了三次，結果他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覺得這種品質非常不

容易。我對上三峽工程一貫比較反對，八五年時，我出了一本書《論三峽工程》，八四年至八五年之間中央確實通過了要上三峽，我有篇文章想拿到報紙上去發表，清樣最後送到中央，耀邦同志卻不同意這文章發表，而且對我講了幾句“閑話”。後來他送我一首詩對此作了自我批評，詩中反映了我的意見，認為三峽是不應該上的。對於反對精神污染，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後來紫陽講的那個話也是他參加意見的，他在與我多次談話中講到了，“搞了二十八天不能再搞了”。反對精神污染，沒有他的話，不曉得要搞成什麼樣子。（秦川插話：他到日本去的那天晚上，專門打電話作了指示：“從現在開始你們不要讓鄧力群來”。）我的最後一句話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不弄清楚的話，我們還會犯歷史錯誤的。

著名經濟學家馮蘭瑞（李昌同志的夫人）：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我們十分悲痛和惋惜。我認識耀邦同志是在一九四〇年，延安時代。比較熟悉還是在耀邦同志和李昌三度一起工作以後。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我到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李昌是政治部主任，耀邦是縱隊的政委。第二次是一九五一年底到五三年，在團中央，我們同住一個大院。最後一次是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任命胡耀邦、李昌去中國科學院。他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一同經受了殘酷鬥爭和嚴峻的考驗。在這次鬥爭中，他們被揪到大連批鬥，回來後，耀邦身體不好，一天晚上突然聽說他去世，我連忙跑去打聽，證明那是訛傳。沒想到，這一次竟是真的，耀邦就這樣離開了我們！耀邦同志正直誠懇，胸襟開闊，性格爽朗，思想深刻，境界很高。他待人熱情真摯，樂於幫助同志。同志們遇到困難，或感到思想苦悶，都要去找他談談。有人請他幫助解決問題，儘管當時他還沒有恢復工作，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但他卻熱情接待，耐心地聽

他們傾吐心曲，幫助他們分析問題。人們從他那裡受到鼓勵，得到安慰，感受黨的溫暖，他卻遭到“門庭若市”的責難。

耀邦對工作極端負責，對同志光明磊落，他無私無畏，具有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坦蕩胸懷和高尚的政治品質，從來不搞陰謀詭計，不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耀邦同志不是完人更不是聖人，他也會犯錯誤。最難得的是他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就承認就改正。一九八一年，江蘇南京顧爾鐸文章的事就是一例。當他發現批評錯了時，就打電話給省委，要顧爾鐸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首都思想戰線座談會上公開了這件事。但是，有的所謂錯誤，卻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中央文件列出的胡耀邦同志的錯誤，有一條是說，耀邦同志在一九八四年一至四月談到統一思想時說的“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的提法，其中後一句話把經濟和整黨等同起來，違反了中央整黨決定。但是，據我所知，耀邦講的這兩句話，是一九八四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見中央決定單行本第39頁）。這句話沒有錯。如果說錯了，那是中央文件錯了，不是耀邦同志的問題。我在發現這個問題後即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同時抄送給代總書記。我建議中央在適當的時候對耀邦同志的問題重新審核，作出正確的結論。耀邦同志為政清廉，從不以權謀私。在任總書記的七年間，我沒有機會見到他（他不常回家，去了幾次沒見到）。但從報道中知道，接連幾個冬天他都在外地，在邊疆邊防戰士和貧困地區人民中間，以古稀之年，飽受風刀霜劍，曾幾次病倒，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他離職約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我們去看他，這時候他考慮的是，在後半輩子我做什麼，還可以為人民做點什麼工作。沒想到這次會見竟成永訣，給我們留下永久的懷念。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上海市出版局黨委書記潘維明：一九七八年我考入北大，擔任了一屆學生會主席，有兩件事耀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七七、七八屆同學發起為老校長蔡元培和李大釗建造銅像的活動，雖然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有極左思想人的反對。在很困難的時候，我給耀邦寫過一封信，他委托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轉告北大學生會的同學們，說他支持這個活動。第二件事，當時北大黨委的工作非常困難，面臨如何對待學生提出的許多尖銳問題，有人提出要在北大抓千分之五的反革命，要開除學生。韓天石同志當時講，千分之五的概念是北大八千人中要抓四十個反革命，我到哪裡去抓這麼多反革命。當時耀邦堅決支持了北大黨委的這個意見；當時耀邦領導的中央確實理解學生，理解北大黨委的工作。所以學生更加熱愛我們黨；所以在天安門游行的時候，北大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標語。

後來在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期間，更體會到了耀邦對青年幹部的一片愛心。我第一次見到耀邦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和芮杏文同志兩人去機場接他，在機場他和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講到了他對精神文明建設的一系列構思，我們也匯報了上海開展文化發展戰略方面的想法。他表示了堅決的支持。後來有兩次參加書記處的會議，討論我們這個文化發展戰略提綱的時候，耀邦有幾段話我至今仍然記得非常清楚，講到我們當時在文化上準備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打破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習慣，要給我們的知識分子、給我們的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發放長期護照，允許他們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廣泛活動這麼一個設想時，耀邦就說，“不要怕人不回來，他不回來，他的兒子女兒會回來，他的兒子女兒不回來，他的孫子孫女會回來，就是他們人不回來的話，他還會把錢寄回來。所以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出去的

人學到了東西對我們只有有好處。”這在當時對我們啓發特別大。

一九八六學潮前夕，他在上海，絲毫沒有即將要下臺的感覺，仍然興致勃勃地談上海的發展，看了上海的十個郊區縣。還專門組織科教、文化和文藝界人士座談，當上海雜技團團長匯報到了由於實行了文化發展戰略，該團有了自主權，能夠在世界雜技舞臺上自主簽訂合同，第一次到日本演出四十五天就賺了一百五十多萬美元。他聽到非常高興地說，我這個總書記就愛聽你們講這些，你們知識分子富起來了，我就高興了。當時也提了很多意見。後來這些藝術家們講，和耀邦在一起，就像解放初和周總理、陳老總在一起那樣。後來我到了電機廠，發現八六年的這場反自由化運動，在最基層的人民當中是不得人心的。

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民心向背確實是考驗一個人最主要的標志，對耀邦同志的評價，想了半天，我覺得剛才大林的話最合適，他就是一個偉大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相處時間比較短，黨校時在他底下的理論研究室工作，與他經常在一起討論文章，真感到是和人在一起，不是跟那種官、假人在一起。我們這個社會爲什麼這樣悼念耀邦呢，就是因爲耀邦是一個真正的人，老老實實的人，不是那種搞陰謀詭計虛假的人。我有機會與吳明瑜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去看他，也是談了很長，從下午二點半一直談到六點鐘。有兩句話他講得非常感人，我們都覺得對他處理不公平，他爲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歷史功績。他沒有那麼想，而是說：“我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地位，第二個沒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個好名聲。”現在想起來，實際上他還有第三個沒想到，即他的逝世會給我們祖國的歷史帶來這麼大的深刻的意義。但是不管怎麼說，他作爲一面改革的旗幟，雖然人離開我們了，但這面旗

附：  
「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  
座談會發言記



還在指導我們。他確實是關心人，我們去，他幾乎把所有熟悉的人一個個都問到了，身體怎麼樣，精神怎麼樣？他問到吳江同志，老吳（明瑜）說他不太願出來。我說要勸他出來走走。耀邦就說要把他拉出來！他總關心別人，其實他自己日子更難過啊！他挨個地講，挨個地說。那天他還說到，“多年來的經驗，有四方面人要慎重又慎重來對待：一是青年學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愛護他們，關心他們的成長；一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要理解、要寬容；一是少數民族；還有民主黨派。”盡管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是這麼一種處境，但是他還是有信心。那天他還問我們：“你們對形勢有什麼估計啊？”還說：“改革很艱難，但是決不能後退，一定要改革。”我們臨走已站起來了，他還鼓勵我們說：“現在要依靠三個左右，即七十歲左右、五十歲左右、四十歲左右的人，大家要努力，要把改革搞下去。”十四日晚我給他家打電話，德平不在，是德華接的，德華說父親病了進醫院後，一度有點險情，心臟停跳那麼幾秒鐘，沒有通過助博器，他自己又跳起來了。德華還說這麼句話：“老人家生命力還挺強”；還說“按醫生說法，危險期是一個星期，最危險期已經過去了，明天是最後一天。”回來我就打電話告訴老吳，老吳還說等他好點了，我們再到醫院去看他。真是沒有料到。

李銳插話說，最近我和他談話望他保重身體，我說你只比我大一歲半。他說我七十三的門坎過了，中國有句古話，七十三、八十四嘛。他對自己的身體是非常之樂觀的。（吳明瑜插話：他沒有任何器質性毛病。）他不相信他自己有心臟病。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我很敬仰耀邦同志，但遺憾的是我沒有見過他（孫長江插話：那天他專門問了顯揚，問了好幾句）。八七年的變故之後，外電有很

多報道，其中說到蘇（紹智），還有在座幾位是耀邦的社會基礎，很榮幸我也被列在其中。從那以後更感到有一種命運上的聯系，尤其關心他的健康問題。這次他得病後我總在探問他的病情，十三日還打了個電話探問，知道情況還是很好的，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我對德平講，等到耀邦健康恢復的時候，我要求見一次，承蒙德平厚意，等他恢復健康後一定安排。我知道耀邦多次問起我的情況，包括我住的破房子他都問到幾次。十五日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人悶住了。這幾天心情很壓抑，耀邦去世前後，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陡然發生一個非常大的反差。我非常注意悼念活動，我在天安門發現，耀邦是屬於人民的。一個領導人去世之後，能夠激起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界這麼樣巨大的悲痛，我覺得這就是對他最好的評價。耀邦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粉碎“四人幫”以後，經過三中全會前後的這場努力，他支持領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把黨的思想路線引導到馬克思主義軌道上來後，我們這個黨才從沉痛的教訓中看清了當代中國的走向。耀邦站在當代中國歷史潮流的前頭，在引領著這個歷史潮流的前進。他堅持民主，記得八一年他當黨的主席的時候有篇演說，裡面有這麼一句話：“革命勝利以後，我們黨的任務仍然是領導人民爭取民主”，“民主不是一勞永逸的”。這句話很多人是不贊成的，想砍掉；由於耀邦的堅持，這句話沒被砍掉。他自己作風非常民主，但最主要的還是他把民主看成中國的希望。在現實的環境裡，他要徹底扭轉局面是不可能的，所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把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使得我們黨的政策體現一種公正、人道的精神，耀邦實際上開了一個先河。耀邦讀了很多書，八七年以來是馬恩全集一本一本讀，我經常知道他已經讀到哪一本了，最後一次消息說他讀到二十三卷，也就是《資本論》的第一卷，後來不知他進程怎麼樣了。他對馬克思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主義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關心人民的生活，把我黨的政策叫做“富民政策”。

秦川插話：真理標準討論之後，又計劃討論社會主義的目的到底是爲什麼？後被人告發了，所以中途夭折了。他富有入道精神、民主精神，而且把民主、入道看作是我們黨奮鬥的一種目標，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我黨高級領導人中，這是極少的。他還有一個可貴的地方，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堅持實踐與理論的統一，親自舉手贊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貫徹。如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幹部要年輕化，黨有這個政策，他碰到這個事情，總要力圖推進這個進程，耀邦是一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爲一個理論工作者，特別要繼承他的創造性精神，推進我們的民主。

中央統戰部林京耀：今後一段時間如何消化耀邦的政治遺產，對我們推進民主化現代化進程有重大意義。八七年他離開總書記的職務以後，我接觸了不少人，有一個感覺，如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但中科院的同志就講，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時間，是科學院的黃金時代；宣傳部的同志說，耀邦當部長的時候，是中宣部的黃金時代；在黨校雖然是副校長，但主持常務工作，黨校的同志也說耀邦工作過的那段，是中共中央黨校建國以來的黃金時代；還有組織部的同志也是這麼說。一位領導同志，能夠給自己工作的單位帶來一個黃金時代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難得的，我覺得對耀邦評價是民心所在。

原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耀邦同志的突然病逝，在人們相當沉重的心情中增添了意外的悲痛。近十年來，在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的事業中，我有幸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導下做了七、八年工作，他以友相待。在他永遠離開我們的時候，作爲他的下級、同志和朋友，不能不坦誠無忌，一吐永志之意和痛惜之情。

耀邦同志並不是最理想的領袖人物，他對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誤勇於自我批評，曾經一再檢討。然而這一切都無損於耀邦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光輝形象。隨著歷史的演進，我們感到，耀邦同志的所思、所言和所為的價值，不僅在於推動了十年來改革開放建設的事業，而且在於，他的某些成就和貢獻至今仍然是改革開放的基礎，他的許多思想和精神仍然值得我們思索和汲取，仍然是鼓舞我們繼續前進的力量所在。

耀邦同志的功績不僅在於“他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表現出非凡的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而且在於他在黨的組織路線方面，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撥亂反正。他堅決反對和批判在幹部路線上任人唯親、人身依附，以極左路線來劃分親疏，對幹部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和腐敗思想，而是堅持黨性原則，從改革開放事業大局出發，公道正派地看待每一個同志，並且以這樣的態度和立場來維護黨的團結。他堅持有錯必糾、有冤必平的原則，以非凡的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領導全國紀檢部門和組織部門一一平反了幾十年以來的冤假錯案，解放了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千百萬長期蒙受冤屈的好同志，並且把這些同志安排到比較恰當的工作崗位上，為實現黨在新時期的任務，奠定了幹部隊伍的基礎。

耀邦同志的功績還在於，他領導黨中央大膽確立和逐步完善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以他銳意改革的精神和深入群眾忘我工作的作風，奮力奠定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他親自主持起草了《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切實保護生產隊所有權和自主權，強調認真執行按勞分配，肯定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體貿易是社會主義的必要補充，他積極支持農民在生產責任制中的一再突破和試驗，領導中央在每年年初發布一個“一號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文件”，推動農村改革向縱深發展。在我國整個經濟形勢由於農村改革的成功開始全面好轉時，他又及時提出創造性地運用農村改革基本經驗來推動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儘管一開始就受到很大的阻撓，但他堅韌不拔，領導全黨步步深入，推動改革開放事業繼續發展。

他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等一系列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指導我國整個改革事業繼續前進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耀邦同志的功績尤其在於，他在重新確立我們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方面所作的特殊貢獻；而正確的思想路線，又是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靈魂。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開創階段，我們黨的很多老一輩革命家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其中我以為耀邦同志所作的貢獻尤為顯著，尤為突出。在提出、支持和組織真理標準的重要討論中，從提出中心思想，組織“特約評論員文章”，以及理論務虛會的召開和整個思想理論路線具體深入的領導，等等方面，都浸透著他的智慧和心血。這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全國人民新的覺醒，推動著全黨全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用實踐標準來檢驗真理，重新評價過去，正確認識現在，使我們黨和國家的復興以及新時期的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耀邦同志對改革、開放、建設理論極端重視，以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研究和建樹，以他理論上的開創勇氣和魄力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榜樣。一九七九年，由中共中央召開的，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巨大作用的理論務虛會，就是在他積極倡導、大力支持下進行的。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認識、啓蒙

作用和非凡的勇氣、魄力，就不可能出現那次會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暢所欲言的新局面。也就不可能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冲破“禁區”，提出新論。盡管當時就有一些人認為這些新論是異端邪說，但是這些年的實踐一再證明，這些新論是新思想的先驅，是很正確的。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耀邦同志強調指出：“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要站在科學的高峰，沒有理論指導是絕對不行的。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後，不但不能放鬆理論工作，而且必須更加重視理論工作。必須使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線、方針、政策、辦法，使我們的事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不要再讓什麼樣的政治騙子牽著鼻子走到斜路上去，這樣的歷史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十幾年的實踐證明，如果不盡快創立出這種理論，而總是靠根深蒂固的老一套思想、觀點和辦法，改革是難以成功的。

耀邦同志還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這個基礎我們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離，但是理論如果不面向實際，不去解決實際問題，那就不叫背靠，而是躺在馬列上面睡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泉就是實際，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級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理論離開了實際，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失去了理論的生命線。”後來，耀邦同志還強調指出，“一切忠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有責任不使它同社會生活隔絕，停滯不前，僵化枯萎，而必須以新鮮的革命經驗豐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應該說，耀邦同志的這些話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髓，對於我們具有啓蒙作用。馬克思主義不但給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的許多原理和根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據，而且更重要的是給我們以認識世界的方法和勇氣，那就是從實際出發，敢於運用自己的頭腦來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耀邦同志在這方面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耀邦同志還怒斥了那些曾經在黨內橫行一時的“理論惡霸”，他指出：“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壟斷起來，只許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許別人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他們可以利用特權毫無根據地把人民歡迎的作品扣上‘反黨文章’、‘反黨小說’、‘黑畫’、‘黑戲’的帽子。這種摧殘文化、箝制思想的惡霸作風必須肅清。”耀邦同志熱情地號召我們：“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沖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堅定地實行理論工作的群眾路線，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的流毒，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園地百花盛開。理論工作的園地無比廣闊，理論工作者要有勇氣、有遠見，敢於從實際出發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樹立為人民利益堅持真理的科學態度，反對為個人私利出賣原則的惡劣作風。”應該說，正是耀邦同志的這些教誨和激勵，使我們有勇氣有覺悟回過頭去認識過去，批判過去的錯誤和弊端，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其中過時或者錯誤的東西和錯誤的認識，恢復它的真理精神；同時使我們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去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耀邦同志的許多思想不僅僅表現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看法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們破除了迷信，解放思想，開擴了眼界，鼓起了勇氣。可以說為一代新的覺悟，起到了啓蒙的偉大作用，從而為造就和更新中國文化，創造新社會的一代新人，打下了基礎，創立了一個好的開端。耀邦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思想解放先驅的光輝形象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裡。

耀邦同志在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上曾經說過：“我們在這段時間的功過是非，已經載入了黨和國家的歷史紀錄，印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們堅信歷史是客觀的公正的，堅信黨和人民是以社會實踐作為檢驗一切事物的標準的。人民將對我們這個領導集體作出切合實際的評價。”應該說，耀邦同志的這段話再次再現出他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信念、原則精神和廣闊的胸懷，表現出他對人民的無限信任。公道自在人心，歷史和人民已經對耀邦同志作出了切合實際的評價。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發言記



##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sup>①</sup>

來參加這個會，使我想起同北大有關係的三個人：一是陳獨秀；二是馬寅初；三是王若水，他今年一月九日在美國因癌症去世了。

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發刊詞“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條：一，自信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六條從民主、科學、實事求是，直到我們現在提倡的改革開放、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等，無不包含在內。從陳獨秀早年的活動來講，最重要的還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反對自古以來的封建專制主義。這也是當年魯迅談的冲破“鐵屋子”，反對做奴隸、做奴才。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春秋戰國時期，多頭分治尚無統一集權的高壓力量。士人（知識分子）處此時機，能自由討論，儒道法墨，百家爭鳴。人生、社會、思想、政治等等，觀點、見解可以各不相同，互相獨立，地位平等。自秦統一天下，統一了體制，也統一了思想：儒法合

<sup>①</sup> 在北京大學“知識分子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流（陽儒陰法）歸於一家，即霸道、王道合一的人治，由皇帝（聖旨）說了算，從各代帝王直到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脈相傳。全國執政以後，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尤其迷信戰爭經驗，迷信意識形態；晚年悲劇即在書記掛帥，個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認：“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實為斯大林）。

缺乏自由民主，這是我國歷史傳統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沒有自然科學與科學思維的傳統。如實驗科學就必須有形式邏輯、定量分析、還原論等思維方式為前提。關於自然，古代只有一部《爾雅》。我們的類書（從《藝文類聚》到《古今圖書集成》）與西方的《百科全書》截然不同。我們的類書以皇帝為綱，歷史、綱常、倫理等佔絕大篇幅，最後才有一點器物、方術之類，且無植物、動物、礦物的概括，五谷與瑪瑙、玉器並列，蝗蟲與旱、賊同屬“災異”。西方則自然與人生分開，《百科全書》以天文、數理、植物、動物、生理等為序，而後法律、政府、國家、倫理等。總之，中西文化整個結構體系不一樣，中國從人生到自然，西方反之。從而也影響傳統思維方式，我們的眼光總是向上，而不下，仰聖賢領袖，輕凡夫俗子。改革開放已二十多年，經濟與政治仍未能同步，還是喜歡政治掛帥，人治高於法治，權勢冒充權威，長官意志代替科學論證，把主義當作宗教。中西思想意識的差異，還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西方“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

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士人習慣依附權門，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變成“奴才學”大師，代有傳人。北宋以後，稱夷為父，變為奴才的奴才，如秦檜（狀元）、賈似道、洪承疇等。當然也不乏人格獨立的學者，如葉水心、顧亭林、黃宗羲、王船山等。我國自古無民主傳統，甚至不存在對自由的向往。無視自由妄談民主，實緣木求魚。個人自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

由乃民主社會的前提。西方經過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二、三百年的努力實踐，人權、自由、民主這些問題早就不在議事日程了。

恩格斯講過，任何人都要受三種限制：一是時代，二是自己的知識與經驗，三是思維能力。我認爲還應當加一項，即個人品德。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做獨立的人，即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這樣才能不墨守陳規，有所創造。可以說，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科學，也就談不上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發展。

回到陳獨秀，他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當年就著意要將屬於西方的好東西，已經過歷史考驗的自由、民主和科學傳統，引進到中國來。上面引的六條，可以說是他的宣言。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是第一屆到第五屆的總書記。大革命失敗的錯誤，過去完全歸咎於他；但不論右還是左，主要還是共產國際領導的錯誤，陳的責任是次要的。現在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出有專刊專書，過去的錯誤評價基本得到平反。陳獨秀一生是偉大的、光榮的，晚年（一九四一）還寫文章批評斯大林的專制主義，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制度創造了斯大林。他還認爲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就等於布爾塞維克主義加普魯士民族性。

五四運動時，人們認爲舊知識分子滿腦袋聖賢語錄，哪裡還有自己，就怕“壞了心術”，培養十足奴性，成爲封建專制統治的恭順奴才。朱自清曾說：“舊知識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或軍閥）生存。所以新知識分子是比較自由的，他們是‘五四’之後才有的。”可是，歷史發展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延安的革命聖地，當年整風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我們過去曾經是完全肯定的。運動高潮時還發生過“搶救運動”，認爲“特務如麻”，許多機關、學校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人們被整得乃至有“原罪”感，於

是甘願做“馴服工具”了。這就為後來的毛主席萬歲，讓一個人思想，個人崇拜，“一句頂一萬句”，“四個偉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打下了基礎。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被稱為小資產階級；一九四九年以後，被稱為資產階級了，屬於“異己”的行列。知識是科學的基礎。延安“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有過極盡挖苦的詞語，後來就發展到：“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時就變成“臭老九”了，學生統統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馬克思將“人的自由自覺活動”視為人的最高本質。可是，我們將這個本質異化為馴服工具，人人當螺絲釘。同時，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逼所有人尤其知識分子劃清界限，宣揚“成分論”，只能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絕無中間道路。一切帶“人”的觀念——人權、人道、人性、人情等統統蔑視。蘇維埃時期錯誤的“肅反”政策，曾冤死十萬人。延安搶救接受教訓，“一個不殺”，卻未總結教訓。終於發展到十年“文革”，滿天下“反革命”，整人、死人不當回事，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造反有理”，“砸爛一切”，將推動人類歷史社會發展的動力——知識、自由、民主、科學、法治（更不論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共產黨的創始人以及後來的許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可是為了所謂“不斷革命”，知識與知識分子卻化為異己的對立物。這個問題不徹底弄清楚，我們走過的可怕的彎路不徹底弄明白，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搞不好的；我們必須從理論到實踐澄清這些問題。我這裡只簡單談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過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就關係到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問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他創造的剩余價值論，都值得重新研究，現已出版和未出版的這方面的專著不

少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體力勞動是簡單勞動，似容易說通；但應用到復雜的勞動上，就比較困難了；尤其應用到腦力勞動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更說不通了。人的智力、靈感這些屬於知識水平與思維能力的腦力勞動，因人而異，是不可能量化的。《紅樓夢》只有曹雪芹才能寫得出來，你怎樣計算其勞動價值？現在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寶貴的財富，如何計算其價值？比爾·蓋茨的資產曾達千億美元，怎樣計算他創造的價值？科學技術所創造的價值，同工人、農民體力勞動創造的價值，怎樣對比計算？歷史發展到今天，科學技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力，其載體是知識和知識分子，是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是碩士、博士，還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所有這些人、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一樣，都是生產力，都是創造勞動價值的，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作用如果以人體作比喻，知識分子是人的頭腦。

馬寅初我不熟悉，只能簡單說幾句。馬老於一九八二年去世，活到一百歲。抗戰時在重慶，他曾當眾質問孔祥熙，指斥他們發國難財，還罵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因而被蔣監禁了兩年。新中國成立後，他衷心擁護共產黨，但對問題有他自己的獨立見解，決不盲從。當年學蘇聯，大學不搞科研，他執長北大期間，主張高等院校也應當從事科學研究。五十年代馬老便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論——《新人口論》，主張“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否則，“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認為國家應採取措施，獎勵節育，用征稅辦法限制生育。可是，這些何等正確的主張，反被視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是“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翻版”。對隨之而來鋪天蓋地的“批判”，馬老堅持真理、威武不屈。周恩

來曾勸他作個檢討，以便過關。馬老嚴肅地說，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我決不在壓力下屈服。我雖年屆八十，明知寡不敵眾，我也要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他終於被免去北大校長和人大常委的職務。談起馬老的“新人口論”，真是感慨無窮。

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嗎？我自己不久前有一件小事可談談。為懷念趙朴初，寫了篇短文想讓《光明日報》發表，其中有一句話，“他六·四以後到上海去了”。後來將“六·四”改成“胡耀邦去世以後”，該報總編輯仍不同意發表。憲法上載有的言論、思想、出版、結社四大自由，何時能真正實現呢？

最後談王若水，王若水是北大哲學系的，他入黨後還沒有畢業，一九四八年就到解放區去了。一九五〇年，他被派到《人民日報》工作，後來是專管理論的副總編輯。六十年代他發表過有新意的《桌子的哲學》，受到毛主席的稱贊。文革後期，由於抵制“四人幫”的“左”，他受過迫害，從而更加清醒。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是改革開放打先鋒的，主持《人民日報》的理論筆政，配合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經濟、政治、思想）做文章。一九八三年三月，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揚作了一個報告，若水參加其中有關異化部分的起草。大家都知道，胡喬木藉這個報告批判周揚，整倒周揚，逼得周揚做檢討後，抑郁而死。（夏衍曾對我說過，這個報告讓喬木去做，就什麼事也沒有了。）王若水同時遭到迫害，他頂住了。為反駁胡喬木，他還寫了長篇答辯文章，說明自己立論的正確，胡不敢再加回答。但隨後若水終於被撤銷職務。從此他就更加奮發為文，從理論上清理並發展馬克思主義。他的好些著作是在香港出版的，國內沒有他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這裡只將他一九九五年寫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較詳細加以介紹。我們是一九七九年以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

後認識並成爲朋友的。當年他曾將這篇文章寄給我，我還復印了幾份送與幾位好友。

以“從追求到幻滅”爲小題，文章開篇即這樣說：“二十世紀確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勃興和失敗的世紀。”“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判共產主義的實踐。”文章闡明了下列六個問題：（一）十月革命和列寧的機會主義；（二）如何看資本主義；（三）共產主義——科學還是空想？（四）從無產階級專政到領袖專政；（五）被誤解的馬克思；（六）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實踐的唯人主義。以下全是摘錄原文，除開作者引用的文句有引號外，就都不打引號了。

（一）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這是社會主義的前提。而列寧把雙方的邏輯顛倒過來，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生產力和社會主義文明達到社會主義水平的前提。所引列寧的原話是：“我們爲甚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俄國革命是依靠了布爾什麼維克自己創造出來的一條規律，那就是：生產力一定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對，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在俄國這樣的一個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對，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

（二）馬克思主義是應當在實踐的檢驗中不斷修正的，問題僅僅在修正得對不對。那種認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根據波普爾的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無權認爲自己是永遠不會推翻的：（若水說）我同意這個觀點。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就認爲，資本主義的壽命不長了。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當作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勢力來看待的。無

產階級要打倒資產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晚年恩格斯糾正了過去過分樂觀的看法，指出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工人階級原戰略應當是由革命轉入和平發展，應當很好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如爭取普選權，參加國會等。二十世紀初，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重新論證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然而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史證明：帝國主義階段過去了，資本主義發展著。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很多變化，它仍然能促進生產力發展。這些變化，馬克思預見不到，列寧也預見不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能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處在發展初期，他們是資本公司，又是經營者、管理者；對於發展工業和商業，他們比共產黨有經驗。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當時慶祝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這是把一大批有經營管理經驗和能力的人拋棄了，不是有利生產，而是相反。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由於官僚主義的決策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和浪費，是任何資產階級的剝削也不能比的。我想提一個尖銳的問題：拿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比較，到底哪一個階級是進步的，哪一個階級是落後的呢？《共產黨宣言》高度評價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但是過早地認為，這種積極作用已經完了。

（三）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非常好的，可是怎麼實現呢？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裡，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裡，是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的。（若水認為馬克思設想勞動證券制度並不誘人）。就我來說，還是寧願帶著錢包，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



到市場上去自由選購。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做到這一條；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利用勞動證券消滅商品），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建立在他的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關於馬克思價值理論存在的問題，前面所作評論即引自王若水此文中的觀點，這裡不再贅述。這些觀點我也早就有過，只是寫不出純理論的文章。）在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對腦力勞動的蔑視以及“工人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在現代的條件下，財富是由工人、科學技術工作者、經營管理者這三部分人聯合創造的。這樣，“剝削”的問題就變得模糊起來了。難道不可以說，腦力勞動者所給予體力勞動者的，要大於他們得之於後者的嗎？馬克思要廢除私有財產，是爲了消滅剝削，爲了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蘇聯和中國經驗已經證明了，我們最多只能做到市場的自發經濟基礎上加上人爲的計劃調節，但不能不要那只看不見的手。今天我們來看《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會發現，在有些方面，如高額累進稅，工業和農業結合，城鄉對立的消滅以及義務教育，西方國家比社會主義國家做得更好。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了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兩種制度正在靠近。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解放人類，但他們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又誤以爲一切問題的根源在私有制。他們認爲，資本主義發展下去，社會將迅速兩級分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鬥爭將決定人類的未來。歷史的發展否定了馬克思的預言。現在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了。

（四）在中國，過去把一切邪惡的品質都歸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被說成是大公無私，最有遠見的，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無產階級階級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這樣的無產階級只存在於頭腦裡，在現實中從來沒有存在過。共產

黨在無產階級名義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黨治國家或“黨國”(Party-State)。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共產黨專政又變成領袖專政，這個學說主要屬於列寧。馬克思和列寧抨擊了資產階級民主，當年資產階級民主確實不完備。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這個好萬倍的民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百年來，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進步。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民主機制來表達民意，監督和控制黨和領袖，防止濫用權力，其結果是黨和領袖凌駕於人民和無產階級之上，異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無法防止黨和領袖的異化。

(五)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一個馬克思遭到嚴重誤解的領域。第一個誤解是有關意識是物質的反映。問題就出在對“反映”的了解。列寧是把這個詞和“攝影”、“復寫”的同義詞來使用的。亞當·斯密把財富看作是勞動的創造，馬克思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所以我們不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體，還要從桌子中看到人的勞動、意志和智慧。這就是見物又見人，並且是從物中見人。馬克思說，以往的唯物主義對現實只是從客體方面來了解，沒有從主體方面來了解。按照列寧的觀點，客體就是客體，不依賴於人存在，這正是馬克思所批評的。

第二個誤解是有關“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列寧說，“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那麼，馬克思說的“存在決定意識”就是說意識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復寫”嗎？錯了！馬克思說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它並不是人以外的東西。包括宗教、道德、文藝、法律、哲學等意識形態，不是反映人以外的東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這種反映也不是依樣畫葫蘆的復寫。因為人民遭受苦難，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要創造出一個上帝來，

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

作為祈求的對象，把幻想寄托於死後的天國。

第三個普遍誤解是有關馬克思說過的“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據此，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把人的本質歸結為階級性，這樣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殺了人的個性。兩性、親子和朋友關係等都是社會關係，屬於“總和”，不能全部歸結為階級關係。而且社會關係是會異化的。馬克思說到，“人的類性恰恰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獲得自由，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本質的實現。人在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又會陷入新的不自由。社會關係是會異化的，異化了的社會關係不但不是人的本質的實現，反而成為反人性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認為工人階級應當消滅自己，消滅自己的階級性，恢復自己人的地位。

（六）一九三二年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學手稿》的發表，賦於馬克思主義第三次生命。歐洲一些“馬克思學”的學者，發現一個不同於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一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馬克思的出發點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馬克思的出發點是人，是現實的人或實踐的人。馬克思哲學是一種歷史哲學，它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對馬克思主義的第四種流行的誤解，就是以爲馬克思最關心的是人們的吃飯穿衣這種基本的物質需要。馬克思批評過把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公式用來解釋歷史。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生存、享受、發展。馬克思主義並不反對享受，只反對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別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變工人只勞動無享受和資本家只享受不勞動的狀況。物質享受是消極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質享受。享受不是最高需要，最高的需要是發展的需要，也就是發展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馬克思認為。即使消滅了剝

削，只要勞動是爲了衣食，這種勞動仍然是不自由的，是不得不進行的，它仍屬於“必然性的王國”。這裡的關鍵在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增加自由時間。自由時間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豐富。所謂自由時間，主要是指進行創造性勞動，如科學研究、技術發明、文藝創作等等的時間。馬克思曾從人的發展角度把社會形態分爲三個階級：最初形態（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專制的）特點是人的依賴性；第二大形態（資本主義的）特點是人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是以對物的依賴爲基礎的；第三大形態的特點是自由個性，這種自由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共同財富基礎上的。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創造一種全新人。“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異化克服了。人將成爲“自爲的人”，世界成爲“爲人的世界”。人將成爲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對馬克思主的第五種誤解，就是以爲馬克思是反對或者害怕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這種誤解在西方很流行。在我們國家，“自由”一詞在很長時間裡是帶一些貶義的，好像這是只有西方國家主張的東西。

第六種誤解，就是以爲馬克思是輕視個人價值，共產主義就是“大公無私”的社會，共產主義精神就是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若水說）我在十年前就說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做不到的，這是一種悖論。既然是“專門”做有利於別人的事，那就是“毫不”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的意思。一個革命者只有在爲革命而犧牲的時刻，才是徹底拋棄自己；在其他時候，是不需要也不應該這樣做的。列寧提出的格言要好一些：“人人爲我，我爲人人。”這個“人人”，包括自己在內。這就不是“無我”。只能反對利己主義，只能反對“損人利己”。但“利己”不一定要“損人”。其實壓制個人的集體是異化的集體，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虛

幻的集體”。要防止有人口口聲聲叫別人“無私奉獻”，自己卻在搞以權謀私。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既不是“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義”。當然，我並不認為馬克思找到了一條實現這個理想的具體道路。

若水最後總起來說：我不是列寧主義者，也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過時了，他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馬克思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哲學裡面，但不是列寧所闡述的那種辯證唯物主義，也跟馬克思本人講的歷史唯物主義內容不盡相同。這種哲學，我想稱之為“實踐的唯人主義”，也就是馬克思的人的哲學或“哲學的人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唯人主義”是我創造的新譯名，英文裡是 humanism。過去譯為人道主義。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稱為 Humanismus，後來他改用了唯物主義這個詞。我所信仰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批判的、人道的。

“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一定要滅亡”。恩格斯引用過歌德的這句話。這對馬克思主義當然也適用。據我所知，毛澤東也表達過這個意思。現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滅亡。這是歷史的進步，應當歡迎。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將永遠佔據一個重要位置。馬克思主義中的精華仍會被許多人繼承和發展。

一九九六年，應《東方》雜誌之約，為紀念顧准，我寫了一篇文章《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文章末尾寫的這段話，就是讀了若水此文而說的：“最近讀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論家的長篇論文，他根據本世紀以來世界歷史變局和當前的現實，來回顧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主義）一系列原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對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並澄清了長期以來一些誤解和曲解，論證深刻，有說服力，讀後覺得深受啓發。”

去年若水去美國前，我曾同女兒南央到協和醫院去看望若水，當時他精神尚好，對病情還較樂觀，說不久要去美國，當地已對他的治療作了安排。今年一月十日突然接到電話，若水一月九日在美國去世了！不禁悲從中來，作了這樣一首七律，即以此結束我的講話。

### 頌王若水

大名若水水長流，思想終生苦索求。  
正本清源談異化，祛邪糾誤得豐收。  
權威假冒行為劣，真理昭彰筆力遒。  
君子之交自古淡，立言立德仰高丘。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五日補正

## 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 ——《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序言

改革開放以後，思想解放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依據而開始的，這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我們終於走出自我折騰的大彎路，踏上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軌道了。同時，也從原來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教義、教條的束縛中開始解放出來，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全面深入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了。有些學者在這個過程中還創造出新的理論。

最近中央領導的有關說法是：“自覺地把思想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sup>①</sup>這明確指出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應持態度。

但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呢？馬克思的理論和學說中有沒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呢？是否由於所處地位不同，可以分為“官方馬克思主義”和“民間馬克思主義”呢？

我們一直高舉馬列主義大旗，但經過斯大林發展的列寧主義，同馬克思主義是有區別的。列寧同第二國際的爭論

---

① 李長春：“推動文化事業產業繁榮發展”，刊於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中，將馬克思主義作了片面理解，如關於政黨和專政的理論（主張專制極權，強調集中紀律，輕視自由、民主、人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第三國際的政黨、斯大林和毛澤東執行的都是列寧主義，即憑借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權乃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等，於是“馬列主義”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成為專制獨裁的手段，全民都得遵守。其後果如何，已為我們的十年浩劫與蘇聯東歐紅旗落地所證實。而第二國際所屬政黨，百年來堅持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方面，沒有對資產階級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通過議會鬥爭、工人運動，走改良主義道路，從而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不斷變化，也可以說是遵循馬克思預言的航標在前進著。

大家都記得毛澤東說過的這幾句話：“馬克思主義我只取四個字：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我們過去確實將馬克思主義作過如此片面簡單的理解，而且還將它戴上類似宗教的神聖光環，這就不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了。要知道，馬克思本人就不同意將他的學說冠以“主義”的稱號。

產生馬克思主義的前提是資產階級經過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後，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和人權的人類理性。馬克思認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人的異化，“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於是才有《共產黨宣言》中將共產主義描繪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以及追求的是人的精神自由與物質自由，等等說法。因此，可以這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人道主義。但是，這又同要達到這個境界的手段，即其革命學說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尤其經濟學說的消滅私有制和執行計劃經濟等大相矛盾。總之，馬



克思主義沒有窮盡真理，真理會愈辨愈明。

現在理論界對於馬克思主義議論紛紛，爭辯甚多，提出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如馬克思主義是否科學性、理論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統一？勞動價值論是否全錯了？唯物史觀和辯證論站不站得住？科學社會主義是否科學或仍有空想？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否即階級鬥爭史？抑或是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可以從物理學史得到啓示：牛頓力學解釋不了新發現的物理現象，愛因斯坦相對論問世解除了“物理學危機”，等等。要知道，在歷史上站得住腳的學說、理論，必然是事實理性和價值理性兩方面都能形成的，我們必須從個人的思想、“主義”中解放出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個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馬克思認為每個時代總有屬於本身的問題，從而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實踐的發展，以批判的精神看待自己的學說，從不把它當作教條和終極真理。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親眼看到工人階級在原始積累中的苦難，從人道主義出發，爲了消除剝削，建立起一整套理論體系。但是他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有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等。我們後人應當永遠尊重和欽佩他的執著追求、艱苦探索真理的精神，以及那種追求人類解放的真誠善良的願望。因此，對其錯誤方面應當如實修正，對其正確方面應當大加發揚；再不要將其理論當作“主義”，不准修正，只准創新，進行無休止的誤導。修正錯誤，堅持正確，這才是對一位偉大思想家的負責任的態度。

如果作了這樣的理解，馬克思被西方知識界、學術界評爲“千年第一學人”，就不會覺得意外了。一百六十年前，《共產黨宣言》敲響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喪鐘。馬克思所追求的

人類理想社會目標為：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社會成員及其生活的公平與公正，在此基礎上全人類的解放；他還提出衡量這些目標是否實現了的三條標準：是否消滅了城鄉、工農和體（力）腦（力）勞動的三大差別。《宣言》中也提到以“高額累進所得稅制”、“高額累進遺產稅制”和“社會失業保障制”等，作為治療資本主義體制的良方。大家知道，百年來馬克思的“喪鐘”和“良方”對資本主義所起的作用，如不僅出現了羅斯福的新政，還產生了凱因斯的政府干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從而資本主義不僅未臨垂死，而且生機盎然，馬克思預言的社會主義因素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自然生長起來。因此，西方學術界對人類文明追求的科學精神，在根本上同馬克思是一致的，他們深刻瞭解馬克思和尊重馬克思；他們回顧歷史，感受當代，放眼未來，自然心甘情願選舉馬克思為“千年第一學人”。

從修正馬克思的各種理論和學說出發，到創立新的理論和學說，許多學者都在做這件大事。保定以吳宗熾為首的一批學者，多年來探索主體與客體之間人類歷史發展的關係，他們“身居保定市井，心繫宇宙萬物”，揭出生物進化的三大規律：主客體矛盾、主客體對立、積累和遺傳，以及人類活動三大定律：效率、需求和合作，出版了“主客體關係學”一系列叢書。他們一九九八年出版《主客體關係學綱要》時，我應邀寫過一篇序言。現在吳宗熾的新著《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就要出版了，書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面的修正，我又寫了上面這樣一些話。我不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生平也沒有寫過純理論著作，只是就平時閱讀所得和自己經歷所感，發表了上述這樣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不當之處，還望作者和讀者指正。

我最後想說的一句話是：沒有真正自由研究、自由討論和自由發表的環境和條件，學術思想的獨立見解和開創精神

是無從出現的，我們過去這方面犯的可怕錯誤和慘痛教訓實在太多了；我衷心希望我們今後能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環境中，得到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全面充分的發展。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

## 迎接新世紀要四講

世紀之交叉千禧來臨，大家感想甚多，尤其我等耄耋之人。多年以來，關於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優劣勝負，人類社會的進步究竟依靠什麼，這個問題總縈繞腦際。

三十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就曾對資本主義發生過正面影響：衛星上天，載人飛船，蘇聯都曾先於美國。可是，誰能料到蘇聯、東歐紅旗落地呢？我們走過三十年的彎路之後，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按照過去的說法是“修透了的修正主義”。當然，今天也還有人想揪住“姓社姓資”大做文章。《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停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似乎根據馬克思的“指示”在發展在變化，不僅沒有“垂死”，沒有“一天天爛下去”，反而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日益左右經濟的發展，知識資本日益取代人力、技術資本，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我們經過“三面紅旗”和“十年浩劫”之後，終於認識到商品生產不僅不能廢除，而且經濟發展離不開市場機制，要走“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道路。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幾十年的對抗，兩者之間的優劣勝負，人們可以作各種各樣的議論，但“你死我活”的局面大概是不會出現了，今後很可能求同存異地活下去，

是否最後走向一種難分彼此的“全球化”或“大同世界”呢？任何智者也料不到百年以後的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強扭的瓜不甜，歷史發展自有其內在規律。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進步最大的變化還是從封建主義變到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還不成熟。西方、東方幾百年間，影響前進與後退、發展與停滯的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大概是求得共識的。

八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為我們送來德、賽兩位先生，否則，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也進不了中國。我們靠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打倒了國民黨，建立起新中國。因此，革命與建設要依靠民主與科學，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此外呢？從資本主義看，還要靠法治和市場經濟，人家早已行之若素，早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克林頓緋聞的熱鬧與冷卻即最近一例）。可我們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農民賣個雞蛋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根植於士農工商，土壤深厚，沒有民主與科學的傳統，也沒有法治與市場經濟的傳統。不幸的是，這個傳統也根植到我們革命的共產黨，我們曾長期以封建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搞“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因而出現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十年“文革”及其紅衛兵運動，“造反有理”，“砸爛一切”，將民主、科學、法治、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至今回顧，仍不寒而慄。鄧小平深感這個問題的嚴重，一九八〇年做了要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其中講到的種種措施，二十年來未能認真落實，以至直到現在，權力導致腐敗的問題仍難以解決。

《炎黃春秋》創辦了九年，針對歷史講真話，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贏得社會上廣泛的好評。去年發表的《批判封建主義是跨世紀任務》、《廬山會議四十周年感言》、《關於個人崇拜的歷史反思》等文章，比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主

義和“左”傾思潮。我希望《炎黃春秋》今後結合人物與史事，多組織一些好文章，在肅清封建專制主義和宣傳民主、科學、法治和市場經濟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總結人類社會進步的經驗教訓，二十一世紀就要來臨之際，我認為民主、科學、法治和市場經濟，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 要認真總結這二十年的經驗教訓

——讀《鄧小平時代》所想到的

中央編譯出版社給我送來了他們出版的一本新書——《鄧小平時代》。作者是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粗粗看了一遍，發現這本書和市面上那些寫二十年改革的書不大一樣：作者是改革的局中人，寫起來卻是那樣客觀、冷靜；作者是當代人，卻力求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和描述這個時代。

這本書從毛澤東逝世寫到鄧小平逝世之後，完整地展現了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遷。書中首先介紹和分析了中國改革的起點，接著，展現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然後，對中國的農村改革、對外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作了詳盡的介紹和深入的分析。還深刻評價了中國改革的推進戰略的成敗得失，介紹和分析了改革過程中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在書的後一部分，對鄧小平的遺產和中國面臨的種種社會經濟難題進行了剖析。這本書不僅寫了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還描述了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思想觀念等多方面的變化。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中國這一社會變遷的研究和描述是放在世界總的發展趨勢中進行的，是放在二十世紀世界社會變革進程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顯得視野開闊。我覺得，儘管書中有的事實或嫌簡略，有的觀點容再議論，但無論是從內容上看

還是從思想深度來看，都可以說這本書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

過去的二十年是極不平凡的二十年。在沒有大的社會震動情況下，排除了左的干擾，使中國走出了計劃經濟的死胡同，走出了現代迷信的陰影，政治上雖未能同步改革，但也開始有所變動了。這一段歷史不僅使每一個中國人感到無比激動和興奮，也使全世界十分注目。把這一段歷史記錄下來，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這本書的作者花了十年業餘時間完成了這件有意義的工作，這是大好之事。

楊繼繩是一位老記者。記者的特點是尊重事實，用事實說話。《鄧小平時代》這本書正體現了這個特點：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作者在緒言中寫道：“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和歷史有一點是相通的，這就是信，即真實可信。”作者是有心人，在這方面的確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歷時十年，訪問了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和研究單位，還專門訪問了幾十位知情的高層人士。有關章節還請當事人核實材料。書中描述的很多重大事件是他目睹的現場記錄，讀起來有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由這樣一位記者來寫這二十年的歷史，同一般研究歷史的人是大不相同的。自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這本書的作者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有利條件。

我們要往前走。前進中要少走彎路，就得把走過的路搞清楚，就得認真總結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如果不了解自己真實的歷史，就會重犯歷史錯誤。《鄧小平時代》對這二十年的歷史是說得比較清楚的。從這本書敘述的歷史可以看出，這二十年其所以前進，就是因為我們敢於面對現實問題，大膽地突破各種各樣慣性與教條的束縛。這本書比較詳細地談到這些束縛，以及中國的改革是如何在突破這些束縛中取得了成功。

我在列席十五大的書面發言中說過，應當開始總結這二



十年（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年）的經驗教訓。我們要在本世紀結束前徹底弄清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以及世界整體發展的趨勢；總結最主要的成功經驗，要記住最關鍵的錯誤教訓，避免再走彎路，二十一世紀能走上康莊大道。總結這段歷史必須允許個人自由思考，研究歷史不能設禁區。《鄧小平時代》這本書觸及了問題，對有些問題的分析還比較深刻。但是，對總結和研究這二十年這項巨大社會工程來說，一本書顯然是不夠的。書中有些看法也是一家之言。因此，我同意劉吉同志在給這本書寫的前言中所說的，要有更多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書寫這段歷史。

歷史使人明智，願我們在總結這二十年的歷史中聰明起來。

##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我這個一九一七年出生的老人，當然是感慨萬端的。這二十年來，幸虧走上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國家的經濟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但是由於沒有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生活落後，仍是跛足前進，並導致腐敗現象叢生，怨聲載道。放眼世界，經濟全球化，人類進入信息時代，科技與經濟的競爭日趨劇烈。據有關方面統計，我們的綜合國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經濟競爭力卻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灣居前十位）。這不能不引起國人的高度警惕啊！百年前，我們落後捱打；辛亥革命後，仍然落後捱打。五四運動迎來自古沒有的德賽兩位先生，引進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國共兩黨沙場決勝，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國。由於從馬克思處取來“階級鬥爭”四個字，從列寧、斯大林處學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以及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計劃經濟經驗，並同中國自古相傳的乾綱專斷相結合從而冷落了德賽兩位先生，使我們走了三十年彎路，經歷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和“文革”十年災難，幾乎走上一條絕路。而那三十年，正是世界科學技術、經濟人文突飛猛進的三十年。因此，我們希望進入新世紀之後，能夠痛改前非，經濟、政治雙雙改革開放，兩條腿邁步前進，走上導致人類歷史前進的自由、民主、科學、法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治、市場經濟的康莊大道。

耄耋之人，餘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難涉，常常只有回顧與反思。反思種種經歷，走過的道路，哪些事還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反思是為了更好地前進。一九九七年列席十五大時，我有一個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隨後在刊物上發表了。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應當開始總結這二十年來（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年）的經驗教訓，作出我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二十年能這樣走過來嗎？何況這二十年中並非沒有曲折，沒有艱難，沒有干擾。”當時想到有七個問題，不能回避研究和討論。

我現在想談的，還是同“防左”有關的一些感想，先從個人有關的經歷談起。

### 重視歷史經驗教訓

應該說，從抗戰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風，自己的經歷還算比較順當的。當年接受黨的教育，學習毛澤東著作，為抗戰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黨工作時，一九三九年到重慶參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會議。馮文彬、胡喬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會議。聽王明、博古作過報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厚版書，印象很深，如同講壇上的教授，當年並不喜歡這種搬書本的教授。會後和胡喬木到湖南檢查工作，轉了一個月。當年我在地方上“紅”了（即暴露了），南方局決定調我到延安。又同胡喬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工作。一九四一年調到《解放日報》。我的境遇還比較正常。

一九四一年，整風運動先在黨的上層進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清算其在內戰時期對黨造成的危害

和損失，以及抗戰初期“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右傾觀點。也聽說批評了周恩來的經驗主義。由於發生了王實味等問題，隨後整風從上層轉到全黨來進行，就涉及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當時把知識分子的什麼缺點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這跟解放以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歸結為“資產階級思想”是類似的。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意義，過去只從正面加以肯定，但知識分子從而把自己貶得一錢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談及。整風運動隨即轉入可怕的“搶救運動”，至今還沒有見到對此事的全面論述，境外倒是有了這方面的著作。我就是在這次運動中被捕坐牢的。

我以爲要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最主要是弄清“左”的問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特別講了“左”是根深蒂固的問題。

歷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裡整的嚴重後果。內戰時期從富田事變前後開始“肅反”，打“AB團”、打“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托派”、“羅章龍派”等等，直到長征結束才停止。我接觸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三個地區誤殺了四五萬人，加上中央蘇區、湘贛、閩西、閩浙贛等，直到陝北，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十萬人，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只剩下四個黨員。許多地區是殺得自己站不住腳的。

延安“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並執行。康生一九三七年從蘇聯回來，把蘇聯肅反那一套也帶了回來，說什麼延安黨政軍機關“特務如麻”，毛澤東也曾一度相信，隨即擴大到華北、華中所有根據地。當時沿用刑審逼供信的辦法，臆造出了國民黨區的“紅旗黨”，四川、河南、甘肅、廣西、廣東、浙江、湖南……，幾乎無一例外。中央黨校動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學在逼供之下，誣陷我爲特務，且是他的“領導人”，於是我被抓了起來。在棗園、保安處等地共關了

幾百上千人。如孫作寶、楊靜仁、武衡、吳波、周建南等都和我關在一起。當時逼供信很厲害，我經歷過五天五夜不給睡覺，不准眨眼睛，認為這樣就可能失去控制講出真話來。我當時挺住了，沒有亂講。這種辦法有長到半個月的。幸有毛澤東的九條方針，及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才沒有重複過去亂殺的錯誤。隨後，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脫帽鞠躬，對被錯誤挨整的同志表示歉意，這場運動就此草草結束。一九五〇年我在長沙看過唐縱的全部日記。唐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頭，戴笠的二把手，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上寫道：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可見，什麼“特務如麻”，完全是自己亂自己。

遺憾的是從江西時期起，如此嚴重、可怕和慘痛的教訓，一直沒有認真總結，以致解放以後，從肅反、反右派、反右傾一直到“文革”，其損失其後果是難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當時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廬山會議後又反右傾，傷及三百八十萬人；“四清”運動認為三分之一基層單位組織不在我們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敵情，如山冤案，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一九七八年後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基本結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長歷史，但積習猶存，餘波未息，如胡耀邦難道沒有受冤屈？趙紫陽是怎樣下台的？對舉世公認的改革開放現實，對鄧小平的“一個中心”、“三個面向”、“三個有利於”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實踐，近年來還不是出現好多“萬言書”，遭到“左王”“左將”們的攻擊。所以來日方長，鬥爭正未有盡期。

延安的“搶救運動”，對我的影響很深，使我頭腦更加冷靜，較能夠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看法。

老實說，我對解放以後的所有的運動都是有看法的；對毛澤東那種按比例抓鬥爭對象的做法，覺得太不科學，太不

切實。一九五二年我轉業到燃料工業部，管全國水電建設。在自己管轄的小範圍內，盡量不亂搞，多保護幾個好人。

## 我黨有史以來一大難題

不斷運動，不斷整人，這個現象歷史上反覆出現，必須從根本上挖出它的根源。

首先是理論與認識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吃虧於“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局限於階級鬥爭和“消滅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識形態”）的框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正確的，但對於革命的進程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具體的設想。對革命形勢何時到來，就曾估計得樂觀了，但也只是探討性的，到了晚年尤其恩格斯，已認識到早年的估計過於樂觀，並認為經過議會道路改造資本主義是可能的。馬恩的學說產生於十九世紀的西歐，怎麼可能一概適用於幾十年百年後的東方和全世界呢。馬克思曾設想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直至非資本主義）的東方國家，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帶來的痛苦，而更快地導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僅僅是提出一個設想，這種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很不成熟時期的設想，竟為東方革命國家一一實踐！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似乎更證明了這一設想的指導意義。十月革命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曾匆匆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垂死階段這一結論，似乎資本主義的壽命屈指可數了，社會主義革命不久就會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同時還提出共產主義可以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的觀點。列寧急於消滅私有制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碰了釘子後，改行新經濟政策，認識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長期的過程，這是符合當時蘇聯歷史實際的正確政策。可是列寧死得早了一些。斯大林沒有接受列寧的新認識，賡續其新政策，反而加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速實行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條件不成熟，遇到困難就搞階級鬥爭，搞肅反，實行鎮壓政策。六十年代我在北大荒勞改時，還看到斯大林“消滅富農”時，跑到中國來避難的好些俄羅斯老太婆。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一邊倒”，仿效蘇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總是隨著人類的進步不斷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國度都應當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修正，有所發展，有所創新，而不能死抱住馬克思的片言只語或已經過時的觀點，生搬硬套。我們犯了歷史性的錯誤，不能怪馬克思，也不能怪列寧、斯大林，只能怪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並沒有遵從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人類歷史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和經濟制度，而不是上層建築，後者對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們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顛倒了。戰爭年代我們講新民主主義，搞三三制；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講到：要將“中國建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我們一直認爲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許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個合理的發展。他還談到：“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幾萬萬人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這些正確的理論、思想就被他自己拋棄了，就急於進入社會主義，搞“一天等於二十年”，一直錯到十年“文革”，到“崩潰的邊沿”。回顧歷史，真是感慨萬端。

其次，“左”的反覆出現還有一個根本原因——體制問題（來源於“無產階級專政”同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即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還沒有做好，這就同民主化的問題有關了。

我國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長達兩千多年的國家，儒家命根三綱六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從秦始皇到蔣介石，一直是一個個人專斷、家長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的國家；當然也是一個權力無限，濫用權力，沒有監督與法治的國家。這種專制傳統也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黨與我們的新中國。

革命和戰爭年代，地下黨與根據地的黨對敵鬥爭尖銳，戰爭環境，軍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黨政不分，順理成章。但當年也還有某些值得回憶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風開始，廣泛填寫“小廣播表”，就逐漸不敢隨便說話了。建國之後，戰爭年代這些傳統不僅繼承下來，而且歷次運動有所發展。黨員要做“馴服工具”，人人以當螺絲釘為榮。一個以反封建專制主義、以自由、民主為天然職責的共產黨，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一句頂一萬句”；“四人幫”搞封建法西斯專制主義；全國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請示，晚匯報。”於是圍著“舵手”一個人轉，成為生活習慣。在西方，“個人崇拜”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我們總是離不開“皇上聖明”“傳佈聖旨”。這不能不使我們深思。

第三，從文化層面上講，缺乏科學素養和排斥科學精神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鬥爭，可以“無法無天”，可以厭惡法律的約束，這是天經地義。可是革命勝利後搞建設，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就再不能“無法無天”，不講科學規律，排斥法治了。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包含客觀的依據，理性的思考，平等的爭論，最終是實踐的不斷檢驗；科學精神有賴於民主精神，而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礎，所謂權威主義（“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萬歲”）同科學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學精神才能保證我們各種建設、各個方面不犯錯誤，才能保證人類和歷史的進步。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可是我們過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長制、大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於是導致大權獨攬，唯我獨尊，定於一尊，讓一個人思考，一個人說了算。直到改革開放年代，這種習慣還難以徹底改變，還出現同科學精神相反的“新權威主義”熱；社會主義同封建專制主義總脫不了鉤。從上到下，從下到上，我們這個偉大民族，什麼時候才能養成民主的生活習慣呢？

第四，“左”似乎有一種“慣性”，“越‘左’越革命”，作為一種“生存意識”深深地銘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傾危險，“左”傾保險的傳統觀念，至今總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餘悸，被告誡要“夾住尾巴”；“左”的幹將總被提拔重用，“文革”時造反派人物有些依舊升官跑紅。相反，被認為“自由化”了，有損於“輿論導向”了，有害於“領導形象”了，不利於“團結一致”了，就要封鎖其發言權，乃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讓自謀生路。對“左”總是寬容的。因此“萬言書”不斷，“左王”“左爺”們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肆無忌憚。

總之，自由、民主、科學、法治，以及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進步的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與發展的依據，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到底，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 防“左”與估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

戰爭年代，我們熟讀毛澤東的著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可以說佩服的五體投地。實際上，今天我們需要從新認識的問題，在這些著作中已經接觸到並有了初步解決。譬如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需要發展經濟，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允

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發展，等等。可惜，這些屬於毛澤東思想正確的東西被他親手拋棄了，反而在“左”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到了十年“文革”，經濟臨界崩潰邊緣，走上了一條絕路。

當然，總的來說，一九四九年之前，毛澤東比較謹慎，比較實事求是。客觀上的原因是敵人強大，有三座大山，還有共產國際、斯大林，這是客觀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約。在這個時期，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農民大國的實際，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長期同“左”傾教條主義即同共產國際、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作鬥爭，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一九四九年之後，情況大變。毛澤東自己也在變化。經抗美援朝，認爲美帝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認爲斯大林也不過如此；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開會，對赫魯曉夫當然不在話下；在黨內是“鶴立雞群”；至於民主黨派更不在話下；知識分子其實最沒有知識，遠不如工農；群眾鬧事，沒什麼可怕。總之，失去了一切制約，早年思想中“左”的東西開始抬頭了，直到晚年，“左”傾錯誤有一個潛伏、發生、生長、發展，最後到登峰造極的過程。

總的來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對如何在一個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問題，一直採取了“輕敵”的態度，一再急於求成，不能不犯“左”的錯誤。五十年代初，土改完成，認爲封建主義已經解決。開始建設，爭取蘇聯援助，沿用蘇聯模式。雖然《論十大關係》想擺脫蘇聯某些影響，走自己的路，但總的方向仍是從列寧那裡來的：認爲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時刻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認爲今後的鬥爭對象與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硬將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從而以思想認識划成份，在新舊知識分子中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尋找無產階級的敵對分子。於是，緊鑼密鼓，反右派結合“反冒進”，搞大躍進，三面紅旗幾年間就能超英趕美，幻想向共產主義過渡。結果經濟大倒退，餓死了幾千萬人。仍然不接受教訓，轉而從經濟運動完全轉向政治運動，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期間為整個過渡時期，一直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造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終於荒謬地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消除“身邊的赫魯曉夫”，發動“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亂”。

應當說，關於經濟方面的知識尤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毛澤東知道的太少，也太不理解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厭惡，恐怕還是源於馬恩早期對資本原始積累的野蠻性和殘酷，以及帝國主義的本能擴張性的論述，而很少注意資本主義在歷史發展中的進步意義。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他似乎注意到了中國還需要發展資本主義這一面。但革命勝利很快到來，急於社會主義改造，急於追趕蘇聯，完全不顧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在西方所起變化，盲目估計世界形勢。蘇聯衛星上天，“東風壓倒西風”，以為社會主義陣營會很快戰勝資本主義陣營了。於是資產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及其思想成為頭號要打倒的敵人，而忽視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沒有肅清，自發的小農經濟思想佔優勢。毛澤東一生只去過兩次蘇聯，沒有到過西方國家。他個人的經驗主要在戰爭年代，以打仗和政治鬥爭為主，他熟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帝王統治之術，經濟方面只有“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條，又自以為搞經濟難道比打仗還難嗎？於是迷信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迷信“發動群眾”的威力，直到迷信自己的“一貫正確”。於是經濟上胡思亂想，隨心所欲起來。也還由於有這樣的土壤，歷史造成中國老百姓太聽話，如魯迅所

言，習慣於當奴隸乃至當奴才，知識分子也是如此，敢講話的也被整得不敢講話了。三年“大躍進”死了多少人？統計有二千萬、三千萬或四千萬啊！我當時在北大荒勞改，幾乎餓死。後來田家英等人聽說我在捱餓，向李富春反映，才把我調回北京。回北京前先調到虎林鎮上電廠勞動，在那裡可以買到泥鰍，六毛錢一個雞蛋，才免於一死。我體會到捱餓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只做了輕描淡寫的檢討。劉少奇卻說了點真話，“餓死人是要寫入歷史的”，餓死那麼多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林彪跳出來保護毛澤東，把一切錯誤推在“不聽毛主席的話”造成的。毛澤東對林彪的說法，非常高興。在錯誤和損失如此大的關頭，毛澤東仍一意孤行，不願吸取教訓；以後甚至發動紅衛兵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這是不可原諒的。

## 獄中的思考

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大別山中一個小水電站勞動。五月份公安部來人要我交代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的問題。我告訴來人：“他們不危險，危險人物是陳伯達。”我請他們帶信給周恩來。十一月他們又來了，把我給周恩來的信退給了我。隨後來了部隊中人，說李德生（當時安徽省革委會主任）要見我。我很明白這是要進監獄了。於是作了準備，把《李銳廬山會議記錄本》交給他們，叮囑他們一定要保存好。到合肥後，一架專機把我送到北京，十一月十一日夜晚我關進秦城監獄。那時秦城關了五百來人，司局長以上的二百多人。後來知道，死了三十多人，有六十多人得了精神病。

我被關在單人牢房中。西方的獄政，除死刑外，與世隔絕的長期單監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被囚者會因此喪失思維能力、語言能力，導致神經錯亂。在延安時聽說過這樣一件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一左

事：王若飛在國民黨監獄單監五、六年，放出來後，竟叫懷表為“鍋蓋”。原先我以為關的時間不會太長，後來看見監獄中有起重機在運作，知道還在擴建，必須作長期打算了。我下決心，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問題何在，後果如何。

開始幾年沒有書看，最後三年才允許讀馬、恩、列全集和魯迅全集。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腦力不衰，除每天堅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學習做舊體詩詞。開始時是即興口占，隨作隨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護士給了我一瓶紫藥水和幾根藥棉籤。靈機一動，發覺可作“奇墨怪毫”。於是靠牆坐在矮床上，面對哨兵監視孔，越發規矩地捧著書本讀書，偷偷地將“一籬筐酸果子”——四五百首詩詞錄在《列寧文選》（兩卷集）上的空白處。後來詩集出版，題名《龍膽紫集》，來由即此。

在延安時對毛澤東自然十分景仰佩服，但也有過具體的事不太舒服。記得一九四二年《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我參加了，蕭軍、舒群等都在座。當講到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毛澤東豎起兩個大姆指，特別提高聲音，神氣地說：“我晚上要點兩根洋蠟；我穿的是斜紋布，吊口袋。”（按當時洋蠟很金貴，一般人只點小油燈，穿的都是土織的十字布，沒有大的吊口袋。）我當時就覺得為什麼要這樣講話，因為並沒有人對領導人生活水平高一些有什麼意見，何必如此動氣。散會後我對胡喬木說了自己的觀感。喬木表示想跟我談談這個問題，以後由於忙並沒有談。毛澤東講話不大顧忌別人的承受能力。如反右時他對梁漱溟說的話，幾乎是用羞辱人的口气，這是很難讓人受得了的。

影響我後半生的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初南寧會議時，毛澤東找我和林一山去談三峽問題。一九五三年毛澤東視察長江，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陪同，林在陪同中談到為了

長江防洪，應盡快修三峽的事。四十年代抗戰勝利前夕，美國的大壩專家薩凡奇來到中國，爲了在空中取氮建大化肥廠，建議修建三峽工程。於是資源委員會派了一批人到美國去研究三峽問題。這一批技術幹部中的絕大多數和有關三峽的資料，當年都在我主管的水電建議總局。一九五四年，電力代表團正在蘇聯參觀時，國內來電，水利部要修建三峽工程。我很清楚，當時全國電力容量不過三百萬千瓦左右，三峽的容量在二千萬千瓦左右，這是完全不適應的。怎麼可能把人力、物力全集中到三峽工程上來呢。所以，我們回電，此事還十分遙遠。從那時開始，在三峽問題上我一直唱的是反調，與林一山持相反的意見。一九五八年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提出修建三峽工程。會上薄一波說，有個反對派。於是毛澤東召我和林一山飛南寧。當面聽取意見，我即據理說明，修建三峽條件遠不成熟。我的觀點已佔明顯優勢後，毛命我們再各寫一篇文章。這一次接受了我的意見，並且認爲我的文章寫的不錯，要我當他的兼職秘書。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四月，關於大躍進我向毛澤東寫過三封信，對我這個小人物的不同意見，他尚能聽得進去。（毛澤東在世時，關於三峽上馬，一直沒有點過頭。）

由於有過兩年的親身經歷，尤其經歷了廬山會議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對毛澤東就增加了許多感性認識。

馬克思說過，受難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難。中外古今，許多受難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獄中詩詞，有一部分反映了我對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的思考。

高天雲氣暖寒門，大地颳風南北旋；  
節令更時旋鬥烈，書生常在覆翻間。

這是寫知識分子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動盪不安的命運。毛澤東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他幾乎不承認相對的平衡，

不懂得社會穩定性的必要，總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拿群眾的話來說，是“共產黨吃不得三天飽飯，又要折騰了”。

萬景冬來成一色，百花春到總千顏。

四時風物人殊好，獨愛冰封未免偏。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是各色各樣的，應當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允許人們有不同的個性，發出不同的聲音。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批評普魯士政府控制輿論，禁止言論自由，也是以自然界花色為例的；晚年還談過，黨內必須言論自由。反右派運動中，大家知道，稍有不同的看法、說法，便遭戴帽之災。言論自由的問題，我們現在解決了沒有呢？

真理過頭成謬誤，偉大可哈差一步。

中西諺語意常通，莫貶過猶不及句。

偉大與可笑之間只差一步，這是西方諺語。事情做過了頭，走了極端，偉大就成了可笑。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具有“過猶不及”的毛病，把什麼事情都做得“翻天覆地”，其實很多事是漸進的改良的。

人皆有限識和知，心血來潮每自欺。

難免高明也失算，正如國手有輸時。

這是不同意把毛澤東看成完美無缺的神人。恩格斯說過，任何一個人都有三種限制：時代、知識和思維能力（還應當加品德）。晚年的毛澤東對自己過分迷信，再加上一幫起哄的人，使他不能不犯很大的錯誤。

還有一些詩也是針對毛澤東性格的偏激，越來越喜歡個人說了算，聽不得不同意見，如：

看事容易作事難，事非經過不知艱。

束修或少或多付，須戒傾囊賭棍然。

言行一致最為難，明哲時忘過去言。

何況潮流難抵抗，不知不覺也昏然。

無擇細流為大海，不辭粒土乃高山。  
船裝萬擔因空腹，秤壓千斤靠小權。

文火燉之肉爛香，若施猛火必焦黃。  
和風細雨苗歡長，暴雨狂風禾易傷。

《龍膽紫集》中，有好幾首歌頌毛澤東的詩，還有長詩，這些只到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為止。

我在監獄中養成了十分理智地去思考問題的習慣，這種習慣一直保持下來，說句笑話，我的老伴對此都不習慣。長年獨守空房，當時有條件想這想那，我有意冷靜地思索，思索得很多。

我想到毛澤東的文化狀況。前面已經提到，他崇尚我國傳統文化，對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採取虛無蔑視的態度。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熟悉的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我到過他的臥室，寬床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堆滿了線裝書。）他除執政後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出國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狀況幾乎毫無接觸。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於小農經濟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大同理想、平均主義（康有為《大同書》中反映的）等，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君權至上、獨斷專行，以及封建專制政治下的君臣關係、駕御策略等，無疑都對他晚年錯誤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譬如他也講民主，說過要讓別人講話，說過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等等，但這只是居高臨下恩賜的民主，不過是點綴，也就始終不能使民主成爲一種制度，成爲一種生活習慣，成爲一種決策的程序。

我也想過必須尊重獨立人格，尊重個人創新。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獨立人格，消滅人身和思想的依附，才能煥發自身的創造力。這一點在體育競技、科學發明、文藝創作中表現的最爲明顯。可是毛澤東硬要做秦始皇，比秦始皇

世紀之交的感言：還是要防「左」



還秦始皇。能在中國像馬寅初、陳寅恪這樣敢於獨立思考，保持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不多；錢鍾書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但表現比較消極。幾十年來把知識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變得服服帖帖，並具有“原罪”感，聰明才智受到巨大壓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大破壞。這真是歷史的大悲哀。我關在秦城時，“文革”在我腦中如一幅這樣的圖畫：毛澤東像個巨人那樣站在天安門，旁邊站著一個瘦小的林彪，周圍則是狂風掃落葉。

中國必須清算教條主義，必須清算封建專制主義，清算一切“左”的危害。

### 堅決貫徹鄧小平一九八〇年的講話

經過十多年的曲折，反覆實踐，應該說經濟方面比較好地吸取了經驗教訓，有了較大的突破。我們終於認識清楚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適用於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總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強，效率較高，成本較低。只有通過市場經濟，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鄧小平理論上的一大突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規定為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追求社會公正）。近二十年的實踐，證明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等主張的正確，當然，隨著實踐不斷發展，這一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要繼續發展。

相對而言，改革開放表現在政治體制，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方面，還明顯滯後。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一極其重要的講話。由於當時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的問題，據說胡喬木向中央上書，要防止“自由化”思潮，這個講話就被擱置下來了，直到現在，

很少再提及。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列席十五大時的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和意見》中，摘引了鄧小平《講話》的很多原文，為的是以其正確性和權威性來說明《講話》中所批判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作風，特權思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備和法治難以貫徹，等等方面，都還沒有很好解決。而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必然影響經濟的更好發展，尤其使得國有企業改革遲滯不前。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十二個問題中有四個問題同鄧小平《講話》是一致的：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要講真話，言行一致；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准搞特權。關於“發揚黨內民主”是這樣寫的：“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對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這些“生活準則”寫得都很具體，但是，實行得怎麼樣呢？周揚事件就是這個《準則》通過不久之後發生的。多年來，上上下下，很少聽到人們談論這個《準則》了。相反的，對輿論的控制，對出版事業的卡壓，是越來越嚴厲了。

生活告訴我們：“左”的教條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每前進一步都是艱難的。記得在推行農村責任制的時候，有些省委的領導很生動地描繪過這個艱難過程。“第一年說搞承包就是資本主義；第二年對搞承包的態度是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第三年的態度是窮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覺悟過來——我落後了！”我看過一個材料，說西方禁止隨地吐痰這件小事，也經過了一兩百年才得實現。

政治體制改革看來也急不得，要比較徹底的解決需要一

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前面談過，我們要大力提倡講民主、講科學，講法治。民主、科學、法治是構成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們肅清封建專制主義殘餘和克服“左”的教條主義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僅難以闊步前進，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

## 做人與當黨員

黨成立八十周年了，要寫點感想。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過去寫得不少了，於是想到自己：已滿八十四歲了，當了六十五年黨員，怎樣當的，當得怎麼樣？

### 一

在長沙小學五年級時，經歷過大革命，當過童子團的班隊長，老參加游行，上街演說。中學時，好讀魯迅的書和進步書刊，厭惡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向往民主自由的生活，高二時還寫過生平唯一的一篇左傾小說。一九三四年考入武漢大學，卻讀的工學院機械系，除左翼書外，還喜讀近代史。二年級時十八歲，正逢一二九運動，成為學校造反頭頭，隨後又是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同幾個最志同道合者成立自發黨組織，於一九三七年五月棄學到北平，接上黨的關係。可以說，一二九運動後，我就自覺地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將自己的一切同黨結合在一起，不論處於怎樣逆境，無怨無悔。

在延安整風運動以前，黨組織了解我這個人，自己全心全意工作，生活很正常。中央機關精簡時，一九四一年秋，我從中央青委調到剛創辦的《解放日報》，大概認為有點寫作能力吧。記得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博

古、陸定一、余光生（社長、正副總編）找我談了一個通宵，主要是談我的歷史和一些人事關係。那時我還是編輯部的支部書記，大家選的。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我被逮捕關到保安處受審查。後來知道由於三個問題：一位曾任成都市委書記的老同學，在黨校一部學習，被逼供成“特務”，咬了我是他的上級；二是一九四〇年在山東被殺的一個“托派”，其人一九三八年初在徐州時，參加過我領導的青年組織活動，咬了我也是“托派”；三是同我一起組織自發黨的一位女同學，傳說在新四軍出了什麼問題。這樣突然而來的打擊，當然毫無精神準備。不過，我是湖南平江人，那個地方紅白鬥爭極劇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婦孺被紅軍移民而死去，也有黨員親屬被國民黨殺害，從小也知道一點黨內鬥爭殘酷的情況。一九四〇年到延安，我就去看望過父親的老朋友李六如，在後來的接觸中，他談過自己受屈的經歷。我的父親一九〇五年剛到日本，就加入了同盟會，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同宋教仁同班，辛亥革命後選為眾議院議員，曾經到廣東參加過孫中山的非常國會，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我們姐弟三人是母親帶大的；母親是清末女子師範畢業的，對子女教育極其嚴格，常給我們講父親的為人正直，重道義，如反對袁世凱，不接受趙恆惕（湖南省長）的饋贈等等，要我們像父親一樣：光明磊落，不趨炎附勢。一九三七年初，知道我在學校有危險時，母親特地從長沙來，住到學校附近，對獨生子進行監護。這時同我說過：你父親在世時也會贊成共產黨的，可是你們膝頭拗不過大腿（斗不過蔣介石），就怕殺頭呵。

關到保安處的第一次受審最為嚴厲：五天五夜不讓睡覺，不准眨一下眼睛（有衛兵監視），雙手被銬，捱過耳光，久久端站或坐矮凳，等等（這類刑逼還屬一般）。強迫寫材料交代，直到眼中模糊一片，手不聽指揮，亂墨塗點為

止。當然，我沒有瞎說過一句話，也沒有亂寫過一個字。保安處當年關了好幾百人，我比較幸運，是最早釋放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就回到報社照常工作了。這有兩個原因，當時重慶的中外記者團要到延安來，報上刊載的名單中有一個我的小學同班，我立即向中央寫報告，說可以對這個老熟人做點統戰工作。由於周恩來知道我這個人，雖然問題還沒有做最後結論，就立即釋放了。關於延安搶救運動的詳情，特務如麻，人人自危，紛紛上臺坦白，地下黨是“紅旗黨”，等等，後來才逐漸知道一些，如《解放日報》編輯部也打了百分之八十的“特務”。康生當時就說我的家庭有血債，父親是被紅軍殺掉的（一九五九年在廬山仍如此說）。幸虧李六如在延安；父親去世時，他到我家中靈堂吊唁。回到報社時，博古同我談過一次話，說他並不同意逮捕我。保安處的噩夢也就這樣過去了。秦城的“延安雜憶”中，有一首關於保安處的七絕：“悠悠日夜舊山窗，恨不心肝挖出瞧；雖說江河曾遇險，怎知滄海浪濤高。”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時，我內心有一種天真的高興，這一輩子不會再遇到什麼麻煩了，即做人同當黨員不會再發生什麼矛盾了。

## 二

一九五〇年開始，利用工作之便，我開始搜集毛澤東早年的文章和有關資料。省公安廳廳長知道我有這方面的愛好，將他們得到的全部“唐縱日記”讓我翻看。唐縱已去臺灣，是戴笠的二把手，抗戰時任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的組長，同蔣的關係極密切。從藍衣社在莫干山成立時起，他就從未間斷記日記，留下一大堆同樣開本的黑色硬殼筆記本（其中還夾有蔣介石親批的很小的便條）。翻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中寫道：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

個內線。這使我大吃一驚：我們說：“黨內特務如麻”，可並沒有一個真正打入到黨內。此事過去有關文章中我都談到過。（《唐縱日記》已經出版）

接管沈陽時，在陳雲身邊工作，聽到他談過，全國解放後，可以和平土改。在湖南工作的三年中，我先後擔任報社和省委宣傳部的領導職務，從沒下過鄉。在熱河時多次下鄉，有很長一段時間報社就在農村。土改時，流行過群眾的過火鬥爭，如將對象捆綁在地上“拖”，有的拖到奄奄一息，確實看不慣。有當教員的老同學，是地主成份，我給地方寫過“照顧”的信，後來成爲“開除黨籍”中的一條“罪狀”。三反時到一個單位參加過“打老虎”，去過一個“老虎”的家裡，真是家徒四壁。我們這些從舊社會出來的人，知道大筆貪污並非易事。當時長沙槍斃一個市公安局長，是中央壓下來的，報紙發表了社論。公審時我沒有去現場，擔心此人叫冤。後來聽說念判決書時，有些條目他只是輕聲自語：這不是事實。

一九五二年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我以“學工”爲理由，堅決離開長期“坐而論道”的生活，終於調到北京燃料工業部主管水電建設。從此就一頭埋進非常具體的基建工作中去了。水電更有其特殊性，不僅技術方面廣而深，牽連的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和政治也極其復雜，我是樂此不疲。

“大躍進”開始，由於三峽問題的“御前辯論”，我的意見被毛澤東採納，意外命我當兼職秘書，於是就卷入政治漩渦中去了。期間曾三次上書，提出不同意見，受到當眾表揚。自己明白，我是晚輩小人物，相左的意見還能接受。不過，可能“闖禍”的想法還是同人談過，但沒有料到來得如此之快。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廬山彭德懷一案，我被列入“反黨集團”成員，從此二十年跌入深淵，成爲賤民。我的八十自壽詩中有句“六不怕唯頭尚在，三餐飯後嘴難張。”

這是“闖禍”的概括。為鼓勵大家提意見，“大躍進”時，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中說道：“共產黨員應當六不怕：不怕扣機會主義帽子，不怕撤職查辦，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有時沒提第一項，是“五不怕”）。廬山一案中，只有我開除黨籍。當時在水電部挨斗幾個月；也打了個“李銳反黨集團”，牽連一二百人。這大概是由於我“檢討不深刻，態度又不端正”所致。記得我曾以“接受了封建家庭的教育，不趨炎附勢”做文章。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來問我：對開除黨籍有何意見？我竟沖口而出：同意開除。可見當時思想對抗之深。鬥爭時，還曾追問我寫過哪些“毒草”文章。於是我將從延安到從事水電工作發表過的文章，開了一個目錄，自認為做事寫文從來實事求是，不講空話大話。在秦城憶舊時，有這樣的詩句：“樹約西風又一秋，此枝棲息且思尤；平生文字難成獄，自我批評總過頭。”吟得後一聯句，竟快樂了好幾天。廬山之變，是平生第二次經歷，做人與當黨員發生根本矛盾時，我不惜犧牲一切，堅持了前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歷史。

第三次矛盾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關入秦城監獄，一九七五年五月釋放。這是由於我得罪了當時紅得發紫的陳伯達。一九六七年八月，北京中央辦公廳等派人來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我下放此地勞動），向我外調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的材料。我說，毛主席周圍危險人物不是他們而是陳伯達，並數說了陳是一個拍馬奉迎的人物。近八年單監生活（單監在西方是最重的刑罰，因犯人可能導致神經錯亂），我設法保持了身體沒垮、腦力未衰。當年共關了五百來人，司局級以上幹部二百多人，有三十來人被整死於獄中，有五六人得了精神病。不管怎樣受審問，或有外調來追查，我堅持了過去的一貫原則，尤其為他人寫證明材料，總按照事實，盡量寫出正面的東西，包括我已經離婚的揭發過我的夫



人。最後兩三年讓讀馬恩列斯全集和魯迅全集了，這是從沒有過的機會。我認真讀書，深入反思，從理論到實踐馬恩列斯毛，哪些對的，哪些錯的，或者是有問題值得研的，尤其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想得很多，好些心得都託所作的舊詩詞中。秦城八年單監，我沒有白過。

意外的是，還發生過第四次矛盾，即一九八九年耀邦世後引發的那場政治風波。當時中顧委一些老同志憂心忡忡，有過些聚談，詳情這裡就不說了。後來我們有四個人顧委挨批斗，那個日子也是不好過的。我們不得不做精神備：這個黨員“不予登記”了。很幸運的是，最後由中顧主任陳雲明智解決：歷史教訓已經很多，再不能如此處理否則將來還得平反。我們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和我，終於平安過關了。還有其他麻煩事，有的還會來勢猛，這裡就不談了。

我們黨走過的八十年道路，其中的艱難險阻和巨大牲，如何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革命的勝利，為什麼後來又了二十來年“左”的冒險彎路，非身歷其境者，是很難想和體會到的。十月革命後七十年，蘇聯和東歐竟發生如此變，而我們黨終於能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保護社會主義的成果並推進了發展，這也是非親身經歷難以說清楚的。

### 三

紀念黨誕生八十周年，我就自己經歷的消極方面，寫上面這樣一些羅嗦事情，也是非親身經歷難以有痛切的受。做人與當黨員應當是統一的，響當當做人，響當當做員。可是，卻發生了矛盾。我這樣寫出來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總是強調黨性高於一切是值得研究的。這來源於階級

和階級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決戰，勝負攸關，你死我活。從而“黨員一切服從黨”，“要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到哪裡打到哪裡”。可是，一方面，黨是歷史時代的產物，不能離開人類歷史發展尤其是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我認爲自由、民主、科學、法治和市場經濟，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市場經濟如何變化還說不清楚）推動社會合理前進的動力，人類已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已起了很大變化，還將繼續朝和平與發展的道路變化下去。因此，黨離不開這個潮流，必須代表這個潮流，領導這個潮流。另一方面，黨是由人組成的，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東西，他受社會環境尤其學校、家庭、親屬、朋友、上下級的影響，也受書本、傳媒和個人性格種種影響，處在不斷變動之中。恩格斯說過：任何人要受三種限制：歷史時代，個人知識經驗，思維能力。我認爲還應當加上一條：人的良知即品德。這就是說任何人都免不了要犯錯誤，從而黨也會犯錯誤。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歷史告訴我們，第三國際的黨無不由領袖當家，斯大林更做到極致。毛澤東是“君師合一”，全國人民曾長期高唱：“他是大救星”，“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做到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不去世，他的二十年“左”的錯誤也無法做結論，也不可能糾正。過去我們只有黨和黨性，一切有關“人”的意義都是談不得的，都是有違階級性和黨性的，如人性、人權、人道、人格、人情等等，都屬於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情況比過去好多了，尤其接受了市場經濟，這是一大進步（原以爲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提出了科教興國，依法治國。從而國家和社會、個人有了生氣，經濟在向前發展。可是關於“人”的問題，關於人的本質是追求自由的問題（精神自由與物質自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黨性、人性、科學性、民主自由性（民主與自由分不開，是一對雙生

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不能互相對立；以及關於治黨治國要依靠民主、科學與法治的問題，這些最爲根本的理論與實踐，我們還遠遠沒有弄清而至解決，還沒有從毛澤東的陰影(專斷獨行，要一點個人崇拜)中完全解放出來；有時口頭上也講講，做的卻是另外一套，有時同民主自由是對著幹的。同志們，我們的路還很長，還要跋涉艱難險阻。

黨的八十周年來臨，我這個“不夠格”的老黨員，發表了這樣一些感想，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講得不對，希望大家糾正。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日

## 對“左”的東西決不可掉以輕心

回顧百年，不免想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經過半個世紀奮鬥，民族獨立解決了；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民生大為改善；民權呢？還有待努力。不免又想起毛澤東的推翻三座大山，問題就複雜多了。我們曾長期以封建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後來叫修正主義），“左”的一套專制獨裁，實際上是反文明、反科學、反民主，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直到十年文革登峰造極大災大難。現在封建專制主義徹底解決了沒有？民權主義真正實行了沒有？還有待努力啊！

一九九八年，應《未來與發展》雙月刊筆談“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我寫了篇短文，題目是“如何不再扭秧歌”。文中道：八十年代的改革如扭秧歌一樣，不是一往直前地前進的。原因何在？就在“左”的干擾不斷，總是說三道四，甚至興風作浪，打著“革命”的旗幟，進攻正確的路線和做法。最近一次就是大鬧“姓社姓資”的問題。十年改革最主要的教訓就在此。某些“理論家”總是想方設法將一個中心變成兩個中心，總是念念不忘“政治思想掛帥”、“階級鬥爭為綱”，似乎只有他們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文中還談到城市改革相對落後了，大中型國營企業活力不夠，還有大虧損面，主要原因就在政治體制改革沒能同步進行，黨政沒有很好分工，政企沒有很好分開。“左”的干擾

對「左」的東西決不可掉以輕心

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總是從方向和做法上橫加指責，拐彎抹角地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鄉鎮企業為不正之風的風源，廠長負責制削弱了黨的領導，“三資”企業為和平演變的溫床，私營企業多了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等等。今年夏天在鄭州，這些“理論家”召開的一個會議上，又傳出這種論調：我們確實面臨“四個化”的危險，即私有化、西化、分化、腐化；說現在有“各種各樣的自由化思潮，各種各樣的私有化論調”。由此可見，我們定要記住鄧小平的警告：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決不能掉以輕心。

列席十五大時，我有一個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除談到黨的七十六年歷史中為什麼“左”的錯誤最難改外，還建議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經驗教訓，避免再走彎路，再扭秧歌，到二十一世紀能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 如何不再扭秧歌<sup>①</sup>

展望未來十年改革的前景，必須回顧過去十年改革的得失。八十年代的改革如扭秧歌一樣，不是一往直前地前進的，原因何在？就在“左”的干擾不斷，總是說三道四，甚至興風作浪。事實說明，真正是右的干擾，容易識別，容易糾正；問題就出在以“左”攻右，或以“左”攻“右”——打著“革命”旗幟，進攻正確的路線和做法。最近的一次就是大鬧“姓社姓資”的問題。十年改革最主要的教訓在此，這個問題不從理論到實踐求得解決，未來十年改革前景仍不容樂觀。

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農村改革，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以公有制為主體，適當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方針，已公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所必須。根據統計，一九九〇年的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佔百分之五十四點五，集體所有制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私營、個體和“三資”佔百分之九點八。這說明經濟活力有近一半來自不吃大鍋飯的非全民所有制，主要是鄉鎮企業。那個百分之九點八，仍屬國家領導，還包含公有成份，比重再上升有什麼可怕？尤其“三資”企業還應當大加發展。再說就業人口，鄉鎮企業

<sup>①</sup> 本文為《自然辯證法通訊》舉辦的大型筆談“今後十年中國改革的前景與問題”而作。

已達九千二百萬人，私營個體達二千二百萬人，這對緩解就業壓力發揮了巨大作用，對解決今後每年一千三百萬人就業仍是一個主要渠道。這兩組統計也表明了我們社會安定、國家穩定的由來。

千萬不要忘記，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就，是付出了二十年與“左”的干擾鬥爭的代價取得的。沒有指導思想上的改革開放和鄧小平充當舵手，就不可能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緊緊抓住不放。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為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我們過去的錯誤根源，就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基本原理。由此而言，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過去十年，農村改革大步走在前面，城市改革相對落後了，大中型國營企業活力不夠，還有很大虧損面。主要原因就在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能同步進行，黨政沒有很好分工，政企沒有很好分開。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就說過：“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化成功。”“左”的干擾主要在政治方面，總是從方向和做法上橫加指責，如認為鄉鎮企業為不正之風的風源，廠長負責制削弱了黨的領導，“三資”企業為和平演變的溫床，私營企業多了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等等。某些“理論家”總是想方設法將一個中心變成兩個中心，總是念念不忘“政治思想掛帥”，“階級鬥爭為綱”，似乎只有他們才是革命者、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能量極大，長期以來左右著思想宣傳陣地，對貫徹改革開放和抓經濟中心危害極大。他們的頑固妄為，還表現在這次對待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表面或敷衍沉默，暗中則極力抵制，甚至反過來攻擊對他們錯誤的揭發，對“左”的危害及其能量，再不能掉以輕心了。

展望未來十年，我們處於更加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中，

在東亞就已經出現新的四小龍。我們如不千方百計迎頭趕上，不僅同發達國家差距會更加拉大，還會繼續落後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競爭是無情的，唯有排除萬難，只爭朝夕，闖出一條新路。我們的經濟改革尤其農村改革已不可逆轉，廣大群眾對“左”的東西深惡痛絕，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合不行，這是我們可以樂觀的一方面。但不容樂觀的還在“左”之根深蒂固，妨礙思想解放和大膽創新。我們的歷史是一部長期與“左”的干擾鬥爭的歷史，“左”派們對社會主義同封建主義結合，安然自得；一聞同資本主義（哪怕是小商品經濟）相親，就大逆不道。這個奇怪現象現在並沒有消失，確實值得深思值得追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正象資本主義是封建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又只能依靠資本主義長期積累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才能順利建立和發展。這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區別所在。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的，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這已為本世紀尤其近幾十年來世界歷史變化所證明，也為我們自己的歷史發展所證明。大邱莊的帶頭人說得好：農村改革就是破“兩網”，一個是“以糧為網”，一個是“以階級鬥爭為網”。後一個網還沒有完全打破，十年來總有人懷疑大邱莊姓“社”還是姓“資”。現在還有“左視眼”，按他們的辦法搞，只能是“左了窮，窮了左，越左越窮，越窮越左”。當前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就是“左”。“我當過四十年農村幹部，看得清清楚楚，前三十年搞運動，把大邱莊折騰得夠窮啦。”

因此，展望今後十年改革，關鍵在做好兩件事：一是如何防止“左”。要及時揭發那些“左”的東西不過是假馬克思主義，是會葬送社會主義的，使之難以欺騙群眾。防“左”的要害還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建立符合國情符合歷史潮流的



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以指導我們的實踐，這就需要充實、發展十三大報告中有關的理論觀點。二是要切實解決民主和法治問題。“左”最喜歡封建專制主義、最害怕民主與科學。民主與科學是社會進步也是改革開放的兩支杠杆。民主是科學的基礎，科學是民主的結果。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伴生的，沒有高度的民主，建設不好社會主義。民主有賴於法治作保障。民主與法治健全了，兩者變為生活的必需品了，我們就會既不怕右，更不怕“左”。

這兩個關鍵如果仍解決不好，那麼，今後十年我們還避免不了扭秧歌。

## 又談德先生

世紀之交逢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不免又要議論德先生問題。自由民主是埋葬封建主義進入資本主義的條件。現代化同民主分不開，西方各國幾百年來早已證實，百年來中國卻幾次失之交臂。最近一些朋友聚談，談到按三民主義來說，一九四九年解決了民族主義，一九七九年後民生主義有了希望，民權主義呢？

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民主與科學是雙生子，西方資本主義今天仍在發展與此分不開。從馬克思那裡來的社會主義，原以為同民主的關係應更勝於資本主義。可是，蘇聯七十年亡黨亡國的教訓，政治上正是走到民主的反面：個人崇拜，領袖專政，鎮壓異己，官僚特權。我們曾經差不太多，“左”了二十多年，且伴之以運動群眾，十年浩劫走到了崩潰邊沿。終於絕路逢生，一九七九年後，鄧小平抓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走改革開放之路。但現代化不能只靠經濟，道理似乎都懂得：經濟改革必須同政治改革同步（市場經濟同自由民主也是雙生子）。我們過去的問題就在沒有解决好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於是，一九八〇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長文中，特別談到理想政治方面要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個人崇拜、家長制作風，大搞特權，破壞法制等等問題。大家知道，由於隨後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

篇文章被束之高閣，而且導致胡耀邦的辭職。回顧八十年代的報刊，很少有談論民主的文章，反而在鄧小平支持下，出現鼓吹新權威主義、強人政治的主張。

我們曾經有過“造反有理”的年代，毛澤東大大推動過造反行動，這同民主原則是背離的。民主是要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爭取民主也要合乎民主原則。民主同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是融為一體的，必須以法治為基礎，如我們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自己的國家憲法，都應切實履行。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信仰等自由，我們貫徹得怎樣呢？別的不談，現在還是偏好輿論一律，連評說“文革”的慘痛歷史都難以刊發。

一九八九年至今又十年了。還記得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光明日報編輯部召開座談會，邀我參加，我的發言摘要刊載四月二十二日該報。現在將發言的最後一段抄在下面，以結束這篇小文。

“當然，民主、科學同法治也是分不開的。我們現在還是習慣人治，不習慣法治，領導人還是喜歡個人說了算；人們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直至執法犯法。我看，在我們這個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小農經濟的國家，把民主、科學與法治當作吃飯一樣，為生活之必需，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恐怕要幾代人不懈努力才能做到。因此，民主、科學、法治，我們應當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如果我能活到二〇〇九年，還來寫紀念“五四”的文章，希望比現在要樂觀一些。

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

## 民營經濟與中國<sup>①</sup>

研究民營經濟應該延伸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從戊戌變法開始，很是恰當。這也引起我的一點回憶。我五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讀小學中學時家裡很困難。記得家裡那時有久大精鹽公司的四百塊錢股票，每年可領到一點股息。久大創辦人范旭東是我父親的朋友。後來股票也賣掉了。

大家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國的民族工商業很不發達，受到“三座大山”的制約。范旭東、陳嘉庚、盧作孚、陳光甫這些人，大概是同一代人，他們是國家的功臣。一個社會的進步離開經濟進步是不可能的。我一直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總的講，我們的路是不是走錯了。原來我們對經濟問題的認識是比較明確的，延安時期和進城前，講到的都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必須要讓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一個發展；而且講得很清楚，我們中國的工業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農業。那時還強調，蔣介石的統治使得民族資本主義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都是這樣講的。這就是允許“光彩的事業”（胡耀邦生前說：“民營企業是光彩的事業”——編者注）很好地發展，中國的私營經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才有劉少奇的天津講話。這是毛澤東同意的。可是從此

<sup>①</sup> 本文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在北京一次民營經濟高級研討會上的講話。

以後，“光彩的事業”經歷了不斷升級的三個萎縮的過程。第一步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有正面意義，但它的後果是導致工商業者膽戰心驚，例如盧作孚自殺了。第二步就是一九五六年天安門開大會，敲鑼打鼓，慶祝公私合營，這以後就沒有什麼“光彩的事業”了，大公無私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了。第三步是人民公社化。我在農村呆過好多年，農民手中沒有錢，連賣雞蛋砍柴賣都不行，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現在憲法也作了修改，正面肯定了民營經濟。回想一下，現在我們搞的這一套，鄧小平允許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要問“姓社姓資”，這按毛澤東的思想是修正主義，“修”到底了。“文革”前搞“社教”時，說“四清四不清”都不行，必須是兩條路線鬥爭，最後的結論是“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我最近聽說，有的老同志還講“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個話不錯。到底有多少老同志這樣講我不清楚。我聽說搞“萬言書”的那位“左王”，最近有篇文章就是批鄧的。我建議主持這次會議的同志找來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今天研究民營經濟應該起這麼個作用：就是要說明一百年以來，從經濟上說，從生產力的發展上來說，推動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不錯，我們進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解放了農民”，經過農業合作化高潮進到人民公社化（其中有“大躍進”運動）；結果呢？反而把農民捆得死死的，個人沒有了任何自主權利，而且還餓死了幾千萬人，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現在我們研究中國民營經濟，應當從一個側面來說明我們過去的路走錯了。應當說明陳嘉庚、盧作孚、范旭東、陳光甫、榮毅仁家族等走得對，他們沒有要國家投資，他們發展了“光彩的事業”。現在的民營企業比他們那個時代所處的環境

好，過去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現在首先是被全世界尊重的獨立的國家，是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發展全民經濟的國家。我們已經總結了過去的失誤，已經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走史無前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回顧我們過去搞的計劃經濟，是產品經濟；說得簡單一點，在觀念上就是不懂得鈔票也能生鈔票，不懂一塊錢能變兩塊錢、三塊錢。資本主義最懂得這個。我們沒有效率、利潤觀點，就懂得花錢。關於公與私的關係，利與義的關係，我們過去很糊塗。以所謂“大公無私”、“義而忘利”，來培養人的道德精神。關於“私”字，林彪講得最絕，“一閃念都不能有”。事實上沒有私就沒有公，私和公是統一的。私同發揮個人創造力是相聯的，民營企業最便於發揮創造力。利與義的關係同公私關係一樣，是統一的，用法治加道德來解決其間的矛盾和沖突。過去我們搞運動，搞大批判，就是培養人說假話，培養假道學。所以現在我們應明正言順地恢復歷史真相，恢復基本常識。一百年以來推動社會進步尤其是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光彩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後我們還要靠“光彩事業”。現在我們的國營企業不太“光彩”。國營企業要進行改革，困難不少。但是我們也不是虛無主義者。五十年代以來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為我們國家工業打下了相當的基礎，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特別是大工業。我們過去就是被一個東西搞死了，那就是階級鬥爭；認為就是農民戰爭、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推動歷史進步，到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們這個國家目前最缺少的還是個人的創造力，很多精力都用到別的地方去了。

今後我們這個社會怎樣劃分階級我搞不清楚。美國“白領”階層大大多於“藍領”，現在還有“金領”（搞電腦的）。現在我們講知識經濟。知識分子下海是好的現象。我的意見

是研究民營經濟要用事實來說明：人類社會的進步主要是靠科學技術進步，靠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進步從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方面講，應該是靠自由和民主，還有法律和法治。我們現在依靠市場經濟發展整個經濟，還沒有發現更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可代替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以後是什麼，有待歷史來說明。

本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及其陣營的存在，曾逼得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分配採用一些帶社會主義性質的原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不斷改進中。如戰後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搞經濟國有化（美國在外），但弊病很多，西歐一些國家又在改回來。現在歐洲的一些社會民主黨當政的國家，在搞“第三條道路”。所以研究中國的民營經濟問題，回顧私營經濟的歷史，還要聯繫百年來及今後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來研究。

於是有一個理論問題：馬克思的理論到底怎樣？對此應該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想法。馬克思的生命力就在於它不斷發展，不斷吸取歷史發展中的新經驗，鄧小平的理論最重要的還是突破了馬克思主義中那些過時的提法，搞市場經濟，“三個有利於”，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允許搞“光彩事業”。

我還是“徐州突圍”後，經過上海去過香港。一九三八年香港的香港同上海不能比，當年上海是世界第五大城市。香港繁榮起來還是六十年代以後的事。我們大搞運動尤其是“文革”以後，從上海、廣東等地去香港的企業家、知識分子各種人以百萬計。我們做的消極的事情對香港起了積極作用。這個事實特別值得我們思考。

現在的“下崗”問題，農村二億剩餘勞動力問題，是壓在社會和國家最大最嚴重的問題；還有入口問題——人口要發展到十六億才可能停住。問題如何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研究民營經濟問題要聯繫這些問題。民營經濟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

## 應大力支持理論方面的新探索

——為《主客體關係學綱要》出版說幾句話

保定幾位同志和作者吳宗熿到家來，要我為《主客體關係學綱要》作序。我覺得為難，因為不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自己只有點點常識，對理論專著不可能提意見；而且年老體弱，雜事又多，又沒有時間通讀送來的書稿。不過聽了客人介紹和翻看書稿相關材料後，仍促動我為此書的出版說幾句話。

大凡一種前人沒有談過的見解或理論初提出時，總是不被人們重視或會遇到阻力的。吳宗熿在理論探索上是個“半路出家”人。八十年代初，他廢寢忘食寫出第一本理論專著《新美學論綱》，有人以為這是“癡人說夢”，無人樂意出版。當年在河北省委書記任上的高揚，讀了原稿，“驚異於作者志願的宏大，研讀的辛勤，著作徵引的精審和體例的謹嚴”，親自作序推荐，此書才得以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吳宗熿又在“三聯”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智能學論綱》。隨後他又撰寫了《利害學論綱》，這仍然是一部充滿新觀點的理論著作。如關於人性的問題，書中闡述道：人性是由物質性、競爭性、合作性和意識性等四個基本屬性構成的。由於人是由原始生命進化而來，因而，人的四種基本屬性，愈靠前的，愈根深蒂固；愈靠後的，愈



膚淺淡漠。反映物質性的物欲、利欲、性愛等觀念似乎無需教育，與生俱來；單純反映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本位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也容易被人自然接受；而反映合作性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等，則要經過後天環境，逐步教育，逐漸形成；至於從理性上把握自己，正確處理物質、競爭、合作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就更不容易了。而理性即意識性的增強，乃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標誌。結合現實來看，這個理論不能說沒有自圓其說。此書在出版過程中，同前幾本一樣遇到過阻力。為此，還是高揚專門致書中央的一位負責同志，嚴厲批評負責理論宣傳的部門“不敢支持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作者”。高揚還說：“即使見解不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內部出版參考似也無害而有利。”我是完全同意高揚的意見的。沒有不同意見尤其是沒有新的意見，往往不僅辦不好事，理論、學術也無從發展。

《主客體關係學綱要》是《主客體關係學系列叢書》的簡要概括。“主客體關係學”是吳宗熾提出的，而《叢書》又是由眾多人來完成的。他們從新的視角來研究什麼是宇宙、生物、人類、社會、經濟、倫理、認識、邏輯、教育、藝術，旨在說明生物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關係（吳宗熾稱此為“生物哲學”）。“人與世界”本是早已有人作過研究的問題，但吳宗熾是在糾正傳統理論將“主體性”等同於“主觀性”的錯誤，提出人的一切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是“生存發展”，根本規律是“力爭得大於失”，“需求增長是質無限而量有限”，合作定律是“整體效果大於局部效果之和”。這應該說是具有理論意義，對社會實踐有指導作用的。著名出版家、南開大學兼職教授戴文葆說，“主客體關係學意在開闢一個新的學科領域，在哲學和一般學科之間架起橋樑，對於推動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學科的發展，存在著重要意

義。”“宋代大學者鄭樵有一種‘會通’的學術思想，本很可貴；但他以為可以匯聚眾義為一書，則不確切。吳宗熾研究的路子是值得支持的。”

高揚和戴文葆都是我尊重的朋友，我相信他們對作者及其著作的評價是確切的。

《主客體關係學綱要》先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大好事。現在出書甚難，尤其出版不講套話、老話，專講新話、真話的書更難，阻力很大，關卡甚多。負責宣傳工作、理論工作的部門，對於敢於在理論方面進行新的探索，對於具有探索精神的人，應當支持，大力支持。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 從蘇東坡談起<sup>①</sup>

諸位詩友：

大家聚集在這裡進行詩詞研究，真是“得地獨厚”。我喜好詩詞，說不上是什麼詩人。現在我講點同詩詞有關和由此談開去的話，就是一些隨感吧。

海南島自古是所謂南荒之地。宋代大文豪、大詩人蘇東坡貶到儋州，在這裡生活了三年。他帶來先進的長江文化和農耕技術，對儋州經濟、文化的發展，自然起過促進的作用。蘇東坡對海南島來說，他就是那個時代先進文化的代表人物。自覺或不自覺，或遲或早，或慢或快，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總會在社會上起作用，推動人類社會前進，這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歷史也會一時倒退的。我們在座的都是蘇東坡的後代，都應當是抓先進文化的代表人物。蘇東坡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他年誰作地輿志，海南萬古真吾鄉。”他在儋州生活了三年，對這裡的山水人事，感情至深，德澤也至深。所以，儋州和海南人民稱頌蘇東坡帶來的文化是“貶官文化”。是呵，除東坡外，海瑞和“五公祠”的李德裕、李綱、趙鼎、李光、胡銓都是貶官，他們的影響都很大。可見，自

① 在全國第十五屆中華詩詞研討會上的講話

古以來，老百姓就是喜歡貶官，因為貶官都是貼近老百姓的，都好直言無忌，好講真話。帝王一手遮天，專制獨裁，最聽不得逆耳之言。中國封建專制時代，從來沒有什麼民主和言論自由傳統，從來三綱六紀，乾綱獨斷，皇帝能做到“納諫”，就了不得了。蘇東坡才情浩蕩，氣質豪放；作文吟詩，自謂“行雲流水”或“泉源涌地”。他當官為民，不為名利所縛，自然容易放言犯上。因此，有些貶官可說是當時的先進人物。儋州人民自稱“古詩鄉”。有感東坡精神，和儋州、海南人民對他的愛戴，謔得二絕句，獻給這次研討會：

終生未踏利名場，儋耳為民服務忙。  
九死南荒吾不恨，貶官文化古詩鄉。

忠佞不分自古然，悠悠專制兩千年。  
迎來新紀新時道，學習東坡好直言。

郭沫若是大詩人，他的詩我們都讀過，大家都是欽佩的。但他晚年卻百般無奈，失去“自我”。“文革”後期，“四人幫”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寫的詩詞中竟也出現了“打倒鄧小平”的句子！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過去幾十年中，多少人都“惑”過；要做到“不惑”，是要付出代價甚至大代價的。著名史學家胡繩，晚年就沉痛地寫到自己：“四十而惑，七十、八十稍知天命。”思想不自由，精神不獨立，人格不高尚，是寫不出好詩來的。我們過去的彎路太大了，經歷的苦難太多了。今天的改革開放新時代來之不易。希望我們大家都做先進人物，用詩歌來推動先進文化的發展。在座的多是中老年人，我們尤應珍惜時光。盡力做有益於人民的事。我這次到海南來參加的

頭一個活動，十八日先到文昌，參加慶祝宋耀如（宋慶齡的父親）一百四十歲誕辰，並安放孫中山銅像的活動。宋慶齡基金會會長胡啓立也來了。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從美國專程趕來，這座銅像是她捐資鑄造的。文昌在海外的人口比在本籍的還多，瓊海也是如此。這裡同廣東相似，晚清時期都向海外發展。孫中山和宋家當年都住在檀香山，兩家志同道合，親密往來。雖年齡懸殊，宋慶齡堅持同孫中山結婚。我在會上吟了這麼四句：

革命先驅海外根，檀香山結兩家親。  
文昌慶壽逢新紀，統一中興慰國魂。

孫穗芳在海內外宣傳孫中山的思想。在紀念會上發言時，我又即席口占四句話：

世界潮流順則昌，潮流浩蕩逆之亡。  
中山遺教牢牢記，民主民權國富強。

由於長年在海外接觸西方社會，孫中山很注意經濟建設。一九一九年著的《建國方略》中，就提到在海南建設洋浦港的問題。世紀末我們才實現了他的理想。不過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如搞“訓政時期”，也並非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這類似所謂“權威主義”。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建立中華革命黨，入黨的人就要按手印，服從他的領導。可見搞革命的人，也很不容易實行民主政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發展了孫中山的思想，可惜他晚年悲劇，也是搞個人崇拜、書記掛帥。我們過去走過彎路，不能怪人家，只能怪自己。馬克思的許多觀點，是根據歐洲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情況提出來的。他是社會科學家，科學思想是不斷發展的，他並沒

有要後人照搬他的想法。他和恩格斯都一直修正自己的觀點。恩格斯晚年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認為工人階級的戰略應當由革命轉入和平、合法鬥爭，爭取普選權，參加國會等。百多年來，資本主義仍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列寧預見不到的。人的本性是自由的，馬克思說，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人的類性恰恰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我們曾長期害怕自由，反對自由，認為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以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控制輿論，壓制不同意見。過去陸定一就曾經堅決反對過種做法。現在提的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尤其是要“與時俱進”，就是要接受過去的教訓，沒有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必須按憲法規定的四大自由辦事。要知道，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也就不會有先進文化。詩人定要獨立思考，要實現“自我”，這樣才能寫出好詩，才能寫出有自己的風格和賦出新意的詩來。來這裡之前，在三亞小住兩天。三亞的主人告訴我：全球評環保，夏威夷排第七名，三亞評為第二名。聽了這消息，真是高興，寫了這樣四句贈主人：

大海沙灘椰樹迎，新鮮空氣水清清。  
當今城市評環保，三亞全球第二名。

我真希望我們全國的空氣，有朝一日都像三亞一樣清新。更希望我們大家的思想日新、日新、又日新。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 訪談錄：中國的中心問題 是民主政治問題

任不寐：李老，我剛剛在互聯網上看到您的一篇文章：《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在我看來，這可能是十多年來研究胡耀邦先生的文獻中最帶關鍵性的一篇。

李銳：這篇文章發表在一套紀念耀邦的叢書裡。我記下的是耀邦的政治遺囑。耀邦剛去世時，我在正式的會議上也公開談過，希望中央能重視。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十五大召開時，我在《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書面發言中，就提到過應當據實總結耀邦辭職的問題。我相信此文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任不寐：看得出，您行文是非常謹慎的，所言都是有根有據的。談話所提出的問題令人深思，那就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非常不健康，用通行的說法是，仍存在“封建專制主義”和“左”的影響。

李銳：所以，對中國來說，政治民主化一直是當務之急，否則還會犯錯誤。毛澤東曾經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黃炎培提出國家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肯定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

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可惜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未能貫徹執行，反而陷入左傾誤區。鄧小平鑑於歷史教訓，於一九八〇年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遺憾的是，二十一年過去了，民主化仍遲遲未能實行。現在強調穩定，問題在於，只有認真實行民主，實施憲政，保障四大自由的實現，才能實現真正的穩定。

任不寐：憲政民主這種提法很重要，它和所謂群眾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應該記住這個歷史教訓。毛澤東的民主觀需要認真清理。遺憾的是，他現在還有影響，在普通工人、農民、甚至知識分子那裡，還有大量的崇拜者。這是中國一個特別麻煩的問題。

李銳：嚴格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為是，晚年太浪漫，在政治上搞個人崇拜，一切由他“說了算”。只有中國這樣的歷史社會環境，才能產生毛這樣的人物。

任不寐：為什麼這麼說呢？

李銳：毛澤東同斯大林不一樣，斯大林對待不同意見的“異己分子”就是殺頭。毛在打AB團以後吸取了一個教訓，他說：“人的腦袋不是韭菜，割掉就長不出來了”。所以以後的運動就不殺人。延安“搶救運動”方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他特別強調思想改造，強調階級鬥爭。過去肅清小資產階級思想，後來肅清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說，他不僅要控制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靈魂，你說這厲害不厲害？一九五七年對待“右派分子”，他也決定不採取極端的政策。他說歷史上的教訓，採取極端政策的後果並不好。但是，他讓你從心理到身體都匍匐在他面前，讓天下圍著他一個人轉。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時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一句頂一萬句”，表演到極致。

任不寐：我知道一位美國的毛澤東研究者也提出過這個



問題，說毛是想把世俗領袖和教皇合二為一的人物。您訪問過美國，您對毛的研究是否受到此種影響？

李銳：我較早研究毛澤東的早年，年青的時候他就追求“君師合一”。林彪高呼“四個偉大”，毛後來對斯諾談過，他只願保留“偉大導師”。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為一的，“聖”與“王”合二為一。外國研究者對中國傳統了解不夠，總想把毛歸到他們理論中的某種模式上去。

任不寐：現在崇拜毛澤東的年輕人仍然很多，這是一種民族心理危機的反映。也說明產生毛的那個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還在。從這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活在我們心中”。這是一種民族性格。這很可怕。我覺得毛澤東有些思想一直是中國進入開放社會的障礙，而這種精神內在於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中。現在的毛澤東思想僅僅是更犬儒化了，但在仇恨市場和偏向暴力、非理性這些方面，毛還活著。

李銳：所以不肅清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中國的道路依舊坎坷。還想當毛澤東，民主和憲政就建立不起來。不過，事實上今後也沒有人能當得了毛澤東。

現在中國是有憲法而沒有憲政。應該迅速建立“憲法院”，並抓緊制定《保護公民利益法》、《社團法》、《新聞出版法》等等。作為執政黨，只有自我監督是不夠的，必須實行法治，真正以法治國，擺脫人治。還必須有監督，尤其輿論監督。現在貪污盛行、腐敗叢生、農民貧困，這都和國家生活不民主有一定的關係。

任不寐：新的一年快到了，您覺得中國政治民主化近期內有希望嗎？

李銳：中國加入WTO後，經濟與國際接軌，在經濟上已經同世界基本實現一體化。這是一個積極的因素。在斯大林時代，世界分兩個陣營，政治上兩個陣營，經濟上也號稱兩個陣營。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事實上，人類歷史的進步有

一些基本的規律，從近代到現代，從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到現在，二十世紀雖有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對抗，所有的國家仍得基本服從這些規律。這些規律是什麼呢？就是我所說的“四講”：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市場經濟。

任不寐：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提法。加入WTO以後，中國政治能採取主動的應對嗎？

李銳：加入WTO以後，經濟上開始同世界一體化了，但政治體制上還沒有同國際接軌。我們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專政，實質是以人治為中心的。幾十年如此。村裡以支部書記為核心，一直到上面。這總的來說同世界進步的總規律是相反的。這有歷史傳統。孔孟之道的民主觀念是民本主義，以民為本；毛澤東的民主是為民做主，這同現代民主觀念都不是一回事。一九八九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文件中，就總結了“我們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今後政治、經濟、文化應該同步發展，只要不搞“左”的那一套就好。“三個代表”比四個堅持好。搞市場經濟，沒有民主體制，沒有憲政是搞不好的。所以，中國的中心問題是民主政治問題。

任不寐：在某種意義上，胡耀邦就是人治政治的一個受害者。

李銳：對，我那篇文章寫得很清楚。

任不寐：我想還有一個三峽問題。黃萬里先生前不久剛剛去世。

李銳：我去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鄧小平遺留下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胡耀邦的錯誤處理引發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八九風波這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我希望中央盡早善後。另一個就是三峽問題，如何善後。這個問題如果不爭取做最妥善的處理（如降低蓄水高程等），保護好水庫區的環

境等，將是後患無窮。

任不寐：毛當年聽取了您的反對意見，現在這次上馬是如何決定的？

李銳：三峽論證時不讓我參加，理由是林一山也不參加，“支持的和反對的都不參加”。其實把這工程拿到人代會上去討論是很不科學的，人大代表又不是專家。三峽問題是什麼問題呢？一，防洪以鄰為壑。二，不是個好水電站。三，影響航運。四，泥沙淤積、庫區兩岸山坡不穩定等。還惹其他很多麻煩，不來細說了。三峽論證時，黃萬里還來我家兩次，他說三峽一定要修，將來在白帝城山頭修個廟，象岳王廟一樣，三個鐵人跪在那裡（中間一女），都是主持上三峽的三個頂尖人物。三峽工程是人治的結果。毛澤東去世後，我們搞了第二個歷史決議。應該搞第三個歷史決議，全面反思這二十年的問題，總結經驗教訓。

任不寐：如果有這樣一個過渡時期，也算是民族的大幸，黨內有責任感的人實在太少了。您現在正在寫新的文章嗎？

李銳：常常被動寫些文章。別人約的。在考慮寫自己的生平回憶。

任不寐：能在國內都發表嗎？

李銳：現在國內出版環境太差了。胡耀邦的文章國內刊物就發表不了。從這個角度你就能看到，中國政治生活有多不正常，離世界潮流有多遠。我明年就八十五了，人一過九十可能腦子就不好用了。王若望去世了，你聽說了嗎？

任不寐：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了這個消息。我看到對他的一個評價：偉大的民主先行者。

李銳：（點點頭）我很早就認識他。我勸過他，不要“滿頭辮子被人抓”。他走到那一步，說明他的人格與為人，是當前國內環境接受不了的，在民主國家乃習以為常的。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於李銳先生寓所

## 《毛澤東執政春秋》序言

在《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文中，我曾談到一九八一年通過的《歷史決議》，“不是對毛澤東研究的終結，而是研究的真正開始。在毛澤東研究中，過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動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錯誤）。這是剛剛過去的歷史。我們實事求是地回顧這段歷史，主要是爲了總結經驗教訓，前人的錯誤給我們的教益並不亞於他們的成就給我們的教益。”這是十年前說的話，沒有聽到不同意見。以前，人們常說，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這種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爲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漫長的艱難曲折道路，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他以不容拂逆的個人意志，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爭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國家的一切，直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真正做到了“繫天下安危於一身”，或者誰也“跳不出如來佛手心”。我們過去的成就和失敗都同毛澤東分不開，研究他晚年的錯誤，對我們現代化的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期間，鄧小平多次談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談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錯誤，其後果極其嚴重，而且一直在發生影響。當年批判“兩個凡是”

時，鄧小平說過：“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轉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能聽黨的話嗎？他們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的。”果然，這種人舊習不改，尤其一九八九年後，又大大出現了這種翻騰，於是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講話，告誡全黨上下，“左”的錯誤是根深蒂固的。所謂“根深蒂固”，當然同毛澤東晚年錯誤分不開。

一九九七年列席十五大時，我有一個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談到黨的七十六年歷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左”，從馬恩列斯的理論與實踐到中國自古以來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分析了“左”及其難改的根源，並建議總結改革開放後二十年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最近，全國學習“三個代表”的高潮中，鄧小平指責過的那種“左”的翻騰又出現了。“左”爺們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死抱教條，無視歷史事實，唯我獨尊，還是老唱那些老調子，還是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

因此，研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研究毛澤東執政時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實，探討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長期任務，這同我們當前的建設和未來走向是緊密相關的。我一直認為，不徹底清理毛澤東的問題，不徹底查明前三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走過的大大小小的彎路，不徹底弄清“左”為什麼根深蒂固的全部歷史，我們就不能轉裝前進，就還可能犯錯誤、走彎路。

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是條長腿，而政治體制改革是條短腿，於是總不能大步前進。原因何在？關鍵就在我們沒有徹底清算過去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同“左”的結合。毛澤東

自己承認是搞“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要有點個人崇拜”；追求“君師合一”……。於是才有林彪的“四個偉大”（毛本人特別欣賞“偉大導師”），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的“砸爛一切”，人類社會歷史進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國家走到崩潰的邊緣。至今回顧，仍不寒而慄。有鑑於此，一九八〇年鄧小平作了要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其中講到的種種措施，二十年來未能認真落實。我們還是習慣人治，習慣家長制，習慣個人說了算；還是一個權大於法的權力社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法治社會；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直到執法犯法的現象，仍普遍存在。這就是腐敗難治、民意難申、言路阻塞、黨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也是東方和世界有影響的人物。有關他的傳記，國內外已出有多種，聽說最近西方又出了兩種。拿破侖去世後，出版的傳記有一百多種。相信毛澤東的傳記也會越來越多的。出於一種歷史的責任感，五十年代我寫過早年毛澤東，八十年代後不斷寫晚年毛澤東，由此認識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者專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人民大學哲學系執教的單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一九九五年春夏間，單將書稿的第一至二篇交於我，隨後幾年間，他又將書稿其餘部分陸續交於我。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到我家中，將修定好的全部書稿給我，囑我寫一篇序言。書稿過去斷斷續續讀過，但老叢之人隨讀隨忘，日常雜事又多，現在也不可能再通讀一遍。因此，序言也只能寫一點浮面的話。

從作者寫的“成書過程”中知道，一九九三年毛澤東百年誕辰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民主觀”的文章，其中

前一部分為“輕諾延安，寡信北京”。這時到處興起一股“毛澤東熱”，“紅太陽頌”的贊頌年底達到高潮。作者感到我們這個民族患有嚴重的“歷史健忘症”，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歷過的苦難。他在思考毛澤東革命成功與執政失敗的關係中，得到苗力田教授的幫助。苗是古希臘哲學專家，《亞里士多德全集》的譯者，介紹作者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於是一九九三年底至一九九四年春，作者又寫出一篇關於“毛澤東政權暴力背景”的文章。經過苗的審閱，將其中一部分約五萬字，冠以篇名《暴力與政權——毛澤東與亞里士多德合論》。刊出後，一種歷史性責任感的驅使，使他對毛澤東“執政春秋（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的研究，一發不可收，終於用五、六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五十萬字的著作。

單少杰是研究哲學和文史的學者，他是從研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受到啓發，從而研究毛澤東的。亞里士多德是兩千二百多年前古希臘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學》一書，研究了希臘城邦的政權因暴力而興又因暴力而衰的歷史。我沒有讀過西方學者尤其西方古代學者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不論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其共同的規律；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道路，有其相異處，也有相同處。亞里士多德的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用來對比研究毛澤東的執政成敗，會有借鑑啓示，可以順理成章。這種學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贊成（我自己沒有這種基礎）。如關於廬山會議，作者指出，彭德懷的上書，既對事又對人，對事涉及所批之事的範圍、程度、性質等方面問題，對人則觸及所批之人的應負責任、實際能力、工作作風等方面的問題。作者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還是毛澤東批評彭德懷的言論，都有一個前輕後重的不對稱結構，先是有條件地肯定對方，繼而很嚴厲地批評對方。不過，毛的言論不僅有談話結構的不對稱，

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對稱。“他可以負人，人不可以負他，很有些曹孟德氣度。”毛澤東批鬥彭德懷，作者除了政治、思想、歷史等方面的考察外，還作出文化方面的闡釋，提出毛還承襲了古代名君整治政敵和駕馭臣民時採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爲。”“太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既有曠世雄主之風采，又有肖小徒輩之行色，幾分雄才，幾分痞氣。”“明太祖朱元璋則把謀害大臣的事做到極致處。”“毛澤東雖不好與史上名君相比，但作為能奪得天下者，自是有許多過人之處。自是一個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長袖善舞者，陰柔之道也是爛熟於肚中的。”

作者根據自己熟讀過的經典理論著作，就毛批彭沒有理論思想，乃非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世界觀，“言辭間多有對彭的輕蔑與嘲諷，以伶牙欺剛正，以利齒辱厚重”；認為“實際上，毛所說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許多問題。他指責別人不懂許多東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這些東西。”比如說，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就不準確了。因為，經驗主義是一種外延較大的概念，不僅包括馬赫哲學，而且包括其他哲學，上自古希臘普羅泰戈拉哲學，中有英國經驗論，下至本世紀邏輯經驗主義哲學。”毛還告誡彭，“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作者認為這一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按毛屢屢引為權威的那些經典作家的說法，在經驗主義哲學中，既有唯心主義派別，也有唯物主義派別，後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前兩人都被馬克思、恩格斯稱讚為唯物主義的先驅。

過去，人們在談到毛澤東獨斷專行時，對其為所欲為方面談得較多，而對其遭遇抵制方面談得不夠。作者在書中強調：在最高決策層中，幾乎所有成員都曾先後不同程度作過努力，來阻止毛的一意孤行，呈輪番抗爭之勢，並最終置毛於落孤陷寡境地。據我所知，從土改開始，尤其從農業合作



化開始，黨內高層就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有過分歧，有過爭論，按舊的說法即有“路線鬥爭”。對於毛所制定的那些具有“極左”性質的方針、政策，黨內許多領導人都先後提出過不同意見，作出過勸阻努力，儘管最終都被毛“一言九鼎”地打壓下去，認真研這些分歧，這些爭論，是很有意義的。作者還比較了毛的黨外反對者與毛的黨內反對者，認為後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頭更硬些。對付黨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陽謀”，便可打發了事；對付黨內異己力量，他就要處心積慮並傾其全力了。彭德懷在被打倒後，總是不服，今天寫一封自討苦吃的萬言書，明天又寫一封自討苦吃的申訴信，直到癌症折磨臨死時，還要求同毛澤東見一面，把問題說清楚。

作者是教授學者，這本書所利用的文獻和有關著作，是大量而廣泛的，經過作者的認真梳理和鑑別，引用的材料比較詳實可靠，是經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談到，他在處理書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寫得很苦。之所以如此，除了寫學術著作所應考慮的一般原則外，還考慮了兩個特殊因素：一是，對於書中所寫的人和事，我國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發言權，當然說多說少不一。二是，在現今中國文化思想界，不僅“毛澤東餘威”猶存。且有“文革”餘孽和積習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動，其中年紀較大者，過去曾當過“四人幫”的幫凶，如今仍懷有“雞蛋裡挑骨頭”這一慣性心理。作者認為無法不讓他們在此書中捕風捉影，但應盡量不讓他們從書中找出學術硬傷。

翻讀原稿時，我對作者的感覺是他將毛澤東嚴厲地擺在歷史的天平上，很少顧忌，暢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時還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處，有的難免使人有過於尖銳之感。關於毛澤東的性格特點，書中也有所論述。這裡舉三個例子：用一個多動症患者，竟拎著一只裝滿雞蛋的大

籃子，來比喻“愛折騰”的毛澤東，卻掌管著新中國所有的權威資源這一局面。用袁紹因討伐曹操失敗而腦殺田豐的典故，來解說毛澤東因搞“大躍進”失敗而加罪彭德懷這一史實。毛澤東晚年多病，卻不愛吃藥，並常同醫生鬧彗扭；這種諱疾忌醫的倔勁，不僅表現在醫病保健上，而且表現在施政用權上，既不願吃健體之藥，也不願吃治國之藥。

不同的讀者對本書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這是很自然的事。作為一個毛澤東研究者，由於種種限制，我雖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樣，毫無顧忌暢所欲言，但我贊成出版這樣的書，因為毛澤東已走進歷史，無法不讓人評說。一九九二年《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一書出版時，在“前記”中我說過：“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同毛澤東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勝利與失敗，正確與錯誤，前進與後退，歡樂與痛苦，乃至價值取向、思維習慣等等，都是同毛澤東分不開的，真是榮辱相關，生死與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輝——毛澤東思想仍照耀著我們。可是他的陰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也還籠罩著我們。”這是八年前說的話，難道毛澤東的陰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人們呵，不要忘記剛剛過去的苦難的歷史。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勞會有收穫的，這本書對研究毛澤東、尤其鑑戒毛澤東都會有好影響的。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三日

## 如何看待毛澤東<sup>①</sup>

(一) 在你的心目中，如何看待毛澤東的一生和這個人？

毛澤東出生於農民家庭，二十歲前一直在農村生活。他非常熟悉農民，熱愛農民，有農民氣質。這是他同他們那一代城市出身的先進知識分子根本不同之處。因此，大革命時他能熱情歌頌農民運動中的“痞子精神”。從一九二七年上井岡山，到一九四九年進北京城，他從馬克思那裡取來的階級鬥爭理論，運用於中國實際，終於在他領導下，取得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勝利。廿二年艱苦卓絕、不怕犧牲、曲折發展、形成理論，中外古今無此先例，當永垂史冊。問題出在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又急於求成；放棄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只爭朝夕”地實現社會主義。他將中國的貧窮落後視為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同時認為上層建築的力量即生產關係的變化和政治掛帥，對社會的進步能起決定作用。於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鬥爭不已，運動不斷，以改造思想，統一認識。他發動“大躍進”，鼓吹“農村作風、游擊習氣”，九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放糧食衛星，辦公共食堂。餓死幾千萬人，仍堅持三面紅旗。從人民公社到“五七指示”，他所追求的“平均、公正、純潔”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康有為的《大

<sup>①</sup> 本文是回答《中國新聞》周刊提出的三個問題。

同書)、張魯的“五斗米教”和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體。最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文革”十年,國家大亂做到了,經濟到崩潰邊沿,還要“七八年來一次”。於是,國家大治有待後人。毛去世前,認為平生做了兩件大事:心中似有所自省,“文革”卻決不能認輸。毛一生服從自己的鬥爭哲學,追求“君師合一”,以此革命取得勝利,以此執政終於徹底失敗。令人浩嘆的是,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這二十來年,由於科技發展,西方飛速前進,我們卻停滯落後了!

### (二) 你還尊敬毛嗎? 你還認為他是偉人嗎?

從人類歷史發展看,不論中國與世界,二十世紀變化最大,進步也最快。這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從理論到實踐的交鋒分不開。毛澤東當然是本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人物,也是有世界影響的人物。我們的過去、現在乃至將來,都同毛分不開。蘇聯、東歐紅旗落地,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常說的實事求是,仍將啓迪後世;他晚年的悲劇,正好引為鑑戒。毛的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都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

(三) 你認為毛身上有哪些東西是本土的, 哪些是外來的? 它對毛及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

這個問題太大,也很復雜,三言兩語難以說清。現在有一種看法,毛並沒有對馬克思做過深入的研究,也看不起抱著馬克思本本的人,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這種看法有其道理,但以此說明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則是不確當的。毛自己說得最清楚:“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為說得準確一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毛早年從梁啓超到陳獨秀(中間還佩服過胡適),即從改良派到激進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自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問題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階級鬥爭”四個字,以及同這四個字有關的“消

滅私有制”，而沒有接受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尤其經濟理論。這四個字中國出不來，因為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資本論》產生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早期的西歐。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使之仍在向前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民主、科學、法治與市場經濟，前四者尤其自由也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這五者至今仍是推動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基本依據，卻同中國歷史無緣，也同毛無緣。毛最熟悉最喜好的是中國的經史子集、詩詞曲賦、小說雜記、成語民謠，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可說是他一生為人、處世、做事的原料。他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翻譯”馬克思的思想，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傳統文化對他也起了消極作用。他喜歡的統治人物是秦始皇、劉邦、朱元璋等。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最早代表。毛自誇“無法無天”，“個人崇拜要一點”；黨的一元化領導發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大權獨攬、小權分散、書記掛帥；晚年更推崇法家（法術勢合一，便於駕馭臣下、統治萬民），同列寧、斯大林取來的“左”的一套結合，終於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我說過：毛澤東思想照耀著我們，但毛的陰影仍籠罩著我們。二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同經濟改革同步，自由、民主、科學、法治，仍有待後人努力。

## 《觀海樓讀書筆記》序言

汪澍白是研究毛澤東同中國文化傳統關係的學者，我們很早就認識，共過事，並且在早年毛澤東研究方面有過交往。現在他的新著——有關毛澤東早年和晚年思想的發展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淵源影響，共二十來篇獨立的文章集結出版，命我寫個序言。我樂於從命，是由於這樣的書對中國當前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太重要了。我們過去走過的錯誤道路同毛澤東分不開；今天那些反對改革開放國策的“萬言書”，不論怎樣花言巧語，其實質仍舊是抱著毛澤東晚年錯誤路線不放，並沒有什麼新東西。一九八一年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之後，我說過，這是研究晚年毛澤東的開始；毛澤東晚年的陰影仍籠罩著我們，徹底揭掉這層陰影是我們的歷史任務。

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汪澍白從南京調回長沙。湖南大學很想延攬他去講授哲學原理，這也符合他自己的心願，但組織部從當時的急切需要出發，把他留在了省委機關。一九五一年春，省委宣傳部長周小舟調任湘西區黨委書記，遺缺由我承乏。其時省、地、縣各級宣傳部門的幹部都比較緊缺，亟待充實與加強。於是將澍白從土改前線抽回，委派他負責創辦省委宣傳幹部訓練班。第一期以抗美援朝宣傳為中心，第二期以學習中共黨史為主課。我和他都參與講課，還曾請省委書記黃克誠講解當前形勢與任務。澍白

勤勉好學，勇於任事，把這項工作圓滿結束。以後回到部裡作理論宣傳工作，我們有了較多的思想交流。三反整風時，他敢於帶頭批評領導，我很讚賞他的忠誠和勇氣。但根據自己的經驗，又頗為擔心他直言招忌，來日難測，可能捱整受屈。

一九五二年我調中央，改行從事水電工作，從此與澍白少有聯繫。後來知道他也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摔了跤子。一九七九年五月，澍白來京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我們劫後重逢，相見甚歡。同年九月，又在長沙相會。我征詢他對拙作《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方向》（發表在《歷史研究》，是《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再版中的一章）一文的意見。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文中對青年毛澤東的評價頗有溢美之詞。例如新民學會原是一個敬德修業的社團，夠不上革命團體的條件；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時也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只是在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後才逐漸擺脫改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走向俄式革命的道路。我覺得他的意見有道理，立即邀他去韶山共同修改原書。此後，我們每有新作，更互相寄贈，開啓新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澍白的新著《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問世。我於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以《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開拓新領域》為題的一篇書評，對該書作了較高的評價。書評說：“關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關係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並非空白，但多限於從文史角度的語名索源之類，拙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也只是在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論述。像汪澍白這樣將兩者作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還屬於開創性的工作。”“弄清楚它同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這不論是總結過去、對待當前或瞻仰未來，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稍後我將毛澤東研究的重點轉向晚期思想，這是一項極

為重要又極為艱難的課題。由於容易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不少人望而卻步；但也有一些青年學者迎難而上，就毛澤東晚期思想問題組織課題研究和撰寫專題論文，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高度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推出的《晚年毛澤東》一書和一九九二年拙作《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見《毛澤東的晚年悲劇》一書），就是這方面的階段性成果。

澍白對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研究起步在後，但由於他對早期思想及其文化傳統已有較深的開掘，轉而攻讀晚期著作時，便顯得思路暢通，比較順利地寫出了一批有獨到見地的筆記與文稿。其特點是：第一，抓住毛澤東晚期思想的關鍵問題，窮根究底地追索它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思想文化淵源。如《從破除迷信到揄揚崇拜》一文，就深挖了他晚年沉溺於個人崇拜的原因，指出它與斯大林主義、皇權主義以及“君師合一”、“內聖外王”的傳統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第二，對毛澤東的某些重大決策，既注意從宏觀上把握其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又細心從微觀上考察其在不同階段的策略轉變。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乾綱獨斷的戰略決策，但從誘導鳴放、開展整風到發動反右，每一段都有策略上的變異。《兩類矛盾學說的演變》一文係有關文件詳加考證，揭示其發展邏輯，這就有助於人們參破“引蛇出洞”這個難解之謎。第三，注意從隱晦曲折的詞語中，窺察毛澤東的深層意蘊。如《滴水洞中的憂慮》一文，通過研讀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手札，分析毛澤東當時的矛盾心情和對林、江以及“文革”前途的多重疑慮，可以說相當深刻地揭示了毛在洞中的心底波瀾。

當然，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曲折複雜，澍白所論及的還只是其中部分問題。深望他能以“老當益壯，窮且益堅”的精神，把這項艱苦工作堅持下去，對毛的晚年思想作出更完整



的解讀。

毛澤東一生思想行藏同中國封建專制傳統密不可分，即從決不能丟的“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那裡取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中國皇權定於一尊聖斷專行的結合，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從新中國成立特別是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以不容拂逆的個人意志，左右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二十餘年，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國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直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鄧小平講過，根深蒂固還是“左”的東西，“幾十年‘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228頁）這種習慣勢力就是毛澤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專制傳統，披著馬克思的外衣，實行秦始皇式（包括斯大林式）的統治。

一九八四年澗白堅辭湖南社科院院長的職務，毅然脫離“左”的傳統根深蒂固的那個湖南環境，飄然遠行到廈島落戶，自號其居曰“觀海樓”。現在將其歷年來研讀毛著（從早期到晚期）的有關筆記文稿，選輯成書，題名《觀海樓讀書筆記》，我樂觀其成。爰將我早年在湖南共事與晚年在毛澤東研究上互相切磋的經歷略加追述，並將我的感想也附上。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八日於北京木樨地

## 讀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

中國的歷史，二十世紀恐怕是變化最大最快的了。這一百年，前潮後浪，滄海桑田，天翻地覆，變幻莫測。歷史巨變過程中，必然出現各種歷史人物，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來說，影響最大、程度最深、時間最長的人，當然是毛澤東了。一九八一年作出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了他執政時期的“左”的錯誤，“文化大革命”更是十年浩劫；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全面進入市場經濟，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可是，至今仍不斷出現“毛澤東熱”，仍不斷發生意識形態紛爭，時常涌出“左”的明潮和暗流，還在繼續造神，對當代歷史研究還設有許多禁區，這不能不令人憂心之至。我在有關文章中曾不止一次指出，毛澤東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我們，即屬於他的“無法無天”，獨斷獨行，一把手說了算，乃至“要有一點個人崇拜”，等等霸道慣性，仍然很有市場。不過，歷史到底翻過了一頁。二十多年來，人們究竟打破了對毛澤東的神化，敢於詳說其功過是非了。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意識形態的最大變化；要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也必須研究毛澤東，徹底弄清楚造成毛澤東晚年悲劇的來龍去脈。

現在有關毛澤東的著述可說汗牛充棟，達幾百上千種，多年來一直是出版界的熱門。不過，真正科學、嚴肅的研究，如實反映歷史事實的著作，實在不多；而且這樣的著

述，在國內往往難以出版。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現在令人高興的是，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王若水的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是極少見的研究毛澤東的嚴肅的科學著作。書名“新發現”，確有其道理，蓋道其前人未道之理也。

若水這部書並沒有全面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現象”，而是選擇毛澤東的個人性格和心理因素這個側面作深層次的剖析。選擇這個角度，當是因為過去的研究對這個方面注意不夠。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中，在執政以後的和平年代裡，毛澤東之所以叱吒風去、獨領風騷，除了歷史和社會原因之外，同他本人的個性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因此，“認識他的個性特征，發現一些意味深長的信息，窺見其內心世界”，這對於研究毛澤東不僅是不能回避的，而且還是應當特別重視的。所謂“新發現”，我以為並不是披露了什麼機密檔案或宮廷內幕，而是作者注意到了被人們忽略的或難以動筆的的一個方面。他追溯到延安整風搶救和蘇區肅反，乃至建黨初期；並從歷史的視角中，同時展現出毛澤東能夠放肆發動“文革”的制度因素的形成。

毛澤東是極富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其性格特征鮮明。綿延十年、禍及國人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毛澤東“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個性，怕是任何一位黨的領導人也不可能發動的。那場“衛星上天”卻餓殍遍地的三年“大躍進”，倘若不是毛澤東“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氣魄，怕也是不會到那樣荒唐的地步的。即便是從來不出門檻送客這樣的細節，也可以反映出毛澤東的性格，他不能顯示出他自己要見客人更基於別人要見自己；“門檻兩邊的地一樣的平，但是門檻內外卻有尊卑之別。”雖然海面刮起七八級風浪，他也要到海裡游泳，以至於警衛和衛士不得不提心吊膽簇擁他沖向大海，說得好聽是“挑戰”，而真正的心態是逞強好勝。大概記得是弗羅依德說過，“性格即命

運”。晚年的毛澤東疑心重重，孤獨寂寞，與黨內同志、生平戰友失去了私人情誼，與子女親人鮮少往來，完全與外界隔絕，終日生活在高牆深院，“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對民情、民心不甚了了。卻還說“八億人民，不斗行嗎”，還要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是毛澤東自己的命運，卻也造成了民族浩劫的命運。

毛澤東性格的形成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對此，若水對農民的階級性格所做的分析十分深刻。中國過去是一個農業國，農民是人口的主體，中共的大多數黨員是農民出身，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農民領袖，而且是做到了“君師合一”的農民領袖。馬克思說過，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必然是分散的、孤立的、無力的，他們需要有人代表他們，從上面賜給他們陽光和雨露。在中國，還有長期形成的宗法社會和家長制傳統，需要權威又很容易崇拜權威。所以，“毛澤東現象”是有中國的滋生土壤的。此外，俄國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這是“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把“民主的集中制”作為建黨原則，又用這個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相結合，成為一種國家制度，斯大林使之更便於專制獨裁。毛澤東把這一套移植到中國，並加以發展，思想意識定於一尊，做到人人“一條心”的馴服工具，從而在中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包攬一切的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把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組織在一個一個的“單位”裡，使每一個人從思想到行為都從屬於組織、依賴於組織。執政黨實行“一元化”領導，把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意識形態統統管起來，成為一個強大的控制力量。這個力量凌駕於社會之上，無所不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使得毛澤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地位，可以隨心所欲，由著性子來，直到他去世前，無人敢對他提出異議。

讀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

當然，注重毛澤東個人性格，並不意味制度的因素不重要。這是若水書中特別強調的。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浩劫，不是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若水說：“人要依靠別人，也要依靠制度。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沒有制度就不能存在，不能發展。但是制度也會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阻礙社會的發展。這就需要革命和改革。”這話說到了根本。

人都有發展個性的自由，這是制度也無權干涉和侵犯的公民權利。制度無權也不能把性格作為選擇掌握公共權利的人的條件，但是，制度必須杜絕掌握公共權利的人，因為自己的個性而干涉、侵犯一般公民的權利。與一般公民一樣，掌握公共權利的人，必須以尊重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和條件，而不能把自己的個性以及由個性導致的結果強加於任何公民。當代中國發生的一幕幕悲劇，正是毛澤東將個性強加於國民的結果。因此，建立一個合理公正的、不使領導人由於其個性而作出錯誤決策或者由於其個性而無法糾正錯誤的制度，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第一要務，也是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目標。

多年來，我一直關注對毛澤東的研究，也從當事人、親歷者的角度寫過一些東西。對毛澤東做深入、科學的研究，是我的一個願望。若水做了我想做的事情，這是值得欣慰的，因此，我悼念他的詩中最後一句是：立言立德仰高丘。

最後，我們要感謝馮媛夫人，她在若水去世兩個月後，就將這部近五十萬字的巨著編輯付梓，這是她同若水十五年共同生活的一個結晶。她寫的附錄：“王若水的‘美麗境界’”和“編後記”。讀來令人感動無已。

## 日譯《廬山會議實錄》序

川口孝夫先生最近來北京，將他翻譯的拙著《廬山會議實錄》清樣贈我，囑我為日譯本寫幾句話，自難推辭。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川口先生在中國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且多在基層，親自經歷過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段災難性的大彎路。他對我說，原來是積極的參與者，後來逐漸懷疑，終於一九七三年回到日本；想不通的問題很多，讀了《廬山會議實錄》之後，茅塞頓開，許多問題才弄清楚了。因此，決心將這本書翻譯出來，以便日本讀者對當代中國了解得深一些。我們有兩次交談，知道先生還讀了我的《大躍進親歷記》等書，為先生對中國的友好和關心深受感動。歷史是偉大的教師，尤其歷史上出現過的重大挫折或彎路，最值得後人借鑑。這是中外古今至當不移的共識共信。近二十年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家知道，是經過正式會議，批判了過去所犯的“左”的錯誤，才做到的，才能出現今日舉世矚目的嶄新的局面。川口先生是過來人，有了親身的感受，所以才對我寫的這類書感興趣。可是我們中國現在的廣大青年，對歷史卻遠熟近生，如他們從學校歷史課中對於古代、近代中國歷史略有所知，而對川口先生經歷過的事情卻茫然無知；中學的歷史課本只講到一九四九年。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日本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

尤其對華侵略，必須讓後代完全清楚認識，這樣，人類才能真正走上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道路。這就是我的一點小感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於北京

（此處為模糊的書寫內容，文字難以辨認）

## 《世紀悲歌》序

傅國涌是浙江的一位青年學者，我們沒有見過面。此前只是讀過他的一本評論當今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書，感到很有見地。現在，他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爭取言論自由的文集《世紀悲歌》，將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囑我寫序，欣然從命。

我生於一九一七年，傅國涌生於一九六七，年齡正好相差半個世紀。社會上有“代溝”的說法。但讀了他的著作，我感到心靈是相通的，對理想的追求並不因歲月而隔膜。

二十世紀確實是災難頻仍的一百年，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中國“文化大革命”和蘇聯東歐巨變，出現過希特勒、斯大林這樣一些給人類帶來惡夢的人物。但是，二十世紀也是人類向自由高歌邁進的世紀。世紀之初，自由、民主、憲政的理想，就已成爲中國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標。我爲鄧拓逝世二十周年寫的悼詩中，有這樣兩句：文章自古多奇獄，思想從來要自由。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類進步的象征。當硝煙散盡，人們從廢墟和灰燼中抬起眼睛，歲月的滄桑掩埋不了先輩奮鬥的足跡。爲了民主共和、言論報國的夢想，宋教仁、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楊杏佛等人，奉獻了寶貴的生命；梁啟超、張季鸞、胡政之、成舍我、陳銘德、徐鑄成等人，奉獻了智慧、心血和畢生的精力。傅國涌攝取這些人物命運的片斷，



篇幅雖短，卻尺幅千里，從“梁啟超時代”到《大公報》、《新民報》、《文匯報》、《觀察》等民間報刊，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長卷，使我們看到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為言論自由前赴後繼的追求。

中國有著幾千年專制集權的歷史傳統，要邁入現代文明的門檻極其艱難，已付出過高昂的代價。本書第二輯的文字，堪稱字字血淚，開頭講的便是父執宋教仁的故事。父親李積芳於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留學，即為同盟會會員，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宋教仁則是該校法律科的；他們是同學，又是同庚——都是一八八二年出生的。民國二年父親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正是在宋教仁遇刺後，從湖南上北京參加國會的。父親一九二二年去世，他的遺物中有黃興、秋瑾、宋教仁的許多相片和紀念書刊，他們自然成了我自幼年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宋教仁力主議會民主政治，袁世凱任總統後，他奔走各省，協調南北，聯絡政黨，全力以赴進行競選活動。他主張責任內閣制，國務總理由眾議院選出，省議會有立法權，省長民選等。他又擅長演說，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國會選舉結果，參眾兩院的國民黨人佔議席的多數。組成國民黨一黨內閣，宋教仁為內閣總理，幾乎成為舉國定論。這當然引起袁世凱的恐慌，必欲清除而後快。一九一三年初，宋教仁在漢口演說，明確提出了革命黨轉變為現代政黨的思想。他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中華民國政權屬於人民，我們可以自信，如若遵照總理孫先生指示的主義和方向切實進行，一定能夠取得人民的信賴。

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頭，佔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於選舉運動。”這些話講得多麼合情合理啊？當時即有謠傳，袁世凱要對宋教仁下毒手了。大家都為他的安全擔心。他對友人說：“暗殺之事，防之不勝防，怕也怕不了，只有處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殺，或足以激動同志們的奮鬥，而縮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果然，在國會開幕前夕，三月中旬，袁世凱急電邀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三月十二日夜十一點，他由上海動身，在車站被手槍擊倒。宋教仁躺在世紀的長路上。但他的思想，至今還有生命力。

傅國涌以充滿激情的筆墨，講述了許多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的人和事，讓我這個八五老人，驀然回首，也禁不住生出許多感慨。長期以來，太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並沒有很好地汲取。許多思想先驅，也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他們或被遺忘，或被歪曲，這是極不正常的。本書從這些歷史人物身上，著力發掘對於今天仍具啓迪意義的因素，我是很贊成的。

傅國涌並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但他酷愛讀書，勤於思考，雖歷經坎坷，卻從未放棄學習。他的知識幾乎都來自艱苦的自學。他的文章也不是在書齋中從容論道的產物，而是在緊張的謀生之余完成的，在這個充滿物質誘惑的市場化社會中，尤為難得。我願意鄭重地向大家推薦這本集子。據說這只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百年言論史的第一步，他還要在此基礎上撰寫中國百年言論史專著。這是一個很有學術價值也很有現實意義的課題，祝他早日完成。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一日

## 《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序

關於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研究，幾十年來海內外出版了許多著作，但是很少涉及到其間同羅章龍與當年“非常委員會”北方區成員的淵源，尤其同羅章龍的關係。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這一組探索這方面史實真相的文集，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西京兵變”四字，也是羅當年的用語。五年前，作者同我談到這方面新發現的史料線索，就是這本書的主題，當時我極力鼓勵他抓緊搜集寫出，趁張學良將軍健在，公之於世。

我個人有兩件有關小事也可藉此先說一下。西安事變之前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漢口有一份進步的報紙《大光報》，其創辦同張學良有關係。主編副刊的孔羅荪等，我們都是秘密的武漢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主要成員，我在這個報上發表過文章和新聞稿。第二件是同學熊彪的奇遇。熊是湖南同鄉，思想進步，一九三五年法律系畢業後即去北平。他在北平參加進步活動被捕，忽然釋放後被帶到西安，張學良的部屬追問他的共產黨關係。這時他並沒有入黨，同北平的黨組織也沒有關係，於是就讓他回武漢了，時間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所以我們當年就知道張學良在積極尋找共產黨人。

書中述及的以黎天才為首的“前共產黨人”，吳雨銘、李希逸、潘文郁、張慕陶等，多是四中全會後“非常委員會”

北方區的成員，他們陸續進入東北軍機要部門後，建立了“非委”的地下支部，以黎天才、吳雨銘為核心，同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羅章龍保持著秘密聯繫。他們在張學良的左右，或掌握機要部門，或任秘書，或當“塾師”，他們“身在曹營心在漢”直接以馬克思學說和共產黨政策影響張學良，也深得張的信任。其中最主要的人黎天才，被認為是在張學良身邊“惟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是西安事變的主要策劃者與參加者。作者在文章標題中，稱黎天才為“張學良的心腹謀士”，吳雨銘為“羅章龍的得力助手”，李希逸為“入幕出帳”者，潘文郁是“從中共秀才到少帥伴讀”，張慕陶則為“匆匆過客”。作者從沒有刊行的史料和羅章龍遺留的檔案中，還查出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同羅章龍有兩次秘密會晤。

這些被稱為“叛徒”的人，他們脫離中國共產黨時，“有過錯誤與荒唐，也有過無奈與委屈”；但他們仍忠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黨的事業，他們長期在東北軍和張學良的身邊工作，影響張學良的思想和作為，直到發生西安事變。為這些“前共產黨人”留下他們走過的這一重要的歷史足跡，是後來人尤其是歷史研究者的一種責任。可是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而又難。

八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從成長、勝利到全國執政，始終是同自己犯錯誤尤其是嚴重“左”傾和“肅反”錯誤相伴隨的。基本總結了毛澤東晚年悲劇和否定“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我們才能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走上完全不同於過去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我們正在反思一百年來的歷史，中國的和世界的，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要敢於思考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也要敢於思考有定論的人和事尤其有爭議的人和事，根據史實重作評價。我們黨的歷史中，恩恩怨怨，錯綜複雜，傷痛災難之類的事情太多了，有

的已有定論，有的還待研究。十年內戰時期，種種“肅反”，自己殺自己死了約十萬人。由於沒有認真全面總結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於是就導致了抗戰期間的整殺托派和延安搶救運動，以及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冤案如山，三軍元帥、國家主席都難幸免。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之後，是否就沒有任何歷史遺留的問題了呢？“肅反”的最早開端，是一九三〇年發生在江西的“富田事變”反“AB團”。八十年代初，中央組織部曾成立一個專案組清查“富田事變”，清查結束做出正確結論時，卻遭到王震將軍的反對，終於又攔下了。我為什麼要寫這麼一段話呢？就是由於書中涉及的幾位當事人，張慕陶在抗戰初被殺掉後，還長期背著托派的惡名；黎天才、吳雨銘都在解放後被逮捕，死於獄中；至於羅章龍，雖比較平安善終，但恐怕許多鬱結並未解開，其中有一個反黨的“非常委員會”問題。

書中的前共產黨人，我只認識羅章龍，同他有過來往。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寫《早年毛澤東》時，羅在湖南大學教書，我曾請人同他談過新民學會的情況，以及他同毛澤東的交往。八十年代，有兩次我們同住在北京醫院，於是就有了不同一般的交往，暢談黨史上許多往事、許多關節問題，也談毛澤東其人其事，有的談得比較深。我建議他寫詳細的回憶錄，建議他將四中全會全部事實經過寫清楚。談話中，似乎感到他還有某些苦衷、顧慮，某些不盡欲言；我是晚輩，也有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的早年回憶錄《榕園載記》出版後，是很得好評的，胡耀邦也很關心，他們還是瀏陽同鄉。

本書作者是有心人，我知道他同羅老有不同一般的來往，並著手搜集有關羅老的一切資料尤其是四中全會的資料後，我就不時加以鼓勵。羅老百年之後，作者就全力通過其

後人得到老人留下的全部檔案資料，不放過片紙只字，我也做到力所能及的幫助。從作者處我了解到，羅老對往事是這樣認真處理的：在記憶旺盛的年代，他就著手寫回憶，盡力查閱文件檔案，有些大篇大章都已完成，只是對發表的時機考慮較多。有許多回憶，他覺得暫不能公開發表，尤其不允許傳到境外去。羅章龍是黨的創建人之一，在四中全會以前，他一直在中央重要的領導崗位上，他鍾情於這個黨，常說要成全黨的話。羅老善舊詩詞，他知道我也有這方面的嗜好，曾有一首五律相贈，這是他去世後，本書作者告知的。其中有這樣四句：“動亂橫江表，時艱感百哀。從君挽世運，一舉清河淮。”世事動亂，艱難百哀，是我們黨幾十年的痛楚，俟河之清，怕是羅老，也該是我們所有人的切切之盼吧。

本書的作者於羅章龍在世時，就為羅老整理詩詞文稿，始終嚴守老人的規訓：對學術有益，重於文而淡於名，也要坐得住冷板凳。寫作本書時，作者廣泛查閱已出版和未刊行的有關著作，尤慎重依托羅老的遺作和不成文的資料，仔細推敲，力求忠實於歷史原貌。作者還拜託有機會來往於大洋兩岸的學者，伺機面詢於張學良將軍。幾年之中，三易其稿，力求信達，以避疏誤。據說張學良將軍已將一批史料托付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機構，要待二〇〇二年公開。因此，這本書中的某些說法，還不宜定論。作者希望張學良將軍能見到此書，這意味著對當事人的尊重，也可看出作者向海內外求教的誠意。

作者在“結語”中說：這些前共產黨人在留下的乾枯史記中，“字裡行間都不約而同地迴避著自己在張學良身邊策動兵變的義舉”，“或是五十年代在中共監獄裡的供詞，或是八十年代公之於眾的回憶錄，只是淡淡地一筆帶過，‘以後就在張學良的左右工作’”之類話。境遇最佳的羅章龍，

“留下的文字或是藏頭露尾，難窺全豹，或是暗語符號，難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靈都罩著一層抹不去的陰影。羅老的後人一再告訴作者，當初老人很少回憶這段歷史，因為他們認為就是這次不成功的行動，使‘非委’最後敗走麥城。”

這些前共產黨人”關於西安事變的歷史評價，我們可以置而不論。這本書的價值在，這一批當年不容於紅白雙方的前共產黨人，多年在張學良將軍的左右所起的作用，最後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他們對歷史負責的精神，終於起正面作用於歷史，有功於歷史。

同羅章龍有關係的“非常委員會”北方區的這一批成員，西安事變後，他們可說銷聲匿跡了。羅章龍這個特殊的“前共產黨人”，他同當年四中全會的關係，以及“非常委員會”成立的前前後後，其間的詳細情況，真實面目，究竟如何，這是應當向歷史交待清楚的。作者在繼續做這件事，我也一直鼓勵他做好這件事，希望能早日看到這方面的成果。

二〇〇〇年七月

## 《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四十多萬字的書，不僅詳細敘述了王實味冤案的始末，以及毛澤東同此案的關係（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仍念念不忘）；而且還記載了延安整風運動轉到搶救運動的全過程，以及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之間有關淵源。弄清楚這一段痛苦的史實，對於了解我們黨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許多事件，尤其是“左”的錯誤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是極有意義的。

書中這一段歷史我是親身經歷過的，如搶救運動一開始，逮捕王實味的同時，我也是被關押到保安處幾百人中的一個。（比較幸運的是只關了一年兩個月，一九四四年六月就釋放了。）受作者的委托，為此書寫一篇序言，我就寫一點感想。

延安整風運動最初是在黨中央高層開始的，即徹底清算四中全會後，政治思想路線上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發生了王實味問題，使毛澤東作出決定，將整風運動的矛頭從王明轉向全體黨員和幹部，從而導致搶救運動：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壞人”。於是，本來是要清算歷史上王明路線的“左”傾錯誤，反而轉為新的極“左”錯誤，搞坦白運動，清“紅旗黨”，在全黨搶救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黨員新幹部。當時有個說法“特務如麻”；延安吃公糧的五萬人中，竟清出“特務”一萬五千多人！這



就重複了蘇維埃時期的肅反錯誤（從富田事變打AB團開始，據統計死了十萬人）。好在總結了一個教訓，沒有再開殺戒（王實味被殺是後來的事情），毛澤東的九條方針後，又加上“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但是仍普遍搞逼供信，自古相傳和蘇聯學來的種種刑罰，直到假搶斃，我在保安處都曾親歷親聞。

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我從公安部門看到全部《唐縱日記》，其中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寫道：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沒有一個內線。這就是說，當年國民黨並沒有一個特務能鑽進我們黨內來（從境外派入邊區的特務是有的）。唐縱乃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二把手，當時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這部《日記》已出版）。從各方面說，延安時期究竟不同於蘇維埃時期，為什麼不認真總結過去的教訓，為什麼還要重複如此可怕的“肅反”錯誤呢？如果說，敵情觀念過重算作一個理由的話，那麼，一九四九年以後又怎麼說呢？經過了大規模的鎮反（其中自難免擴大）之後，“敵情”應當說基本不存在了。可是歷史上的肅反運動，卻發展到以言定罪，以思想劃階級，從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四清，一直到十年“文革”，遍地敵情，如山冤案，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回顧歷史，我們黨（和毛澤東）有光榮、正確、偉大的一面，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確有不光榮、不正確、不偉大的一面啊！儘管是次要的一面，我們決不能淡忘，若無其事。由於幾十年中沒有認真徹底清算總結這種濫殺無辜的肅反錯誤、根深蒂固“左”的教訓，我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太大了，以致出現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十年文革浩劫。一九八〇年討論後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我曾經說過，這是我們總結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的開始。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仍沉重地談到，“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列席十五大時，我有一個長

篇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建議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年的經驗教訓。關於“左”的歷史教訓，究其來源我感到的一點是，此乃我國封建專制主義君為臣綱唯上獨尊的傳統，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唯我獨革榜樣的結合；這也是個人迷信與理想至上即毛澤東終生追求的君師合一（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結合。將理想（理論）或革命絕對化以後，濫整、濫殺，盲幹、死人又算得了什麼呢。

王實味冤案由李維漢“引發”，康生定性，毛澤東參與造成，經過五十年後，到一九九一年才徹底平反。李維漢是黨的元老，參予過王明路線，經歷過光榮正確與各種曲折，“文革”前後捱整受害，終於澈悟，一九八〇年找鄧小平長談黨受封建專制主義影響的問題，導致鄧小平隨即作《黨和國家領導制的改革》長篇講話，論述封建專制傳統對我們黨和國家體制和種種嚴重危害（可惜的是，講話中的種種措施沒有落實）。這時李老已八十高齡，以帶病之身寫作回憶錄，其原則是寫出歷史的本來面目；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於自我批評。為王實味平反，就是這時提出來的。王實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李老時為該院領導。他說：王實味問題要重新審查，王的問題是由我引發的，我有責任把它搞清楚，當即向中央組織部建議重新審查這一大案難案。可以說，沒有李維漢這樣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沒有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王實味的冤案是難以徹底平反的。所以我寫這篇序言的另一個感想，就是大家尤其老同志（我們這些過來人），應當學習李維漢對歷史負責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我們就不能認真吸取歷史教訓，順利開闢前進道路。

作者宋金壽從一九八〇年協助李維漢整理回憶錄時，即開始研究王實味問題。多年來他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從多家圖書館和有關單位搜集資料，經過嚴肅認真的研究和思考，

全憑歷史事實說話，先後二十年寫成了這本書。

按道理這個序言本應由溫濟澤來寫，因為一九八四年李維漢去世後，為王實味平反的責任主要就落在他的肩上了。李老臨終前將這件未了之事囑托給了老溫。溫濟澤是當年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而且也是王實味冤案的當事人。他同李老一樣內疚，感到有責任為王實味平反，為此多年奔波，來往於中央組織部與公安部之間，從各地方搜集證據，付出了極大努力。他還自己並組織有關同志撰文，編著了《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一書，一九九二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為此書出版，他又寫了《再談王實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訓》一文。不幸的是老溫一九九九年去世了。我寫的懷念溫濟澤的文章中，引用了他總結王實味冤案的六大教訓為：一、要解決歷史上對托派的錯誤看法。二、對敵情的過火估計。三、一個人說了算的主觀武斷的惡劣作風。四、群眾運動的鬥爭方式（千人大會，“左”風壓倒一切）。五、寧“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態。六、不願意聽不同意見的專橫態度。這六大教訓現在是否都已解決了呢？溫濟澤認為這樣的總結遠遠不夠，還應當從王實味到批判“三家村”寫出一本書來，總結歷史上“左”的教訓，教育當代人，啓迪後來人。他對宋金壽說出了這個心願。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及其教訓，已呈現在讀者面前了。同志們，防“左”、反“左”還是我們長期的任務啊！

## 《烏“畫”啼》序

《烏“畫”啼》的編者囑我爲此集的出版寫篇序言，終於從命，是由於自己同雜文有過緣分，幾年前還出過一本雜文集。

在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魯迅的雜文，從而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政治傾向。到延安後，參加過《輕騎隊》的活動，寫過諷刺性的雜文。雖然《輕騎隊》的文章很得毛澤東的讚賞，整風運動開始後，仍然免不了受批判和作檢討。大家知道，寫《野百合花》的王實味當年曾被定爲托派、特務。尤其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認爲“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提法不當時，更把反雜文提到“理論”和政策的高度。於是一九四九年後，這種精神推廣到全國，那種尖銳潑辣、針砭時弊的雜文，可說絕了跡，報刊上很少見有不同的音符，出現了令人痛感到的輿論一律。

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後，隱蔽在專制體制下的陰暗面昭然於世，震撼了每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的靈魂。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開始對斯大林模式進行反思。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人民日報》改出八版，雜文才又開始重新復活。記得那時是胡喬木主其事，提出改版後的《人民日報》要發表雜文，還提出一個作者名單。我雖然在工業系統工作，也應邀參加過《人民日報》爲此而召開的座談會，出席那次座談會的有王任

叔（巴人）等。在這樣的倡導鼓舞下，人們又寫起雜文來，我也乘興寫過幾篇，發表在《人民日報》八版。一九五七年一月知識分子會議，二月最高國務會議，三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些會議的內容和毛澤東講話廣泛傳達後，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雜文作者，確實感到一種早春天氣的到來，都覺得應當為雙百方針作貢獻。從而報刊紛紛登出了許許多多的雜文、小品文和隨筆。收入本書的就是這些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作品，當年發表在《人民日報》、《新觀察》、《中國青年報》、《文匯報》等報刊上。

可是，隨即於五月開始布置，六月正式發動的反右派鬥爭中，這些雜文作者大都紛紛落網，被打成右派分子。幾個月前是求言詔求言，現在是言者有罪。就政治道德、政治信譽而言，當然蒙受了難以挽回的損失，直到今天還得來還這筆債。當年有個說法，右派言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些雜文大都是拿來給作者作罪證以定案的。今天重讀這些文章，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呢？可以說正好相反：篇篇都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健全的，都是恨鐵不成鋼的肺腑之言。這些意見如果當年不是受到批判，而是得到採納的話，那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的局面，就可能提早二十年到來了；這些雜文的意見和主張，並沒有越出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和方針。

比如，巴人在《論人情》中指出，人除了階級性，還有人類共同的本性，社會主義社會應高揚人道主義。徐懋庸曾犯過嚴重的“左”的錯誤，這時在《不要怕民主》一文中說：“現在有些幹部卻實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來愈怕民主。我看，對百花齊放的怕，對百家爭鳴的怕，儘管動機有好壞，理由有工拙，實質上都是對民主的怕。”本書書名“烏‘畫’啼”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徐仲年當年寫的一篇雜文的題目，該文主要是談黨群關係，共5節，《人民日報》從《文

匯報)轉載時，刪去兩節。文章從“鳳鳴”比喻“報喜”，“烏鳴”比喻“報憂”談起，以為“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要害是第二節談“毛毛雨下個不停”(黎錦暉的一句歌詞)，毛澤東曾引用來說明“和風細雨”的重要。可是文中說：“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霾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得用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平民憤。”開始反右派後，毛澤東針對這篇雜文，在上海幹部會上說：“他們還說，你們共產黨就不公道，你們以前整我們就是急風暴雨，現在你們整自己就和風細雨了。現在右派還要挖，不能鬆勁，還是急風暴雨。”

因此，我認為，《烏“畫”啼》一書是一份特別有意義的歷史記錄與歷史文獻，值得推荐，值得一讀。溫故而知新，想想當年因這些文字而罹難的作者，所付出的代價，後來者更有責任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並且從中對照今天，應當吸取逆耳忠言，使我們各方面的生活更健康起來。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 《走過五十年》序言

一九四九年長沙和平解放當夜，我們新聞隊伍就進了城。為在新區培養黨的新聞隊伍，隨即辦了一期新聞幹部訓練班，由地下黨的同志推薦，內部招收了一百四十五名二十歲左右的進步青年。這三個多月的學員生活，同各人一生的工作和發展道路以及種種遭遇，無疑起了很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其中除三十二人已去世外，其他一百一十三人天南地北取得了聯繫，要在這個班開辦五十周年之際，自願自費到長沙相聚，舉行一次活動，還要出一本紀念冊。可見大家是多麼重視這三個多月的短暫相聚。籌備組給我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承蒙大家記得這個班的創始人，要我為這個冊子寫篇序言。

一九四九年回到故鄉時，我三十二歲，也是“風華正茂”，只比大家大十歲左右；不同的是，自己似乎覺得很懂世事之艱難了。當年報紙稱《新湖南報》，真是立志要建設一個新湖南。由於自己從事宣傳和新聞工作已十來年，很不願再“坐而論道”，於是一九五二年轉業到水電建設崗位。雖然各自的崗位不同，但大家都親歷了這五十年坎坷曲折的道路，酸甜苦辣，大同小異。回顧當年，實際上我還是“少不更事”的。從延安出來，自以為經過整風搶救，不但立場堅定了，也一生清白了，今後可以大幹一番事業了。可是誰能料到呢，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犯了原罪，不論老少新舊，統

統被劃入資產階級，不僅要不斷改造，而且最終成爲臭老九，是打倒的對象。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三十年階級鬥爭中，知識分子可說失去了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近二十年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搞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要重新認識了。可是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還沒有搞得很清楚。人家的白領已經擴得很大，藍領在日漸縮小（還有金領——專事電腦的）；人類已經進入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過去知識分子工農化過，工農卻還沒有知識分子化。從階級及其作用來說，知識分子究竟應當怎樣定位呢？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周年。我做了四句打油詩：“五四精神莫自豪，古今專制盡王朝；趙家樓火忽然滅，革命換來皮上毛。”過去不是有這樣的說法嗎？知識分子是附著在工人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五四運動是知識分子搞起來的。陳獨秀辦《新青年》開始的啓蒙運動，從西方請來德、賽兩位先生。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卻根深蒂固。蔣介石學過希特勒，我們學過斯大林，“四人幫”搞了十年封建法西斯主義。歷史多麼不幸，這兩位先生至今還沒有在我們這個以農民爲主體的國家扎下根來。

現在是世紀之交，出題目做文章，都在反思這一百年或五十年。今天小小的新幹班這一百來人相聚，恐怕也難免要回顧這五十年各自走過來的路即經歷和感想。我寫了上面這些話的目的有二：一是，大家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歷史長河和社會生活中究意應當怎樣定位？如果以人體作比喻，從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地位的作用來說，知識分子是否可以說是人的頭腦？二是，思想自由與人格獨立，即不論做人或治學，是知識分子賴以起作用的本質或特點，無論達爾文或馬克思，大概都是這樣說的。那麼，我們自己在過去的



五十年中，從這兩方面來說，有些什麼經驗和教訓可以總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啊！

近年來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因此，藉此機會，向大家提出來，期以互學共勉。

一九九九年六月初於北京

## 〈一九五七：新湖南報人〉序

一九四九年春，全國解放在即，我從東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負責籌辦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基本班子是冀察熱遼《群眾日報》的一批人，這都是我原來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北和武漢，又有一些同志加入了這一支隊伍。那時，長沙新聞界地下黨的力量相當強大，一進入長沙，即同地下黨的同志會師。長沙是八月五日解放的，八月十五日，《新湖南報》就創刊了。

報紙創刊之初，我們辦了一個新聞幹部訓練班，經過地下黨推薦，招收了一批政治素質和文化教養都比較好的青年，計一百四十多人，經過短期的政策教育和業務訓練，就讓他們當起編輯、記者，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了。幾年之後，其中有的人入了黨，成了業務上的骨幹。

就是這樣幾部分人：南下的、地下的以及新招收的年輕人，大家通力合作，可以說，把一張報紙辦得有聲有色，在全國省級報紙中頗有一點名氣。記得那時《人民日報》的“報刊述評”欄還很注意介紹《新湖南報》的情況和經驗。

一年多以後，我調省委宣傳部工作，離開了報社。一九五二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開始，我調離湖南，轉業工業戰線，被派到燃料工業部負責水力發電建設工作。從此各忙各的事情，同原來報社的同事，就是書信來往也很少了。

一九五七年發生了一場反右派鬥爭。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是謹小慎微的，專心幹業務工作，外界的情況所知甚少。後來才知道，新湖南報社是重災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復職後才知其詳：和我一同南下的同志、地下的同志、還有新幹班的學員，都有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編輯部上百個幹部，劃右派的竟有五十四人之多，都是業務骨幹。此數比徐鑄成主持的《文匯報》和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兩個報社劃的右派加起來還要多！成為當年全國新聞界的第一大案。他們之中，有些是我很熟識的。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心一意辦好報紙的好同志，有的還經歷了艱苦的戰爭環境的考驗。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覆查，他們全部屬於錯劃，這五十四人中間，並無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當然，這不過是全國反右派鬥爭的一個縮影。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所提供的數字，全國的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已經被宣布屬於錯劃，予以“改正”了。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是在不斷發展的政治運動即同資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過來的。回想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號召人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壞人當作好人，錯把敵人當作同志。為什麼就沒有說提高警惕，不要錯把好人當作壞人，錯把同志當作敵人呢？在反右派鬥爭中，小到一個新湖南報社，就把五十四個同志當做敵人了；大到全國，就把五十五萬多知識分子和幹部當作敵人了，這個數目等於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大都是精英啊！這是何等沉痛的教訓。當年直到“文革”十年，對為什麼要那樣反對並整治知識和知識分子，是應當總結其教訓的，從“理論”到實踐，都要徹底弄清楚。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回了一趟長沙，聽了一些報社遭難的同志談往事，為之感嘆唏噓。曾提議他們把各自的經歷寫下來，為這一頁歷史留下一份真實的記錄，使後世知所鑑戒。那時大家剛恢復工作。都以全副精力投入本身的業務，

無暇及此，響應的不多。多年過去之後，大家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了，回顧往事，有的人也有了寫出這一段經歷的願望。印在這本書裡的，就是二十四位同志的自述和對已故者的懷念。

這都是極具體的個案。這樣編成一集，讀後對於當年報社的反右派鬥爭就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相當具體，甚至可以說是感性的了解了。炮制出這個“全國第一”的大案，當時報社主其事的負責人當然有不容推卸的責任，這一點，書中的各篇都已經寫得相當充分了。不過，我想再補充一點，就是書中沒有怎麼說到的事情的大背景，應該看到這是極左路線的一次突出的表現。它不是某一地區某一單位的事情，而是全國的問題。看過這些材料之後，我想，假如那時我還沒有調離報社，對於上級布置下來的反右派任務，也沒有可能頂著不辦吧。當然，我不會去制造這種“全國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夠不按照上級下達的指標，比如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選第五卷424頁》），劃幾個右派分子交差吧。正因為這是全國的問題，是極左路線的問題，才更有必要總結其歷史教訓了。

當然，回顧歷史必須重視細節，要解剖個案。從這書的各篇裡，可以看到這些同志及其家人在二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承受了怎樣的苦難，有的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過，我們僅僅從這個角度、這個層次來看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看它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那我們就還是只見其小未見其大了。經過開放改革二十年，回頭再看，就比較看得清楚了：第一、反右派鬥爭改變了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路線，回歸到八大以前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了。第二、實行了言者治罪。再無人敢提意見，使隨之而來的“大躍進”沒有遇到任何批評地進行。第三、把一

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的主張，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主張（如引進外資、幹部應該懂得專業等等），都當作錯誤言論來批判，從而顛倒了是非，損害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建設，損害了生產力的發展。第四、一些說假話的、告密賣友的、當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趨炎附勢的人得到升遷和獎勵，從而敗壞了社會道德。這是對幹部隊伍的一次大規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幹部隊伍平均的道德水平和專業水平，給事業造成長時期的損害。要談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就得從這樣的角度、這樣的層次來談，庶幾較接近於真實。鄧小平說得好：毛澤東的領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鄧選》第二卷，第294～295頁）可見他也是把反右派鬥爭看作是歷史的分水嶺的。

書中的一些作者認為，我是這書最早的倡議者，因此希望書前有我的一篇序言。我也樂於從命，正好借此機會簡單說一下我對這事的看法。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信陽事件”及其教訓

## ——《信陽事件》序言

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〇年四月，發生在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的人為災難，被稱為“信陽事件”。國內外有關著作多有所談及，但缺乏詳實、深入和全面的論述。作者是黨史教授，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查找原始資料，翻閱當年報刊，訪問當事人，走遍這個地區十多縣市區，寫出這本記實性的研究成果。

信陽事件之所以發生，當然同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尤其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分不開。信陽曾是河南“高舉三面紅旗”和產生“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糧食衛星、大辦鋼鐵）的最先進地區。受到毛澤東稱贊的第一個人民公社——楂岬山衛星人民公社，即誕生在信陽地區的遂平縣。當年這種新型農村社會的半軍事化組織，使農民個體所有的一切，包括土地、房屋、生產工具直到廚房用品，統統充公。此事發生在河南，又同河南當年成為全國最先進的“躍進者”分不開，其關鍵又在河南省委領導反右派、反右傾抓得最緊最為突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原為二把手，一九五八年初帶頭批判第一書記潘復生的右傾。給潘定了八大罪狀，刊登報紙，在全省批倒批臭，而且大抓“小潘復生”，包括另一位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副秘書長在內，受

「信陽事件」及其教訓——《信陽事件》序言

牽連的幹部、黨員和群眾，共達二十多萬人。爲了擴大戰果，還搞了反右派補課，全省共劃右派七萬多人（佔全國右派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免去潘復生的職務，任命吳芝圃爲省委第一書記。吳從此就更爲所欲爲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楂岬山公社率先放出小麥高產衛星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六月十一日，又放出更大的衛星三千五百斤。近鄰西平縣不服氣，城關公社將幾個場的麥子集中於一個場，放出了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特大衛星，地委書記調查是真的，讓省委支持，於是上了報。一時間河南紅遍全國，成爲“大躍進”榜樣。夏收後，河南公布了這樣一組數字：夏季總產二百零六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點六，單產增百分之一百一十七點五。吳芝圃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根據河南省統計局的資料，河南省的小麥解放後八年來，平均每年只增進三億斤多一點，而今年就增加了九十六億斤。最後說：“河南小麥潛力還大得很，今年能躍進，明年也能躍進。”八月，毛澤東視察河北徐水縣，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建議見報後，全國又開始大放水稻衛星。遂平縣又帶頭放了一個畝產三萬斤的衛星。隨後，湖北麻城、四川郫縣、廣西環江陸續放出三點六萬斤、八萬斤、直到十三萬斤的超級衛星。爲此，《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通訊。北戴河會議提出“以鋼爲綱”和一九五八鋼產翻一番的號召後，河南又帶頭放鋼鐵衛星。《人民日報》以套紅號外予以宣揚。這樣，河南的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幹部特殊化的五風，也帶頭泛濫成災，信陽當然位居首位。

一九五八年河南就大大征了過頭糧。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二月，豫東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已發生嚴重的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已接到

大量這方面的來信舉報，河南省委也下去查實過，發現有二十多起吃死人肉的情況。開封地區已有統計，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全區各種病患者三十三萬人，近半數為浮腫病，死亡者已達一萬六千多人，外流人口已達七萬多。因此，在廬山會議初期，吳芝圃有過檢討，承認帶頭“左”傾刮五風。可是，批斗彭德懷後，吳又大吹河南公共食堂一個也不會垮（這是我親耳聽到的）。廬山會議後全國大反右傾，河南省委又抓得特緊。吳芝圃先在省裡批判部分領導幹部，然後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地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於是信陽各縣市把反右傾和征購糧掛起鉤來，征購不到糧食就說成是右傾思想、富農思想，是瞞產不報，於是就大反瞞產。“反瞞產”當時是全國性的，河南又帶了頭。因此，“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是信陽事件出現的直接原因。過去有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也說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根據專家就全國歷年旱澇等級報表和氣象水文概率統計的研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大地基本風調雨順，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不過，確有少數地區在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澇災害。一九五九年信陽曾遭受百年不遇旱災，秋季幾乎絕收，這當然是雪上加霜。

一九五九年河南實產糧二百一十億斤，卻高估產四百五十億斤，以此數征購糧食並安排一切，五風越刮越大。因此，造成嚴重餓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糧食超征購。征糧指標層層加碼，誰敢說完不成，誰就是右傾；生產隊不願多報多交，於是出現了反瞞產運動。結果征了透底糧，群眾的口糧以及種子糧、飼料糧都征光了。於是浮腫病大量出現，大批大批人餓死。有的人餓得實在熬不過去，偷拿了隊上一個玉米，被活活打死。有的乾脆偷吃人肉。基層幹部為了避免戴



右傾帽子，守土有責，嚴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訪，不惜採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時嚴厲制裁那些爲了活命偷殺豬、羊、牛的人，定爲“破壞社會主義”的罪犯，游街示眾，捆綁吊打，判刑下獄，許多人被逼死、致殘。爲了說明此種殘忍慘痛情況，從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作者舉出光山縣槐店公社梨樹大隊共三十八個例子，這裡抄摘兩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徐被吊在食堂梁上，遭到殘酷毒打，六天後死去。徐一家六口隨後全都餓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裡款未還，遭到毒打，五天後死去。晏妻黃秀英在家裡炒麥子吃，被抓住扣以“偷糧”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會後將黃捆綁並冷水淋凍，不久死去。家中留下五個小孩，除十四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四個小孩因無人管，都活活餓死。

信陽地區原是河南比較富裕的魚米之鄉，這時國家糧庫裡也還是盛滿了糧食，但無人敢打開倉門救濟飢民。也有基層幹部偷偷殺老牛分給大家的，但是同情群眾的幹部也無不被批鬥。信陽專員張樹藩對高征購有意見，讓打開國庫發放救濟糧，被停職檢查。光山縣委副書記張福鴻因說了實話，由第一書記馬龍山主持鬥爭會，竟被縣常委們活活打死。由於上告信陽事件很多，有些轉回河南，於是吳芝圃下令：不能讓這些有損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便指示郵電局檢查信件，並加派人員監督，據統計共扣下一萬二千多封。吳芝圃極力捂住蓋子，到一九六〇年初，終於捂不住了。國務院的衛生部和內務部都向上作了反映，秘書長習仲勛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派人到信陽調查了三個月，當時查有實據的餓死人數目爲七十多萬。吳芝圃仍想穩住地委書記路憲文：“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

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一九六〇年七月，省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丟卒保車”，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因他親自動手打了張福鴻。

中央監委向中央的調查報告，終於驚動了中央領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有批示，並召開緊急會議，派出了王從吾（中監委副書記）、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安子文（中組部副部長）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了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等慘狀，僅光山縣就餓死二十萬人，北京來人無不掉淚。後來在省委的擴大會議上，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到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約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與群眾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小隊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作者以全書一半篇幅評述中央工作組調查後，有關整個信陽事件的處理經過。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二日，在中南局領導人陶鑄、王任重直接參與下，河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檢查省委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的錯誤，或者說是左傾蠻幹的錯誤。”陶鑄作的總結說到這樣一個至今仍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河南省委的認識上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那就是總強調自己總的政治方向是堅定的，其他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總認為只要注意總的方向，不犯右的錯誤，問題就不大了。反正犯不了路線錯誤，右派也劃不到，右傾機會主義帽子也戴不到，就心安理得了。這就忽視了在向總的方向前進中的“左”的錯誤的危害。河南省委就是這樣，對反“右”很敏感，對犯“左”就不敏感。陶鑄還說道：河南省委應接受什麼教訓呢？主要是違反實際，“左”傾蠻

幹，破壞民主，閉塞言路，驕傲自滿，麻木不仁。這幾個問題加在一起，欺上瞞下，造成如此嚴重局面。關於民主問題，陶鑄著重說道：必須健全黨內的正常民主生活。現在危險的地方就是很多錯誤的東西得不到抵抗，以為沒有問題，實際上問題一大堆。必須保證黨內任何人在一定的黨的會議上反映工作的真實情況和批評領導的權力，不准戴帽子，不准記帳，更不許打擊報復。任何個人不得代替黨委作決定或改變決定。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不得壓制不同的意見，應允許申述不同的意見。

吳芝圃作過幾次檢討後，調離河南，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到中南局任第二書記。由於信陽事件當年中央定性的“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闢”，有關人員的定罪最初都較為嚴重。從一九六〇年九月到十二月，信陽地區的十六個縣（市）委書記與縣長都被抓了起來，“其個人與家庭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厄運”。原來還準備大開殺戒，以平民憤。最後決定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處死刑，由毛澤東改為死緩。後來陸續發現餓死人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信陽事件只是暴露較早，在信陽遭到逮捕法辦的縣領導幹部減為十二名。一九七九年，河南省委決定，對他們實行“三重新”，即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其中有的人沒有等到“三重新”已“含恨離開了人間”。他們對“三重新”的安排是有意見的。原羅山縣委書記許文波認為：“信陽事件”是個重大歷史事件，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我黨對一個重大事件處理正確與否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特別是定性不准，將會給下一代造成不良後果。“文化大革命”就是個很好的例證。“信陽事件”既不是“階級報復”，也不是“違法亂紀”，完全是因為執行了極“左”路線，大刮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達到了頂點，在糧食問題上執行了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所造成的。楊守

續一九八五年向省委的申訴書中說：我認爲我不是反革命，「信陽事件」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闢，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只處理下邊是不公平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因此，請求中央、省委對信陽事件的性質作出公正的結論。

一九六三年十月，原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獲得釋放。「文革」期間他被反復揪斗，打成「信陽事件」的罪魁、血債累累的劊子手、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等，多次被毒打，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一九七九年後，擔任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他一九八五年寫給中央的信中說：我積極執行了省委「左」傾蠻幹錯誤路線和政策，餓死那麼多人，使信陽地區幹部和群眾遭受了極大痛苦，思想上感到萬分沉痛，血的教訓，今生難忘。我認爲死人問題在全省都發生了，不是信陽地區一個孤立的問題，信陽死人問題是高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河南死人問題，當時的省委應負主要責任。死人的主要原因是執行省委錯誤路線和三高政策的結果，省委對信陽死人問題自始至終是了解的。把信陽作爲一個孤立的「信陽事件」來處理是錯誤的。事情發生後，省委負責同志不敢承擔責任，把一切錯誤都推到下面，這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和品質。一九九三年，離休已十年的路憲文得了癌症，臨終前二十三天，他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文中分析了造成「信陽事件」的主客觀原因之後，感到有四條刻骨銘心的教訓：

（一）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鬥爭，形成一言堂的局面，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當年吳芝圃利用當時的政治空氣，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了潘復生，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

（二）錯誤路線引導下的群眾如果愚昧盲從，就會釀成大災禍。當時，人民公社化一轟而起，競相放衛星，鋼鐵元帥

升帳，都是違反社會經濟規律的，但都沒有受到群眾的抵制，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人民群眾只有被管理權。因此，只有人民群眾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確立，才能克服和避免犯嚴重錯誤。

(三) 上層建筑的改革一定要同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更一定要同生產力相適應，否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破壞作用。“信陽事件”死人問題，實際上就是違背科學規律而受到的一種懲罰。

(四) 幹部尤其黨的高級幹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依法辦事，接受監督。這樣，才能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

以路憲文為首的《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曾陷身於歷史大潮中，成為害人者又是受害者，他們對事件的認識是值得後人牢記的。他們都譴責極“左”思潮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何等的危害。搞“左”的一套的人無不將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自封為一貫正確的革命者，總是用套話、空話、大話嚇唬人，習慣用教條和各種各樣大帽、手段去鎮懾人，而不是從實際出發，老老實實腳踏實地工作。他們又總是不講民主，習慣專斷，不講科學，更不講法治，老子天下第一，獨行其是，凌駕於一切之上。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之所以發生信陽事件，發生“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文化大革命”運動，根本還在黨和國家體制上存在問題。我們歷來強調黨領導一切，無產階級專政實為黨專政和領袖專政；也強調民主集中制，結果卻形成黨的一把手領導一切，只講集中，不講民主，形成一言堂，上行下效，凡事一把手說了算。由於歷史造成此種慣性，又沒有有實權的平行監督機制，更沒有輿論監督（報紙從來被控制為“輿論一律”），於是導致一把手犯錯誤，無人敢說，終於釀成無法收拾的局

面。“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三四千萬人，其教訓難道還不慘痛嗎？請問，毛澤東不去世，能夠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嗎？

我曾寫過六十萬言的《大躍進親歷記》。一九六〇年後，我就不明世事了，“信陽事件”書中沒有涉及，所以願意應作者之命，為這本書的出版寫這樣一篇序言。

昨天、今天、明天是互相卸接的。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鑑，鑑往知來，中外古今的哲人都是這樣說的。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我想，這也是作者的本意。我希望所有的國人尤其在位的執政者，永遠記住這一句話。

二〇〇一年八月初

## 《歷史的評說》序

同光遠第一次見面，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漢，抗戰前他就知道我們一些人在武漢組織自發黨的活動。延安中央青委時，我們是“輕騎隊”的隊友。五十年代在北京卻很少碰面。我們接觸漸漸多了起來，是一九七九年以後這二十年。十二大以後，尤其都有中顧委的身份時，遇重大事件常交換意見，一起活動時不免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甚至患難與共。記得耀邦追悼會的前夕，我倆都在耀邦家裡談得很晚。近十年來，“左”爺們的眼中，我們兩人被拴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光遠是一個真正筆耕不輟的人，不論開會、旅行，他都文思不斷、紙筆在手。他多年前的著作目錄，就有厚厚一本，發表過的文字至少在中國是創造了吉尼斯記錄的。他自己也承認是“學者和著作家”，“家”的頭銜可以戴很多：哲學、經濟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教育學，等等。他也自稱是“雜家”：“什麼事都要‘研究研究’，喜歡發起這事那事。”（見“我的《自白》”）。去年出版了一本有關酒文化的《酒啦集》（自稱“酒啦啦隊員”），一百多篇短文。最長的一篇四千多字《中國歷史上的禁酒》；《四部辭典中“酒”字開頭的語匯》，考查出共有四百來個辭匯，“從中反映出酒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還有篇千字文《希望有人研究酒經濟學》，“世界大也無限，小也無限，對酒的

經濟學研究也是如此。”

好幾年前我就向他建議：將自己經歷的重要歷史人事趕快寫出來，這是我們這些人最後最重要的任務，也是一種歷史責任；意思是不要興趣太廣，而餘年有限。終於一九九八年來臨之際，從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發表二十周年開始，光遠寫出了一系列文章，並且用半年時間寫出了一本二十多萬字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書名《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自序”中說：“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責任，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還說，“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加深了這樣一個認識，那就是現在人們對歷史的淡忘很快。”還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是背叛。”並且將這句話改成：“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將來。”他還在書中說：“不讓後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三中全會只開了五天，全會之前開了三十六天中央工作會議。光遠是自始至終參加這次會議的重要人物之一，鄧小平的重要講話，他是主要起草人，小平所擬的講話提綱三頁原稿，還由他保存著。大家知道，三中全會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起了扭轉乾坤的作用，將中國從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深淵中，經濟崩潰的邊沿中，挽救了過來，重新走上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道路。可以說，沒有這次三中全會，就沒有今日之中國。因此這本書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價值，可能超過光遠過去幾十本書的任何一本。

繼這本書之後，同這本書內容緊密相聯的光遠另一本書，有關當代歷史人事的著作——《歷史的評說——我記憶中的國事》一書就要出版了，編者將清樣與我，囑寫篇“序言”。書中說：“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才覺悟到，在一九七五



年以前，其實我書生氣十足，只懂得書本上的政治，不懂得現實政治；只懂得原則政治，不懂得還存在骯髒政治。”除開在延安被搶救過兩年，文革前光遠基本上是平安度過的。這是確實的，如果沒有這種覺悟，這二十年來，光遠不可能為改革開放如此生龍活虎，衝鋒陷陣。這二十年中，他是堅持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先鋒，也是爭取民主、反對專制的先鋒。他在回顧自己一生時，說經歷了兩個“出乎意外”：一是一九三五年參加革命，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沒有想到革命勝利來得如此之快。二是開國大典那天，感到政權在手，以後國家的事就好辦了，卻沒有想到國事越來越難辦。現在才認識到，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政治民主、經濟富裕、文化發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有許多課要補，自己也就不那麼急了。“我想，這大概就是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吧！”光遠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者、馬克思主義者。他說，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冷淡主義，在中國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在馬克思主義不那麼時行時，我決心做一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就是對當代社會、當代世界（對我國來說還要特別加上當代中國）具有科學的認識，並且按照這樣的認識提出促進社會進步的基本主張。”

達爾文說過：“虛假的事實對科學進步的危害極大，因為它們往往持續長久。”研究歷史更是如此。歷史真相不徹底弄清楚，就無從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就不可能輕裝前進，就可能重蹈復轍。過去我們曾經將斯大林主編的《聯共黨史》當作教科書和百科全書，從而學過斯大林，“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我們自己的歷史過去也並沒有都弄清楚，如關於陳獨秀其人其事，關於四中全會和羅章龍，尤其關於富田事變、打AB團及一系列肅反事件（當年自己殺自己近十萬人），沒有認真作過總結，吸取教訓。於是

延安搶救運動時，“特務如麻”。對此錯誤，七大開會時“道歉”了事，沒有認真總結。於是一九四九年後，政治運動不斷，整人依舊“往死裡整”；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冤假錯案堆積如山，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現在情況如何呢？“文革”浩劫，竟成了深入探討的禁區，有的刊物還因此被查封過。

當然是有感於當前這種“不讓人知道歷史真象”的可怕現實，在這本自己五十年親身經歷的歷史人事中，光遠毫無顧忌，秉筆直書，即從這一系列文章題目，讀者就會有種歷史的真實感：“難忘黨的八大”，“毛澤東否定了‘廣州會議’”，“跟鄧小平一起倒霉”，“天安門事件平反真相”，“陳雲起了個好頭”，“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康生問題”，“鄧小平對外談天安門事件”，“胡耀邦在起什麼作用”，“我要為周揚說話”，“我想寫寫胡喬木”……。

在“難忘黨的八大”中，光遠說的我有同感：“如果八大路線能夠貫徹下去，而不是第二年又轉過去強調階級鬥爭，中國建設的進程會比現在提前二十多年”。文中還說毛澤東當時要變“政治中央委員會”為“科學中央委員會”，但隨著事態的發展，而走向了毛預想的反面。

關係中國知識分子前途與命運、地位與尊嚴的“廣州會議”，光遠強調“帶有貫徹‘七千人大會’的精神，恢復一九五六年黨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精神的重大歷史意義”。但是，由於“毛澤東沒有對廣州會議直接表態，導致許多省沒有落實會議精神。半年後，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脫帽加冕’事實上被否定了，”周思來在會上“強調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陸定一則認為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九六二年十月北戴河會議期間，毛說，“看來還是陸定一的看法正確”。光遠在文中還感嘆道：“對知識分子階級分析的方

法，似乎直到現在從理論上還沒有見到權威的結論。”

文革中作為一個被專政的對象，光遠回憶了自己作為中宣部的“大判官”被批鬥流放的悲慘歲月，大捱過幾次打，受傷後去過醫院。他說：“許多人經過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終身殘疾，而我終於完好如故。為此，也有人贈我以‘福將’的頭銜。”“文革”時他一直保持一種幽默心情：“鬥爭會上講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只是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種體力上的磨練。”他還諷刺了“請示病”，也說了一大通自己“真誠而錯誤的檢討”。“作為一個專政的對象”，居然“不識時務”地考慮如何“征服自然”，如何“訪貧問苦”，結果遭到“專案組”的一通審問：“征服什麼自然，還是征服你自己吧！”在高等教育中，光遠是堅持學位制的，毛澤東認為這是“提倡追逐名利”，文革時“使我放棄了從前的正確主張，還自覺自願地作了檢討。這樣的事情也許不止一件”。“我這個自認為理智比較強，能獨立思考的人，在文革那樣的環境下，也會改變原來的正確認識，接受錯誤的思想，所以說是一件憾事，而且是對我有深刻教育意義的憾事”。

光遠同胡喬木有五十三年的交往。這篇《我想寫寫胡喬木》許了個願：“我雖然不可能也不想寫他的評傳，但單就我與他直接接觸的事情來寫，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評傳的性質。”這篇長文的開頭就用小題標出：“胡喬木這個人的特點之一，便是強詞奪理和肆意歪曲他人的本意，有時甚至還造一點謠。”文中只記了當年同《人民日報》有關的兩件事：一是有關學習張志新烈士的報道；二是為肅清“左”的影響，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對第一件事，胡指責為“藉此煽動對黨的不滿和醜化黨的領導”。光遠說，“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話”，因為將處死張志新的“四人幫”死黨看作黨組織了。第二件事，胡“完全歪曲事實”，指責于

光遠和胡耀邦主張“應該‘先生活，後生產’”，並且藉鄧小平的話來壓胡耀邦。光遠說：“我們根本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文章結尾說：“對胡喬木這個人和他的言行進行分析研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光遠以重筆寫了他同胡耀邦“難兄難弟”的關係。他們成爲朋友是一九七五年開始的。耀邦早在自己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匯報提綱》中，就提出了“科學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但在隨後的“批鄧”中，他也因此挨批。關於三中全會時所起的作用，光遠說：鄧小平是靈魂，葉劍英全力支持鄧，否則也開不成這個樣子；胡耀邦所起的作用很大，沒有他這個會也開不好。胡當時是中央組織部長，在會上說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如說有一千七百萬脫產幹部，歷次運動中挨整的有二百萬，過去那些事可以“一風吹”；康生是“罪魁禍首”，“四人幫”應改稱“五人幫”；過去“黨內有黨，法外有法”，長期政治生活不正常；還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要有一大批敢於思考問題、敢於說話、敢於處理問題的幹部。主張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尤其是農業問題，耀邦是會上講得最透的。批評了過去的“以糧爲綱”，丟掉甚至破壞了其他經濟作物；不同意我們自誇“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五分之一的人”的說法，“養活”有各種各樣的養活，現在水平太低了；說勞動的積極性永遠是第一位的，集體經濟不能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就根本沒有優越性，“包產到戶”四個字呼之欲出。三中全會後理論務虛會的成就，更是同主持人耀邦的作用分不開，即他不斷鼓勵理論工作者要徹底解放思想。引用了馬克思的話：“理論上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汪東興這時堅持“兩個凡是”，告誡一位與會者：“理論問題要謹慎。”耀邦針鋒相對地講，“理論問題要勇敢”，研究理論的根本態度是堅持真理，勇於創新。光遠還特別寫到耀邦

的好讀書，勤於學習，勤於用腦，中外古今的書都讀，舉了好幾個發人深思的例子。還談到陸定一在這方面的感想，陸作自我批評，說沒能提倡老幹部應當具有大學畢業的文化水平，“使黨和國家遭受了很大損失。罪名是貽誤國家大事”。從而談到只有很少數老幹部有此覺悟，“下苦功夫，刻苦學習，有很大長進。這樣的人中第一個就得數胡耀邦，他讀的書真不少，很有見解。詩詞歌賦也都能來幾首，字也寫得不錯。他從紅小鬼成了個大知識分子”。光遠還選擇了自己《生活準則》的超短文三十八篇，以《願胡耀邦長壽八十萬小時》（即活到九十一歲又九十五天）作為篇名，獻給辭職後的胡耀邦，以自己修身、養性、為學、辦事、處世、做人、休息、活動等等方面的心得，影響耀邦，希望他笑口常開，心情愉快，排除煩惱，向他傳授“健身之道”的“精神勝利法”。當然，耀邦的過早去世，引起大家的無限悲慟，舉國震驚。光遠在《會計司胡同二十五號》文中，建議將來以此故居建立“胡耀邦紀念館”。

于光遠是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當之無愧的先驅，改革開放事業諸多領域的拓荒者。他的這本回憶錄自有傳世的價值，其中記錄了他能成為這一“先驅”和“拓荒者”的種種事跡。

一九九九年六月

## 《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序言

凡是已經過去的事件，都可以歸入歷史。歷史對於我們有用，是因為從過去可以規知現在，從現在可以推想未來。過去的種種，無論偉大輝煌還是失敗苦難，對善於學習的人，都是財富。愚蠢的人尤其別有用心的人，則拒絕接受教訓，用思想統制的辦法把一切失敗都從歷史上抹去，結果往往重蹈覆轍。延安整風（後來發展到搶救運動）對於統一全黨認識，奪取全國勝利，以及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當然起了很大作用；但黨內鬥爭的濫用造成的惡果，卻可謂至慘至痛。延安的這場悲劇雖然接受了教訓，有“一個不殺”的方針（也殺了幾個，如王實味等），但仍同一九三〇年底江西“打AB團”開始的各個蘇區的“肅反”運動分不開，當年“肅反”中被殺的共達十萬人。在後來的歲月裡，同對待蘇區的“肅反”不總結教訓一樣，整風的成績是被大大宣傳過了，而對嚴重的錯誤卻一直三緘其口，且不許人說，一說就是否定成績，就是翻案。結果，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種“肅反”、政治運動不斷，逐漸發展擴大，從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在更大的範圍、更長的時間裡重犯了過去的錯誤，造成了更加慘重的損失，“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所以我一直主張多研究歷史，要懂得從歷史中接受教訓、汲取智慧。

研究歷史，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從整體的格局來觀察歷

史，這是我們許多歷史學家在做的工作。無論通史還是斷代史，都是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材料加以集中、抽象，然後敘述各個歷史事件的原因、條件、過程、結局、影響。這樣的工作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做得好，對於我們掌握歷史規律，接受歷史經驗，可以獲益匪淺，但也常常易流於枯燥，闡割了歷史的豐富性與生動性，缺乏感性體驗的歷史規律或歷史經驗是很難深入人心的。另一種模式，是從個體的經歷來展示歷史。這是許多傳記、回憶錄、口述歷史以及日記、信件等的作者在做的。雖然個人所經歷的事件有大有小、所知的事情有多有少，但都是歷史的一個片段、一個側面。因為是個人的經歷，所以它不僅包含對所歷事件的細致、具體的敘述，也更帶個人感性的體驗。其所長正足以補史書的不足。

中國是一個有修史傳統的國家。中國傳統的史書是兼顧抽象與具體兩個方面的。司馬遷的《史記》，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表、書之外，其實都是家庭或個人的傳記。這些傳記寫得生動具體、神采飛揚，讓人讀來絲毫不感乏味，歷史事件也就是通過人物的活動一一展現出來了。後來歷代的史書，大都繼承了《史記》的體裁（惜筆力不及），即使是編年體史書，也十分注意人物言行的個性化敘述。五四運動以後，西方史學傳入，開始有了新的史書體裁，記傳體史書幾乎無人再作（恐怕也無人能作）。乃至蘇聯修史的框架被我們接受之後，國史成了黨史，黨史成了領袖人物言論的集納，史料只是填塞來作為現成結論的映證。修史至此，史書也就越來越枯澀無味，讓人提不起興致來了。蘇聯的經驗已有前鑑，他們的黨史是每換一屆領導，就要重修一次！

重新恢復紀傳體史書的傳統大概很難做到了。社會生活的豐富性、社會活動的多樣性，使得歷史早已不是幾十個人

甚至幾百個人物的經歷所能概括。但新史學的體例卻也無法反映生動具體的歷史。怎樣才能使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傳諸後世；怎樣才能使後世真切地理解我們時代的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以便他們更好地前行？我以為，不妨來個雙峰對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勵史學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現在的結論，而是按照歷史的真相總結歷史的經驗，寫出確有見地的現當代歷史佳作。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著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在他的“八十自壽銘”裡這樣寫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另一方面，鼓勵歷史事件的親歷者，真實地而無塗飾地寫出自己的遭遇、見聞、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麼標準的框框。現在這樣的著作面世的不多，我們的領導仍是要求“輿論一律”，對新聞出版嚴加控制，惟恐影響所謂“安定團結”。殊不知政治文明與先進文化的首先要求，就是言論自由，這是民主生活與文化事業的基礎，也是安定團結的基礎。有了這兩個方面的努力，即便我們一時不能產生偉大的歷史著作——這需要多種條件的綜合機緣，至少也為產生這樣的著作做好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包括材料與思考。

郭維敬同志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記錄了近六十個人物與事件（工作地區二十個省市），除少數知名人士外，多是不見於經傳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同樣都是那一個歷史時期各種事件的親歷者。他們的悲痛與歡樂、苦難與成就，都繫於社會的專制與開明，倒退與進步。許多史書上沒有的歷史事件的細節，我們只有在這些個性化或個人化的歷史記述中才能讀到。而缺少了這些細部的真實，歷史的畫面就無法得到真實地再現。我沒有讀過書中的全部文字，著者寄來一部分“簡介”，雖然這類人物與事件，我知道不少，且為這類書寫過序言，但我讀到這些“簡介”後，仍然震驚



不已，尤其是反右前的一些事情。這裡摘錄幾件：

《行軍三千里，磨難三部曲》的侯福凱，大學畢業時，在南京參加西南服務團，徒步跋涉到昆明後，在雲南廣播電臺任秘書兼編輯。一九五五年肅反突遭捕，被判刑十五年。刑滿後因無家可歸，不准離勞改隊，又留勞改隊十年，共二十五年。離勞改隊後，在農村與一年五十六歲，比自己長三歲的農婦結婚，打工、擺小攤多年，於一九八六年始平反離休，後不久病逝。臨終前，詩句中有“死去猶望‘德’先生”，渴望民主不已。

《一封朝奏九重天的傳奇故事》，寫清華大學南下學生董紀興，一九五〇年在“三反五反”時，出於天真熱情，向毛澤東上書，匯報領導幹部公開向群眾檢討可大大提高黨的威信，因而建議毛也同樣做。結果開除黨籍被拘捕，董百般無奈，只得裝瘋賣傻六年，又裝失語症十年。他的傳奇故事在廣西柳州地區傳聞甚廣，三十三年後始徹底平反。

《覆巢之下無完卵》敘述信陽師範音樂教師申繩武，肅反中被錯捕，復查糾正後，在反右末期卻無端與“右派”一道被送去勞改，一九五九年餓死。其妻焦玉鈞（北京市原市長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擊抄寫小學生手持小旗上的標語時，將“反對美帝霸佔黎巴嫩”中的“反對”二字寫重了一處，當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亦早死。四個兒女淪為孤兒，大的十六歲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個分別為十歲、六歲、四歲，討飯年余，為孤兒院收容。十歲的兒子健康正常活下來了；六歲的女兒後來成了瘋子；四歲的兒子長大後，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與人毆鬥，傷人致死被判死緩。

《盲流樹起紀念碑》中的重慶白寺驛的王嘉泉，南開中學高中畢業，解放後參加工作，因家庭出身且姐夫跟隨蔣介石去臺灣，被打成“潛伏特務”，幾經劫難，被迫加入“盲流隊伍”，逃到新疆石河子。經農八師學校收留後教學突出，

發表過有關文章。文革中被打成“逃亡地主”，勞改十年。復出後除努力教學外，以自己菲薄的工資，省吃儉用，收養教育了六名特困生，個個送入名牌大學，被這些特困生尊之為“父親”。他終身未娶，用行為樹起了一座紀念碑。

關於河南省反右情況，書中有這樣幾個統計數字：全省共劃右派九萬人，佔全國百分之十五，學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平均佔百分之二十三，有的地區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個別學校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固始縣劃右派教師數佔全體教師的百分之四十八，遂平縣佔百分之五十二。“右派分子”中的悲壯情景與劃右的荒唐故事，書中收錄不少。

《幾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的余士奎，反右時任學習小組長，因帶頭鳴放，被劃為右派。勞改中多次堅持說真話，遭到說不盡的生死磨難。關於反右，他自言自語說過“誘人上鉤，又置人於死地，此乃領袖思想之精髓也”。險被打死。對“信陽事件”，他在座談會上獨持異議，說“全國都刮南風，信陽這個小地方能刮北風嗎？信陽事件的發生，地委書記路憲文雖有責任，但主要責任是上級。”又險被打死。文革中他公開演講說：“歷史上有兩種官員沒有好結局，一種是敢於犯顏直諫為民請命者；另一種是功勞卓著，位高權重者……劉少奇和所有被打倒的老革命家都關心人民群眾疾苦，彭德懷的萬言書何罪之有？”結果被捕判死刑。林彪死後，改判死緩。他在捕前及在獄中，都有一些堅持真理的激烈言論。

《權力意志下的悲慘命運》，寫信陽地區在“左”書記王某的領導下，反右運動的各種荒誕離奇故事。如在所轄十九個縣市中，開展向地委“報喜”活動，結果劃右派數一浪高於一浪。黨校副校長董玉寶實在劃不出“右派”來，書記厲聲斥責說：“你就是右派！”竟真將董劃為“右派”。息縣

劃右派比較遲緩，他親自到息縣召開大會，公開說：“難道平時，就沒有提過支書意見的！”經這一點撥，大家心領神會，當天夜裡該縣就以四百多右派報捷。他到汝南縣視察，看教師學習班鳴放大字報時，見有數十名男女教師畫一副漫畫，諷刺教育科長隨地便溺。於是在大會上說：“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結果這一大批無辜教師都一個個淪為“右派”。

《反右何處不荒唐》與上文相似，其中豫東永城縣還有所謂“草荒右派”，全縣據改正時公布的數字竟為一千九百七十六人。商丘地委宣傳部長謝某，將全系統所有幹部幾乎全部劃成了右派，據傳只剩下“兩個半”所謂好人。由於謝規定了數額，專署文教科九人必須劃八人，該科科長馮德馨無奈，只得將包括副科長在內的全部幹部都劃上。馮與副科長商量，副科長說：“現剩下咱們兩人，只有劃我，因我是本地人，劃上還可以回家種地。”嗣後，馮每月工資總要將一半寄給副科長家，直到這位副科長“摘帽”。此事後來傳為“美談”。

反右結束後，信陽地委為改造“右派”，在所屬的大別山區譚家河建立了“萬勝山林茶場”。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數去而不歸，埋骨荒山；幸存下來的則多因傷殘，未得盡天年。至今人們談起譚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造成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就是幾個負責幹部，都把右派當作不可寬恕的重罪犯，對之毒打，任意餓飯，迫使不分晝夜地幹超強勞動，達兩年以上，以至一批批自殺、餓死、累死。基建大隊長徐蘭宇與辦公室主任賈文明同被人稱作“活閻王”，一次強令右派在惡劣天氣中翻山越嶺去扛木料，途中倒斃、滑入山澗及大糞坑、走不動凍死的達八人（另一說十七人）之多。當年死了右派還不如死了家禽家畜。其它分散在各縣改造及送勞改農場的右派，其處境也同樣惡劣，死人亦不在少

數。如平輿縣共劃右派七百二十九人，改正時有一百二十九人已死去，佔右派總數的百分之十七。

現年七十二歲的楊一華，在監獄、勞改場共度過十九個春秋，先後創作了一千多首舊體詩詞，大都作為“罪行”證物被收繳，現僅留下二百多首，書中選刊了五十來首。讀後覺得真是“有膽有識，詩如其人”。這於我也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親切之感，願為這位特殊詩人多作點介紹。一九四九年後，他曾在華東軍大、南京政治學院等處學習工作，後轉業任中學教師。他十分關心時事，敢於獨立思考，一九五五年就因研究斯大林的內外政策，被批斗八個月，後更因對歷次政治運動有不同看法，而倍受打擊，慘遭厄運。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後，他為了不連累一起議論過時政的難友，將自己多年來對重大問題的看法和盤托出，被改判無期徒刑。他的詩詞可說全是史詩，為針砭時弊反映現實之作，有對“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的批判，有對杰出人物的贊頌或其不幸遭遇的同情，有對遇害友人的哀悼和對親人、家鄉的思念，以及對自己身世的感嘆和期盼，等等。揚善刺惡，褒貶分明。他熟讀古籍，深諳詩律和典故，詩作厚重沉郁而又雋永開闊，格律嚴謹而又自然流暢。現摘錄幾首以見一斑。

他曾與友人合寫過電影劇本《陸游》，“有感三絕”第一首，引用陸游和梁啟超詩句：“死去猶能為鬼雄，中原未復恨難窮。千秋自有史臣筆，亙古男兒一放翁”

一九五八年反右有感：百花齊放百家鳴，納善從流劇可親。誰識翻雲覆雨手，一時才俊盡沉淪。

一九五九年參觀馬橋鄉畝產將達十八萬斤糧田有感：信口雌黃誇短長，千斤棉與萬斤梁。由來咳唾成珠玉，泥土也能自化糧。（《後漢書趙壹傳》）：“勢家多所宜，咳唾成珠玉。”）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地本傾斜水怎平，是非非是令人

驚。英雄豈獨始皇帝，自筑長城自毀城。

讀漢武帝罪己詔有感：三面紅旗白日昏，冤魂無日出愁城。武皇一詔真千古，寧為蒼生不為名。

詩人於一九六二年底被捕入獄，即作七律一首自勉：星槎有路疑無路，苦海無邊會有邊。別樣心情嫌蛺蝶，依然氣骨傲榆錢。澗中恰有陰沉木，岩畔偏宜不見天。他日重溫今日夢，定牢腸斷唱催眠。（原詩自注：李商隱詩：“莫訝轉愈為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此句意謂對人民、國家忠貞不渝。陰沉木是珍貴木材，傳說生長濕處或在水中浸泡多年而成。不見天是烏龍茶精品）。

一九六六年紅衛兵：供石他山攻璞玉，興兵紅衛亂乾坤。洪楊內亂天朝敗，劉鄧清除中共昏。元佑黨牌今復見，東林舊案豈重溫。籬籬撤盡長城毀，日暮西風摧斷魂。

詩人一九六八年被押往西寧繼續服刑。一九八〇年無罪釋放，恰好十九個年頭。一九八〇年返滬有感：恰似牧羊蘇武日，也如重耳返家天。黑牢一刻人應老，怎信已禁十九年。

這本凝結一代知識分子血淚的故事，不能不引起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反思。一九四九年後，國家是何等興旺氣象，尤其八大通過了不搞階級鬥爭，集中發展生產力的正確路線，大家都受到鼓舞。可是隨即反右派運動之後，形勢就急轉直下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我們務必弄清楚，到底錯在何處，教訓在哪裡？經過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終於走上市場經濟道路之後，我們已經懂得或似乎懂得一些根本問題了。可不可以這樣簡單說幾句：

什麼叫社會主義？過去“不怕窮，只患不均”；“只怕富，富則修矣”。於是“窮則思變”，發明“三面紅旗”；大搞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效法“五斗米道”；太平天國一套都出現了；從康有為的《大同書》中找到社會主義。

怎樣進入社會主義？要消滅一切私有制（完全不顧恩格

斯晚年對《共產黨宣言》的批判），要“大公無私，消滅私字一閃念”。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從馬克思取來四個字：“階級鬥爭”，“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一分爲二”的鬥爭哲學。

怎樣領導呢？“無法無天”。這就要“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就從中國古代治國之道中吸取營養並加發展。不要講什麼“仁政”。要“法先王”，“以吏爲師”，“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綱六紀”，“乾綱獨斷”到書記掛帥，到要點個人崇拜，“總得有一个人說了算”。知識分子算什麼，不會殺豬，只會七嘴八舌；秦始皇只坑了幾百個，我們幾十萬。於是“知識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西方的東西，那一套不能學。到“文化大革命”，就“四個第一”，“破四舊”，人類歷史發展得到的文明全被踩到腳下了。最近挖掘出來的同羅稷南的談話，最能說明問題。

這二十多年來，國力得到很大加強，經濟持續發展，但也走過彎路，出現過風波。根本問題在政治改革未能同經濟改革同步，民主滯後，法治難張，有憲法而無憲政，四大自由難以實現，仍是人治爲主，導致腐敗叢生，難以遏制。政治文明就是要實施憲政，只有民主化和法治化，才能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不斷發展。

書中的故事含血帶淚。我相信這些真實的記述，會幫助讀者理解我們曾經走過的歷史，從而知道社會進步的艱難，因而更加懂得珍惜已有的進步，奮力去開創未來的坦途。歷史和現實只有在開拓未來的奮鬥中才能得到完美的結合與表現。

郭維敬同志爲此書的出版索序於我，因述淺見，發表了些感想，對他的成績表示高興，並借此就教於大方之家。

二〇〇三年一月四日

## 《湘濱往事》序言

本書作者是我二姐的長子。為支持我二姐夫婦參加革命，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二年，我母親和大姐將他從九個月撫養到十三歲。作者寫出此書就是為了紀念這件事。

我於一九三九年底到達延安後，整個戰爭年代同家庭失去聯繫。為怕李家絕了後，母親就讓我這個外甥改姓李（過繼到我名下）；作者五個兄弟姐妹，只有他姓李。因此，我的母親養育這個外孫子就像當年待我一樣，非常嚴厲，就怕他不成材。書中著重記述了我的極具鮮明個性的母親和大姐，她們可說是清末到民國的兩代知識女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她們為人處世同時代的關係。

我母親三十二歲守寡，不論生活怎樣困難，她母代父職，撫養三個兒女，教育他們“要為國家做事”。一九五九後，我被“打入另冊”，妻離子散，流放在安徽大別山一個小水電站勞動時，曾收到母親來信，她說：“我已年過古稀多了，沒有什麼了不起。希爾好好保重身體，往後再為國家盡力。”我父親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留學，即參加了同盟會。“一二·九”運動時，母親同我談過父親的信念：“這個社會將來是要共產的。”母親活到一九八〇年九十歲去世，儘管始終沒能在兒子家中生活過一天，還在“文革”中遭受種種打擊與侮辱，她老人家都坦然對待，畢生沒有說過共產黨一句壞話。當然，她生長在舊社會，有封建意識，又年青守

寡，生活艱難，壓力沉重，因而脾氣暴烈，我們姐弟三人從小就過挨打的生活。本書作者也承受著這種過於嚴酷的教育方法。我的大姐執教中學時是有名的老師，有時在母親面前也還不免挨罵甚至挨打。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婦女追求自主自強，開風氣之先。大姐琬華一九三四年畢業於上海兩江體專後，就在湖南的省立中學任教，肩負家庭經濟重擔，供弟妹讀書，後來又支持我們參加革命，贍養老母直到送終。在我蒙難的二十年中，她不怕受牽連，在精神和物質上關懷我、幫助我。此中情況確如書中所寫，大姐是“家庭的支柱和恩人”，用革命隊伍的習慣詞語，大姐是我和二姐的“後勤部長”，使我們無後顧之憂。

作者的父母是職業革命家，戰爭年代一直在國民黨區從事地下工作。書中寫到抗戰時，人們扶老攜幼地逃難，作者同弟弟分坐在籬筐裡，請人挑著走。這種細節一般史書難以見到。更重要的是，書中還寫到當年國民黨統治區有關的人和事。例如，記敘了魯立剛、李相瓊夫婦對湖南教育事業的貢獻，在艱難的抗戰時期為事業獻身的愛國精神。其中還有值得注意的復雜的歷史情況，即作為一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魯立剛，以及當時湖南省立一中的廣大教職員，乃至國民黨的沅陵縣縣長夫婦等，對我們家中的共產黨背景等都是一清二楚的。每逢生活困難或失去組織關係，二姐夫婦還要回到大姐家中，乃至謀求教書職業。戰爭時期十多年中，他們卻一直是安全的。這應當說，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道義在起作用。作者還以他的所見所聞，通過不同層次的諸多人物，如省高等法院院長，有CC背景的銀行行長，街道上的裁縫、甲長，交不起房租的房客等等，生動真實地記述了解放前夕國民黨區民生凋敝、社會動蕩的種種情景，以說明國民黨政權人心喪盡，必然覆滅。



作者在戰爭年代的大後方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同新中國一起成長，經歷了共和國曲折歷史的風風雨雨。在他們這一輩人中，由於家庭環境和個人經歷（作者從大學工科畢業後任教多年，做過省市行政和外貿部門的負責工作），他的見聞要多些，感受也要多些吧。在閒聊中，聽他無意間談起童年的一些事情，覺得很有意思，於是就鼓勵他寫出來，這也能或深或淺反映出這一段歷史的某一側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典型，每一個人都值得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留給後世。從作者的童年也想起我的童年，尤其想起我的母親，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復職到長沙大姐家中時，老人已認不出這個朝思暮想的兒子了。我寫過一篇《我的父親》，還沒有寫過我的母親。此書也使我想起高爾基的那一本《我的童年》，記得書中正好也寫了這樣的一個外婆。

這本小書是作者已屆退休年齡時寫的，寫作不是他的專業，自然不在文字的工拙，只在求真傳信。由於反映了半世紀前那個時代的某些有意思的情況，我認爲是值得出版的，也就應作者的要求，寫了這樣一篇序言。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五日

## 《劉順元傳》序言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參加全國學聯大會等活動後，準備轉回山東敵後時，經長江局組織部給徐州蘇魯特委轉組織關係，給我寫介紹信的就是劉順元同志。他還讓我帶領十幾位青年同志（內多黨員）一起去，組織關係也由我帶上，他向我作了親切而信任的交待。這是戰爭年代我同順元同志惟一的一次接觸。再同劉老見面，是四十多年後，一九八三年在南京了。十二大後，我參加省部級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經常出差。四月間，到華東幾個省。江蘇的情況比較複雜，老同志對省的主要領導人意見甚多，因此，同劉老有幾次交談，深感他的直言不諱，高尚風德，也聽到廣大幹部對劉老和其他幾位老同志的衷心愛戴。這種情況在其他各省較少遇見。後來每逢中顧委開會，也常見面，無論就過去歷史和當前問題，交談中我們思想是相通的。當然，我對他曲折而光輝的一生經歷，沒有具體的了解。丁群同志退居二線後，有感於當代“左”的災難，人事滄桑，於是勤於執筆，不僅積極為“文革”烈女陸蘭秀徹底平反，還為她寫了詳細的傳記，並命我作序。這次他又作大好之事，為劉老寫了傳記，並將原稿寄我，讓我寫序言。作者為此傳記，南北奔波，並先後花了六年多時間，查找原始檔案，訪問二百多知情人，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從傳記中我更加覺得，劉順元同志是黨內老一代中極為難得的領導幹部；是具有大德、大智、大

勇，不應被後人忘記的歷史人物。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爲界，本世紀前五十年，爲推翻三座大山，歷經曲折坎坷，千難萬險，付出多少犧牲，取得了革命勝利。後五十年，爲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誰也不曾料到，還要經過更爲曲折、險阻的過程，尤其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其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革命勝利後普遍認識不足的，即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又是一個以農民爲主體的大國，兩者互相依存，難以解脫。於是導致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藉體還魂。人們能夠勝利地渡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關、生死關，卻難以渡過勝利以後的階級鬥爭關和個人崇拜關。

劉順元生於一九〇三年，歿於一九九六年，是一位世紀同齡人，他目睹了世紀之初的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和北伐戰爭，親自參加了以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又經歷了全國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和重大事變；他的經歷，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一個縮影。他的極可珍貴之處，從傳記中可以看到：

——從一個普通而又閉塞的農家孩子，成長爲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以後又因爲就業勤恭，博覽不倦，成爲一個“陳說古今，無不悉貫；評論時事，皆有證據”的學者。

——從相信軍閥吳佩孚，到敬仰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並且成爲自己家鄉山東省博興縣的第一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以後又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對國民黨日趨腐敗的失望，轉而研究馬克思主義，在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代初，毅然拋棄國民黨，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爲博興地區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

——他在山東從事地下工作和到上海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上海局工作以後，曾經先後三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始終堅貞不屈，每次都差一點犧牲生命。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被營救出獄，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到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武漢淪陷後，深入皖東敵後，參與創建了擁有十八個縣級政權，五萬人民軍隊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

更值得珍貴的是：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東北地區工作時，他從過去的盲目崇拜蘇聯，到識破和抵制駐旅大蘇軍的大國沙文主義，被蘇軍驅逐出境；以後又因此被斯大林指責為反蘇，受到了撤銷濟南市委書記的職務並連降三級的處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又從五體投地崇拜毛澤東，到較早地發現和抵制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多次從理論和實踐上批評“大躍進”，抵制“文化大革命”，以至被毛澤東點名批評為“老右傾”、“大右派”，並且在“文革”中被關押批鬥達七年之久，差一點性命不保。

——粉碎“四人幫”後，他不僅帶頭參加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參與一系列撥亂反正的工作，包括審理林彪、“四人幫”集團；而且為避免重犯“左”的錯誤和再出現“四人幫”集團這種禍害，率先指出了黨在理論觀點和領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與不足，為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實行改革開放，作出理論上的建樹。

劉順元的三生三死、幾起幾落的經歷，充分表明：他不僅在革命時期，具有高於常人的識見和勇敢；而且在革命勝利之後，具有高於常人的識見和品格：他真是如他四十年代在自傳中所說的，是這樣一個錚錚鐵漢：“危險時絕不貪生怕死，安樂時絕對不會貪污腐化”；“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頭，同時亦不在思想上盲從”。他確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唯真理是從，而決不隨風轉舵、唯命是從的共產黨員。

相信讀者不僅可以從書中了解劉順元的人格和風範，得到啓迪和教益；而且還能從一個側面，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種種曲折變化的真實歷史。

# 懷念帥大姐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帥大姐歷經了一個世紀的滄桑，靜悄悄地走了。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望著她的遺容睡在鮮花中是那樣安祥，在腦中閃過我曾經寫過的幾首詩：

## (一)

大姐驕吾黨，高風舉世宗。  
刑庭知鐵骨，正氣貫長虹。  
瀝膽披肝剖，先憂後樂中。  
老年參盛業，回首一生雄。

## (二)

湖湘多壯士，巾幗有英雄。  
盛德難求喻，平生只為公。  
霜風心似火，古柏骨如銅。  
直道堪師表，言多逆耳忠。

## (三)

大姐英名天下聞，死生兩度煉金身。  
百年曲折坎坷路，鐵骨冰心傳後人。

第一首詩是一九八六年寫的。那年的一月二日去看望帥大姐，才知道一月三日是她的九十大壽。這天我寫了這首詩，並以“回首一生雄”為標題寫了一篇文章，登在《瞭望》周刊上，文中談到一九三八年在湖南開始結識大姐。從此每屆元旦，就會想起大姐來。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大姐九十二歲生日時，應《模範共產黨員帥孟奇》一書編輯之約，我又寫了篇短文，著重談大姐一生不隨風倒，從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勞大（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王明鬧宗派起，到延安搶救運動，到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她都敢於頂風，敢講真話；還寫到她雖文化不高，卻極其重視知識，重視人才，親近知識分子。文章以一首五律結尾，那就是第二首詩，並以“平生只為公”一句，為文章的標題。

一九九二年以後，大姐就因病長期住在醫院了。每年我總要去看望兩三次，她雙目已近完全失明，但總聽得出我的聲音：是李銳來了。起初她還能坐在輪椅上，由服務員推著在走廊裡散散步。後來兩年就臥床不起了。

一九九五年底，她的秘書陳雙壁告訴我，大姐明年虛歲一百，準備小範圍祝賀一下，就像在延安祝她五十壽辰一樣，大家寫幾句心裡話留念吧。我的心情自然很不平靜。一九八二年我調到中央組織部後，同大姐的往來才密切起來，她極其關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每想到她的一生奮鬥，一生坎坷，特別是兩次涉臨死亡，能活到一百年，真是人間奇跡。是什麼力量，精神的？體質的？能使她達到如此高齡。於是我吟得四句，寫了第三首。

詩中“死生兩度”之一：一九三二年大姐在國民黨的刑訊室裡，受過罕見的酷刑，三次倒灌煤油水，七孔流血，牙齒被打掉，左眼失明，腿骨折斷。當年傳聞已經犧牲，一九三七年瓦窯堡開全國黨代會時，帥孟奇曾被列入烈士名單。她被判無期徒刑，抗戰前夕才出獄。一九三八年我見到她時，才四十二歲，已經顯得老態了。五十年代，李伯釗為大姐寫過一本書《女共產黨員》，詳細寫了大姐在上海公安局受刑訊的這段經歷。這本書發行幾十萬冊，教育了一代青年。

“死生兩度”之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大姐在中組部主管外交外貿幹部工作，被康生誣以“叛徒、特務、裡通外國”的罪名，被關入監獄七年。右眼被打壞了，加之獄中通夜不關電燈，右眼逐漸失明。一九六七年她已七十一歲，並患有心臟病，一九七三年全身浮腫，尿中毒。康生為留下“活口”，大姐才被送到醫院開刀，九死一生，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大姐從來沒有跟我談過她在“文革”時受折磨的情況。一九七八年她從流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住在醫院時，全國婦聯的原負責幹部去看望她，問起她右眼為何失明時，大姐忍不住談了原委：“關押起來，白天、晚上進行車輪戰，逼我承認‘叛徒’、‘特務’，經常吼叫：‘站起來’，‘低頭’。我的右腿在國民黨監牢裡坐老虎凳折斷過，站久了，腿就發抖，倒在地上。他們就把我抓起來，強迫我站立，我又倒在地上。就這樣，日夜連續批斗五十天，有一次一位專案組的人把《女共產黨員》一書卷成一個筒，一邊批，一邊揮動書打在我的右眼上。他惡狠狠地說：‘看你這本書欺騙了多少革命青年，你還配做一個共產黨嗎？’後來右眼腫起來了，發了炎，也不給治療，失去了視力，這是最痛苦的。”她沉默了一會兒，樂觀地說：“兩次坐牢，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要看到四化的實現，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引自《模範共產黨員帥孟奇》二〇四～二〇五頁）

是的，“要看到四化的實現”，是這樣一種精神力量，使大姐戰勝疾病和磨難，活了下來，活到了一百零二歲。其實，大姐並無什麼養生之道，一生粗茶淡飯，生活極其樸素。她節衣縮食，把省的錢捐給教育和公益事業及援助有困難的人。她常說：“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有的人要那麼多房子有什麼用。這只會脫離群眾，害了子女。”為了反對歪風邪氣，端正黨風，進行革命傳統教



育，他克服雙眼失明的困難，寫了許多文章，回憶何寶珍、徐特立、錢瑛、鄧中夏、彭湃、陳潭秋等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輩。她還為《中國婦女》寫了《學習張志新同志的崇高品德》，對“四人幫”殘害張志新，表示極大的義憤，並希望眾多的共產黨員能學張志新的大無畏精神，實事求是，敢講真話，不說假話。

帥大姐自己就是一個最敢講真話，不隨風倒的人。在黨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敢於堅持實事求是，保護幹部，所以她贏得眾多的人的愛戴。帥大姐的終生好友劉英大姐說：“我敬她，愛她，從心底欽佩她！她稱得上是黨內楷模，女中英豪。”

帥大姐的一生，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苦難、曲折，也代表了光輝和充滿希望的未來。在她離去的時候，已經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歷盡艱難曲折，終於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道，領導著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生活。她安祥地走了，我們後人永遠地懷念她。

一九九八年十月

# 誰人不仰原前老

## ——《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一書座談會上的 書面發言

近日廣東教育出版社專人送來《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一書，並邀我參加五月二十六日爲此書發行的座談會。由於身體不適，我只能寫幾句話，作爲一個發言吧。

任仲夷同志在大學讀書時投身革命，是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我們有過十分相似的經歷，然而我們之間過去並不熟悉。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時，雖同他有過接觸，但對他的認識多來自他人之口。

大家最早稱道他的一件事，是關於張志新的平反。一九七七年三月，任仲夷調遼寧省委主持工作，其時，“兩個凡是”的影響還相當大，他頂住壓力，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積極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兩個凡是”。他佩服胡耀邦爲平反冤假錯案時提出的“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精神，決心爲平反冤假錯案要“敢上刀山”，不惜冒政治風險。一九七九年一月，張志新的問題提出後，他批示“公安司法部門應抓緊清查這一案件”。二月，再次強調：“這個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給予平反。”這時華國鋒正在遼寧視察工作，有人請華爲張志新題詞，華未予理睬。華的態度沒能阻止任仲夷爲張志新平反昭雪的決心，他說：“不題詞可

能有別的考慮，這不要緊，我們還是按省委的決定幹。”三月，遼寧省委為張志新召開平反昭雪大會，追認其為革命烈士。四月，《遼寧日報》刊出了《為真理而獻身》的長篇通訊。《人民日報》的編輯看過這篇文章後，都極為感動，決定轉載。稿子送胡喬木審查，喬木壓了一個月不退回，經報社一再追問，才說，這事太慘了，對黨的形象損害太大。後來報社將這一情況報告胡耀邦。耀邦說，張志新是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報》應該刊登。於是《人民日報》不僅加編者按轉載了《為真理而獻身》一文，同時還組織了一些文章，連續報道。此後《遼寧日報》則在任仲夷的支持下，對張志新的宣傳持續了五個月，編出二十多個專版。當年宣傳張志新，推動了全國揭批“四人幫”，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火。

沒有二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今日之中國。打仗要有先鋒，辦大事難事又何嘗不如此。任仲夷是改革開放真正的先鋒之一：他是最早支持批判“兩個凡是”的三個省委書記之一；他較早提出“由窮變富”是革命的目的；他較早提出“生產力標準”問題；第一個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他是第一批支持鬆綁的省委一把手……他在遼寧工作期間提出要把大連辦成“特區”。當時中央考慮，特區辦在與港澳台毗鄰地區更有影響力，沒有同意任仲夷的建議。但不久由於這個“特區情結”，一九八〇年中央就調任仲夷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此時中央已批准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辦三個特區。創辦特區是決定中國新的命運的一著高棋；由誰來主其事，則關係此舉的成敗，這盤棋能否取得勝利。這就是說，這個廣東的新領導，必須徹底解放思想，必須衝破重重禁區，必須頂住種種壓力。任仲夷以“敢上刀山”的精神，充分利用中央給予的政策，頂住來自各方的非議，甚至要頂住被某些保守人士、高

層領導批評爲“搞殖民地經濟”的壓力，帶領省委、特區市委和全體幹部闖過一道道難關，在幾年時間內，將特區辦得有聲有色，進行了多種大膽嘗試，創造出許多“全國第一”，帶動了全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中的問題，只能在發展中解決。如果只是飛進了幾隻蒼蠅，就要把窗戶關住，那就談不上什麼改革開放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目標就要推遲許多年才能實現。如果當時屈服於種種“左”的認識、“左”的教條、“左”的壓力，就不可能出現我們今天的新局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時期。由於有了特區的成功經驗，我們才開始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才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才使鄧小平理論有了實踐的基礎。因此，可以說，任仲夷功莫大焉。

一九八五年任仲夷從一線退下來，勝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我也差不多同時退出一線，都轉到了中顧委，從這時起，我們接觸的機會多了，才比較熟悉起來。由於我們有著某些相似的經歷，使我們成爲無話不談的老年朋友。他來北京開會，或是我因事去廣東，我們總要安排時間見面，交談交談。記得他同我談過他的“安全著陸”。這是說他退出一線時，同主持福建改革開放的項南的命運有所區別。當年他們兩人被那些“左傾”思想嚴重的人視爲“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那些人抓住改革開放中的某些問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從延安搶救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們真是吃盡了“左”的苦頭，對這些歷史我們都有過認真的反思。搶救運動時，我在延安坐過一年多牢，任仲夷在太行也捱整一年半，他同我談過挨整的情況，並不亞於延安。嘗過這種苦果之後，對“左”的東西，我們自然有特別的敏感，就好比種過牛痘，產生了免疫力。由於真正透徹接受了前車之鑑，任仲

夷才能如此始終堅決站在改革的最前列，而且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把握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創造出大量新的經驗。這方面書中有詳細的記錄，值得細細品味。

任仲夷不僅是一位積極倡導和身體力行的經濟方面的改革家，同時也是一位不斷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老幹部。他家裡珍藏著一幅“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的照片（據說當年他捱過一千多場批鬥），將之稱爲自己“最寶貴的財富”，定要牢記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認真吸取歷史的教訓，永遠不再重犯“給我們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因此，他不斷地提出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還是要實現民主化與法治化。

廣東有特色，同有任仲夷這樣的老領導分不開。我到過全國許多地方，只有廣東令人感到上上下下一片生機，一種希望所在。任仲夷在廣東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說，他的作爲已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因此，一九九七年中共召開十五大，已退下來十二年的任仲夷仍被選爲十五大正式代表（原中顧委委員只是作爲列席代表參加）。

一九九八年，吳南生邀請我和老伴並王若水夫婦等到廣東參觀，在汕頭住了幾天，又同仲夷見面，相談甚歡。吳南生也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先驅人物，我爲他寫了一首詩，同時寫了這首《讚任仲夷》：

無限風光滿眼前，南天一柱立南天。  
誰人不仰原前老，說古談今猶少年。

詩後有註：“離休後，常不免自稱職務冠‘原’或‘前’字。‘原前老’呢稱於是傳開。任仲夷主持粵政，有大功於改革開放，至今報刊仍常發表他的言論。八十年代後，四下

廣東，這回又得同原前老長談。”

在這已經退下來的十幾年中，仲夷人退心未退，仍然十分關心廣東的改革開放，關心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為廣東和全國的改革真正發揮餘熱。我們時常在廣東和全國著名的報刊上，見到他的文章和訪談錄。像仲夷這樣至今還起作用的老同志，環顧全國，已經不多了，我希望所有的老同志都向他學習。這本《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我希望老中青三代都來讀一讀。

最後我想用仲夷的話來結束本文：“我們的黨，我們國家，需要有一批不怕任何風險，英勇無畏地為真理而鬥爭的戰士。有這樣一批人，黨、國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 《孫大光文選》序言

大光與我同庚，都出生於五四運動的前夕一九一七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參加一二九運動，隨後入黨的。這時大光在上海已是團省委巡視員，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貧寒，只讀過初中，十六歲從家鄉安徽來到上海當學徒，十七歲起就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從而由上海到廣東，由廣東到川貴，由川貴轉到東北，長期戰鬥在黨的地下工作戰線上。長春解放前，他曾任國民黨的市社會局局長。直到一九四八年，他才回到解放區黨的幹部隊伍。

五十年代我們都在工交部門做負責工作，但沒有來往。一九六四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長，當年大概是最年輕的部長，這說明他很有才幹。“文革”時期，我們都身陷囹圄。大光於一九七五年復出，轉向資源勘探最重要的崗位，任地質部部長。我於一九七九年平反復職，仍在電力部；一九八二年轉到中央組織部，主管“第三梯隊”工作（選拔年青的省、部級預備幹部）後，才同大光在工作上有些接觸。當年以“四化”標準選接班人，即年輕化、革命化、專業化、知識化。

大光在這方面傾注了極大精力，顯示出他的眼光、見解和走在時代的前面。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他的一篇總結性文章：“建設第三梯隊是歷史賦予的責任”。開篇的幾句話我最有同感：“我來地礦部工作已經

九年多，深感地質工作必須由內行來領導，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來就象是隔靴搔癢。如果一大批領導骨幹不懂得或不很懂得專業技術知識，就會貽誤整個事業的發展。過去，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吃過沒有知識的虧。”在地質系統各級領導幹部中，他已經進行了四年調整：“省局級班子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佔百分之六十七，專業技術幹部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部黨組成員六人，除我以外都有大學或研究生學歷，懂得業務的管理。部機關司局級幹部中，有大專學歷和專業技術幹部達到百分之七十。”他還談到：“對選第一、二把手，除政治上堅強和有組織能力等條件，特別注意兩個‘深’字，一是對戰略問題的深謀遠慮，二是在處理具體工作時的深思熟慮，特別注意他們是否善於團結一班人，是否能知人善任，是否有改革精神，勇於並善於開創新局面。”特別是最後一句話，回想當年建設第三梯隊時種種阻力，“有文憑沒有水平”等等，他確是有膽有識的排頭兵。有人曾寫文章，說應給大光頒發一項“伯樂獎”。

我同大光更多交往，是在兩人年近古稀，退為中顧委委員之後，每逢開會，見面就多了。大光少年時即酷愛文學，且喜動筆。在地下工作時期，讀過《史記》和中國通史等方面史書。後來在繁重的工作崗位上，仍擠時間讀書，熟讀《資本論》和馬恩列斯著作，不僅文史哲，尤其經濟方面有廣泛學識，這在我們黨的高級幹部中是少見的。他思維敏捷，思路開放，言語直率，胸懷剛正；經歷了幾十年風雨坎坷，始終保持著一個真正革命家的腳踏實地又大膽無畏的風骨，以及對社會對歷史的責任感。一九八九年春那一場政治風波時，我們中顧委的一些老同志，目極時艱，憂慮國勢，想給中央寫封建議信。我在電話裡同大光講了信的內容，他完全贊成，便讓我代他簽上名字。這封信雖未能發出，還由於其他情況，中顧委特為我們幾個人開批判會。在那樣一種舊習



重現的形勢下，大光不隨風、不趨勢，決不做任何違心的推波助瀾之事。還記得一次會上，他被點名對我發言，他昂然站起拒絕了：“我沒有話要講。”

我是喜歡“舞文弄墨”的。過去我並不知道大光善寫文章，這本《文選》共收文章九十篇，跨度六十一年。他委我先睹，真是一快。大光從十六歲起便在上海、廣東、重慶等地報刊，發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政治文章，從經濟、軍事、政治到文化，涉及面很廣，讀來如見當年華夏大地的烽火硝煙，如聞國人老少的吶喊呼號，其真實、生動的記錄，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擔任全國交通和地質領導崗位期間，“文革”以前的幾篇長文，第一篇就談利用價值法則改進企業管理；其他多從微觀到宏觀談具體業務，可見工作細緻深入。一九五三年發表在《人民日報》的長文《利用價值法則，改進國營交通企業的經營管理》，是批評當年交通部系統的工作缺點的。大光時任計劃司司長，部領導曾不同意發表，經過力爭，終得部長首肯。格於當時政治氣氛，參觀大慶也還是多談業務和技術管理；全國交通會議談“五反”運動，今天讀來也還有某種現實意義。最具個性的，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文章，或調查、或報告、或書信、或論述、或回憶，內容充實直抒胸臆，讀來信覺親切。從中可見大光對事業的忠誠，對工作的勤勉，對同志的友愛，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最能表現大光為人的剛毅正直和對歷史負責任的文章，是《我說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這一篇寫給中顧委領導同志的信，時間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當時正逢一場經濟風波，銀行提款，市場搶購。信中談四個問題，一是物價問題，必須嚴格控制通貨發行，並提高存款利率。二是要進一步總結經驗，在經濟理論和有關政策上，目前還相當混亂。過去四十年最大失誤是違背了《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的方針政策，經濟建設遭到連續的大挫折，必

須徹底批判經濟戰線還存在的極左思想，以明確今後路線。

三是關於“透明度”，即公開化和民主化的問題。由於當年政協和人大兩會民主空氣活躍，提出一些尖銳問題，從而談到黨的會議定要大大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黨的生活公開化、民主化，首先應開放輿論，依靠新聞媒介的監督，包括對黨中央、國務院及其領導人的監督。四是黨風和黨建問題。這是全文的重點，篇幅最長。從許多重大貪污受賄案看，組織嚴重不純，腐敗風氣嚴重地侵蝕我黨。批評紫陽同志下去視察，談的只是經濟問題，沒有抓黨風建設，聽聽下面呼聲，認為這是總書記的首要任務。從而是談到社會風氣之壞前所未有，講了四點：1．人們談論“三上三下”：“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批評國務院成批進口豪華轎車，濫建樓堂館所；南京重修一所高級賓館，我們的國務委員、書記們住起來心安理得。高級決策機關和關鍵人物例外，就注定整黨要走過場。2．關於高幹子女出國和工作安排問題，社會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小平同志說：“要從我的子女查起”，這證明小平同志是偉大的，希望不要辜負了他的願望，因為社會上對他的子女也是頗有非議的。必須在最高領導層中打破一切庸俗習氣，切不可搞官官相護。“我在中央會議上反覆建議，要把社會上關於高級領導的一些傳言查清，公諸於人，以正視聽，但沒有人理睬。”還主張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一律不要經商，已經擔任職務的一律退出。3．關於幹部的使用，我們也還沒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賢。4．現在我們的高層領導住的深宮，吃的“特供”，出門火車專列，汽車則警車開道，前呼後擁，裡外三層，平民百姓怎敢怎能傾斥衷腸？“黨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長此下去，將伊於胡底？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豈是危言聳聽？”十二年之後，重讀這篇文章，許多話豈不是正對今天情勢而言！這封

信曾在中顧委大光所在小組宣讀過，博得全體委員的一致贊成和熱烈掌聲。

在一心爲公方面，大光更是身體力行，堪稱楷模。他是知名的書畫收藏家，過去一部分工資用到這方面。一九八七年，他將一百九十一件古代書畫珍品捐給安徽省博物館（在地質部禮堂展覽時我去看過），所得四十多萬圓獎金悉數獻給家鄉教育事業。一九九〇年他又把所藏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劉海粟、李可染、吳作人、關山月、傅抱石、石魯、黃胄、李苦禪、謝稚柳等近代當代大師、名家的作品（大多是畫家相贈的）五十幅義賣，將所得四百五十萬圓再次捐獻家鄉辦教育。我在報上見到這個消息，衷心感佩大光的高風亮節。

由於年事都高，身體欠佳，我們之間來往日少，不過我覺得，我們的心是時時刻刻相通的，尤其遇到重大關節事件時，更有此感。讀著他的這些文章，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加深了對同年友的感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光是一位不欲聲形的智者，在夕陽晚照中，他一直以一種寧靜的心態和目光，關注著黨和國家的今天和明天，既抱著美好的期望，尤懷有深深的憂忡。我相信，這部《文選》會給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得到史識，得到激勵，還會得到某些安慰和滿足。

二〇〇〇年四月

## 記住溫濟澤的最後留言

溫濟澤走了！延安清涼山的老同事、老朋友又走了一位。最近兩三年他明顯老態了，有時我也稱呼他：溫老。去世後的第三天，我到他家中，才知道是三月中因肺炎而住院的，四月十五日夜彌留前，白天還校閱了《口述傳記》的二校稿。我同他最後一次相聚，是今年二月七日的周揚紀念會。那天到會的有四、五十人，發言的多談到周揚的悲劇，對當年因所謂“異化問題”受到批判，導致冤死、氣死（陸定一語），很是憤慨。溫老發言，談自己的執行過立三路線，也談到應為周揚徹底平反，聲調很是激昂慷慨，這同他平時輕言細語很不一樣。會上每人發了一本剛出版的《憶周揚》文集，其中有溫老寫的《歷史新時期的周揚》，特別讚揚一九七九年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時，周揚在報告中說的：要允許自由討論。科學無禁區。科學思想不能聽命於“長官意志”，不能少數服從多數，應當允許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要尊重實踐的檢驗。一切理論和學說，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豐富和發展。

溫濟澤比我大三歲，但革命經歷卻早得多。他一九三〇年入團，三次被捕，受盡酷刑，坐過五年多牢，抗戰爆發後才出獄。他在獄中勤奮學習，攻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後，即在陝北公學當教員，編寫過《自然

課本)和不少科學小品文章。一九四二年他參加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的編輯工作，這本書後來列為十二本《幹部必讀》之一。一九八二年，根據黨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的精神，他又約請二十幾位同志參加，根據原本新編出《馬恩列斯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是一九四三年初從中央研究院調到《解放日報》副刊部的。“搶救運動”之初我被關入保安處，一九四四年六月提前釋放回到報社，同溫老才接近起來。感到時局的大變化即將到來，我們幾個人一起還復習過英語。我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初離開延安赴熱河的，從此就天各一方，隔行隔山。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到北京復職後，我們住到同一幢高樓，成為僅隔一層樓的緊鄰，於是經常往來。由於都歷經滄桑，都已進入晚年，共同的話題多，無論是議論形勢，回顧歷史，研究問題，臧否人物，都能毫無顧忌，深入交談，有時還互相通報非常重要的信息。

溫濟澤的為人，人所共知，確實人如其姓，既溫和又寬厚，很少見到他有過疾言厲色。因此，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鬥爭“補課”中，他在中央廣播事業局任副職時被打成右派，當時是很令所有的熟人大吃一驚的：這樣的老好人，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說，“從此墜入萬丈深淵，呼天不應，入地無門，簡直像在地獄裡、苦海中，自強不息地煎熬了整二十年。”一九七九年之後，他“像火山爆發似的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找回二十年失去的時光。”（引文見《告別二十世紀》）

還在社科院主持研究生院工作時，溫老即利用業餘時間組織一些老同志，編輯十卷本的《革命烈士傳》，從全國幾十萬、上百萬烈士中，選擇一千人立傳，工作是何等浩繁。他對所有的革命烈士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尤其關注瞿秋白的恢復名譽，因為他少年時是讀瞿的著作而投奔革命隊伍的。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寫過二十來篇紀念和研究瞿秋白的文章。“文革”初期，瞿秋白被誣衊為“叛徒”，八寶山的

墓碑被紅衛兵砸毀。一九八〇年，溫老組織二十幾位“志願兵”，成立一個虛設的編輯部，沒有辦公地點，靠電話聯繫，邊研究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邊收集文稿，一九八五年先出版《瞿秋白選集》，以後《瞿秋白文集》十四卷陸續出版。每逢革命紀念活動，他總要寫文章做報告，講李大釗、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的事跡，受到北京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要退團的青年，因聽到他的報告而不退了。據陳景潤說，他五十年代就受過溫的文章的影響。

一九八五年離休後，他以全力來編《革命烈士傳》。為指導編撰工作，編委會曾不定期出版內部《通訊》，以確定傳記預選名單的範圍等。為更好“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發揚傳統，繼往開來”，於是醞釀將《通訊》改為正式出版物，一個新的期刊《中華英烈》於一九八六年誕生。溫老邀我參加了籌備工作。他自任主編，我列名編委，十八個編委中如黎澍、廖蓋隆、方實等多為延安老人。刊物的重點放在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更注重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我常參加編輯部的有關活動，都是在溫老家中開會。創刊號刊載了我寫的《總理在我心中》，從而推動我寫作同類性質的文章。《中華英烈》創辦一年後，忽然要換主管單位，為此，溫老多次召開編委會，商討刊物的歸宿，最後達成協議，由文聯主管，得以生存。但是好景不長，剛剛穩定了一年，又遇到“全國刊物整頓”。於是，《中華英烈》成了一個斷線的風箏，不知飄向何方。為了使刊物繼續生存，七十五歲高齡的溫老，到處奔走，八方求援。一本宏揚革命精神愛國精神的刊物，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創刊四年後，竟兩易其主，還難以求生。不管有多難，溫老硬是挺著，請求新聞出版署寬延註冊時間，在無主管單位的情況下，保證刊物正常出版。一九九〇年，以蕭克將軍為首的炎黃研究會，接手《中華英烈》刊號，創辦了《炎黃春秋》。溫老以這個研究會副會長

記住溫濟澤的最後留言

的身份，任特邀編委，繼續關注這個刊物，在這個刊物上繼續發表許多有影響的文章。我也是這個刊物的熱心作者，參加一些有關活動。

溫濟澤同胡喬木有幾十年的密切關係。在懷念喬木的文章《良師·益友·同志》中，他深情地回憶了他同喬木結識的過程，從延安一直到社科院。文中寫到喬木如何驚訝他被打成右派，並與廖承誌一起設法挽救過。粉碎“四人幫”後，還沒有平反；喬木就讓他到社科院任職，負責科研局的工作，後來參加院黨組，任研究生院院長。文中說了一句：“像對許多人一樣，我也看到喬木同志有些弱點和缺點，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優點和長處。”一九九八年十一期《炎黃春秋》刊載的《真理標準討論中的一段曲折》中，他終於寫到胡喬木的弱點和缺點：“喬木談話變來變去，有時做事令人難以捉摸。在理論務虛會上，開始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時，他同大多數人意見一致，而當討論熱烈展開後，他的態度就有些變化了。”文章中還談到，他聽見喬木說過，“現在有些人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要批判‘共產主義渺茫論’。共產主義曙光已經冒出地平線，怎麼還能說渺茫呢？”他還聽別的同志說：“喬木說過，共產主義就在腳下。”他向研究生院傳達過喬木的這些說法，“引起一些人的詰問，我自己也開始懷疑：我們把社會主義建設成這個樣子，怎麼倒要批判‘共產主義渺茫論’呢。我不好直接去問喬木，但暗自下了決心，還是應該獨立思考，再不隨便盲從他人了”。于光遠說的“不但要斤斤計較，還要兩兩計較”受到批評後，他為之辨明：光遠是反對吃“大鍋飯”時說這話的。“按勞分配就應當看一個人的勞動成果，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不得食。我們不但應當斤斤計較，還應當兩兩計較。我把這次會上討論的情況告訴了于光遠，以後他自己到會作了說明，還寫了一個報告送給鄧小平同志。”溫濟澤也為黎澍鳴

不平。黎澍寫了著名的文章《論歷史的創造者及其他》，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似乎從無異議的命題，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新的成功的探索，卻被批評為“反對了毛主席”。關於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受到胡喬木批評這一大公案，溫濟澤在文中為受到處分的王若水和受到批評的周揚鳴不平，他談了此事的經過，談了周揚拍桌子同喬木的爭論。“我知道周揚對‘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早有研究。”“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前後一致的，他是我國研究‘人道主義’特別是異化問題的少數幾個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一。為什麼要如此大張旗鼓、大加鞭撻批判呢？周揚病已加重，氣憤難平。”

為國內有名的王實味冤案平反，是李維漢於一九八一年正式向中央組織部提出來的，認為王實味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李維漢是當年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負責人，溫濟澤和王實味都是該院的研究員。一九四二年整風時，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十一日，溫濟澤寫的鬥爭王實味大會的日記，曾在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後來康生插手，一九四三年四月將王實味逮捕，用逼、供、信的辦法，將王打成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和“五人反黨集團”的頭頭。一九八二年李維漢去世前，囑托溫濟澤找有關部門為王實味徹底平反。經過多年努力，除“特務問題”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集》的註釋中平反外；所謂“托派問題”，到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經過多方查證作出平反決定。一九九二年一月，溫老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在另一篇《為什麼這樣“左”》的長文中，他總結王實味冤案的六大教訓為：一、要解決歷史上對托派的錯誤看法。二、對敵情的過火估計（當年國民黨特務根本不可能混入黨內）。三、一個人說了算的主觀武斷的惡劣作風。四、群眾運動的鬥爭方式（鬥爭王實味搞了千



人大會，“左”風壓倒一切）。五、寧“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態。六、不願意聽不同意見的專橫態度。我認爲這六大教訓現在並未過時。

一九九五年，溫濟澤的自選集近六十萬字的《征鴻片羽集》出版後，送了我一本。全書共分四編：哲學·科學、新聞·廣播、歷史·人物、青年·其他。書中百多篇文章，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一九七八年以後寫的。作者在“自序”中說：“回顧我這一生，黨叫我幹什麼，就幹什麼；幹什麼，就鑽研什麼，就寫點什麼。因此，能業餘寫出這麼多東西，由於工作多次調動，我寫文章所涉及的領域也就比較寬廣。”這段話我有同感，好像代我而言。我的一生也是這樣過來的，我也有過二十年的“萬丈深淵”；一九七九年之後，我也“要找回二十年失去的時光”；我的絕大部分文章和出的十多本書，也是這二十年“新時期”中寫的。我與溫濟澤有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爲人處事原則，只是我沒有他那樣溫和、寬厚；我們都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文如其人，我們在文章中講的都是實話、真話，有的放矢，沒有空話、套話。這是我尊敬他、我們成爲好朋友的主要原因。去世之前，他寫了《告別二十世紀》（刊《炎黃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文章的末尾說：“我一生經過大小八十一難，得到了一部真經，這個真經就是：迎接未來世界的機遇和挑戰，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堅持創新，勇於創新。創新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創新是我們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的動力。人的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世界發展也是無止境的！”

這些話也是我想說的，我願意遵從的。希望我們大家尤其是溫濟澤的朋友們，都不要忘記他最後的留言。

## 繼承歐遠方遺志

“以文會友”，“一見如故”，正好形容歐遠方同志與我的相識。我們過去沒有見過面，近年來由於對一些問題的共識而接近，他寄我陳獨秀研究的期刊，還贈閱《安徽老年報》。去年他到北京，來我家中見到第一面又是最後一面。那天我還找到我的鄰居老同學楊純，他們在新四軍共事過，一起話舊並議論形勢。

這次來合肥參加第十四屆中華詩詞研討會。第一天在會場上見到鄒人煜夫人，她將“悼遠方”的四首七絕與我，讀罷為詩中真情感動不已。五十年患難相伴，突然永別，“琴聲戛斷失和弦”，怎麼能不“後行實比先行苦”！散會後，夫人同我談到，遠方有心臟病，一直忘病工作，去世前八小時還在寫文章，“扼腕豈因傷壽短，才思滿腹付東流”。戰爭年代和解放後，歐遠方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在宣傳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擔任領導。這方面我們有共同的經歷，其中甘苦與磨難自有同感。夫人簡要地同我到遠方一生的三大段：早年實現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可說是反朴歸真。從安徽省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聯誼通訊》（二〇〇一年第二期）“紀念歐公”的專輯上，十多篇老同事老朋友懷念文章反映，“喪失自我”的第二大段時間，他並非完全喪失，還是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而且盡可能地保護或照顧一些受難的同志，

大家都懷念他“爲人忠厚和善，作風民主”：“許多老記者、老編輯、老工人都熱愛歐公。”歐公晚年的輝煌，大家都共知樂道。他的“博學多才，敏於思考，勤於鑽研，厚積薄發”，在晚年得到充分的發揚和發展。這是一個不怕死的老頭，利用一枝筆，爲中華民族百年向往的民主與科學的實現而奮鬥不已。他反復研究《共產黨宣言》的實質，就是要求得個人和人類的自由化、民主化，丟掉老祖宗這一追求，就不是真馬克思主義。雖然遭到某些“左爺”的責難，他一笑置之。

夫人談道：在最後二十年，遠方日夜所思、盡付筆端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上述爲馬克思所追求的國家要民主化、科學化，如何得以實現。二是，“常憂風雨問民情。”他非常關心並了解農村情況，認真總結過去這方面走過的彎路。去年曾爲糧食又回到統購統銷，向中央作過建議。可是“直言招得權人忌”，他也不以爲意。聽說現在又逐步改過來了，他也就心安了。三是重新研究黨史上的一些重大舊案，反復查閱資料，組織座談，寫出文章。如對陳獨秀問題的重新探討，追究歷史原貌。陳獨秀晚年回歸民主科學，批判斯大林的錯誤，過去不爲史界注意，現在也正還歷史以公正。關於項英的問題，也作同樣的努力，認爲當年下結論太快了。

重新研究認識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大彎路的老同志和專家學者是很多的，但從理論到實際，作深入全面的清理與研究，得到大的成果的，卻不很多。因此，我們對歐遠方同志的突然辭世，感到深深的痛惜。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於合肥

# 哭慎之

一九八二年在玉泉山認識李慎之。我們都在為十二大服務，他在政治報告小組，我在人事小組。大概由於有相似的坎坷經歷，一致的思想看法，還有共同的朋友黎澍，以後就逐漸交心，無話不談了。我每寫了重要文章，必請他先過目。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論，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孫行者在八卦爐中煉成火眼金睛一樣，使他對歷史、對現實、對中國、對世界，能擺脫習慣的成說、定論，作更深刻的思考，他每寫成一文，也必寄我，每每給我以啓發。他的著作多真知創見，有理論深度。這大約也就是每一次災難都以歷史的進步來補償的一例吧。他的逝去，不只是我失去一位至交，更是理論界難以彌補的損失。這十來天，天天向他家中探聽病情，總有一線希望。昨天上午終於傳來噩耗，痛心至極。暫寫這幾句話，吟得一絕一律，向你告別。慎之，你放心，我們會永遠向前。

痛感始皇難絕緣，晚年拼命講人權。  
曾經一語當今勸，思想領軍永向前。

君有奇才未遇時，古稀方得展雄姿。  
學兼中外多新解，思貫古今少舊辭。  
敢逆潮流培氣骨，豈依權貴弄胭脂！  
天公不假斯人壽，春雨滂沱哭慎之。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 附：慎之來信兩封

李銳同志：

今早枕上忽然想到你正在起草的信中，似不妨加上前兩年我起草而未發出的信上的幾句話：今年又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其實已為他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定下了中國現代化的三個目標：一、民族獨立——民族主義；二、發展經濟——民生主義；三、建立民主——民權主義。不過國民黨腐敗無能，這些目標只能由共產黨來實現。結果是：一、毛澤東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完成了第一個任務；二、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中國已走在解決第二個任務的正確道路上。現在只剩下民權主義這個最艱巨的任務要我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來完成。

我的原稿一時找不到，上面的話寫得有些囉嗦，但大意是不差的。如能加上，則一，不但有利於打動“核心”；二，一旦發表引起海內外反響之後，將使此文件具有歷史意義，過五十年一百年，將愈顯其光芒。不見“新民主主義”已失其魅力，而三民主義正日耀光華乎！

匆此，請酌，即致

敬禮！

李慎之

二〇〇一年四月六日

李銳同志：

四月份的那個建議書，最後放了啞炮，我至今懔然。

我以為以你的地位和名望，完全可以單幹，千萬不要再拉什麼人聯名了。否則“築室道旁，三年不成”。

“七一”以前的好時機，既已錯過。但是時機還是會來的。申奧成功是推動中國改革的一大助力，加入WTO更是如此，而“七一”前後的兩個月“無恥大吹牛”也提供了不少口實。所以我建議你在十一前後，以上次未用的文本為基礎再次以個人名義發出建議，一定可以有大的影響的。

我本來希望的就是你。

李慎之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慎之來信兩封

## 《千紀相迎總是春——馮蘭瑞傳記》序言

傳記的主人比我晚幾個月到延安，那是一九四〇年，都在中央青委，住在大砭溝口的一個山頭上。蘭瑞是從重慶來的，原在當地青委系統做地下工作。我原在湖南省委組織部兼省青委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到南方局開青年工作會議，馮文彬、胡喬木從延安到重慶來指導，會後喬木到湖南檢查青年工作，由我伴行。由於在湖南有些“暴露”，南方局調我去延安，又與喬木同行，就被留在中央青委了。一九四一年，蘭瑞去了中央研究院，我到了剛創辦的《解放日報》。以後就沒有碰過面，後來知道她同李昌結了百年之好。這樣，我們都同中央青委的老關係結了緣，如胡喬木、于光遠等，晚年我同馮文彬還有一段工作關係。

一九七九年一月，經過二十年“打入另冊”生活後，我回到北京平反復職。於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同中央青委的一些老關係又碰面了，真是舊緣結新緣，其中就有蘭瑞。她同光遠都在社科系統，屬思想戰線；我雖然依舊“務實”（在電力部、組織部），由於好“舞文弄墨”，且喜回顧歷史，就來往起來。如蘭瑞所在的經團聯的活動，我常參加；也參加他們主辦的一些座談會；還到馬列所開過會，有次隨意提過一個建議：編一本書《假如馬克思還活著》。

真理標準討論、理論務虛會等，我都無緣參加，且其間種種內情和爭論是知道的。“文革”後期，蘭瑞在國務院研

究室工作，胡喬木是領導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儘管室內有人立即向江青寫信，揭發鄧小平的種種言行，光遠和蘭瑞硬是頂住了。粉碎“四人幫”後，蘭瑞更是積極參加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先鋒行列，尤致力於經濟領域的探索，同一切來自“左”的干擾抗爭，決不退讓。“四人幫”曾詆毀按勞分配，認為這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爲了從理論上澄清這種謬論，關於按勞分配問題，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北京經濟學界舉行了四次討論會，蘭瑞與蘇紹智除參加會議外，還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多篇文章。理論務虛會時，他們兩人有一個聯合發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寫成文章在《經濟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兩位“理論權威”橫加指責，說是此文“否定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多次開會組織批判文章，而且不許發表作者的反批評。當時有“三中全會以來第一個割理論喉管事件”之稱（這時張志新臨刑被割斷喉管之事剛剛報導）。其實文章的問題確是觸犯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言行：主要內容在批評了那種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不妥當的。其不當在認為整個過渡時期都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於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還要大搞階級鬥爭，而不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以致二十多年都沒有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樣就必然過早地消滅個體經濟、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甚至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等，終於挫傷群眾積極性，破壞生產力。後來直到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對這篇文章的無理指責才告結束。正是由於這類“不服管制”的情況時有發生，蘭瑞所在的馬列所幾乎被兩位“權威”撤銷，她曾爲此直接向鄧小平、胡耀邦寫信申訴。二十世紀八



十年代初期，關於這個“階段”問題的爭論，以及馬列所將被撤消事等，蘭瑞都來找我談過，給我看過有關文章和資料。

我們今天走上的這條改革開放的道路，定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是並不平坦的，是二十多年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方面，有人說過，是在“批判——沉寂——活躍”，“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躍”，這樣的周期中度過的。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過去發展到十年浩劫折騰得還不夠嗎？關鍵還是鄧小平說的：“左”是根深蒂固的，這是一九九二年說的。在批判“兩個凡是”時，鄧小平就說過：“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社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能聽黨的話嗎？他們一遇機會就會出來折騰的。”事實證明，現在不是還有批鄧這類的“萬言書”出現嗎？他們實質上是堅守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神經特別緊張，總認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要造成一個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他們偽善，他們決不認輸；他們將自己打扮成“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世人面前以“權威”自居；他們的目的是使人失去獨立人格，不會獨立思考，盲目服從他們的指揮。總之，他們仍習慣走毛澤東晚年的道路。他們發動類似“文革”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鬧了二十八天，被中央制止下來。他們決不死心，隨即利用習慣的正常思維，打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子，來反對他們的“眼中釘”，對真正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實事求

是的人，必須除之而後快。

不管這二十來年中，出現過多少曲折甚至是令人寒心的曲折，歷史終歸不可能走回頭路了。十年浩劫之後，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終於出現了大批敢於解放思想、面對真理、實事求是的老中青三代人，蘭瑞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事跡在這本傳記中有比較詳細的敘說。她是經濟學家，更是思想戰線的英勇鬥士。從五十年代開始，她從事經濟理論工作：一九八六年離休後，發表論著八十三篇，出版專著四部，共約一百五十萬字。她的研究工作一直圍繞著經濟活動的主體——勞動者這個主題，包括勞動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勞動者的就業、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等。她常下去作調查研究，其著作不僅是理論的，也是實踐中的。一九九一年，她負責的課題組出版了《論中國勞動力市場》一書，被譽為國內外首次系統地論述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市場問題的專著，獲得馬列所優秀科研成果獎。一九九六年發表的論文《中國的第三個失業高峰的情況和對策》，國內外報刊轉載引用已知的達三十多家，並於一九九七年獲《新華文摘》第一屆“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獎。

蘭瑞每有新著面世，總忘不了送我一本。我出的書，也常送她和李昌老友指正。她的辛勤耕耘總是向前看，我卻常朝後看，當然目標是一致的。我常感到，當年從大後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夠像蘭瑞這樣，如此英勇奮鬥，決不向“左”的權勢彎腰，在學術上獲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蘭瑞今年八十歲了，但她決不像一個“老太婆”，她的“八十自壽”（刊《文匯報》八月十七日）詩這樣自語：“幸喜老來仍銳氣，豈憂夕照嘆黃昏。”希望她筆耕不綴，續有新作問世。

如果說延安時代我們這些人憑的多是青春的激情，今天飽經滄桑的我們，靠的則是理念和成熟了。我們為國家富

強、人民幸福奮鬥終生的理想和信念沒有變，當年的熱血依然；而且我們對世界變化，人類前途仍持樂觀態度，正如蘭瑞自壽詩最後兩句：人間信息全球化，千紀相迎總是春。

## 《一個老共產黨人的世紀思索》序言

本書作者鐘沛璋只比我小七歲，也是快八十的人了。我們有大致相似的經歷，即青年革命，中年坎坷，老年反思。因此，我們雖然相識較晚，卻願應命為本書寫序。

收集在書中的十五篇文章，大都屬於老年反思，讀來特感親切。我們是二十世紀過來人。這個世紀是人類歷史空前巨變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兩大陣營對抗，科學技術空前發展，新經濟方興未艾；進入信息時代，經濟日益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成為人類共識。大家知道，所有這些變化都曾經和正在影響我們這個古老國家，可說無人不受影響，尤其知識分子。我們過去的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歡樂與痛苦，光榮與羞愧，尤其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同後二十年其間的根本變化，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所謂反思，即我們所經歷過的這段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從理論到實踐，確應查清楚弄明白，這樣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否則，就還會扭秧歌前進。甚至還可能走彎路。

從時序上說，作者反思最早的是有關魯迅一九〇七年的文章《文化偏至論》（見《心與誰相通》——從魯迅想到毛澤東、馬克思）。魯迅親身感受到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非人的世界，人永遠只是在亂世之奴和盛世之奴來回顛簸，痛感奴隸們的麻木不仁；認為中國在新世紀要“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其首在立人”，即“尊個性

張精神的立人思想”。作者查出魯迅當年在日本接觸過《共產黨宣言》，魯迅如此重視個體人的精神自由，同馬克思最根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宣言》中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全面解放，從物質自由到精神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追求。可是，五十年代出版的《魯迅全集》，對《文化偏至論》有批判性注釋，認為文中有錯誤，“尊個性張精神”屬於尼采的資產階級觀念。大家知道，毛澤東在延安曾多次高度評價魯迅，是“中國第一等聖人”，是文化新軍最偉大的最英勇的旗手，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者說：“在我們見到的毛澤東對古今中外人物的評價中，沒有見到第二人受到過這樣高的評價。”令人想像不到的是，作者在文章開篇卻引用了這樣一件發人深思的事實：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曾在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特去看望，向毛提出一個大膽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羅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了。（引自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於是作者認為，毛澤東的心同魯迅的心其實是並不相通的，同馬克思的心也是不相通的。因此，《共產黨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思想，在中國長期不被重視，個人自由一直被認為是不好的東西；一篇《反自由主義》曾被作為整風的經典文件；新中國剛一成立，為破滅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幻想，要批判“民主個人主義”；從批判胡風的主觀精神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從“反右派鬥爭”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無不是要整掉知識分子個人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作者引用了王申酉的一句話，“為什麼青

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與禁錮著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他走上政治舞臺後，卻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從而感慨道：從傳統文化中的核心“三綱五常”，到以革命的名義宣傳做“螺絲釘”、做“馴服工具”，是一條長長的繩索，把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個人發明創造都緊緊地束縛住，使我國人民長期處於龔自珍所哀嘆的“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使孟子所鼓吹的“民為貴”成爲一句空話。甚至改革開放之後，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仍可嚇得許多人紛紛作檢討。

作者認爲：“人類社會運動的發展有其極複雜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們對它的認識只能是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修正的過程。”發表《共產黨宣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終止他們的認識和探索，直到他們生命結束之前，還不斷在實踐中修正和發展他們的理論。因此現實中不存在絕對真理和終極目的”。作者對二十世紀世界變化的情況，我們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盡自己的認知作了一些簡要的回顧，並對今後應當遵循的客觀規律，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提出如下一些看法和意見：

——關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馬克思當年過高地估計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沒有看到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和克服危機的可能性。”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勞動者擺脫了人身依附狀態。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規定，一切公民都有言論、著作、出版的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又爲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現代資本主義中，存在著許多社會主義的因素，如社會福利、反對壟斷、高額遺產稅、經濟活動中的聯合與跨國化、全球化等等。“當代資本主義正張著兩個翅膀在飛翔，一個翅膀是改革，一個翅膀是高新技術。”因此，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同社會主義更接近了。列寧批評民粹主義

和無政府主義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毛澤東在“七大”時也說過，資本主義在我國必須有廣大的發展，才能建設社會主義。“遺憾的是，後來列寧和毛澤東在實踐中並沒有這樣做”。我們長期以來形成一種“恐資病”，談資色變，連農民的一點自留地都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堅決割掉。在思想領域還搞什麼“狠批私字一閃念”。結果是把自己緊緊地封閉起來，隔絕於世界之外。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歷的挫折和失敗的教訓是什麼？最根本是兩點：一是必須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任何形式的主觀主義。種種慘痛的挫折和失敗，無不是拒絕科學、拒絕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知識，而以“美好的願望”，“革命的名義”，推行空想的、烏托邦式的農業社會主義這種主觀主義造成的。二是必須反對專制主義，實行黨內的國內的民主。過去主觀主義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禍害全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根本原因是在全黨全國大行專制主義。“共產黨實行的還是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長期一人說了算，容不得有不同意見。沒有監督，沒有思想自由，沒有創新和發展，中國就沒有希望。”

——還要學會民主。中國只有專制主義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民主的思想也是從西方來的。美國的憲法“主權在民”，“大權不可獨攬”，是用來規範政府的行為的，而不是管老百姓的。西方國家自文藝復興之後，越來越重視人的權利，人的解放，發展了民主制度，使科學技術蓬勃發展起來。作者深深感嘆：曾經“苦於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中國人民，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卻要把民主、自由、人道等人類文明成果，都作為資本主義的毒草，拒之門外，而對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概看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不斷地要他們“脫褲子”，“洗澡”，“思想改造”，以至“知識越多越反動”，對“臭知識分子”要不斷進行批判鬥爭。二十世紀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表明，現代化必須具備三方面的條件，即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發展。“經濟發展後仍維持專制體制，必然導致腐敗。現在嚴重的腐敗現象在腐蝕著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以至整個社會。政治不改革，中國往何處去，就沒有正確的保證。”作者認為蘇聯瓦解有兩大教訓，除沒有發展多種經濟，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導致經濟失去活力外，就是搞專制獨裁，不搞民主，且制造大量冤案，殺害大批精英，從而失去民心，紅旗落地。

幸運的是，作者上面這些看法和意見，有機會同江澤民總書記當面談過（見《與總書記一席談》）。他們一批上海交通大學的老同學，應邀於二〇〇〇年年尾的一天，到江的家中談了大半天。總書記預先出了三個題目：怎樣看資本主義，怎樣看十月革命，怎樣看當前的問題。同去的老同學王嘉猷，還是江的入黨介紹人。這次長談的結尾，他們強調了必須實現民主憲政，“就是要改天換地，徹底結束我國長達幾千年的專制統治制度的陰影”。目的就是要使“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得到大發揚”，使我國社會成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真正達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境界。有了民主憲政，真正從人治轉到法治，人民就不難選擇出他們能夠放心的各級領導人，就可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民主憲政還應該藉鑑外國成熟的經驗。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給人民以思想自由。“一個民族是否有希望，首先在於是否有活躍的思想，蓬勃的創造力”。因此，實施民主教育，要從少年抓起，培養公民意識。“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呼喚民主，盼望民主，而事實上，對許多人來說，又不知道民主為何物”。“中國人民只有通過‘立人’與‘立國’，才能在世界全球化



的過程中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所有的“世紀思考”，還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己兩次工作經歷有關。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他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當了四年局長。深感我國多年形成的封閉而高度集中的新聞體制，必須向開放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聞體制改變。經過調查研究，新聞事業現狀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報紙一色化，報導宣傳化，輿論一律化，訂閱公費化。回憶劉少奇講過的一句話：“一九五八年的浮誇風，誰要負責？黨中央要負一半，報紙也要負一半。”他向新聞界宣傳胡耀邦的觀點：要把講真情、講實話、講真理作為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他多次建議，黨政分開，設立國家新聞出版社。他贊成報紙既要重視黨性，又要重視人民性。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遭到胡喬木等人的反對，胡提出人民性是錯誤的，黨性是新聞工作的靈魂，是新聞工作壓倒一切的原則。於是就出現了訓斥周揚“反中央”和撤換《人民日報》領導班子的事件。

九十年代，作者曾主辦《東方》四年，這是民間團體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的會刊，宗旨在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成爲一個既獨立思考、獨立言論，又相互寬容、相互理解的研討班。”這個刊物在知識界受到普遍重視。可是一九九六年，刊物卻被指責爲“自由化傾向嚴重”，如不扭轉，“就必須堅決關閉”。此事就關係到我同作者的相識了。爲評介顧准和《顧准文集》，我應約在該刊一九九六年第二期，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刊在卷首。作者說：給《東方》引起更大麻煩是兩件事。一件是《東方》刊登一組紀念顧准的文章（另一件是禁止刊登一組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的文章）。有些人看了就很不舒服，認爲對這樣一個人爲什麼要作如此宣傳。特別是李銳寫的《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中說：“馬

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也有空想。”“馬克思哪些是對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搞對了哪些，搞錯了哪些；到底是什麼問題，理論問題還是實踐問題，不弄清楚還會犯錯誤。”對這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科學態度，有些人看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馬克思主義。於是，這年第六期以後，《東方》就遭到“停刊整頓”的處理，作者也就辭去社長兼總編輯的職務。我本人也由於這篇文章發生過一次短暫的風波，經過我的反擊，立即平息。其情我寫了一篇文章：《小風波與大悲哀》及附件《關於〈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的答辯》（收入《李銳反“左”文選》），這裡不加贅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深圳召開的“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研討會上，我有個題為“溫故而知新”的講話（也收入上書），其中談到，歷史和現實確在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要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後者來源於前者），也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也同馬克思主義有關）。過去我們對資本主義尤其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認識不清楚的，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也是認識不清楚的。當代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並無“你死我活”之爭；這兩種國家相互之間是可以求同存異、協調共處的。這些問題從理論到實踐是必須弄清楚的。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如何善處當前，作者同我有許多共識，因此，對他的這本書作了上面這樣一些介紹。

二〇〇二年四月八日

## 《黎澍集外集》序言

這本收錄了黎澍遺稿的集子，有利於思想解放，要了解和研究黎澍是非讀不可的。

集中所收錄的主要是不見於黎澍已出版的文集的文字。這些文字大多寫於一九七八年以後，半數以上未曾發表過，這主要是由於其內容當時還屬於“犯忌”一類，難以被報刊採納；也有的本是在內部講的意見，一時還不宜或不需對外露布。這兩類文字所議論的多是相當重要甚或相當尖銳的問題，對研究黎澍思想尤具價值。

黎澍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他的思想最為活躍，對現實、對歷史、對世界的思考和認識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時他已痛感有必要對自己以往的認識來一次再認識。一九八四年，他以“再思”命名自己的文集，意即在此。

不過黎澍自己並不認為他的認識已是到“底”了。黎澍當年為他的文集取名時有意不用“反思”而用“再思”，就是為避免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經過這樣一次反復，認識已經完成，真理完全在握了。《再思集》的“作者說明”中說得很明白：

“再思”也只能是認識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片斷”。經過實際生活的檢驗，勢必又要發現種種不足，還要三思。事實上本書輯錄的文章已經顯示出這種必要，說明認識的正確性只能是暫時的、相對的。究盡真理，永遠是不可能的。

這一段講的不是作者假作謙虛的套話，而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實際過程。就此而言，黎澍確實掌握了認識的規律，他由自己的切身體會，才能做到不折不扣地“破除迷信”。

經受過“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凡是願意思考、有歷史責任感的人，都不免要回過頭來，對自己原先相信甚至是堅信不疑的東西進行一番審視，從中得出某種新的認識。能夠作這種反思的人當然不少，但黎澍的反思與眾不同，要深刻、徹底得多。他思想的鋒芒所指，不僅僅是某個具體問題或某條理論公式，而是觸及指導、規範我們所有人的思想、行爲的根本理論原則和規章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環境。他於一九八八年九月曾說，他在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兩件事：“在思想上反對封建主義，在理論上批判教條主義。”（《黎澍十年祭》）

何以要“在思想上反對封建主義”？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忽視了封建專制思想影響的嚴重存在，習慣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只是奉命批判、否定資本主義而不知其他，以為這就是所謂建設社會主義。反對封建專制之所以至今還是思想政治上的一大工程，不僅是唯上命是從、還在繼續造神的舊習難改，根子還在教條主義，即以簡單的方法在生搬硬套“本本”上的社會主義。所以，黎澍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為其《自選集》寫的序中又說，他的這本書的“要義”，“就是在這裡開始對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問題”。

提出了什麼問題？批評“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命題，是重要的一個；“重新估價階級鬥爭在歷史中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個。如果天假以年，相信黎澍一定還會提出一個又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使教條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和偽科學原形畢露。

從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就在提出重新認識階級鬥爭問

題的同時，黎澍還說了以下一些話：

建國以來我們把那些根本不符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認識、觀念、理論認做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把它奉為絲毫不可更改的主臬，人們對此習以為常，覺得無隙可破。但是這些認識、觀念、理論給國家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意識形態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至今還沒有人做過細致的研究。

如果任憑那些實踐已經證明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社會實際的理論冒充馬克思主義，或者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等人那些失去真理性、不適用於中國國情的結論、觀點，那麼發展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句空話。

馬克思、恩格斯的話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話本來就不是真理。有的話從前是真理，經過時間考驗，現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社會科學的理論沒有永恆不變的絕對真理，越是固止不動的，就越說明潛積著異已的力量。（《重新估價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試問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除了黎澍，還有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發表過這樣振聳發聵的議論，做到如此徹底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呢！

這本文集也收錄了很少幾篇寫於建國初期的文章。從這些舊作中可以看到，黎澍以往確為他自己所說曾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的宣傳者”，在思想、觀點上也有著同別人一樣的局限。但同時這些文章顯露出重視事實、尊重歷史真實和不尚空談的風格。文如其人。尊重事實，不說假話，不說套話，不悖良知，可以說 是黎澍的本性。就是在極左的路線的嚴重統治下，他的這種本性雖受到壓制，仍時時表露出來，以致為自己招來種種災禍。

例如，據我所知，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黎澍公然不同意將本單位年輕人徐宗勉（當時是胡繩的秘書）定為右派分子，因為他知道徐只是在黨小組學習會上講了自己的一些

想法和疑問，以供討論，不屬於什麼“右派言論”。結果他被指責為政治立場右傾，遭到不止一次的批判，並被下放到安徽無為縣農村“受教育”。從此，他在政治上不再受到上面的信任。

又如，六十年代初，黎澍發現已“摘帽”的原北京大學右派學生沈元的歷史研究文章寫得好，便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了沈元的文章，並通過正常組織手續將沈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料此事引來一場風波，有人甚至寫信給毛主席告狀，說不該重用右派。沈元因此遭殺身之禍，黎澍再次受到很大壓力。但同情他的老友也不少，他們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寫了一個報告，使此事不了了之。

隨後，黎澍又發表了《讓青春放出光輝》一文。此文因其鼓勵青年刻苦鑽研、奮發有為的內容，在社會上特別是高校學生中受到廣泛好評，卻受到中宣部和學部的嚴厲批評，罪名是鼓吹“白專道路”，反對“政治掛帥”。據黎澍自己說，此文的根本涵意在暗指政治運動搞得太多了，對培育人才，發展科學文化十分有害；應當提供條件，讓年輕人有充分的時間和自由去學習、鑽研科學文化，奮發有為，發明創造，為社會做出貢獻。因此，說這篇文章反對“政治掛帥”倒也並無大錯。當時所謂的“政治掛帥”，說到底就是用人造的愈來愈嚴重的“階級鬥爭”來壓制個性，摧殘人才，維護政治專制，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黎澍用曲筆來反對這樣的“政治掛帥”，恰恰是他一貫尊重實際，愛護青年，珍惜人才，憂國憂民的表現。

不久前故去的唐振常先生所撰《黎君墓表》有言：“學生求真求是，權威非盡信，勢力不能移。”這是對黎澍偉大人格的很好的概括。我認為，黎澍的這種人格不僅表現在治學上，也體現在做人方面，這是最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

二〇〇三年三月一日

## 附：關於黎澍幾篇詩稿的解釋

為編黎澍的《集外集》，徐濱夫人找出我們兩人相互祝壽的詩稿和他的另外兩篇詩稿，讓我寫點解釋。

一九八七年我七十歲，澍兄七十五歲。他先送我一首五律，向我說未定稿；就如這次我看的三頁詩稿寫的，其中五句互有改動。徐濱於一九九五年曾從舊檔中找出澍兄用兩尺宣紙寫好的贈詩，題款“李銳吾兄壽晉八句”，落款並蓋章（一九八七年四月）。由於還在推敲之中，所以沒有送給我。我即予裱好，加上如下附語：“徐濱夫人近日從澍兄遺物中檢出此件與我。此詩當年似未定稿，澍兄曾書於紙片示知。第三句云：‘曾經風浪惡’（宣紙寫的是‘曾經波浪闊’）；末句‘愈老愈英雄’（宣紙寫的是‘發奮更爲雄’）”，即為現在正式發表的定稿。

一九八七年年尾，我寫贈澍兄祝七十五壽辰的詩，同後來發表的也有三個句子中的文字小有出入（發表的也有兩個版本：一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寫的悼文《最後一天的書案——哭黎澍》，二見一九九五新編《龍膽紫集》）。當時我寫給他的稿子中在第三、七、八句的旁邊，用鉛筆寫了另外的句子，大概是當時讓他推敲的。

除開相互祝嘏的詩稿外，另外兩篇詩稿當是澍兄八十年代住在木樨地時寫的。其一寫三聯書店。抗戰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生活、新知和讀書生活出版社三家書店，為便於進步人士出書，各自獨立運行，但都備受國民黨政府壓迫，常

遭封店、抓人，乃至有幾位同志被殺害。當時鄒韜奮、艾思奇、薛慕橋等人的著作，極受讀者歡迎。國統區三家書店後來都被封殺，只剩重慶一家。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三書店遷回上海，於一九四八年合成一家，用“三聯”牌子，一九四九年後“三聯”由人民出版社統一領導。一九八五始恢復獨立建制。

抗戰初期，黎澍在湖南、桂林從事新聞工作。皖南事變後，他同國際新聞社總社撤退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和許多民主人士從九龍輾轉到達東江游擊隊，曾同茅盾、韜奮等在深山密林中居住過，自然結下了友情。鄒韜奮（一八九五—一九四四）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九二六年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備受社會各界歡迎。一九三二年創辦生活書店。一九三三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後，在國民黨政府迫害下，流亡海外。一九三五年回國後，主編《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報》等，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九三六年，與沈鈞儒、章乃器等“七君子”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抗日戰爭開始獲釋。由當年地下黨護送，他於一九四二年到達蘇北解放區。一九四四年病逝後，中共中央接受其遺書中的申請，追認為中共黨員。已有《韜奮文集》面世。黎澍想起了三聯書店，想起了抗戰初期的那一段戰鬥生活，自然就想起了三十年代起，中國進步書報刊的領頭人物韜奮先生，認為那一支筆勝過戰場的幾個師。作詩時，可能澍兄還想起了自己在成都《華西晚報》工作的經歷。他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奉命到晚報任主筆的，住在一個破廟中，生活極其艱苦。陳白塵主編的文藝副刊除經常刊載葉聖陶、張天翼、吳祖光、郁風、丁聰等人作品外，還刊載郭沫若、茅盾、夏衍的文章。一九四五年四月，晚報編輯部還遭到三青團一群人的打砸搶抄，乃至停刊兩天。正當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時，黎澍連寫幾篇社論，要求立即取消新聞檢查制度。到

附：關於黎澍幾篇詩稿的解釋



這年九月十二日，由國民黨宣傳部長吳國楨出面，宣布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制度。這年年底，郭沫若曾寫了一首七絕贈《華西晚報》：

五年振筆爭民主，人識華西有燭龍；  
今日九陰猶慘淡，相期努力破鴻蒙。

郭沫若把國統區的西北角喻為日照不到之處，把《華西晚報》喻為照亮黑暗的燭龍（典出《山海經》）。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四日

## 感懷趙樸老的厚愛

五月三十日上午，到八寶山向趙樸老遺體告別時，見到擁擠的人群，歸途車輛仍絡繹不絕，深深感到他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和諧精神，仍在撫愛眾生。

趙樸老長我十歲，我得到過他的厚愛。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剛回到北京電力部復職，《人民日報》文藝版滿版刊載了我的《龍膽紫集》獄中詩詞約二十首。劉瀾波（電力部部長）這時正與樸老同住醫院為鄰居，大概是從瀾波口中知道了我這個人的坎坷經歷。我本來是詩詞的門外漢，於是得以向老人求教。集子的“初版後記”中說：“稿本在北京最初得到趙樸初、錢昌照二老的謬獎，他們還提出刪存方面的意見；並蒙趙老題贈《臨江仙》詞。”油印稿本四百多首，長詩頗多，蒙趙樸老一一審閱。關於“厚愛”，見於他的這首“臨江仙”題詞：

不識廬山真面目，幾多幽谷晴峰，只緣身在此山中。峰頭剛一唱，谷底墜千重！度盡動波才不減，詩心鐵壁能通，莫將此道比雕蟲。血凝龍膽紫，花發象牙紅。

這首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題的詞，榮幸地印在第二年出版

的《龍膽紫集》的卷首。當年舊詩詞可說還剛復活，此集印行兩次，共一萬三千冊，這當然同這首詞的謬獎分不開。我的一首《蝶戀花》寫秦城獄中有感：“修得京郊山下住，十二樓台，百二圍垣處。旦暮唯聞鴉雀語，堂堂歲月滔滔去。來日嬌楊成茂樹，短短頭毛，推落霜如許。心事翻騰誰可訴？壯懷付與雕蟲句。”想必這首詞引起閱稿者的感嘆吧。趙樸老告訴我，象牙紅長於喬木，花似小手指，是抗戰時他在四川見到的。幾年後我到重慶時，找到這種大樹，還摘了一朵拿在手上，拍了張照片。《龍膽紫集》新編本（收入一九八〇年後的詩作）出版時，一九九二年九月，趙樸老又重寫了這首詞，在附語中說：“此十三年前奉題龍膽紫集之作也。頃李銳同志與余同住北京醫院，云將再版，囑重書之。”現在這個新編本的再版（增加近年詩作）又交出版社了，趙樸老的題詞將永遠為這個集子增光。平時同趙樸老無緣接觸，他住醫院時，我去看望過。一九九七年十月因病住院時，趙樸老也同住在四樓。我的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有這麼幾句：“趙樸老夫婦來，稱讚《發言書》（指我列席十五大的書面發言，後在刊物上發表了），並覽《八十自壽》（共六首）。胡耀邦逝世時，他躲到上海，大哭兩場。”十月二十一日的日記：“四點醒來，折騰一小時後復又睡著。六點一刻起床。折騰時吟得一絕，謝樸老關懷後學：已銷寒氣沐春風，緣結詞壇主將翁。兩度關懷《龍膽紫》，巴山猶憶象牙紅。”這首詩我已記不清當時是否即寫好呈送給趙樸老了。好在這首詩和附記說明原委，已刊印在今年五月出版的《李銳詩詞本事》中。這是湖南友好從《龍膽紫集》和近年詩作中選出二百六十餘首，作有關本事說明，“既是一種詩話性質，又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傳記”。趙樸老那首《臨江仙》詞，仍刊在卷首。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趙樸老知道我也喜好書法，曾寫了兩首詞送我：“小令二首，前者何滿子，一九六

七年八月七日作；後首桂殿秋，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

悄悄非關多病，三年不見東山；花事綢繆風又雨，  
更兼蜂妒鶯讒。終信曉珠天上，照地紅艷千般。

持舊句，伴新詞，和心和血祭豐碑。喜看今日明霞  
起，紅艷千般照四陲。

從這兩首詞，可以想見“文革”初期和“四人幫”覆滅  
後，趙樸老的心情。這幅珍貴的墨寶常懸掛在我的房中，現  
在更是一種特殊的紀念了。

二〇〇〇年六月

## 幾面之交懷鄧老

鄧廣銘先生大名久仰，但緣慳一面。這也難怪。他是著名學者，歷史學家，而我多年做著開發水電的事情，可謂風馬牛。由於性喜文史，終在離休後有了見面之緣。

緣分還要從一篇文章說起。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齊白石一百二十周年誕辰，家鄉各界舉行紀念活動，並在湘潭籌建紀念館，我捐了一幅有關書畫，還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文中談到，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路過北平，購得黎錦熙、胡適、鄧廣銘合編的《齊白石年譜》，“對於這一位從細工木匠自學成才的藝術大師，對於他潛心繪事敝屣尊榮的風骨，敬仰之情不覺油然而生。”文章末尾寫道：《年譜》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商務出版的，已經很不容易找到。“我以為很值得重印。不知編者中的鄧先生是否有意於此：將白石老人晚年事跡補寫進去，使成全璧呢？”這本《年譜》約三萬字。鄧先生在跋中談及，為了補充資料，他曾從老人朋輩的著作中去搜集，找過王闓運、瞿鴻禨、陳師曾等八個人的詩文著作，包括湘綺樓日記和全集，結果所得有限，全未採用。由此可見鄧先生治學之嚴。我在文中的這個小建議，先生想必看到的；我完全不了解先生多年來從事的業務和著述，這種“建議”自然是過於隨意性了。先生去世後我才收到的《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書後所附的“著述目錄”中，一九四九年並無《齊

白石年譜》記載。

能有幸與鄧先生相識，是近幾年的事情。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後，有過一些聚會活動，如為年高德劭的學者做壽，有規模較大的宴會，在這種場合，必同鄧老見面握手，互相問好，或交談幾句。我聽人說過，他很稱讚我寫的《廬山會議實錄》，認為是“真正的史筆”。有一次他還當面對我說：這本書是記當代史事的“第一本書”。

我不是治史的人。但回顧當代的曲折歷史和一生的坎坷經歷，所見所聞所感，覺得有責任如實地記錄下來，也便是史，至少可稱之為史料。對於這些史料，我有我的認識，評析得失，這就涉及史識。我深知治史之難，尤其當代史事，必須屏除各種顧慮雜念，乃至干擾，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一有諱飾，便非信史。而中國向來的歷史，最大的問題就是塗飾太厚，以致後人治史，要花很大的力氣作去偽存真的工作。鄧先生一生學問的著力處，可說就在求真。例如他一九六一年寫的《略論辛稼軒及其詞》一文結尾處，曾引用岳珂的一段文字來說明稼軒創作的態度。三十年後，又特為此文寫了一段後記，說明據他研究，岳珂此段記述並不可靠。這是真正的科學家的態度，也為一位歷史學家史德之所在。我非歷史學家，能得到這位世人敬仰的史學大師的稱譽，真是深感榮幸。

同鄧老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友誼賓館友誼宮，中國文化書院為鄧老九十歲大壽，張岱年老八十八歲大壽，還順便為宮達非和我的八十歲，舉行慶祝活動，共九桌宴席，到文化教育界人士近百人。鄧老與我同桌，他精神很好，只是有點耳背，同我談到：現在不搞運動了，經濟在前進，但政治改革還沒有跟上；又當面稱讚我寫的書有教育意義。席間我應命作了一個簡短的講話，並念了為二老大壽做的一首七律（尾聯是臨時改動的）：

幸會群賢抒雅興，玄思史筆兩長庚。  
同經世紀滄桑變，難避風雲左右傾。  
爭放爭鳴空水月，不移不屈實書生。  
少年立志求民主，到老自由仍怕聽。

真沒有想到這是同鄧老的最後一面。曾想有機會向他多多請教，不意他竟遽爾仙逝，這使我悵悵無已，不知何以如此緣慳。

鄧廣銘先生去了，但他的風範，他的學問，他的史德，都將長存，激勵後人去寫作真正的信史，不去編造偽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

## 施嘉煬老前輩百歲大慶

施嘉煬老前輩百歲大慶

我國水力學的啓蒙老師施嘉煬教授百歲來臨，所有從事水電水利建設的人員尤其是他的入門弟子，無不歡欣鼓舞，向他祝賀致敬。施老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從美國學成回國後，即在清華工學院土木系任教，三十年代任系主任並院長，一直教授機械、電機、水力學等課程。一九三三年就編寫了《水力學實驗》教材。抗戰時期，施老在西南聯大時與資源委員會成立了雲南省水力發電勘測隊。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雲南境內五大河系中查勘了二十七條支流的五十二個河段。對當時一些小水電站做了設計，鍛煉了設計人員，爲水電開發打下了基礎。抗日戰爭勝利後，又到美國考察河流綜合利用和水電梯級開發。施老從事水電水利教育六十載，桃李滿天下。我在年輕時無緣當他的學生。一九五二年從事水電建設工作後，就有緣同他的許多弟子共事，並從弟子身上感受到老師的教誨了。一九七九年我回京復職時，水電事業滿目瘡痍，曾倡導成立水電工程學會。一九八〇年大家在新安江水電站聚會，正式成立學會，公推施老爲學會理事長（後來又任名譽理事長）。我現在只就施老對學會的貢獻略記數事：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施老任理事長期間，學會及其專業委員會共舉辦學術討論會四十余次，交流學術論文三千余篇，這對水電建設在新時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



一九八三年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科技幹部學術報告會”，有二百多人參加，宣讀論文一百余篇，還有水電界老領導、老專家、老教授三十多人到會指導。他主持這次會議，認為這是一次“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盛會，為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促進水電建設的新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學會成立之後，施老創辦學會高級學術刊物《水力發電學報》，自任編委會主任，延聘水電界知名教授和資深工程師為編委，聘請清華水利系教授、講師為編輯。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五年的辛勤奉獻，使《學報》從內部發行到公開發行，並與國外同行交換。他自己撰文，組織國內知名學者供稿，使《學報》成為國內一流的學術期刊，《學報》現在已被評為全國優秀科技期刊，受到中國科協的獎勵。在三峽工程的論證中，曾發表過覃修典、黃萬里等不同觀點的學術論文，促進了研究解決三峽工程建成後，可能發生泥沙淤積等環保問題的準備，以及金沙江梯級開發的及早上馬。不久前，還發表了陸欽侃等有關三峽水庫降低蓄水高程的建議。這幾乎是能刊載有關三峽工程不同意見的唯一學刊。

此外，還主持《水力發電知識叢書》編委會，出版了一套面向中級幹部和科技人員的科普讀物，現已出齊二十余冊。

學會創立初期，當時電力部有位派駐聯合國工作的水電專家曹維恭，施老與他一起參加美國兩年一次的國際水電會議，並與美國壑務局交往互訪，舉辦學術演講會，親自作專題報告，受到各國專家的重視。他不顧年邁，還到歐洲、朝鮮參加有關水電的國際會議，宣讀有關中國水電建設的學術論文，宣傳我國水電開發的巨大成就。

學會原秘書處負責人趙振聲同我談過施老有關的生活細節：任理事長期間，不時召聽秘書處工作匯報，還趁進城或到北京圖書館搜集資料之便，邀請電力部同志到展覽館莫斯科

科餐廳共進午餐，聽取有關科技方面的信息，自己出錢會賬，從不用公款。這種方式延續了好幾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在施老八大壽並執教五十五年紀念的慶祝會上，我曾發言致敬，並書奉一首七律：

幾見滄桑度八旬，教鞭周甲力耕耘。  
蔭蔭桃李成蹊日，滾滾江河化電神。  
水木清華常憶舊，天光皓月迭更新。  
舉觴恭祝先生壽，同做小康時代人。

詩後有跋：施嘉場教授執教五十五周年，適逢八十華誕，清華校友集會祝嘏，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在京同人囑余寫祝辭為壽。昆明石龍壩建於辛亥，為我國水電之嚆矢，舊廠房酷似山廟，門聯云：“機本天然生運動，器憑水以見精奇。”橫額為“皓月之光”。施老嘗率弟子久居春城，當能憶此，故詩及之。

一九九一年施老九十壽誕時，我又書賀一首七絕：

十春喜見譜新篇，  
留得壯心山水間。  
萬水千山齊祝願，  
施公百歲二千年。

詩後跋語：嘉場教授前輩八秩大壽曾奉七律為賀。今有幸獻句祝九十華誕，期頤之年世紀更迭，當書獻小詩，同做小康時代人也。

水電工程學會為慶祝施老九十壽辰，特編印了一本《施嘉場論文選》，其中有施老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以改革促水電開發，力爭二〇〇〇年裝機達到一億千

施嘉場老前輩百歲大慶

瓦)。文中首先談到中央在南寧會議上曾提出“水主火輔”的方針，以改變電力能源以火電為主的結構。（不幸的是由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反黨集團”事變後，我受到牽連，水電部也打了個“李銳反黨集團”，水電建設系統成為“反水利、反三峽、反水電”的“三反分子”）。六十年代又以燒煤的火電為主；一九七二年起，盲目學習外國，修建了很多燒油電廠，還將不少燒煤電廠改為燒油。“一九七九全國發電量中，煤電佔百分之六十二，油電佔百分之二十一，水電只佔百分之十七。不久石油危機發生，我們也跟著國外將油電改為煤電。”僅燒煤與燒油的兩轉換，國家經濟上就受到很大損失。關於發展水電建設，十年動亂期間更遇到很多障礙，尤其未考慮水電與火電的投資和工期的實際構成，曾片面地認為水電比火電投資大、工期長、設備利率低等，使水力資源極為豐富的水電得不到應有的投資，其結果反映在一九八四年我國電力能源結構中，即發電裝機，“火電佔百分之七十點五；水電佔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年發電量，火電佔百分之七十七點二，水電只百分之二十二點八，水火之間相差極為懸殊。”文中接著談到世界各國無不優先發展水電；對我國電力政策必須優先發展水電作了充分論證，並提出改革的幾項建議，希望世紀末水電裝機能達到一億千瓦。遺憾是的這個希望落空了，當前水電比重仍同八十年代差不多，即同五十年代也差不多。

這裡不來展開議論我國電力能源政策的失誤，只是談到百歲老人終生理想未能實現。由於預祝“施公百歲二千年”，我自然應當獻上第三首壽詩，請施老笑納：

曾經耄耋祝期頤，有幸千年再獻辭。  
世紀同齡傳道者，水能開發啟蒙師。  
江河不盡懷恩德，桃李成蔭念潤滋。

未許壯心隨歲老，白煤東送嘆遲遲。

這最後一句說的是：“西電東送”（水電又稱白煤）現始形成政策，其實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初，我們這些“水電狂”就極力鼓吹並扎扎實實在開發黃河上游和四川、雲南、貴州的水力資源了。

說一句大話：“沒有劉家峽，何來今日之蘭州！”

二〇〇一年九月一日

## 祝賀黃乃的文集出版

黃乃的文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盲文》（及外編《鏡心集》）即將出版。我深知這一文集來之不易。他命我作序，儘管我對漢語盲文一竅不通，仍願意寫點題外的話，自然不是序。

黃乃是我的老同學、老朋友，還有世交的關係。他原名黃一寰，戰爭年代改名黃肅，為便於書寫，成為黃乃。我們從開始相識、相交，至今已七十五年。要敘述我們的交情，那需寫一篇長文，這裡只能略述一二。

黃乃的父親黃興，是辛亥革命的元勳，被稱為“革命的實行家”，直到武昌起義，是同盟會多次起義的直接領導者，黃花崗之役負過傷。當年孫（中山）黃是並列齊名的。討袁（世凱）失敗之後，孫黃之間曾有意見不和，以致國民黨長期“揚孫壓黃”。所謂世交是，我的父親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留學即為同盟會成立時的盟員，這時就同黃興、宋教仁等相識了，後來同黃乃的大哥黃一歐也是朋友。一九四九年南下到長沙時，我去看望過大哥。

黃乃比我早到這個人間三個月，是遺腹子，我則五歲失怙。我們是長沙有名的楚怡小學同班同學，都是班上的高材生，在初小時都跳過班。他比我早上學半年，高我一班，我成績好跳了一班，同他同班；他跳了一班，我又跳了一班，仍舊同班。一九二八年小學畢業時，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五

名。我們都好課外活動，大革命時期同是童子團的頭頭，他還是校學生會的副主席。讀中學後，我們不在一起了。“一二九”運動時，我是武漢大學的一個頭頭。那年寒假，黃乃從南京回到長沙（他在南京中學讀書），準備去日本留學，我們才又見了面。我們都關懷國事，在思想傾向等方面完全一致。寒假結束後，我們一起從長沙到武漢，他到過珞珈山我的宿舍，我們還一起在蛇山他父親的銅像前拍過照。

一九三九年最後一天，我從重慶到達延安。當晚看《日出》演出，在中央大禮堂門口意外見到黃乃，真是喜出望外，都高興得不得了。他一到日本即參加了左翼留學生的革命活動，抗戰爆發後不久，即入了黨。延安時期，我沒有進過學校，黃乃在馬列學院學習過。後來他調總政敵工部研究日本問題，受岡野進（野坂參三）直接領導。一九四一年我調到《解放日報》工作，他是副刊《敵情》的主要編輯。清涼山同王家坪距離很近，這四年中我們常相往來，包括個人的感情生活都很關心。一九四三年搶救運動時，我被關到保安處，他沒有受到這樣的衝擊。博古對我受如此審查頗不以爲然，因知道我們之間的深切關係，曾問過黃乃對我的看法。黃乃向博古直言：李銳絕不會是特務。我現存延安時期惟一的一張照片，就是一九四四年從保安處放出來後，同黃乃在王家坪合拍的。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熱河辦報，曾收到黃乃從山西寄來的長信。他那時正遇上愛情生活的第一次波折，信中附有新體長詩，也有舊體詩，這就是《鏡心集》中《將失偶》說的：“望穿書不至，何處可爲家？！”

由於先天不足和隔代遺傳，在小學時黃乃就是五百度近視；在延安時一千二百度，右眼已失去視力，總在小油燈下伏案熬夜。我常警告他，雙眼失明後，怎麼得了！真是不幸，一九四九年進入北平後，他終於左眼也失明了，去蘇聯

也沒有治好。黃乃是極有文化素養的人，從青少年起，就對語言有偏好，日文很好，通世界語，對新文字拉丁化、漢語拼音極傾心力；寫得一手好文章；新舊詩都在行；此外還好音樂，會吹口琴，會拉手風琴，是王家坪和楊家嶺當年舞會的樂隊成員。在延安時，他用筆名傅弭，《敵情》上常有文章，是真正的日本問題專家。當然，失明給他帶來極大痛苦。一九四九年中國天明了，大家是多麼興奮，多麼熱情地投入新的工作；可是三十三歲的黃乃眼前卻是一片黑暗了。一九五〇年三月《傷懷》詩：“眼如殘濁意如沙，親朋咫尺似天涯。長病那知春信息，寂寞東風伴落花。”我對老友的失明真是痛心不已。成爲盲人之後，黃乃下定決心一心爲盲人工作，首先是根據舊盲字創造新盲字，使全國千萬盲人更便於提高文化，帶來幸福生活。五十年代初，他就在瑞典出版的世界語盲人刊物上發表文章，介紹新中國。當時有十幾個國家的盲人給他來信，記得一九五三年，名記者子岡在《中國青年》上介紹過他的動人事跡。

黃乃於一九五三年任中國盲人福利會副主任，一九六〇年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任，八十年代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五十年代中，他的家庭生活又發生變化，他仍是被動的，這方面的愉悅與痛苦，我們都是共享的，他也只好向我這樣一個老友盡情傾訴。當年我盡可能在工作上給他以關心。他在教育部新成立的盲啞教育處負責時，我曾向胡喬木建議，應當給黃乃配一個專職秘書。此事終未能實現。由於忙碌，“大躍進”後，我們就沒見過面了。“文革”期間，我在秦城八年，學做舊詩以解煎熬，不免常回憶舊事。有一天想起黃乃，情不自禁地對著高窗獨語半天，吟成下面兩首（念黃乃）（載《龍膽紫集》）：

韶齡共硯儲英源，同飲延河又六年；  
曾戒油燈將毀目，吾兄秉燭對新天。

如啟閉門千里流，忽然獨白不能收，  
知音何日聽彈撥，別後滄桑十八秋。

二十年之後，一九七九年一月返京復職，曾將《龍膽紫集》全部原稿給過黃乃。他贈我這首七絕：順風逆浪輕舟過，測得江河萬里艱；已識廬山真面目，長征新路著先鞭。

獨身生活二十年，回到北京之後，我找到了好老伴，重新建立了家庭。黃乃的老伴安琳是六十年代初結婚的，是他生活與工作的好內助。我們兩家人有了極為親密的來往，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成為鄰居之後。一九八八年黃乃七十歲生日，他邀我與老伴家宴時，我將這首七律寫成條幅相贈：

少小同為童子團，毗鄰共度古稀年。  
六秋共飲延河水，廿載睽違凍雨天。  
依舊鏡心觀世界，革新盲字吐噤篇。  
常嘆大器才難展，卻有精神海內傳。

我們偶爾也還有文字的交往合作。一九八七年，宋教仁誕生一百零五年時，家鄉湖南桃源縣政協要出紀念專輯，讓我們都寫紀念文章。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夜十一點，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暗殺時，黃興、廖仲愷、于右任都在身邊。我的父親與宋教仁同庚，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過書。文章末尾寫道：我的老友黃乃同時應約，還寫了一首“念漁叔”（宋教仁號漁父）七律，要由我代書送去。為結束這篇小文，我步老友原韻，也寫了這樣四句：



獨夫子彈震神州，慟哭人才第一流。

誰道英雄長寂寞，民權社會共千秋。

黃乃一直致力於漢語新盲文的創造，五十年如一日，在這五十年裡，他所遇到的各種阻力我不知其詳，但他以極其巨大的毅力，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使他創造的方案得到各方的認同。這兩年我才聽到他表達的自慰。他的《漢語雙拼音文方案》認為，漢字同漢語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和差異性。中國雖然從三十年代開始就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但真正作為拼音文字被廣大群眾使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並被實踐檢驗而不斷改善的，非盲文莫屬。它不同於西方拼音文字的國家，將盲文字母同明眼文字母一一對應起來，編一套縮寫系統便能滿足他們盲人的需要；而漢語盲文是沒有什麼先例可以照抄照搬的。這二十年來，我不能同黃乃共享這方面的喜怒哀樂；對他的傾注全身心的執著事業，我雖然不懂（對盲文真難發生興趣），但我實在是同情他的，也共享他的煩惱和快樂。

我簡直難以想象，黃乃半個世紀的盲人生活是怎麼過來的。這本《文集》的出版面世，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相信他的明眼人朋友和所有盲人朋友，都將為之高興不已，特別是這個盲文新方案的全面實施，將使千百萬盲人通過手指觸摸，“看到”五彩世界之變，享受人間之樂，體味複雜之情。黃乃的這種精神，無論如何誇獎，無論如何讚美，他都是受之無愧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

## 《道奇隨筆》序

從《新青年》雜誌開闢“隨感錄”一欄以來，八十多年之中，雜文越來越成為報刊上的一種重要文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讀者。改革開放以來，雜文也隨著重新發展起來，作者也越來越多了。雜文能夠成為一種深受讀者歡迎的文學體裁，當然是由於它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尤其針砭時弊，能夠提出問題，引人深思。我自己就是一個從青少年起就愛讀雜文的人，衷心希望不斷有好的雜文作品問世。

這一次因事到湖南來，會見了許多老朋友、老熟人，同黃道奇同志有過交談。過去我只知道他在青年時投身革命，後來曾經歷了一段坎坷的歲月，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央“幹部要四化”的方針下，擔任過省一級的領導工作，卻不很了解他在寫作方面的才能。這一次聚談，才知道他是一位已經發表過不少作品的雜文作家，是湖南省雜文學會的名譽會長。前幾年他出版了一本雜文集之後，刊登在報刊上的雜文又有不少了。他告訴我：要從新舊作品中精選一部分編集付印。我聽了很是高興。承蒙不棄，囑我寫一篇序，作為一個雜文愛好者和偶爾也寫點雜文的人，也就樂於從命了。只是我這次在長沙只能停留幾天，加上還有一些活動，來不及細讀他交給我的書稿，只得借此機會談一點自己有關雜文的想法。

作者在自序中說：“我的文章對我國過去封建文明所遺

留下來的東西攻擊得多一些。”這就說明了作者的思想傾向。書的首篇“我不是龍的傳人”，更表明了作者的深心。其實“龍”作為上古人們的一種圖騰，求得對生活的保護，似無可厚非。但此物被歷代帝王據為己有，因而帶上了濃重的封建專制色彩。作者對此深為厭惡，“關於我不是龍的傳人”，寫了好多篇文章。我以為這些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余毒，是貫徹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必要前提；這應當是今後長時期中，雜文寫作的一個中心主題。我有時也寫一點雜文（還出過一本小集子），目的也就是鼓吹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最近我在《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短文：“迎接新世紀要四講”，總結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提出我們要時時講民主、講科學、講法治、講市場經濟。雜文寫作在這四個方面是能夠發揮很大作用的。是不是這樣呢？想請寫雜文的朋友思考一下。

我衷心祝賀道奇同志這本雜文集的出版，並且希望他不斷有新作品問世。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老同志，拿起筆來，把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把自己對於現狀的深刻觀察和思考，把自己對於國家和人民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懷，都扼要寫下來。我以為，這就是我們這些老年人（我比道奇還要大七歲）對於社會最好的回報了。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一日

## 《趙師梅先生傳略》序言

《趙師梅先生傳略》即將出版，作者俞大光（中國工程院院士）、陳錦江（華中理工大學教授）都是趙先生的學生，命我作序，自然義不容辭，因為我也是趙先生的學生。

一九三四年我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趙老師教我們的電工學，除上課聽講外，我同趙老師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從長沙來珞珈山入學時，先父的好友田秋明伯伯（長沙秋明醫院院長，同先父都是清末留日的）特別告訴我，趙師梅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已將我的情況寫信告訴了趙先生，要我一到學校就去拜見。於是，趙老師讓我每個星期六都到他家吃晚飯，“打牙祭”，在校三年中，很少間斷過。當年教授大多都住在學校的一區，即山前的單棟“洋房”中，趙先生完全有資格住在這裡，但他卻住在二區，即降等的教職員宿舍中，這就說明他的自奉儉朴和謙讓性格。趙先生是湖北巴東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坐過牢，受過傷。當年首義人物大都成為新的權貴，他卻潛身於教育事業這個清門，從來不以對革命有功而自矜、自炫，甚至這一段光榮歷史，也不讓人知道。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我是學校中鬧事的頭頭，當年工學院機械與土木二系（電機系是一九三五年才設立的）同學是運動中的先鋒隊伍；兩次進城並過江大遊行，武大的隊伍很是威武。隨後罷課，成立學生救國會，我在學生會管

宣傳，辦刊物，辦牆報，一九三六年後更是武漢秘密學聯的負責人，於是就很少上課了。趙先生對學生的救國活動是暗暗支持的，對我的不上課從不責備，考試時仍然給我及格。武大當年直屬南京教育部，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干預校政，可是對學校中搞救亡活動的七個頭頭，還是向校方提出了警告。我是七人之一。趙先生很擔心我的安危，將這一情況告訴了田秋明，於是我的母親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來到珞珈山，監督這個獨生子的行動，曾在趙先生家住過。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不辭而別，離開學校，到北平接黨的關係。母親幾乎神經不正常，當然也為難了趙先生。

一別十四年之後，一九四九年南下過武漢，我找到武昌趙先生家，去看望我尊敬的老師，他並沒有老態，相見之歡不言而喻。後來從老同學中知道，抗戰期間，趙先生鼓勵學生直接參加抗日工作，在家鄉宣傳抗日，鼓勵青年參軍，自己還作過打遊擊的計劃。國民黨發動內戰後，他支持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發生震動全國的武漢大學“六一”慘案，軍警槍殺三名學生，多人受傷，二十多師生被捕。趙先生不顧個人安危，仗義執言，領街署名揭露慘案真相。“大躍進”三年災難時，糧食緊張，更缺肉類，享受國家特殊照顧的趙先生，他一次也沒有去過學校的營養食堂。抗美援朝時，他只領取基本生活費用，大部分工資支援國家。援越抗美時，他將部分工資以“袁月”名義按月存入銀行，上交國家。晚年，他自以為貢獻少，國家還窮，曾經幾次正式請求降低自己的工資。

除教學之外，趙先生做過許多兼職和社會公益工作，從不畏困難，從不計毀譽。他常幫助貧寒同學完成學業，為貧困山區捐資興學，同事、親友遭遇急難，他總是解囊相助，不遺餘力。終其一生，趙先生可稱是真正淡泊名利、公而忘私的人。

趙師梅先生也是尋常的人，他過著尋常的生活，從事尋常的教書工作，似乎沒有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豐功偉績。然而，他卻是極不尋常的人，具有中國傳統的為國為民的崇高品德和奉獻精神。本書作者辛勤搜集資料，敘說傳主，行文樸實，內容感人。

趙師梅先生已去世十四年，他的學生、同事和親友永遠懷念他。相信這本書能擴大這種懷念的範圍，能使這位教育家為國為民、律己育人的崇高精神永放光芒。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

## 《IDF 之父——黃孝宗的人生時代》

### 大陸版序

《IDF 之父——黃孝宗的人生時代》一書值得一讀，這是黃孝宗的口述自傳，殷正慈撰寫。

黃孝宗跟我是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的先後同學。我是在一二九運動後，抗戰前夕輟學離開珞珈山，投身於救亡和革命的洪流。黃孝宗比我小三歲，是一九三八年考入已經西遷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一九四二年畢業。一九九三年參加武漢大學百年校慶時，我曾見到過殷正慈同級校友。一九九七年黃孝宗來北京時，我以武漢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的名義宴請過他，相談甚歡。這一口述自傳出版，黃通過端木正學長見贈一冊，我才獲得一讀的機會。

這書的前一部分寫傳主的青年時代，引起了我對那一段歲月的回憶。那時正是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之中，黃在樂山，我在延安，不論兩人的境遇有多大的不同，但是希望中國戰勝、希望中國強大這樣一種愛國之心、報國之心都是相同的。

一九四四年，黃通過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就讀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院，他的關於火箭噴嘴推進系統的博士論文，被美國國防部認為事關國家安全的機密文件，博士成為噴射推進系統的專家，於是先後在“反作用馬達公司”（RMI）

和北美航空公司所屬的洛克升公司擔任資深設計工程師、工程設計組組長。在每一項任務中，都表現出了他解決困難問題的卓越的才能，作出了獨特的貢獻。這些貢獻，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一一列舉，這裡只說一件：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宇宙飛船“阿波羅十一號”登月成功，第一次在另一個地球上印上了人類的足跡；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第一步踏上了月球時，說出了這樣的豪語：“我的這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是的，在人類跨出的這一大步中間，就包含有黃孝宗的一份貢獻。是他在液化氫火箭的尖端技術發展過程中，突破了多項關鍵性技術，才使這一次人類登月的壯舉成為可能。他也因此獲得美國太空總署頒授的“阿波羅 / 土星的路月球計劃功績獎”。

黃孝宗的這些成績，是他在美國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之後獲得的。我想，我們並沒有必要為此感到遺憾。科學技術無國界，是全人類的財富。毛澤東早就以恢宏的度量說過嘛，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來自中國的黃孝宗對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也是中國人的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德裔火箭專家馮柏郎當面誇獎他：“怪不得，火箭是你們中國人發明的。”

還應該看到另外的一點，黃孝宗的成功，當然同他過人的天資和勤奮有關，可是在武大機械系出身的人中，總還有天資和勤奮同他不相上下的人吧，為什麼卻少見也取得如此顯赫的成功呢？這就要說到美國的環境了。僅僅從技術的角度說，美國的經濟條件、科學技術條件，包括材料、工藝、實驗等等，以及管理的經驗，所有這一切，都為黃孝宗的成功準備了必要的前提。這一些方面的不足，自然也就限制了國內科技工作者的成就吧。如果我們不僅僅從技術的角度看問題，就不得不令人難堪地提到我們走過的一段可怕的彎路。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知識和知識分子遭到了輕賤，



除了反右派運動之外，什麼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越蠢，白專道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那時，除了研制導彈和核武器的極少數部門受到“特殊保護”，作出了一些成績之外，那些沒有受到“特殊保護”的許多科技工作者，確實很難作出什麼成績，在世界科技快速發展的年代，就更拉大了同國外的差距。特別是十年“文革”對教育的破壞，更造成了人才的斷層，增大了我們今天建設的困難。從黃孝宗的身上，從幾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身上，從許多在海外作出了成績的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一點也不比外國人遜色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技術條件的不斷改善，大家學會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給科技人員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特別是不再做自己折騰自己的蠢事後，在這個剛剛開始的新世紀中，相信中國定將逐漸成爲位居世界前列的科技強國。

黃孝宗六十歲在美國退休之後，又在臺灣工作了十年，擔任軍方科技總顧問兼中山科學研究院代院長，從事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獲得了“IDF（自主防禦戰機）之父”、“臺灣飛彈（即導彈）之父”的稱譽。退休之後隱居美國。

在這本書前面的插頁中，有一九九三年他回國訪問期間，國家主席江澤民同他親切交談的照片。可見他是一個熱愛祖國的愛國人士，也是兩岸都能接受的人物。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爲上計。像黃孝宗這樣一位與臺灣軍方關係頗深的人物（視同二級上將）都可以受到這樣的禮遇，我想，兩岸的和平統一，總有一天要到來的吧。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樂於向讀者推荐這本朴實無華的口述自傳。現在，海南出版社得到了在大陸出版此書的授權，我就寫下上面這些意見，作爲大陸版的序言。

二〇〇一年九月

## 《古詩詞名篇誦讀》序

國家教育部在新的語文教學大綱中，列出了要求學生背誦古典詩詞的篇目；中華詩詞學會積極地開展了“讓詩詞走進校園”的活動。現在，學會根據教學大綱編輯了這套《古詩詞名篇誦讀》，配上名家的誦讀錄音與精美的插圖，供同學學習、教師教學、家長輔導，以及校外青少年自學之用。

中華詩詞，自古相傳。春秋四言，戰國騷體，漢魏樂府，唐宋絕律，宋詞元曲，互相輝映，代代不絕。詩詞為形義音統一的漢字組成，四聲音律，平仄協調，語言精煉，音韻鏗鏘，琅琅上口，易於記誦，潛移默化，陶冶情操。有關治亂的歌吟，言志愛國的精神，國風國粹，影響深遠。學校教育，以學習知識為基礎，人文精神更是根本。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將“詩教”列在六門主課之首（詩、書、易、禮、春秋、樂）。我國是一個有高度詩教傳統即重視人的素質教育的國家；振興詩詞，重在育人。

關於自幼受詩詞教育的影響，可以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回憶二十年代童年生活的詩作中，有這樣一首七絕：

心靈小小慕英雄，四曲悲歌贊古風；  
蘇武牧羊易水別，木蘭織布滿江紅。

《蘇武牧羊》、《易水別》、《木蘭辭》、《滿江紅》都是譜了曲的古詩詞，小學時音樂老師教唱的，至今還背得。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對孩子的心靈影響至深。我的一生，從古

詩詞包括魯迅的詩詞中吸收的營養很多，也可以說，影響了自己的做人處世。

科學求真求是，人文求善求美，兩者缺一不可。近年，教育家楊叔子院士積極推動詩詞進入大學校園。他的《讓詩詞大步走進大學校園》的論文，引起教育界和詩詞界的巨大反響。文中講到：“沒有現代科學，沒有先進技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打就垮；而沒有優秀歷史傳統，沒有民族人文精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打自垮。”這一論斷將素質教育提到國家民族興亡的戰略高度，這也道出詩詞教育即這套讀本出版的歷史意義了。

新世紀來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鋒芒畢露，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這一切決定於人才。人才培養基礎在學校。我們希望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這顆璨如明珠的詩詞，能在小學、中學、大學的校園中，在科學與人文教育兩方面都起到良好的作用，希望新的一代既能努力追求知識，又能不斷自我激勵；既能做到思維正確，又能促進思想創新；既能樹立遠大理想，又能扎扎實實做人。

二〇〇〇年九月

## 《李銳論說文選》自序

天假以年，過了八十歲，來編自己的文選，這倒是我願意做的事；於此多少反映一生行藏。

除小冊子外，此生一共出版過十七本書，五十年代三本，八十年代以後十四本，近五百多萬字（六十至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無緣寫文，只是學會做舊詩詞）。這本文選中的七十篇文章，可以說，代表了我一生從事過的工作和對歷史的愛好。戰爭年代和解放初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在《解放日報》、《冀熱遼日報》、《新湖南報》三家報社當編輯和社長；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主管水電建設前後十一年；八十年代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主要貫徹幹部四化方針和挑選後備幹部隊伍（當年稱“第三梯隊”）。業餘愛好即主要研究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一九八五年退居二線後，還有一件繁重公務，主管《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省、地、縣四級）編纂，從而更多接觸一些黨史資料。

回顧一生，堪稱勤快之人，且養成動筆習慣，不是作家，又非學者，居然出了這麼多書。學生時代頗好文藝，喜歡讀魯迅的書。高中三年級時是班上牆報的主編。讀大學時參加一二九運動，是學生會的頭頭，主編會刊，並在報刊發表文章。以後在工作崗位，更是勤於動筆，文章與工作緊密結合，所謂操觚鼓舌，以推動業務的發展。我還是一個勤於動腦、善持己見的人。在延安《解放日報》四年中寫的文

章，不論社論、專論或通訊，除個別題目是領導佈置的外，都是自己主動寫的，包括戰局和軍事的評論。以後的歲月，更是養成了這種習慣。尤其在水電建設的崗位上，為爭取我國優先發展這一再生、乾淨和廉價的能源，搖旗吶喊，到老不歇。有關毛澤東早、晚年的書和文章，以及防“左”反“左”的文章，也都是受歷史責任感驅動而為的。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好意，讓我編這樣一本選集。之所以用“論說”為名，是這些文章有評論也有述說。今年我已經八十一歲了，自己也常感到精力不濟，體力和思維能力都在走下坡路了。此生的坎坷同歷史的曲折是分不開的。編這本選集時，也覺得有一種安慰，儘管長達二十年的“棄置身”，與世隔絕，但對歷史與現實的觀察自認是不斷前進的，我並沒有荒廢時光。人活到八十歲，也不過七十萬小時，其中能工作的時間，除去成年之前和睡覺休息，不過三十多萬小時，何況我還閒置了二十年。我已出版書中的十四本，是六十二歲以後寫的，這足以說明自己“堪稱勤快之人”。我的餘生不多了，我現在更是以日以小時為單位生活著、工作著。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

## 《李銳日記》（出訪卷）序言

平生只有兩個階段的日記沒有間斷過，一是六十年代下放，二是一九八二年至今；五十年代及以前只零星記過一些。日記於我主要是備忘，當然沒有想到要發表。去年滿八十歲時，四五十位新老朋友曾為我舉行過一次祝壽聚會，深深感到大家對我的關心，希望我多活幾年，這確實同自己一生的曲折經歷跟當代歷史滄桑緊緊相連有關，又同我這個人敢於講點真話有關。因此，我也就不拒絕將我的日記公之於世了。

這本“出訪卷”是爲了工作和接受邀請出國時的日記，其中還包括歸來後作的報告和國外的講演、談話等。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一共有七次出國。

一九五四年燃料工業部電力代表團訪蘇是我促成的，因爲當年部內外對應當優先發展水電尙無統一認識，尤其部裡前蘇聯電力專家組長，警告中國不要輕易建大水電站，說這方面蘇聯有過大教訓。所以回國後，我將蘇聯水電建設的經驗教訓作過一次長報告，在水電建設總局講了兩個下午，並整理成文予以發表。

一九五八年應蘇聯電站部邀請，率代表團參加斯大林格勒水電站截流。這次訪蘇沒有記日記。好在隨團訪門的時任三門峽工程局技術處處長的翁長溥寫有文章——《一九五八年訪蘇記》，從而幫助我作了追記。在莫斯科停留時，曾應

命對留蘇學生談過國內“大躍進”的某些混亂情況，被人告了狀。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挨批鬥時，這封告狀信曾經印出來作為罪證之一。於是這封附入廬山會議文件的信，在我寫的《廬山會議實錄》中得以引用。

一九七九年，“賦閑”二十年之後，隨能源代表團訪問巴西和美國，進一步了解到西方是如何以及為什麼能夠優先發展水電的。可惜當時沒有記日記，隨團訪問的水電老專家陸欽侃幫助我作了回憶。

一九八三年去幾內亞，是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去參加幾內亞的民主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我生平第一次（也許是末一次）有機會到非洲觀光，同時來去經過比利時和瑞士，開了某些眼界。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去美國和一次去澳大利亞，身份是訪問學者和毛澤東研究專家。我五十年代寫的《毛澤東初期革命活動》（擴大篇幅一倍的第三版書名為《早年毛澤東》）曾有過日文和朝鮮文的譯本，英文本是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版的。這十多年來，我的有關我國當代歷史與晚年毛澤東的著作和文章，引起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專家的注意，我也結識了幾位這方面的著名人物。在國外不免要作講演、談話和接受採訪（包括媒體），所有這些活動，我是注意了自己中共老幹部身份的。這從日記和講話中可以得到證實：不論講話、為文，我自認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人。

除開一九五四年訪蘇日記和報告外，其他都是首次發表。回顧一生，不論在務虛的崗位（如新聞和宣傳）和務實的崗位（如水電建設和幹部人事），我可說是一個從不誇誇其談而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在欣逢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革命年代如此，在二十來年“左”的錯誤泛濫成災的建設時期亦如此。因此，我可以做到原汁原味地公布自己的日記。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 《“大躍進”親歷記》前記

### (一)

一九八四年冬“退居二線”之後，我就想將自己親歷過的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這兩年，即南寧會議到廬山會議這一段“大躍進”的歷史資料，整理出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只將《廬山會議實錄》定稿，並增訂再版，其他就只零星發表過幾篇文章。我不算一個懶人，伏案乃生平習慣。可是，雖居“二線”，仍然人來人往，雜事不斷，且有一件繁重公務纏身，一年之中，難得有一個較長的安定時間。那本《實錄》和其他書稿，都是利用夏喘發作時，到外地或住醫院時完成的。所以這個夙願就一直拖下來了。

大家知道，“大躍進”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重大失誤，連續三年的“大躍進”，使我國經濟發展遭遇到嚴重的挫折，教訓非常深刻。如實錄出這一段歷史，於後世自有鑑戒的意義。自己已是望八之人，來日無多，確實有一種責任感驅使我趕快結束這件未了之事。現在我先寫出從南寧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這半年的經歷，由於時間、精力所限，粗糙差誤難免，希望讀者多加指正。至於從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這一段“親歷記”，我當盡快完稿，否則，“未了之事”還是沒有結束的。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



## (二)

《“大躍進”親歷記》的前一部分南寧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已於一九九六年三月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我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交稿的，隨即寫後一部分，即一九五八年六月的華東區計劃會議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上廬山開會前的形勢。這後部分篇幅較大。一九九六年夏季在懷柔水庫山邊躲夏喘痼疾時，已將大部分初稿寫出，其餘部分一直拖著沒有動筆。這一年來雖然依舊瑣事不斷，但為什麼不能像過去那樣，只要材料齊全，就能揮毫而就呢？是否同年屆八十有關，精力與思維都走下坡了？自認一生從不偷懶，可是有時確不想提筆，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眼看又該躲夏喘了，於是下定決心，發了一個狠勁，將沒有最後完稿的幾章，一氣呵成，並將全書最後定稿，前一部分也有所增訂。

今年四月滿八十歲時，承蒙京中友好為我聚會祝壽，我講了這樣幾分鐘的話：此生正好大體分成4段。第一個二十年，在學校讀書，一二九運動時開始革命；第二個二十年，戰爭年代與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勤奮工作；第三個二十年，淪為“階級異己分子”，並單監八年；第四個二十年，繼續工作，離職後更勤於伏案。可以說，我早歲即知世事艱難，雖學工科，卻好歷史。我們這一代人有幸是本世紀世變滄桑的見證人，自己又曾在政治漩渦中生活過來，有錢難買回頭看，一種歷史責任感，使我筆耕不已。“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應當讓後人記住前人的經驗教訓，失敗的教訓尤為可貴，如果不牢牢記住，還會重犯錯誤。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新版很受讀者歡迎，坊間竟有五個

盜印版。《“大躍進”親歷記》前一部分出版後，同樣引起讀者關注。之所以用“親歷記”之名，因其中有些事雖非親自參與，卻是發生過重大歷史影響也是當時自己很關注的。

我好像一個挑擔“腳夫”，到了目的地，將擔子卸下，頓覺一身輕鬆了。

期待讀者的指正。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前言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從一九二一年創建，迄今已有近八十年歷史。大半個世紀以來，黨的一切活動、一切奮鬥，無不同中國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前途息息相關，而且在東方乃至全世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可歌可泣有聲有色的活動，構成了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不論當今和後世，要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和世界，就不能不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因此，系統地提供準確可信的有關史料，就是一件極其重要而迫切之事。這方面，有關部門已經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如原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及各級黨委黨史工作部門，多年來徵集整理並出版了許多黨史資料；特別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以及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編輯出版的大量文件選集、法規匯編、檔案資料匯編以及個人文集等，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黨的組織機構沿革和人事更迭情況，是黨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有過一些局部的或專題的散篇敘述，但缺乏全面的系統資料。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全國第三次黨史資料徵集會議，正式提出編纂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任務，並下達了《徵集、整理和編纂方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此項工作，以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爲了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牽頭，和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檔案館共同組成中央編纂領導小組（組長馮文彬，一九八八年六月後爲李銳）和中央編輯組。同時，召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全國編纂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部門、黨史徵集研究部門、檔案部門，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團體的有關同志參加了會議。會議提出了“廣徵、核准、精編”（隨後增加“嚴審”）的指導方針，“統一規劃，中央、省、地、縣四級負責”的編纂原則。會議確定本次編纂黨的組織史資料包括三部分：有關文件、決議和黨章等文獻資料；中央及中央派出機關的組織機構沿革及其領導成員，幹部、黨員統計數字；地方組織機構沿革及其領導成員，黨員分佈狀況。會議討論通過中共組織史資料《徵集、整理和編纂修訂方案》，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報中央資料的說明》。資料時限從一九二一年七月黨的創建開始，到一九八七年十月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爲止。會後，省、地、縣三級普遍建立由黨委有關負責人任組長的各級編纂領導小組和工作班子，人民解放軍也在總政治部領導下組建編纂機構。據粗略統計，全國先後從事過組織史資料編纂工作的專職人員有兩萬多人，兼職人員有八萬多人。

一九八八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撤銷，新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後，此項工作改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牽頭統管。由三家業務人員組成的中央編輯組，除負責指導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編纂工作外，自身承擔的編纂任務爲兩部分：一是歷史文獻資料；二是中央領導機構、工作機構以及應收錄的下屬組織機構的沿革和領導成員。省、地、縣三級除自行編纂出版本地區資

料（自編本）外，還為上一級和中央卷提供有關資料（上報本）。

編纂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是一項浩繁的系統工程。自建黨以來，經歷長期的戰爭環境，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黨的組織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壯大。現存的歷史檔案資料或殘缺不全，或割裂分散，或難以核實，甚至存在矛盾和爭議。回顧黨的組織機構沿革變化，從中央到地方，從根據地到國民黨統治區、淪陷區，從秘密黨到執政黨，時移境遷，事易人非，欲追本尋源，首尾相應，編纂完整、準確的資料，其難度及所需投入的人力和所傾注的精力，均非始料所及。又如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央直屬地方組織即達數百個，其分合變遷，極為複雜。此項工作無先例可援，無前規可循，編纂人員開創探索，邊做邊學，不斷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逐步完善，提高質量。為交流情況，總結經驗，指導各地和有關單位編纂好自編與上報資料，多年來，中央編纂領導小組除了經常編印《簡報》和專題通報外，還召開過十多次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會議，從而逐步解決一些重要問題，如“分期劃塊、縱橫結合”的編纂體例；自編資料同上報資料之間的聯繫與區別；收錄範圍的寬嚴適度；黨、政、軍、統、群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合編與分編；文字敘述的內容、層次、規範化，以及同名錄、圖表的有機結合；人事政治情況的註釋，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可遵循、可操作的文件。

到一九九九年，中央、省、地、縣四級編纂的三千零六十七部組織史資料大多已經出版。這套大型資料叢書的形成，首先是廣泛徵集相關史料的結構。徵集到盡可能完整的資料，是做好編纂工作的基礎。許多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建立了地、縣、鄉、村四級徵集網絡，開展“普征、普查、普訪”活動，從歷史資料、文獻檔案、幹部履歷表、當

事人回憶及群眾中搜集大量的資料，尤其從老同志處“搶救了”大批珍貴的活資料。據二十三個省、區、市不完全統計，共查閱歷史文獻和幹部檔案七百三十六萬多卷，走訪老同志一百七十萬人次，發出調查信函一百一十九萬封，開座談會近四萬次，徵集的資料約百億字。全國各級編輯組織普遍建立了資料依據、文獻索引等方面的檔案卡片，做了大量艱巨細緻的資料搜集與整理工作。

在廣徵的基礎上還必須核准。整個編纂過程中，各地都在核准環節上下過苦功。在檔案原件與其他文獻資料之間、檔案文獻與回憶資料之間、不同的個人回憶之間，分清主次，相互補充，綜合考證，檔案為主又不唯檔案。對有爭議、有分歧的問題，更是不怕麻煩，深入調查研究，從歷史事實出發，力求做到核實無誤。戰爭年代，各省、區、縣跨邊越界的大小“邊區”眾多，弄清其來龍去脈，難度很大。在起始的兩三年內，省區間的協作會議開過多次，如北京、河北牽頭的北方十二省會議，廣東牽頭的南方七省會議，吉林同遼寧、黑龍江、內蒙古間的多次研討，湖南和湖北、江蘇和上海等省市間的經驗交流，對協作項目進行核對、補充，查清許多歷史疑難問題，使有關資料更為準確。

為使這部資料能夠反映歷史原貌，又方便讀者披閱使用，必須科學安排編纂體例。凡有關收錄範圍的詳略，各級機構的層次，名錄中必需說明的地域、事件、諸種歷史背景等等，以及文字敘述不同層次的分工，多年來反覆研討，形成文件，直到最後編纂成書的總目錄和凡例、說明，都以文件定之。

審查定稿是立準立好資料的最好保證。各地一般都採取自審、互審、會審和最後報審的“四審”制度，分級負責，層層把關。凡上報本和自編本，必須經同級黨委嚴格審定，方能上報或出版。正是經過這樣的努力，使得浩大、繁雜而

艱難的編纂工程得以善始善終，保證了這套資料叢書的可靠性。中共組織史資料中央卷編纂工作，是在地方編出上報資料，提供豐富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央卷卷帙浩繁，中央編輯組歷時數年，徵集核實資料，查閱檔案，埋首編寫，並組織多次審稿會，再三徵求各方面意見，其中文字敘述等重要部分，請有關專家反覆討論，最後又請黨史方面資深專家審稿。

全國三千零六十七部中共組織史資料（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如實理清了自建黨以來近八十年間，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黨組織以及政權、軍事、統戰、群團各組織的發展歷史，各級、各種組織的來龍去脈及人事變遷的情況，還澄清了黨的組織發展中許多重大疑難問題和某些長期有爭議的問題。這樣一套系統、完整的組織史資料，不僅豐富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資料，而且也豐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資料。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資料的編纂過程中，查清了黨的歷史上許多眾說不一、訛傳已久的組織和人事情況，為平反遺留的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提供了史料依據。許多地方結合組織史資料的編纂，編寫出一些黨史讀物和鄉土教材，用以教育廣大黨員、幹部和青少年。有的地方召開組織史報告會，在幹部培訓班上講黨的組織發展情況。各級組織史資料的出版，不僅為黨史研究、檔案管理、組織人事等部門從事有關業務提供了許多方便，而且為體制改革和機構調整提供了歷史的藉鑑。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部門和個人已開始利用這些資料。

有了豐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學的歷史研究，才能如實地揭示前人為什麼遭受挫折，為什麼能夠前進，從而使今人和後人有所鑑戒，有所趨避。這套浩大系統的組織史資料，能為治史、資政、育人提供可信的依據。隨著時間推

移，這套資料的價值必將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其社會效益將愈益顯著。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通稱中央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纂，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其編纂分工如下：

中央檔案館負責編纂本書第一卷（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第二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八卷（文獻選編（上）〈一九二一·七至一九四九·九〉）。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編纂本書第三卷（抗日戰爭時期）、第四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

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編纂本書第五卷（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六卷（“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七卷（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第九卷（文獻選編（下）〈一九四九，十至一九六六，五〉）、附卷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組織）、附卷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附卷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群眾團體組織）。

編纂《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自始至終得到黨中央、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和各級黨委的重視和指導。一九九九年六月，黨的十三大以前的組織史資料基本成書。中央負責同志對編纂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同時指出，將正在編纂中的十三大至十五大期間的組織史資料抓緊完成，同十三大以前的資料合併成爲一套書出版發行，從而完整地反映黨的一大至十五大的組織機構沿革的歷史。爲了進一步加強對編纂工作的領導，決定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的現職領導，並請幾位近些年從部領導崗位退下來、較爲熟悉這一段黨的組織工作的老同志，共同組成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編審委員會，曾慶紅任主任。《中國



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脫稿後，經中共組織史資料中央編纂領導小組反覆審改，繼由中共組織史資料編審委員會最終審定，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報請中共中央批准，決定公開出版發行。

編纂完成《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各單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及其組織部門、黨史部門和檔案部門，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人民團體的有關部門共同協助取得的成就；是許許多多長期從事組織人事、黨史研究和檔案管理工作的同志支持和幫助的結果；參加各級組織史資料編纂工作的同志，更是為本書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值本書出版之際，謹一並深表謝忱。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內容跨越近七十七年，黨及政軍統群組織機構沿革錯綜複雜，人事更迭頻繁，有些文獻資料和人事檔案不完整，機構設置和幹部任免手續不盡完備，雖經編輯人員一再努力，書中難免存在錯漏，懇請讀者指正。

## 憂慮三峽<sup>①</sup>

### 一、三峽工程構想的由來

經過一九九八年的洪水之後，不少人又在談三峽工程，也更加關注三峽工程的進度和它到底能否像原來說的那樣抵禦大洪水。一般的說法是三峽工程弄晚了，如果弄早了，有三峽大壩，今年的洪水就不會有這麼大。不管怎麼說，三峽工程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它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工程，而且是跨世紀的。到二十一世紀修起來，那時候還會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和議論這件事情。這樣一個大工程涉及面之廣，恐怕是世界歷史前所未有的。它的意義也不限於一個工程，而是與我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對生態、文化、經濟等等，都有很大影響。當然，也不限於現在。它很快將在下個世紀初矗立於大江之上，一旦建起來，就會影響到未來許多年。幾十年來你一直都在關心這個事情，一般來說，你被看作反對這個工程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我想請你就這個問題再發表一些較系統的看法。我覺得，無論什麼時候，什麼事情，總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這也就是我想在這個關於二十世紀系列訪談中找到你再談談三峽的初衷。

① 原刊《世紀之問》一書。李輝採訪（楷體），李銳訂正。

三峽問題我想分兩部分來談，第一部分就是三峽問題的由來，它到最後是怎麼樣重新上馬的，它的歷史過程，這個問題需要交待一下。第二部分是三峽本身的問題，三峽的防洪，同整個中國經濟的關係，同生態環境等各個方面的關係。主要是這兩個方面的問題。

現在提到三峽工程，一般都上溯到孫中山。不過，他還僅僅是一個構想，還沒有考慮到是否有可能會付諸實施，如何實施。開始具體論證是什麼時候？

三峽工程在歷史上，現在推到淵源，是孫中山最早提出來的。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講航運問題時，提到宜昌以上急流灘石礙航，“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這是以航運為主，結合發電，興建低水頭閘壩。一九三二年，工程師譚震等在三峽查勘後，提出在黃陵廟和葛洲壩建低壩，也是以發電和航運為目的建低水頭工程，比現在所建葛洲壩還低。抗日戰爭後期，美國最有名的一個大壩專家薩凡奇，那時到了重慶，是當年國民黨管經濟建設的領導機構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和錢昌照請來的。會內有一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當時研究四川的龍溪河、大渡河、馬邊河、岷江等長江的支流和雲南的螳螂川，請薩凡奇對這些中小河流的水力開發提些意見。後來美國派到中國的戰時生產局顧問、經濟學家帕斯克爾提出，由美國貸款在長江三峽建高壩水電站，用一半電力制造化肥，運回美國還貸。於是，一九四四年九月，由工程總處負責人黃育賢等陪同，薩凡奇到三峽查勘，研究高壩方案。

當時美國專家設想的三峽大壩是什麼樣規模的？

三峽這麼大的電站，那個時候設想水庫蓄水（海拔）高程是二百米左右，以發電為主，兼顧灌溉、防洪、航運等，裝機容量一千多萬千瓦，這樣大的電力，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我記得全國電力大概還

不到二百萬千瓦。所以美國專家那個時候考慮到以三峽電力搞大的電解工廠，生產巨量化肥，就可以佔領國際市場，美國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考慮三峽的。日本投降之後的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資源委員會和有關部門就派了五六十個搞水電、水利的專家到美國壟務局，在該局設計總工程師薩凡奇的領導下，就三峽方案作了一年多的研究。這批人大部分回國了，回來後都留在水電部門（少數人到水利系統）工作，也有少數人留在美國。在國外的的美籍華人裡，現在還有人關心三峽工程，像徐懷雲，一九八九年我到美國時曾見過他，三峽截流時他被邀請來過。

五十年代能源部門的職能範圍是如何分工的？研究三峽工程是不是主要由你所在的水電總局負責？

燃料工業部當時有四個總局，一個是煤炭，一個是石油，一個是電力（電力就是火電），還有一個水電。一九五二年我調到燃料工業部時，水電工程局是部內的一個司局，其他三個總局都是部屬，獨立的。我了解情況以後，發現部內不能開展工作，才成立了水電總局。過去美國搞三峽的人絕大多數都在水電總局，黃育賢是總局的總工程師（已去世）。

建國後到底是什麼時候又重新提出修建三峽工程的？

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一九五四年發了大洪水以後，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負責人林一山，在薩凡奇的基礎上提出來要盡快修三峽。他的出發點是要解決長江的洪水，最初可說沒有考慮水電，這同美國薩凡奇的想法是兩回事。一九五四年的長江洪水堤防防不住的水量大概有一千億立方米。林一山就想讓三峽這個水庫把這一千億立方米水裝起來。

就是說，蓄水防洪是五十年代修建三峽大壩的主要目的。

是的。爲什麼提出要這麼一個大水庫來裝洪水呢？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水利部門的一個指導思想，就是要用水庫來裝洪水，來解決防洪這個大問題。五十年代淮河、長江、黃河發生洪水的前後，毛主席，還有周總理，當然非常關心洪水的問題。開國之後，中央領導，首先是毛主席，對中國的建設來講，最早關心的是兩件事情，第一個就是治水（第二是鐵路）。毛主席最早的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都是關於治水的。長江就是三峽問題，毛主席曾經被林一山說動了，很想早修三峽，於是一九五六年寫了那首有名的“高峽出平湖”的詞。治水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事情，“善治水”與“善治國”是相關聯的。由於地理氣象等原因，中國的洪水在世界上可能是比較嚴重的，大概同印度差不多。蘇聯和歐洲這個問題都不嚴重，中國是亞熱帶地區，季風暴雨造成的洪水較大。

一九五四年底電力代表團到蘇聯去參觀，團長是劉瀾波，我是副團長，主要是參觀蘇聯的水電建設。記得接到國內一個電報，是一九五五年初。水利部要考慮修三峽，征求我們的意見。當時我就跟劉瀾波起草了回電，認爲這個問題對國家來講是一件長遠的事情，提不到日程上來。

那個時候你就對上三峽不贊同，是第一次接觸嗎？

那個時候就認爲三峽工程特別大，問題極復雜，這是一件長遠的事，當時是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你是因為研究了之後反對呢，還是說你自己本能地覺得這個事情不行？

只是初步接受到的認識。我在大學是學工科的，這些東西容易理解，知道其間的要害。三峽是世界上未有過的特大工程，電站這麼大的容量，當時中國已建水電站的容量有多大，整個國家有多少電呢？我到蘇聯參觀過大壩和水電站，蘇聯也好，美國也好，水電站大概的情況我是知道。三峽工

程當時超越世界水平很多，不是一般的超越。不論從技術上來講，還是從工程規模上來講，尤其從國家經濟情況和電力需要來講，當年只能用四個字：“不能設想”，是接受不了的。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就是一句話：“對國家來講，這是很長遠的事情，現在提不到日程上來。”因此，立即回了這麼一個電報。後來在蘇聯，我就跟蘇聯水電設計總院談過三峽的問題，請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基本上跟我們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是很長遠的事情，現在提不到國家的日程上來。從蘇聯回來以後，蘇聯有關部門關於三峽的看法，根據燃料部領導的意見，我寫過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給總理。

但是，這個問題水利部逼得很緊，因為中央也在議論長江問題，要防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就請了一批蘇聯水電、水利專家來研究這個問題，那個時候水電系統只有兩個蘇聯專家，長江水利委員會一下就請了十幾個專家。蘇聯管河流大工程的不是農業部，是電力部，蘇聯的水電站，包括修運河，都是電力部門主管的，或者水電水利設計院管的。我國水利部請的專家，對口是農業部，而蘇聯的農業部管灌溉，根本不管大河流工程。所以三峽請來的專家，除了個別農業部的以外，都是電力部門的，水電系統的。因此，關於三峽問題，我們同這些蘇聯專家就容易溝通。可是同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之間就很難談得攏，免不了要發生爭論。

## 二、漫長的爭論

關於是否上三峽工程的的爭論，最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第一次爭論是在一九五六年。當時，水利部有一份刊物《中國水利》，我們水電總局有一個刊物《水力發電》，都是

技術性的月刊。林一山在《中國水利》該年第五、六期上，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大概有兩萬字，就是主張要修三峽。認為只有三峽才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他那時候提的方案應該說是很荒唐的。所設想的水庫蓄水高度是多少呢？那時候的高程是二百三十五米，現在的高程不是一百七十五米嗎？比現在還要高出六十米！二百三十五米是個什麼概念呢？重慶要淹到什麼地方？要淹到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就是大半個重慶城市要被淹掉。爲什麼要二百三十五米呢？因爲這樣就可以有一千一百億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庫容，設想把長江一九五四年提防當不住的洪水全部裝起來。

這就反映了你前面談到的防洪方針，依靠大水庫來解決洪水問題。

對。這樣就提出了長江規劃的第一項，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內容。林一山就寫了這麼一篇大文章，這個文章當時是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的，因此我們及時看到了。看到以後，水電系統許多技術幹部都認為這樣的方案太離譜了。按照二百三十五米高程，三峽水庫當時要遷移人口二百多萬，將淹沒四川沿江十幾個城市，重慶大部分被淹。我們認為，不能爲了免除湖北荊江和武漢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脅而犧牲重慶。防洪應該採取綜合規劃原則，要注意四個方面的協調發展，這就是加強堤防、湖泊窪地蓄洪排澇、支流水庫和幹流水庫四個方面，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中外如此，尤爲重要。我們只能根據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條件，逐步提高防洪標準，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地去解決最高標準的長江防洪問題。至於要求在當年建成三峽這樣大的水電站，同國民經濟包括電力的發展更是遠遠不相適應，並且將遇到一系列世界上未經歷過的技術問題，因此我們在《水力發電》上，九月份出了一期長江規劃專號，全面地論述防洪、發電、航運等方面，以及有關經濟、淹沒損失和地質等種種技術上的問題。

大概有十來篇文章。

那個時候是不是長江的水還比較清，所以沒有想到泥沙問題？

是啊，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專號中主要的一篇文章是我寫的。由於對方寫了兩萬字，我也寫了兩萬字。從防洪，從國民經濟各方面來講，對方的論點都是不合理的。我現在跟你只講過程，不講內容。這種刊物專業性強，不為人們注意，毛主席和中央當然更不知道。可是，蘇聯專家一來，問題就提到中央的日程上來了。尤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載了似乎三峽工程已經定案，很快就會施工的報道，關於施工期的具體措施，“圍堰發電”和“臨時船閘”都作了介紹。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只差國家下命令，就要動手了。於是，我只好寫一篇短文《略談三峽問題》，以正視聽。寄給《人民日報》，報社隨即寄來清樣，準備發表。後來《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揖告訴我，清樣也寄給了總理，總理說：這個問題不在報紙上爭論。那時候不僅僅是長江要修個三峽，淮河也要修個三峽，裝淮河的洪水。因此我沒辦法，只好用帶點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雜文，就是《大魚網主義》（刊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報》）。附帶說一下這篇雜文給我帶來的厄運。一九五九年從廬山下來挨批斗時，此文曾印發作為罪證之一，並使整個水電建設都蒙受不白之冤：“反三峽、反水利、反水電。”

我編你的那本隨筆集《苦瓜的味道》時讀過你的這篇文章。你這樣寫道：“生活中確實有人喜歡辦大事情，熱衷於解決大問題，急於一次徹底解決問題；還有人把這提到理論的高度，說這種‘大’癖是解決問題的‘重點主義精神’。”

那個時候，廣東的報紙登過這麼一篇文章，大概是一個縣的一位部長，不相信別人的勸告，強迫漁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魚網，做了一個三萬多斤的大魚網，想一網把過海的魚全



部打上來。結果這個網下了海以後，一條魚也沒打上來，我就用這個篇名，說現在有很多的大魚網主義。

你在文章中不點名地提到了兩條河流。你說：“據說，有一條河流，為了解決防洪問題，在支流上已經修了許多水庫來裝洪水，然而解決問題不大。於是現在有新的規劃，在幹流上修一個最大的水庫，以徹底解決防洪問題。可是這個大水庫的代價是多大呢？移民一百萬以上，投資好幾十億元。”你說的這條河流是不是就是淮河？另外一條是長江嗎？

是的。這是講淮河，另一條是講長江三峽。當年這個問題只是在我們兩個系統中間爭論。我們這個專刊出來之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就不吱聲了，也不說我們講得對，也不說我們講得不對，反正不吱聲了，然後就是“大躍進”開始。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修三峽，當時國家計委的李富春、薄一波他們都知道這個事情，他們至少是持保留態度的。於是薄一波就提出，有個李銳和林一山爭論的問題，李銳是搞水電的，是三峽的反對派。毛主席就說，把兩個人都找來當面談一談。南寧會議情況就不多談了。毛主席認為我的意見對，沒有料到的是要我當他的兼職秘書。隨後，總理帶隊視察長江三峽。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即有個三峽的決議案，其中談到：三峽工程何時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才能做出決定；要防止規劃中集中三峽一點，不及其他；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和有了三峽就萬事大吉的思想。我參加過這個決議案的起草。這個決議案是完全正確的。從此以後，三峽問題在五十年代就沒有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大躍進”時期，一九五八年底，“長辦”作了個三峽初步設計要點報告，提出一九六一年開工，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開始發電，一九六七年建成。但中央未予考慮。我所知道的，一直到毛澤東、周

恩來去世之前，六七十年代，不管水利部與林一山怎樣催三峽上馬，他們沒有點過頭。而且後來我所知道的，從國防上考慮，總理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張愛萍。張愛萍考察過，正式提了意見：三峽不能修。到現在為止，張愛萍還是反對修三峽，防洪不能靠這個。毛澤東、周恩來去世之前，對三峽問題沒有點過頭，但是，出來一個葛洲壩。

一九七四年我到宜昌葛洲壩工地去過。聽說是為修三峽大壩作準備的。

其實是應在三峽修成了以後，才需要葛洲壩。因為三峽是一個大水電站，而用電要求有時間差異，有多時有少時；發電多的時候流下的水多，發電少的時候流下去的水少，流量忽多忽少，這對航運不利，需要有一個反調節水庫，把水量調節到便於航運。所以修了三峽以後，為了利於航運。在它的下游需要修一個緩沖的反調節的水庫，以利於航運。但是當年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堅持修三峽，就是要在長江上修大工程，修不了三峽，就要修葛洲壩。最開始林一山也是反對的，他知道葛洲壩是什麼作用，但是他最後又贊成了。

我當年去的時候高中剛剛畢業，聽說大壩好像最開始的時候修壞了，後來又炸了。

對，修壞了，停工兩年。因為泥沙淤積礙航問題沒考慮清楚。交通部有意見，周總理去視察，決定停工兩年，修改設計。所以當年修葛洲壩是荒唐的事情。但是，他們把毛澤東說動了，於是毛澤東就題了詞贊成修建此壩。葛洲壩什麼時候開工的呢？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而且把毛澤東的題詞像紀念碑一樣，特制起來，到處懸掛。我一九七九年一月恢復工作，一到水電部，大門一進去，就見到整個牆面上是這幅題詞。不久，水利、電力兩部分開了。於是我就讓辦公廳取下了這大幅題字。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題字是違反基本建設程序的：“贊成修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

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這怎麼可以呢？必須搞好了一切之後才能施工，這是基建程序的常識。水利部的主要負責人就是這樣的，明明知道這是違反基建程序的，還是把它奉為聖旨，這是在幹違反基建程序的事情。他們真是這樣幹慣了。

### 三、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

八十年代關於修建三峽工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你也正好這時平反恢復工作。那你重新工作首先遇到的事情是不是就是這個大問題？

當然。我一九七九年一月回來，首先接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修三峽，又開始爭論了。以後八十年代就不斷地爭論。我回來以後，陳雲同志一直管基本建設，中央的分工，他是管經濟的，他曾經講過這樣極端的話：三峽出了問題，要亡黨亡國的。所以我一回來，關於三峽他就要我寫個意見。寫過不止一次，大概寫過兩三次。在八十年代初，這個意見書上去以後，中央領導層從鄧小平起，都看過的，趙紫陽、胡耀邦都看過的，都有過批示。後來，就由國家計委、國家科委一起來作三峽論證。計委、科委領導論證的時候，比較客觀，各種反對的意見都能夠反映出來，計委、科委的領導都能聽到，而且中央都能夠聽得到，所以這個事情遲遲不能定下來。之後，三峽的論證由誰來領導呢？由水電部（後來水利和電力兩部又合並了）從計委、科委手中爭取到論證三峽工程的這個領導權，於是水電部部長錢正英打著科學化、民主化的旗號，請了四百多個專家參加，各個方面的專家都有，成立了總的領導小組，分成十幾個專題小組，水文、泥沙、地質、水工、防洪、發電、航運、移民、水位、經濟、

環境、施工等等。四百多個專家裡，對上三峽工程持反對意見的，他們請了幾個，多數都不請。真正反對得最厲害的專家他們不請。還請了二十多位特邀顧問，也是有選擇的，只有一位持反對意見的孫越琦，不得不請。

你參加了嗎？

沒有。他們爲什麼不通知我參加呢？據說水利部有人講，因爲林一山不參加，所以李銳也可以不參加。林一山當然用不著參加了，林一山的意見就是你們的意見呀！你們堅決貫徹林一山的意見。我那個時候調到中央組織部了，我也忙，也沒有精力主動攬和這個事情，但是向中央我寫過很多意見書，我的意見當然他們都看到了，我是堅決不同意的。怎樣進行論證的呢？論證的領導是水電部部長，領導小組裡都是水電部的副部長和總工程師。那十幾個專題小組的負責人呢，都是清一色水電部所屬各司、局、院的負責人，都是在部長領導下支持三峽上馬的。實際上怎樣論證的呢，這裡面最妙是妙在什麼地方呢？舉個例子，雖然提出要比較各種蓄水位的方案，但還沒有展開討論時，領導就授意水位組，提出初選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後來許多老專家如施嘉煬、張昌齡、李鵬鼎、羅西北、黃元鎮、張啓舜、何格高等，都在論證會上發表不同意見，提出較低的一百五十米、一百六十米等方案，但均未被考慮，還是一直堅持預定的初選方案。這就是現在的施工方案。所以後來我就講過這樣的話：皇帝選皇后，你不能只有一個候選人，你至少得有三個、五個，甚至十個、八個，一個候選人有什麼可選的？幾十年來，爲解決長江的防洪並利用水電，他們就守住一個三峽工程，只有一個惟一的候選人。過去他們連金沙江都沒有去過。

你認爲即使要解決長江的防洪、發電問題，也至少應該多幾個不同的方案來對照，是不是？

我參加過黃河規劃，全流域實地考察，進行全面調查研

究，全流域四十六個梯級電站，從上游到下游，有整套的規劃。長江規劃沒有這樣進行，上游和下游都不管，主要是孤立地論證三峽。據了解，三峽工程也研究過替代方案，如“長辦”曾根據論證要求，提出過防洪替代方案：“在做好一九八〇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礎上，中游加固堤防，擴大並完善分蓄洪區與上游水庫聯合運用的方案。”在三峽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的討論會上，許多專家認為這個方案是比較合理的。但是由於沒有符合領導的意圖，要“長辦”再作補充的研究報告，再開三峽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討論會，終於否定了替代方案。發電和航運也都提出過替代方案，也都輕易地被否定了。論證的結果究竟是怎樣通過的呢？就是各個專題組只通過它本組的專題，組中各人簽字對本專題負責。如水文專家只對水文資料論證負責，地質專家只對地質評價負責，等等。各組專家對三峽工程建還是不建，蓄水位多高，都沒有參加研究。後來主其事者統計十四個專家組共四百一十二位專家，對三峽工程方案只有九位專家未簽名，其他都是贊成的，這種統計是不符合事實的。許多專家對要不要建和建怎樣規模的三峽工程，是沒有發表過意見的。而且學術問題豈能以少數服從多數，何況是虛假的多數呢？再則，各個專題組所提意見相互有矛盾。例如，泥沙組為了減少泥沙淤積，延長水庫壽命，提出水庫運用原則：“蓄清排渾”，即汛期讓帶有較多泥沙的渾水下泄；而防洪組則考慮汛期水庫應盡可能攔洪，是“蓄渾”而不是“排渾”，兩者根本矛盾。這樣兩個互相矛盾的論證報告，都經領導小組通過了！如此嚴重的矛盾，領導小組未予考慮。

關於三峽工程上馬，多年來有的人怎樣向中央施加壓力，就不細談了，上面談的就是到最後人代會通過之前的大致過程。三峽上馬要人代會通過。三峽工程的有關經濟、生態、社會和技術各方面的問題都非常復雜，你不了解這些，

怎麼能夠進行表決？三峽方案表決時，有一百七十七人反對，六百四十四人棄權，這在人代會表決議案方面是空前的。後來我就寫了篇文章，談到人代會給代表看的全是正面意見，沒有反對意見；討論時很多專家提了問題，提了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四川代表。整個論證過程就是這樣的。

這些過程我第一次聽這麼詳細。

所以這個過程是兩種結合，一是主其事的人主觀、專斷、沒有科學頭腦，聽不進不同意見；一是片面的防洪思想。這些事情，我今天還來談，也算是對歷史負責到底吧。到了一九九六年，三峽上馬開工之後，我還寫了個意見，什麼意見呢？停下來。

它沒法停，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不可能停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尚未宣布正式開工，還是出於責任心，我曾給中央常委上書，題目是“關於三峽工程建議聽一次反面意見”。我寫道，現在通過的一百七十五米大壩高度的方案，必將引起泥沙淤積，影響重慶港，阻礙航運。七十年代談論葛洲壩問題時，周總理曾明確指出長江開發，航運第一；並疾言厲色說道，如果礙航，就要炸壩。我問過負責論證航運的交通部同志，他說三峽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有關航運的問題，有的並未落實。長江航運關係四川當前改革開放與今後長遠發展，至深且巨，這同所謂荆江大堤受千年一遇洪水威脅，自不可同日而語。在選定一百七十五米方案的論證時，泥沙淤積問題究竟如何解決，並無準確可靠的保證。我在這個上書中最後這樣說：“我鄭重向中央建議：請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反對三峽工程（或一百七十五米方案）現在就上馬的專家學者，開一次會認真聽取一次他們的意見。請原諒我說句老話：只有兼聽則明。”不管我的意見有沒有聽，我得說出來，寫下來。立此存照，我的意思就是立此存照。

我想到找你談這個問題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很多事情，需要聽聽不同的聲音。你出的一本有關三峽的書的封底上印了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我已經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這話說得真好！

我的《論三峽工程》這本書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現在香港出的增訂再版收集了這十多年的文章和意見書。“再版前記”最後說：“出版此書始終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世人了解有關三峽工程爭論的歷史過程；二是希望有助於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至於三峽工程本身，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都已經反復說過了，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鑑。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 四、長江與黃河防洪的不同特點

你那麼執著地反對上三峽工程，到底是從哪些方面考慮的呢？

這就要說這個三峽的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也就是要修三峽的主導思想是不是合理。應該提出這個問題來。

它主要目的是防洪，就是為了解決長江的洪水，一直是這麼宣傳：有了三峽工程，長江的洪水就可以解決了。現在稍稍有點改口了，說會減緩長江洪水，會不至於發生大的災難。就是這麼一個出發點。但是我聽說在七十年代的時候，他們經常變，為了使得三峽上馬，電力緊張的時候，他們就說修三峽是要電。要防洪，要電，他們經常變來變去，為了三峽上馬，但是現在說的主要還是為了防洪。

問題是防洪的功效到底有多大呢？

好，那我們就講防洪。中國的洪水，跟蘇聯的不一樣，蘇聯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中國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

造成的。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各支流的洪水，時序一般稍有錯開，但六、七、八三個月的洪水總量非常大，要想用一座大水庫來攔蓄是不可能的。三峽只對控制四川來水起一定作用。長江中下游防洪主要應靠堤防，使洪水盡量下排入海，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辦法。中國治水自古以來，一個是堵，一個是疏。傳說鯀是堵，堵，不行了，後來大禹就疏了。鯀是被殺了頭的。造成洪水的原因不同，流域的情況不同，自然形成的局面也不同，中國洪水最厲害的還是黃河。黃河的洪峰很高，相對洪水流量不大，用水庫攔蓄還比較容易(如三門峽)。但是黃河的問題是特別嚴重的，而且是很難解決的，為什麼呢？黃土高原的問題，泥沙的問題，它是條懸河。

這幾年黃河倒沒事。但我看過你一九八二年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對你很早就提出要治理黃河中游的水土流失問題印象很深。你這樣說：“黃河為害在下游(河床十年淤高一米的威脅始終存在)，病根是中游水土流失，必須鎖住泥沙(這也是沃土)。多年來人財物力集中於下游工程防治，對中游的根治一直沒有放在應有的地位。解放後，中游水土流失現象仍在發展。三門峽工程教訓極大。此項工程當年由水利、電力兩部促成。由於對水土保持過於樂觀，對泥沙運行規律沒有掌握，結果三門峽淤積嚴重，不得不改建，但仍發揮了防洪、防凌、灌溉及部分發電效益。下游已建和在建工程花園口、位山、洛口、王旺莊四座攔河樞紐，由於泥沙淤積，水位抬高，又終於廢棄。”我覺得你對黃河的考察和憂慮，同樣適合於今天對長江的狀況。七十年代末我坐船從武漢到上海，江水還是灰色的，而去年再去看，已經是黃的了，報紙上已有不少報道說長江水土流失問題十分嚴重。所以，今年洪水過後，開始在上中游地區禁止砍伐森林了。談長江，看來也還得多談談黃河。



黃河現在水量不行，上游工農業發展，把水引用了，近年來發生下游長期斷流。中國自古以來黃河爲害，影響到國家的安定，因此就有這樣的傳言：“善治國者必善治水”，不懂得治水就不能治國。爲什麼提出修三門峽水庫來防洪呢？因爲三門峽所處之地控制了黃河流域面積的百分之九十。黃河整個流域面積七十五萬平方公里（長江一百八十萬），三門峽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二，不能控制的只有下游的百分之八。黃河洪水主要是暴雨造成的，北方地區年降雨量並不大。黃河流域年平均水量五百億立方米，總的水量不多。長江流域年平均是一萬億立方米，大於黃河二十倍。黃河的洪峰，它的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相差幾十倍、上百倍。黃河到三門峽那個地方，最大的洪峰流量都是一萬到二萬立方米每秒，雖然洪峰很高，但洪水時間短，洪量不太大，水庫一擋，這個洪峰可以削掉。所以水庫在黃河上能起大作用，用水庫防洪，還是比較合理的。那個時候的設想是對的。但是，三門峽本身原來的設計方案卻是失敗的，因爲泥沙問題不好解決。

但是理論上是成立的。

因爲它峰高，把峰一削掉，問題就解決了。長江呢，整個流量是一萬億立方米，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之比並不懸殊。長江的最大歷史流量可能達十萬立方米每秒，最小流量也有幾千，它相差二三十倍。跟黃河不同，黃河是上百倍。長江的洪峰不是尖峰型，是饅頭型的，來的時間很長，洪水總量很大。因此，長江的洪水形態同黃河不能比，這種形態，饅頭型的，用水庫不好解決，總量太大。

就是說它有提前量，可以提前預告的，能夠來得及防衛的。

是的。長江這種洪水，用水庫來蓄洪、解決洪災是不合理的。而且三峽只控制長江流域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二，它只

能控制川水。整個長江流域的洪水是三個來源，一個是四川：一個是南部，就是湖南的湘、資、沅、澧四水，江西的贛江等；北部，湖北漢水流域。下游就是安徽、江蘇了。在一般情況下，長江各個來源的洪水是錯開的，長江洪峰的三個來源，時間上最早的是南岸，湖南、江西，五月份就開始下雨了，一般是五、六月份洪峰就來了；其次是四川的六、七月，漢江是七月到八月，主要是八月，所以它來源不同，洪峰錯開了，一般年份的洪水沒什麼大問題。從歷史上來講，長江的洪水情況和黃河完全不同，本身的河床也很寬，而且有大量自然湖泊分泄洪水。特別是兩湖，還有江西（四川沒有湖泊），都有湖泊，最大的是洞庭湖、鄱陽湖，歷史上湖北有雲夢澤，孟浩然有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湖北的洪湖等一些大小湖泊大概都是過去雲夢澤遺留下來的。

它們大都在荆江北岸，不僅僅是洪湖，很多湖。歷史上，長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雲夢澤，湖北是千湖之省，大大小小的湖泊上千個。長江南北自古以來都有堤防，堤防演變到明朝，湖北逐漸把北岸的堤修高，而且分洪的口子都堵死了。傳說這跟張居正有關係。明朝這個很有名的宰相張居正，是湖北人，他就保護湖北，把北岸堵住，北岸的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又低又薄，於是，南岸就被洪水先後沖開四個口子，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個口子沖開了，洪水就總是淹到湖南了，淹到洞庭湖。荆江北岸堵了以後，很多湖泊就變成田地了。湖南的洞庭湖呢，不是“湖廣熟，天下足”嘛，洞庭湖有個什麼好處呢？汛期來了大洪水以後，當年當然受損失，但是土地淤肥了，第二年高產豐收。因此湖北人就埋怨張居正，堵了北岸之後，這糧食，好東西都給湖南了。其實洪水本身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不得了，廣東、廣西人對洪水的概

念同湖南、湖北就不同，過了就過了嘛，他們河邊街道修的都是騎樓，洪水來了就上樓。洞庭湖過去差不多戶戶有船，一般洪水來了上船。長沙我也熟悉，靠河邊的街道是進水的，水一退就完了嘛，有什麼了不起的。到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大方針，一定要把洪水堵起來，用一個個水庫來裝洪水，而對堤防的興趣不大，做了加高加固堤防的方案也不認真執行。所以這種思想的危害，多年來就很厲害了。

五十年代一開始修淮河，毛澤東說：“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當年，修淮河是個什麼思想方針呢？淮河是條什麼河呢？它是一條扇形河流，上游的支流都很短促，到了下游安徽就變成淮河幹流了。修淮河的時候都是單一的防洪水庫，開始都是在上游支流修佛子嶺、磨子潭、梅山這些水庫，都是單一的防洪水庫，這些水庫控制的流域面積加在一起，不到百分之五，控制不了淮河的洪水。後來想到在幹流上修個大水庫來裝洪水。所以淮河一開始修的防洪水庫起不了多大防洪作用，至於這些水庫發展灌溉，建水電站，都是後來的事情。

水庫的功能單一，只是追求防洪。

一九五二年我調到北京來主管水電，第一個碰到的是什麼問題呢？水利部修官廳水庫，要防洪水，永定河要永安嘛，水庫只防洪，不發電的。修個水庫不發電，即沒有綜合利用的思想。當時官廳有兩套泄洪措施，一套是從壩頂溢洪道泄洪；另外右岸還有個泄洪隧洞。於是，水電總局向水利部建議，那個洞就做發電的引水洞行嗎？就等於是防洪嘛，你把水給我發電不就完了嗎？可是，這個洞不能給你用，我要放洪水的。後來沒辦法，我們只能在左岸重新搞地質勘察，重新打隧洞，建電站。官廳水庫修成了以後，那個電站也修好了。水庫範圍的地質調查也是水電總局補作的，因為發電怕漏掉了水，防洪則不管漏不漏。淮河水庫的水電站都

是後來建的。多年以來，水電系統同水利部門在工作上就存在這個矛盾，水利部門後來雖然也有了綜合利用思想，但是有一個總的指導方針，總想用水庫把洪水裝起來，從淮河、黃河一直到長江，一貫是這樣的，這個問題從方針來講是不合理的。防洪當然重要，是國家大事，但是要實事求是，首先要根據這個地方的水情、汛情來安排，而且應當肯定，防洪主要靠堤防。同時，還要靠臨時分洪、蓄洪，河道本身要經常疏治。

可不可以加個防洪保險的辦法？有一個經濟的問題。三峽，幾千億投下去修個水庫，爲了防禦多少年一遇的洪水，這几千億下去以後，多少年它不來，如果不計發電收入，投入資金及其利潤，加在一起的損失是多少？是很可怕的數字。搞不好，幾十年，是多少萬億。所以沒有經濟思想，只管花錢，不管收入，這是導致上述這種單一用水庫防洪的一個根本原因。現在西方，防洪加用保險的辦法來解決，這叫非工程措施，出了問題，由保險公司賠付。採用工程措施，想一口就吃個大胖子，把洪水都裝進去，是絕對不合理的。過去提出三峽蓄水高程二百三十五米的方案。後來退到二百米，現在退到一百七十五米。可是一百七十五米還是有問題的。三峽的問題非常複雜，爲了防洪應不應當修，作用有多大？現在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所起的防洪作用，裝的水最多到二百億立方米，可是將造成重慶港的淤積。

## 五、令人憂慮的泥沙、泥石流

今年長江洪水出的問題就很大。湖泊的分洪能力減少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長江中游百分之八十先澇後洪。三峽水庫修在宜昌上游，解決不了中下游地區暴雨造成的澇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不少地方是平原，洪水

水位抬高以後，兩岸的雨水流不到長江去了。所以先澇後洪，百分之八十都是先澇後洪，修了三峽，也解決不了澇災。三峽水庫從防洪來講，主要對哪裡有作用？對湖北荆江大堤，就是沙市那一帶，對荆江北岸可以起到減緩的作用。如果不修三峽工程，林一山他們就用這樣的語言：遇到一八七〇年特大洪水，荆江一破堤，就是上百萬人要淹死。幾百萬畝土地要泡湯。但一八七〇年荆江大堤並沒有潰決。現在的荆江大堤比一百多年前加高、加固得多，怎麼會潰決呢？怎麼我們這個時代能淹死上百萬人呢？不是開玩笑嗎？不可能發生的。現在我們的氣象預報日益進步，長江的洪水來臨可以預做準備。

過去蓄洪的湖面大呀，現在圍湖造田，越來越小。

今年朱鎔基下死命令了，必須加固堤防，退田還湖。過去我們都講過，他們就是不聽。一九八四我在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再談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中，就談到過加固堤防和利用湖泊窪地防洪的重要作用。我提到一九五八年中央成都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要抓緊時機分期完成各項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別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窪地蓄洪排漬工程等決不可放鬆。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林一山、錢正英等人就是一心一意要建三峽工程，而忽視加固堤防工程和其他防洪措施。我還談到：“長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窪地，本是泄洪的良好場所。但是在過去‘以糧爲綱’的方針下大量圍墾，湖面逐漸減少，原有通江湖泊二萬多平方公里，已減少了約一萬平方公里，泄洪能力大大減少，抬高了江湖洪水位，增加堤防的防洪負擔和洪水威脅，還破壞了生態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還湖，不僅可以改農爲漁，提高經濟效益，改善生態環境，還可以恢復其泄洪作用，是適於自然條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二萬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積，利用

一米水深蓄洪，即有二百億立方米的容積，即相當於三峽工程一百七十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庫容。”但是這種建議沒有引起注意，到今年發大洪水了，才後悔了。

所以我就覺得，過去中國很多事情，都是幾十年之後才後悔。像馬寅初警告人口問題，當初不聽馬寅初的，人口現在和將來都成為最嚴重的問題。不聽梁思成的，把北京城牆拆了，整個老北京的傳統風格不再存在，到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這個三峽工程會不會五十年之後、一百年之後再後悔呢？人們會不會說，為什麼當時不聽李銳的，不聽這些專家的？我擔心這個問題。

就有這個問題。他們不聽中央成都會議通過的決議，硬是把長江防洪寄托在三峽工程身上。不但三峽防洪庫容有限，淹沒損失、移民問題等嚴重，而且蓄洪水位達一百七十五米，回水回到重慶。大洪水帶來的大量泥沙和卵石就會淤積在重慶港區。將來的危險性在於重慶可能變成死港，嘉陵江口都被泥沙淤成攔門沙，壅高嘉陵江的洪水位，增加重慶市的洪災。重慶港有淤死的危險。泥沙問題在論證過程中間並沒有解決，他們說，這個問題將來總有辦法解決的，他們就是用這種語言來通過論證的。所以現在有些專家建議降低三峽水庫蓄水位至一百六十米，一百六十米回水就不到重慶。

據說三門峽也是遇到泥沙淤積這個問題。

三門峽大壩剛建成，開始蓄水時，泥沙淤積就向渭河上游延伸，即將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周總理召開會議，決定放棄原來設計的防洪和發電方案，打開壩下底孔，並在壩旁山內開挖大隧洞，泄洪排沙，從而緩解了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可是，他們不接受這個教訓，仍一意孤行。長江三峽不僅是泥沙，還有卵石、礫石，常年累積壅高重慶以上洪水位，會造成四川上游的洪水災害。這是黃萬里根據他的實踐

考察得出的結論。黃是水利專家，當年修三門峽時，他預言過後患。他認為三峽大壩決不可修。

許多專家文章談到，三峽工程一個大問題過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就是泥沙問題很難解決。而且水庫的清水下泄，會沖刷堤壩根基，帶來隱患。

沒有修三峽，原來泥沙沖下去，沒事。三峽水庫攔截泥沙造成淤積後，還會出另外的新問題，它放下去的水比較清，這樣對下游河床的變化就發生影響，搞不好下游的堤防就會受到沖刷，堤本身出問題。很多專家提出這個問題，堤防的基礎被掏，堤防就站不住，這是新的問題。此外，兩岸的生態環境，移民問題，是極其令人擔憂的嚴重問題。三峽是一個幼年河谷，在地質上講，是一個不穩定的河谷，兩岸山坡不穩定，容易發生滑坡岩崩，過去查勘水庫範圍內共有四百處這樣的險區，現在已增加到一千多處。明朝的時候，長江有兩次大岩崩，使長江被堵塞，引起斷航，最長的斷航是二十多年。近年來三峽庫區雲陽、奉節、巫山、巴東，也曾發生過多次滑坡岩崩，沖毀房屋、田地，滑坡體侵佔長江江面，影響航運。三峽中礙航的險灘，都是歷史上滑坡、岩崩造成的。建成水庫以後，兩岸水位抬高，山坡經長期水泡之後，增加它的不穩定。而且移民還要後靠，水庫內的十幾個縣，下面的好地都開了，往上開墾荒坡，當然又增加破壞。還有七百多個工廠要往上移。城市還要往上移，這不得了，真是不堪設想，可怕之至！破壞植被，水土流失更嚴重。破壞植被，遷建城鎮之後，這些嚴重的問題已經開始出現了。

水庫水位高了以後，泥石流的隱患是不是會更厲害？

當然更厲害。庫區十幾個縣原來都有泥石流。這個問題，當年在中國顧委小組開會時，大家議論。我那個小組裡的賀彪同志，當年在洪湖、鄂西山區打過游擊，他對這一帶的

泥石流印象特深，他是堅決反對修三峽工程的。現在問題擺在這裡，水庫修成以後怎麼辦？一百多萬的移民，西方人要嚇得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

可不是，他們一個國家解決一萬人就了不得。

這個問題我體會最深。我經手的最大移民是新安江。新安江應該說還是一個成功的水電工程，水庫形成的千島湖變成旅遊區，因為它沒有泥沙問題。水庫淹沒兩個縣城，移民二十八萬人。當年敲鑼打鼓，幾百塊錢一個人，把人歡送走了。一九七九年我回來以後，新安江已建成快二十年了，還有兩萬人發生問題，水沒有淹到那兒，他就回來種地。還得做工作，又花了一大筆錢，解決這個遺留問題。所以從生態環境來講，三峽庫區山坡的穩定，一百幾十萬移民，十幾個縣城，七百多個工廠呀。現在四百億包了，包不住的。

重建一個縣城現在恐怕都得幾個億。

真是不堪設想。

關鍵是這些人移民後靠之後，又要重新開墾荒地，把植被進一步破壞。

聽說現在不准向上後靠了，二十五度坡地不准開墾，那麼，移民要靠外遷了。

## 六、“回眸一笑百病生”

從發電的角度看，是否有必要修三峽工程呢？

從發電來講，幹嘛要三峽電站呢？別的問題不談，三峽這麼巨大的投資，而上游要建水電站，花錢少的多哪。金沙江他們過去不管的。後來聽說泥沙問題厲害，泥沙從金沙江下來的，決定三峽上馬之後，錢正英等人才到金沙江去看了。金沙江上的幾個大水電站，如溪洛渡、向家壩等，還有大渡河的瀑布溝、嘉陵江的合川等，很少淹沒損失，投資也



少，水電系統早都勘察設計好了，由於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三峽，就是上不了馬。泥沙一半來自金沙江，他們現在會對上溪洛渡等積極起來的。

我也聽說，從發電來講，在上游建水電站，確實投資又少又快效益好得多。

當年建葛洲壩就是一個錯誤，花錢特多，發電性能又差，對航運不利。爲什麼？它沒有水庫調節，不能在電網內調峰（這本是水電站的優勢），調峰就要影響航運。再則，汛期就沒有水頭了，洪水一下來，落差就小了，甚至於洪水極盛時難以發電，是很有問題的一個水電站。當年拿這個錢，修別的水電站，又快又好又多又省。

專家說是四川、貴州那一帶這類水電站很多。

主要是四川。我曾預言，三峽一上馬，水電就沒有什麼文章了。我這本書中都談到的，這兩篇文章你都可以看。這是一九九五年寫的，三峽上馬水電就沒文章了，爲什麼呢？國家沒有投資了。電力部一位管水電的副部長，我講這個話時他沒怎麼感覺到，三峽一上馬他知道了，說李銳說中了，沒錢了。所以他對風力發電感興趣了。

而且修小的、中型的水電站，對改變當地落後狀況還有好處。

我這篇文章很短，你可以先看。全世界一百年以來，各個國家無不優先發展水電，像美國、歐洲，好開發的都開發完了。

專家說中國還有大量的地方沒有開發呢。

包括印度水電都比我們開發的多。我國水力資源世界第一，開發條件也極其優越，現在開發的水力資源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印度百分之二十多。全世界過去以水電爲主的國家很多，比重達到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三十多個，現在水電比重仍佔一半左右的有四五十個。由於水利部門這樣的防洪

方針，長期好大喜功，堅持催促三峽上馬，嚴重影響了我國水電的開發。前面談到，我長期不贊成三峽急於上馬，是個頑固分子。因為長江上游有投資少，移民少，見效快，大大優於三峽的大水電站。再重復一下，三峽投資過大，移民太多、也太困難，防洪作用有限，尤其航運是難關。它的船閘，第一個最大最高的閘門是六十五米；五級連續船閘，一個閘門壞了，五級船閘都陷於癱瘓。出了問題不得了，技術上世界上還沒有先例。這使我又想起了葛洲壩出問題時，周總理說的話：長江航運第一，出了問題要炸壩。除以上問題外，泥沙問題未解決，還有生態、兩岸滑坡等問題。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中國水電學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我講了下面這一段話（當時四川省的幾位負責人在座）：三峽與水電開發的關係，使我想起白居易《長恨歌》寫唐明皇的悲劇故事。楊貴妃就死在馬嵬坡。“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前面四句似可改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峽多年上馬說。某家有女最堅持，人大投票驚全國。後四句不必動了。三峽開工之後，如我所料，許多急待開工的水電項目，如龍灘等等，只得靠邊站了。在建工程也將因投資緊張而延工期。

“回眸一笑百媚生”，我非常擔心“媚”字變成“病”字，“回眸一笑百病生”，就是三峽水庫修成以後，非常擔心引發其他問題，如泥沙淤積、水庫污染、兩岸岩崩等，真唱起長恨歌來。這就有可能是你講的二十一世紀的長恨歌。三峽論證不簽字的九位專家之一陸欽侃，今年八月四日在《南方周末》發表整版訪問記，談對今年長江洪水的看法。他認為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比一九五四年小。水利部一九八〇年上報國務院關於近十年長江防洪部署，針對一九五四年洪水安排的加高加固堤防，落實分蓄洪區等措施，如果按計劃部署一

九九〇年完成，或後來推遲至一九九五年完成的話，一九九八年洪水就不會如此成災。有些人就是不重視堤防和分蓄洪區的防洪作用。陸欽侃最近兩次上書中央談三峽的泥沙問題並未解決，連當事人也說不清楚。這就是“某家女”突然對金沙江溪洛渡水電工程大感興趣的原因過去從來不關心上游金沙江的，也從來沒有去過。許多好的水電項上不去了，六宮粉黛無顏色。作為這一聯的下聯，可以這樣相對：三峽工程有問題喲。我這是調侃一下。

現在又在大力發展火電了。

從來就是搞火電。

現在又加強了。

我們的火電，煤都不能脫硫，煤不脫硫就變成酸雨，環境污染不得了呀，患癌症的多啦。

所以三峽的問題，從三峽本身來講，從發電來講，都不合理，尤其航運問題。長江從上海可以坐船到宜賓，是世界上最好的通航大江。一九八〇年，水電總局曾經請美國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察看三峽。美國大河流的船閘工程都是陸軍工程師團修的。他們的司令員來了，他看了三峽以後，得出一個結論是：像三峽這樣五級船閘，世界上是沒有的；這麼一條通航的河流，一斷航以後，一億人在四川怎麼辦呢？他認為，從航運來講，三峽不應當修。前面談到黃萬里，現在八九十歲了，清華大學的水利系的教授，他在美國學水利的，三十年代回國以後，四川的河流他去查看過，徒步走過，他認為長江不僅是泥沙問題，還有很多移動的卵石、礫石，問題更厲害，更麻煩。他是堅決反對修三峽的。當年三門峽他的意見也是對的，他不贊成三門峽那樣修，打成了右派後，他更沒有發言權了。三峽他是一直反對的，堅決到什麼程度？他向法院起訴，要告國務院的狀，我過去不認識他，他前幾年到我家裡來過兩次。

一九九七年我八十歲，寫了六首自壽詩，其中一首同我們談的有關，念給你聽：毫矣無窮遺恨篇，至今水電未優先。曾抒壯志好多省，總扭秧歌老大難。“亂點鴛鴦”情理悖，苦掙夾縫路途艱。嗚呼大禹嗟何在，酸雨煙灰滿地天。發表這些詩時，這首有個注解：“水電建設爲此生最長工作崗位，前後共十一年。‘亂點鴛鴦’指上葛洲壩、三峽。‘夾縫’指水利與火電之間。”“亂點鴛鴦”也有過四句，念給你聽：以鄰爲壑四川災，泥石沙奔水庫來。白帝城頭望岳廟，鐵人佷跪恨尤哀。

別人不知道你這佷鐵人是誰呀，對吧？

這是黃萬里教授的說法，反正是論證三峽上馬，主其事者吧。我的牢騷在“六宮粉黛無顏色，三峽工程有問題”。

這兩句話是在你那本《直言》的一篇文章中見到的。

總之，修三峽工程有許多地方是不科學的。防洪，作用有多大？導致泥沙淤積如何解決？發電，你投資多少，回收多少？我幹嘛花這麼多錢？我修更多、更省、更好的水電站嘛。而且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呀。四川河流水位都抬高，怎麼得了。我幹嘛修這個船閘？長江這麼一條通航的河流，修了船閘出了問題破壞航運嘛。葛洲壩只是一級船閘，低水頭，曾出過多次事故的，出了問題幾個月不通航，你怎麼得了？

反正這些情況不報道，大家不知道。

所以有一系列的問題。原來都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防洪，發電，航運，泥沙淤積，生態，移民，還有重慶。重慶是個什麼問題？世界上沒有這麼一個大城市在一個大水庫上端，在水庫上端有個什麼問題？河流帶來的泥沙進入水庫上端，水的流速就減緩，泥沙即在此淤積，河槽逐漸堵塞，從而影響航運，並逼高洪水位，增加洪水災害。三峽水庫形成後，受害最嚴重的將是重慶市，除上述情況外，還將影響重慶市的排污問題。原來城市污水靠長江流水

自然排散，水庫形成後流速減緩，整個庫區污水不能擴散自淨，還會形成新的污染源，必然嚴重惡化生態環境。現在葛洲壩小水庫範圍內，污染嚴重，魚類絕滅，船民中疾病叢生，不可不鑑啊！問題夠多了，將來疾病的問題很嚴重的，血吸蟲可能再發生。還有魚類問題。哎呀，想到這些，我的頭都要發炸了。就談到這裡爲止吧。

李輝補記：訪談稿交李銳定稿後，他寄來《世界能源導報》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該期上刊載的一篇報道，題目是：《三峽庫內的地質和洪水災害》，全文如下：

據《中國三峽工程報》報道，三峽庫區內發生暴雨，洪水和大量山體滑坡，受到雙重災害，據報庫區一些縣的情況如下：

湖北省巴東移民縣，隱藏著復雜的地質隱患，自八十年代以來曾多次發生震驚全國的大型滑坡和泥石流災害。巴東縣城開始遷建以來，發生過三次大型地質災害，新城在滑坡後遷了建，建了遷，飽受艱辛與苦楚。初次遷至老城上的黃土城，建成了一座投資一點八億元，有二十萬平方米建築規模的新城。一九九一年八月發生一場泥石流，使全城水、電、路、通訊中斷，大量工礦企業受損或停產，受災損失八千九百六十八萬元。一九九四年元月被迫再遷至上游四公里處的白土坡重建新城，建成了三百套移民房和十餘家企業。但與大量的開挖相伴隨而來的大量坍塌、滑坡，一九九五年六月又發生二道溝大滑坡，滑坡體達六萬七千立方米，十月的青竹標滑坡三千立方米，二〇九國道近二百米被推近長江十米，倒塌房屋十五棟，受災損失達三千多萬元。巴東縣再次放棄白土坡，又遷至上游二公里處的西壤坡。一九九八年六月末巴東發生大暴雨沖刷及山洪奔瀉，致使原本地質自然災害頻繁的巴東又發生了多次地質災

害，新老城區發生了二百多處，新城區白岩溝滑坡最為嚴重。全縣十七個鄉鎮、一百六十個村遭受洪水和滑坡襲擊，十六萬人受災。

一九九八年洪水，三峽庫區上端重慶市寸灘最高洪水水位一百八十三點一四米，最大流量五萬七千八百立方米每秒，比一九五四年還大。重慶市所屬三峽庫區受災很嚴重。巫山縣上遭山洪，下遭長江洪水，腹背受災，損失嚴重。全縣各地洪水泛濫，山體滑坡，房屋倒塌，農田受淹，道路被毀，通訊、電力中斷。全縣大型滑坡二〇九處，零星滑坡無法統計，民房倒塌，許多人失去家園。著名的移民示範區桂花新村和七星移民新村亦在此次自然災害中損失嚴重。

##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卸不了的！

《中國水利報》和《中國水利》月刊發表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政協副主席、水利（電力）部老部長錢正英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水利部機關歡慶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會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迎接二十一世紀對水利的挑戰”的長篇講話，引起了廣大讀者的關注。其中第三節“經驗與教訓”的部分約佔全文的一半篇幅，主要論及關於黃河三門峽和長江三峽等有關問題。經詳細拜讀，並查找有關史料，發覺其問題的奧秘，在於她意欲借機推卸其在主持三峽工程論證中所不容推卸的歷史責任。

人們很難想象《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從一九九二年四月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通過至今即將八年，舉世矚目的超大型三峽工程轟轟烈烈正式開工興建也已五年多，而原來主持三峽工程論證的錢部長，卻憂心忡忡提出：三峽工程“人大也算是通過了，現在也開工了，但是從個人思想上講，我對自己主持的論證到現在還沒有做最後的結論。……我感受到最後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當時論證中認為有兩個問題是最擔心的，一個是泥沙問題，一個是移民問題，現在我還加上一個庫區污染問題，我認為這三個總是仍然值得非常重視。”還說：“三峽的論證雖然是結束了，三峽工程雖然是開工了，對論證究竟行不行，還要經過長期

的實踐考驗。”

我們不禁要問錢部長，在一九九零年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上，在一九九二年提請全國人大審議三峽工程時，你何不“實事求是”地交代這些情況？而讓中央領導和全國人大代表們在片面宣傳的形勢下同意三峽工程上馬，出了問題你該負何責？

錢正英部長還說：“對來自反面的意見應給予充分的重視。”今天我們不得不鄭重指出的是，早在十三年以前的一九八七年和十一年以前的一九八九年，我們幾人作為持不同意見者會同眾多專家、學者，曾就有關三峽工程的綜合論證和專題論證，先後合作編著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對有關三峽工程的諸多重大問題（包括錢正英部長擔心的泥沙、移民和庫區污染問題），都作過深入透徹的調查研究和具體建議。但當時主持論證的錢部長對此採取了什麼態度呢？

當第一本書將問世之時，有消息傳來，說“有關主持論證的領導，不滿意你們出這本書，不同意公開發行這本書；主管論證部門寧願出資收買全部（3100冊）新書，也不准讓新華書店公開發售。”這是通過當時的李鵬代總理給國家計委領導對我們所施加的巨大壓力。當然這是難於令人容忍的。經過我們據理力爭，名正言順地進行了合理的申辯後，這本書總算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與廣大讀者見面了。此書出版發行後，輿論界、學術界反映之熱烈出乎意料。首都各大報刊紛紛發表書評，並沖破層層封鎖，發表了眾多的“反方意見”。

在第二本書《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出版後不久的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又寫信給國家計委黨委說：《長江，長江》“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動亂與暴亂制造輿論的書。你單位林華、田方同志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將‘有關材料’送上，供你單位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好在國家計委黨委領導相當客觀地處理了這個問題。這封信雖則並非錢部長親自撰寫，但卻反映了在她直接領導下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內，竟有人企圖使用以政治棍子整人的伎倆。而並不像錢部長今天所說的那樣：“有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不要怕別人提出問題，就怕別人看到問題不提。……如果有徹底的唯物主義態度，就不怕人家提問題，問題早提有好處。可以避免錯誤。”按照錢部長今天所說的，那麼，十多年以前在三峽論證過程中針對錢部長現在所擔心的三個問題提出的正確意見，不僅未被採納，反而被橫遭誣陷打擊。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今天對此該如何正確看待呢？

歷史有時候真會對人開玩笑。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以整版篇幅詳細刊登該報記者對“錢正英的訪談錄——三峽工程的前前後後”，這是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通過“三峽工程決議案”的前夕。錢部長成竹在胸，滿懷信心地對記者侃侃而談。在結束訪談時並激動地說：“啊呀！我跟你講，我經手的大小水庫也數不清了，但修一個水庫就挨一次罵。這一次，我開始接受三峽論證任務時，家裡孩子都反對，”說：“你幹啥呀？你做了那麼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個給大家罵的事情？萬一搞得不好還得坐班房，殺你的頭不足以謝天下；”錢部長對那時這種慷慨悲歌與豪言壯語，今天又該作何感想！？

現在，我們擬分別就錢部長提出的黃河三門峽和長江三峽等主要有關問題作以下商榷。

## 一、關於如何正確吸取三門峽工程改建的 經驗教訓問題

在提到一九五五年黃河規劃要建“三門峽高壩大庫，全部攔蓄黃河泥沙，從而把黃河一勞永逸地變為地下河”時，錢部長說：“挖私心來講，我們自己內部有一個小算盤，那時水電和水利是分開的，水電是電力部，水利是水利部，三門峽這個項目馬上就要上，爲了爭取三門峽的領導權，就是三門峽歸水利部主管，還是歸電力部主管，我們的調子也高了，都贊成搞三門峽了。當然也有認識上的問題，儘管有些懷疑，但是大家都相信，所以也相信了。”就是說，爲了爭取三門峽建設的領導權，儘管還有懷疑也就相信了。

一九五六年在審查三門峽高壩大庫的初步設計時，水電總局技術員溫善章提出低壩滯洪排沙方案；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提出壩底留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以備刷沙出庫；曾參加黃河規劃的水文水利專家葉永毅提出初期利用底孔排沙的運用方式等，都未被採納。看來，錢部長對於“爭取領導權”是非常積極的，但是，對於工程建設中的重大不同意見，並不是像今天那樣的“徹底唯物主義者”。

三門峽工程於一九五七年四月開工，一九六零年大壩建成，在堵塞導流底孔開始蓄水後，就發現庫區泥沙淤積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經陝西省強烈反映，水利電力部於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召開了兩次三門峽問題座談會，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總理於一九六四年召開治黃會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經反復研究，下決心對三門峽工程進行改建，由高壩大水庫蓄洪攔沙改爲低水位滯洪排沙。周總理還說：“底孔排沙過去有人曾經提出過，他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學生（指溫善章），當時會議上把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他批評得很厲害。要登報聲明，他對了，我們錯了，給他恢復名譽。”

隨即對三門峽工程進行改建，在岸邊開挖兩條大隧洞和利用四條發電引水鋼管，進行泄洪排沙。但因隧洞進口和發電引水鋼管的位置較高，泄洪排沙能力不足，洪水期水庫水位難以下降，庫區泥沙仍在繼續淤積。於是又進行第二次改建，將已被堵塞的位置較低的導流底孔，在水下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再行打開，以盡量增加低水位時的泄洪排沙能力；同時降低發電進水口，以便在低水位下發電。這樣才使水庫水位得以下降，進行有效的泄洪排沙。

三門峽工程自改建以來，經過降低水位暢泄，至今潼關以下峽谷庫區經沖刷趨於沖淤平衡；但在三門峽大壩上游一百一十四公里的潼關卡口，曾被淤高五米左右，迄今尚未沖掉，形成二級壩；潼關以上還在繼續淤積，遺留問題尚未解決。從三門峽工程的實踐可明顯看出，水庫泥沙淤積起來很容易，但在水庫上段淤積後再要想沖掉就很難。

長江三峽的泥沙雖然沒有黃河多，但也不少，居世界第三位。而且長江上游的泥沙比黃河下游的泥沙粗，還有沙礫卵石，更加易淤難沖。在水庫上段淤積後再想沖刷掉將更加困難。

黃河三門峽工程是我國水利水電建設中一個嚴重的規劃決策上的失誤，對水庫泥沙淤積和淹沒損失移民問題太不重視；事前不聽取不同意見，在興建後又被迫反復改建，浪費了大量資金，給庫區人民造成很大困難。原設計水庫水位三百三十五米時估算的移民數為二十一萬九千人，現在包括庫區塌岸和高水位遷移後返遷人口，共達五十六萬人。而其結果既解決不了黃河下游的防洪和泥沙淤積問題，還要因此興建耗資幾百億元的小浪底工程；對上游則增加了泥沙淤積和洪澇災害，經驗教訓甚為深刻。

規模巨大的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泥沙淤積還將影響重慶港的航運，水庫淹沒移民更多，庫區污染必更為嚴重，理應認真吸取三門峽失誤的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再犯更大的錯誤。

遺憾的是，在三峽工程論證時，曾對在三門峽提出降低庫水位排沙方案，經周總理指出“他對了，我們錯了”的溫善章未被邀請參加；他所提出《對三峽正常蓄水位的建議》（載《能源政策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建議三峽採用正常蓄水位一百六十米，壩頂高程一百六十五米方案，泥沙淤積可不影響重慶市區，還可減少移民五十萬人，也未予理睬。

三峽工程論證時邀請了清華大學好幾位老教授，就是沒有邀請對三門峽工程曾提過正確意見、反對修建三峽的黃萬里教授。

曾對黃河泥沙有深入研究的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前所長方宗岱，也沒有讓他參加泥沙專家組，他給防洪專家組提出的泥沙淤積將威脅重慶市防洪安全的意見，也未被重視。

以上情況顯然是與中共中央、國務院[1986]15號文對三峽工程論證所要求的“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廣泛征求意見”相違背的，也是不利於吸取黃河三門峽工程改建的經驗教訓的。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那時的錢部長竟是今天錢部長的反面，今天所說的最漂亮的話，也洗刷不了那時極力“壓制不同意見的責任”。

## 二、關於如何正確看待“文革”前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問題

錢正英部長爲了表示她一貫正確，所以特別強調說：“我個人的觀點，長江規劃肯定要以三峽工程爲主體，但是我

在‘文革’以前一直不主張上馬，認為那個時候沒有條件。”

實際情況究竟如何？一九五八年二月末三月初，周恩來總理帶隊到三峽考察，在船上聽取各有關方面意見。當時明顯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方是林一山，主張長江流域首要任務為防洪，首先要在長江幹流上建三峽大水庫；另一方是李銳，主張要根據經濟技術條件先支流後幹流。有記錄在案的錢部長的發言，則是明顯支持林一山而反對李銳的。她說：“我過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這次林一山同志提出的報告也是對的”；“李銳同志提出爭論的意見，我認為是屬於一棍子打死”，“今天李銳同志剛才的批評，仍有些過分的地方”。錢部長所支持林一山的主要觀點是“不首先肯定三峽，幹支流關係是很難正確肯定的。”

在這次查勘三峽後，中央成都會議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的《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中，在“三峽工程是長江規劃的主體”後面，加了一句“但是要防止在規劃中集中一點，不及其他和主體代替一切的思想。”這是對片面強調三峽工程的明確批評。

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成都會議上，通過了三十多個有關“大躍進”、總路線的決定和文件，三峽工程沒有趕上這個大浪潮。接著就“反右傾”、三年災害，調整鞏固，在“文革”前才都不談三峽了。

### 三、關於如何認識三峽工程論證中的重大問題

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十二大提出二十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考慮要上三峽工程，但規模太大，移民太多，難以興建。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萬里副總理等中央和有關部委的領導，當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的李鵬等，於十月七至八日赴宜昌查勘三峽，聽取長辦關於三峽工程情況的匯報。回

北京後初步提出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的低壩方案。十一月二四日國家計委向小平、耀邦、紫陽、萬里、依林等領導同志匯報《關於二十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問題》時，談到準備興建三峽工程，小平同志說：“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

長辦在過去研究三峽工程各種高低蓄水位方案的基礎上，於一九八三年三月編制完成的《三峽水利樞紐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可行性報告》，壩頂高程一百六十五米，利用超蓄水位至一百六十點七米，可防禦百年一遇洪水保護荊江大堤的安全。裝機容量一千三百萬千瓦，年發電量六百五十億千瓦時，水庫移民三十三點三萬人。

一九八三年五月由國家計委召開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查會議，領導小組有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平及有關部委領導包括錢正英、林一山等十六人，邀請參加審查的各有關方面的代表和專家約三百五十多人。經過審查討論，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宋平同志在總結發言中說：領導小組按照多數同志的意見，擬向國務院建議批准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一百六十五米壩頂高程的方案。

後來，水利電力部由錢部長簽發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以（八四）水電計字第六十一號文報國家計委並報國務院《建議立即著手興建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報告》，列出了長辦研究過的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一百六十米、一百七十米、一百八十米、二百米等各種方案，經部黨組討論提出了幾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正常蓄水位應定在一百八十米以上；第二種意見是在一百五十米基礎上作適當調整，將大壩加高十米，將來如移民順利，可抬高蓄水位至一百六十米；第三種意見是在前兩種意見中取一個中間方案，即正常蓄水位定在一百七十米左右。並說“一致認為，三峽正常蓄水位的選擇，涉及面廣，影響深遠，事關重大，是國家的一項重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要戰略布局，不是在一個部範圍內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中央縱觀全局、權衡利弊作出決策。”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國務院以（八四）國函字第五十七號文原則批准《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並指示：“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即同意水利電力部二月十五日報告中所提第二種意見）。

重慶市一九八四年十月提出不同意見後，一九八五年二月中央、國務院決定由國家計委牽頭，國家科委協助，組織有關方面進行關於三峽工程水位方案的論證工作。一九八五年及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組織了全國各有關部門（特別是水利電力部）的設計研究單位、高等院校的專家們，成立了三峽工程綜合評價組，對三峽工程進行了系統的綜合評價研究，先後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召開了規模較大的三峽工程綜合評價專題論證會和經濟評價討論會。

錢部長說：“最後到一九八六年幾經周折，決定要我組織重新論證。”不知為何幾經周折和經過什麼樣的周折，中央和國務院又要求水利電力部重新論證三峽工程，而不要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繼續組織論證了？同時，水利電力部的領導不知為什麼又改變了一九八四二月十五日報告中所說“三峽正常蓄水位的選擇，不是在一個部範圍內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中央縱觀全局，權衡利弊作出決策”的態度，而從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手中接過三峽工程論證這個領導權！？

錢部長領導三峽工程論證於一九八九年結束，但“到現在還沒有做最後的結論”，她最擔心的三個問題的事實究竟如何？現分述如下：

## （一）泥沙淤積問題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鵬就提出：“泥沙淤積是否會影響重慶航運的問題，要做出負責的結論，有了明確的回答，工程才能正式開工。”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上李鵬又說：“黨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領導同志最關心這個問題（泥沙淤積礙航問題），要作出認真負責的回答，而且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三峽能不能上馬和開工，取決一這個問題能否得到妥善的解決。”而在三峽工程已經開工五年多的今天，主持論證的錢部長卻說“還沒有做最後的結論”，“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周總理在聽取葛洲壩工程匯報時嚴肅指出：“長江是一條大河流，不能出亂子。如果航運中斷了，壩是要拆的，那就是大罪。那和黃河不一樣，黃河不通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周總理又說：“長江上如果出問題，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要載入黨史的問題。”查這兩次談話記錄，錢部長都在場的。時至今日當不至無動於衷！？

在三峽工程論證時，明知“低水位方案（一百五十、一百六十米）水庫淹沒損失和移民及工程投資都較小；泥沙淤積問題較清楚，解決措施較有把握；工程效益也都有相當規模。高水位方案（一百七十、一百八十米）水庫淹沒損失和移民數量；泥沙淤積已不同程度的影響重慶市區、港區和嘉陵江口”。不少參加論證的老水利水電專家，如施嘉燭、張昌齡、覃修典、李鶚鼎、羅西北、黃元鎮、陸欽侃、何格高、張啓舜等都提出採用較低方案的意見。而領導小組為何就是不聽這些專家的忠告，卻堅持較高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

附：  
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再者，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於一九八八年七月所作《一九五四年大三峽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對重慶港區影響的試驗研究》，結果顯示，重慶港區主河槽基本被淤死，再經兩年沖刷已難以沖開的嚴重礙航情況，已說明一百七十五米高方案泥沙淤積問題的嚴重性。難道非要在三峽水庫真正釀成巨大禍害才行嗎？

## （二）移民與環境問題

關於水庫移民與環境問題，中國科學院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科研領導小組一九八五所作《三峽工程不同蓄水位對生態與環境影響的初步論證報告》的結論說：“三峽大壩興建後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綜合衡量，一百八十米方案所帶來不利影響要大些，問題要復雜些，也較難於對付，而一百五十米方案較為穩妥些”。

三峽工程論證時所邀請的生態與環境專家組顧問侯學煜、馬世駿和專家陳國階，以及特邀顧問孫越崎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培源等，都曾指出三峽庫區大量移民和淹地，是超過了本地區環境容量許可的。而三峽工程論證的結論，卻認為“庫區移民環境容量研究結果表明，淹沒涉及的各縣（市）都有潛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縣（市）範圍內統籌安排解決。”然而，近幾年的移民工作實踐則恰恰相反，並已充分證明“三峽庫區農村土地容量嚴重不足，必需進行外遷。”並已不得不作出安排十二點五萬人遷到十一個省市的決定，勢將大大增加移民難度和移民費用，也不利於移民遷出區和移民遷入地的社會穩定與安定團結。

### (三) 庫區污染問題

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審議三峽工程時，重慶市人大代表強烈反映，三峽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淹及重慶市市區所有排水口，污水排放的流速降低，岸邊污染物濃度升高，環境污染嚴重。五十一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的《請求專題研究與評價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經濟與環境影響的議案》，不應沒有交代。

今年“兩會”期間，四川、重慶許多代表、委員談起對三峽庫區嚴重的水污染無不非常激動。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資源綜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陳萬志說，必須在成庫前整治沿江城鎮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患於未然。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環境保護局黨組書記朱天開說，我們不能讓長江變成第二條黃河，不能讓長江成為像海河、淮河那樣污染嚴重的河流。全國政協委員、高級工程師姚峻談到對長江上游水質污染嚴重狀況時說，據統計，四川省、重慶市年污水排放量達三十多億噸，而年生活污水處理能力不到四億噸，加上長江幹流上十多萬艘船舶的油污、生活污水都排放江中，使長江水質不斷惡化。同樣威脅長江水質的還有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沿岸堆積固體廢棄物。報紙報道的標題是：“長江快變成下水道了！”

如按三峽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六十米，則上述泥沙淤積、水庫移民、庫區污染等困難問題都能得到緩解。與高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相比所差防洪、發電、航運效益，都可從支流水庫得到補償，在三峽論證中是否還存在中央成都會議所批評的“在規劃中集中一點不及其他和以主體代替一切的思想”？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 四、關於長江防洪的指導思想和責任問題

一九九八年長江剛遭受大洪災，而錢部長在這長篇講話卻避而不談長江的防洪問題，顯然是不應該的。

查水利部於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由錢正英簽發上報國務院的（八十）水辦字第八十號文《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報告》，對長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防洪部署，主要為：培修鞏固堤防，盡快做到長江幹流防禦水位比一九五四年實際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擴大洪水泄量，落實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額洪水。

上述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應在一九九〇年完成，但因實施不力，完成很差。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水利電力部又由錢部長簽發了（八七）水電計字第三百一十三號文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置執行情況的報告》，要求推遲至一九九五年完成此項任務。但是到一九九八年大洪水來臨時此項任務仍未完成。究意是什麼原因？在三峽工程論證期間，不少專家強烈呼吁先做好長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興建三峽工程，作為水利部長是怎麼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

一九八〇所定長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禦一九五四年大洪水為標準。一九九八年長江中下游洪水比一九五四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實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過這次洪水，不會那樣被動而釀成那樣巨大的水災損失。由於對培修鞏固堤防不重視，一九九八年洪水時長江中下游堤防出現各類險情七萬三千八百二十五處，經廣大軍民奮力搶險，還造成淹沒耕地三百五十四萬畝，受害人口二百三十一萬人，死亡一千五百二十六人，倒塌房屋二百

一十二萬間。如果長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話，本應可大大減少災害，此豈不值得反思嗎？

李銳在“談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問題”文中提出：“我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向中央領導同志寫的一份意見書中談到，水利部門的防洪指導思想多年來存在以下問題：（1）江河防洪標準要求過高；（2）重工程措施，輕水土保持；（3）重水庫蓄洪，輕湖泊窪地分洪滯洪；（4）重蓄輕排，重水庫輕堤防與河道整治；（5）重防洪輕除澇。”李銳在意見書的末尾，還具體建議“水利工作應回顧歷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切莫護短，這樣才能實事求是走上正道。”

我們很同意李銳的建議，五十年來，新中國的水利工作特別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工作究竟取得了什麼樣寶貴的經驗教訓，實在需要進行一番認真的總結。這樣的總結，理應是集體的，即使是個人的回顧，也應當是全面、公正、客觀的，決不容許借口總結經驗教訓，而掩飾、逃避個人的責任。這樣攸關若干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國家大事，並不是個人坐班房、砍腦袋的私事。作為長期主管水利部門的老部長，確實應當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了。

三峽工程如果不考慮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運行而封堵底孔，就提高到一百七十五米高水位。那麼，問題的嚴重性將導致後患無窮。爲了對子孫後代切實負責，主管當局的確應予充分重視並予解決。

張廣欽（原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黃萬里（清華大學教授）、金永堂（水利、水電科研院高級工程師）、金紹綱（北京師範大學高級教師）、田方（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林發棠（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二〇〇〇年三月八日

附：錢正英應負的責任是推御不了的！

## 附：談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問題

關於今年長江的洪水問題，報刊已發表了一些成災原因的論述，多指出上游水土嚴重流失，中游蓄洪湖泊銳減等，乃關鍵所在；也有專家、院士認為，早修三峽就好了。九月四日的《南方周末》整版刊登記者專訪：《陸欽侃眼中的長江防洪》，導讀標題為：“天災因素與人禍影響”；“十八年前《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報告》所提出的諸項任務，迄今尚未完成。”陸是水利水電與防洪規劃的老專家，四十年代到美國參加過薩凡奇的三峽計劃研究，從五十年代起，一直參加三峽工程的規劃論證。我認為陸的這個長篇談話，真正涉及到長江防洪問題的要害，即水利部門如認真執行了自己的原定計劃，今年的水災並非不可避免。

今年長江洪水形勢，上中下游都同一九五四年相似，但洪水總的來量比一九五四年少，宜昌、漢口、大通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過警戒水位的天數，都不及一九五四年。有些河段及沙市、監利、城陵磯、九江、湖口等城市的水位，則高於一九五四年。

有史以來，長江是一條具有很好的自調蓄泄功能的河流，洪災並不很嚴重。宋以前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泄調蓄洪水，演變到本世紀，僅存南岸四口。國民黨統治時期，聽任湖泊長期淤積，盲目開墾湖田，湖泊調蓄作用大減，導致水災嚴重。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似乎認識到這個教訓，但由

於實行“蓄洪墾殖”的水利方針以及“以糧爲綱”的戰略，“要超綱，開湖荒”，導致圍湖造田日趨嚴重。長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一九五四年通江湖泊共計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平方公里，到一九八〇年僅存六千六百〇五平方公里。如湖北的洪湖、西涼湖、東西湖等通江湖泊的湖口全被堵塞了；洞庭湖、鄱陽湖都新增圍垸，減少蓄洪容量近半。長江兩岸新建很多碼頭港口，直至河床亂建、擴大居地，長期不加強控制管理。長江流域上游本是關內森林覆蓋最高地區，自“大躍進”大煉鋼鐵亂砍林木以來，森林植被一直遭受破壞，導致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泥沙下泄，河床壅高，湖泊淤積。

一九五四年洪水之後，爲解決長江防洪問題，水利部門一直催促三峽工程上馬，認爲這是最有效的一勞永逸之法。這時我在電力部主管水電建設，很不同意這種意見，曾展開一場關於三峽的爭論。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向中央寫的有關報告中，這樣談到長江防洪與三峽的關係：“防洪本身也必須是綜合規劃，即幹流水庫、支流水庫、湖泊窪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者不能偏廢；應根據條件，見效快慢，逐步提高防洪標準。”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南寧會議討論三峽問題，曾否決了三峽工程盡快上馬的意見。三月間，周總理率領各有關部門領導和大批專家查勘三峽，討論三峽和長江防洪問題，聽取各方意見。隨後召開的中央成都會議上，由周總理主持起草，聽取各方意見，通過了一個決議：《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我曾列席這次會議並參加了這個文件的起草。《意見》第四項是有關長江防洪問題：“長江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發生一次，要抓緊時機分期完成各項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別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窪地蓄洪排漬工程等，決不可放鬆。在防洪問題

附：談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問題

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記得這最後一句話是我加上去的。成都會議通過的三十幾個有關“大躍進”、總路線的決議和文件，如過眼煙雲，早被世人忘卻，唯獨關於三峽的這個決議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以後，六十、七十年代的情況我不清楚，只知道不論水利部門怎樣催促三峽上馬，直到去世之前，毛主席和周總理從來沒有過首肯之辭。

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八〇年，發生過一次洪水。水利部根據國務院要求，召開長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談會，經討論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報告》。《報告》中說：“從實際出發，長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務是，遇一九五四年同樣嚴重的洪水，確保重點堤防安全，努力減少淹沒損失。”從而定了五項措施：“（1）培修鞏固堤防，盡快做到長江幹流防禦水位比一九五四年實際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擴大洪水泄量。沙市由四十四點六七米提高到四十五米，湖口由二十一點六八米提高到二十二點五米，南京定為十點五八米，上海定為五點一米。其他堤防，各省自定標準。（2）落實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額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區、洞庭湖區、洪湖區、武漢附近區、湖口附近區，共分洪五百億立方米。（3）停止圍墾湖泊。（4）整治河道，擴大泄洪能力。（5）加強防汛。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內安排長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三十四項，需投資四十八億元。”

我是一九七九年平反復職的，當年就卷入三峽上馬的爭論。一九八二年三月，我從電力部退下來時，見到財政部的一個文件，尖銳批評水利部門亂用投資及一個水庫工程問題嚴重等情況。於是我向中央寫了一份《對水利工作的意見》萬言書。同年七月，國務院召開的水利討論會上，此件作為會議頭號文件印發了。我的意見書中談到，水利部門的防洪指導思想，多年來存在以下問題：

(1) 江河防洪標準要求過高，要在短期內解決力不勝任的防洪任務，而不是根據具體情況作經濟比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卻因圍湖圍灘和河道洪障不加控制，以及泥沙淤積等原因，使一些重要河道排洪能力有所下降（如淮河目前已低於一九五六年）。

(2) 重工程措施，輕水土保持。據調查，近年全國水土流失更趨嚴重，黃河、長江泥沙都在增加。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也是重工程措施而輕生態保護。“水土流失關係民族命運”，這恐非危言聳聽。

(3) 重水庫蓄洪，輕湖泊窪地分洪、滯洪。一方面熱衷於修防洪水庫，不惜淹沒損失，勞民傷財；另一方面，原有分滯洪水的湖泊窪地，長期以來注意不夠，措施不落實，洪水來臨，不能發揮應有作用；且有的圍墾日增，如淮河的城西湖蓄洪區、海河的文安窪、東淀等都已成田，長江中游的湘鄂兩省尤其嚴重（洞庭湖已較解放前縮小百分之四十）。不適當的依靠水庫防洪的思想，以及水庫的防洪如何同綜合利用更好地結合，仍然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4) 重蓄輕排，重水庫輕堤防與河道整治。一九五四、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六三、一九七五、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各年大水，幾條大江大河還是主要靠堤防防洪。堤防與分洪，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最主要的防洪辦法（至今美國也是這樣），相信二十一世紀以後也必將如此。令人擔心的是，現有堤防的質量問題還不少，遇到較大洪水要臨時搶險；河灘造林和阻水建築物影響行洪，比較普遍，長期得不到解決。

(5) 重防洪，輕除澇。我國水災最嚴重的一百萬平方公里平原地區，內澇十分嚴重，對農業威脅很大。即使提高了防洪標準，堤防未決，仍然會有嚴重澇災。一九五四年長江洪水，受災面積中，漬水內澇及先澇後洪約佔百分之八十。



一九八〇年亦與此相似。此種情況，即使建成三峽水庫，也是不能解決的。海河、淮河等平原地區，除澇標準都還很低。

我的意見書的末尾，有幾點具體建議，如水利工作應回顧歷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切莫護短，這樣才能實事求是，走上正道。主要是徹底清理三十年來“左”的思想，徹底糾正“左”的錯誤。要切實加強水土保持工作，對此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扎扎實實抓下去。防洪方針應切實實際，著重發揮和加強現有防洪工程和措施的作用，以堤防為主，充分利用原有的蓄洪、分洪、滯洪工程。

八十年代，水利部領導方面最關心之事仍在三峽上馬，上述《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報告》所定措施，並未抓緊一一落實。因此，一九九〇年七月，姚依林副總理在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結束時，特別講到：“長江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已有三十多年沒有發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測風雲，要居安思危，早籌良策。當前要繼續抓緊一九八〇年平原防洪方案（指前述《報告》中的部署）的各項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設。”深為遺憾的是，一九八〇年所提“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已經十八年了，未能落實。以堤防而論，當時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漢市堤、無為大堤、同馬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護岸培修、洪道整治等工程，至今尚未完成。一九九五年汛期，長江幹堤曾發生險情二千五百六十二處；一九九六年汛期，繼續暴露堤身未達標及堤質諸多隱患。今年大水，又發生滲漏、管涌、塌坡、涵閘等幾千處險情，甚至決口成災。加強堤防並非大難之事，這只能說，主其事者志不在此。於是洪水來臨時，只得動員群眾，調遣部隊，千萬人緊急搶險。這就是七、八兩月電視中，天天出現的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場面。我們就事不論事（不談這些場面所包含的種種偉大意義），這種搶險既勞

民又傷財，且達不到質量要求，汛後還要返工重修，真是既不合理，又不經濟。我國的堤防主要問題是老化失修，應當認真進行加固和必要加高。我們可以修建高達百米的堅固土壩，一二十米高的堤防會有什麼困難呢？三峽開工後，每年成百億投資，前述《十年防洪部署》的四十八億元投資，是不是國家拿不出來，還是不去使用呢？美國的密西西比河常發生大洪水，幹流上沒有修一個水庫，而是靠堤防作為防洪的根本措施，遇大洪水時，沒有聽說過要動員多少人上堤搶險之事。

幾十年來，水利部門的防洪主導思想是嚴重脫離實際的，一直重水庫，輕堤防；重建設，輕管理；重工程措施，輕水土保持；重大江幹流，輕支流小河；重下游輕上游。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來水，減輕荆江大堤所受威脅，對武漢不起什麼作用；如一九五四年型洪水所受淹沒損失，只能減輕百分之五左右。一九五四年六、七、八三個月上中游來水總量中，宜昌以上來水只佔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四年潰口分洪成災時水量一千零二十三億立方米，中下游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後，其中一半可由河道下泄，另一半還得靠分蓄洪區解決。三峽水庫形成後，按一百七十五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過一百至二百億立方米（這個數目相當於中下游堤防加高一米後，河道下泄的流量）。何況一百七十五米方案遺留問題極多，主要是泥沙淤積對重慶的影響，因此許多專家建議水位控制在一百六十米。

近年長江中下游水災頻繁。一九九五年受災農田六千九百一十六萬畝，受災人口七千四百八十九萬人，死亡一千三百零二人，直接經濟損失五百九十二億元。一九九六年（六、七月份統計）受災農田七千三百零五畝，受災人口七千多萬人，直接經濟損失七百億元。這兩年洪水都比一九五四

年小，但災情卻比一九五四年重。今年災情當然更重。因此，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關於長江的防洪問題，幾十年來，許多專家學者、社會名流提過許多切合實際的意見，不贊成水利部門那種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的想法和做法，可惜都未引起重視，連姚依林副總理的話也白說了。經過今年這場大水，水利部門應當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了，應當改弦易轍、回船轉舵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

## 附：三峽工地之行（三首）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應三峽工程負責人邀請，在工地度留三日，談話中將三首詩相贈，並書成條幅。

橫空出世史超前，高峽平湖現眼邊。  
但願無憂更無恙，巫山神女總開顏。

南寧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獨自憐。  
黃老曾經調侃甚，彌留時節夢魂牽<sup>①</sup>。

舊地重來廿二年，分明非夢亦非煙<sup>②</sup>。  
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忠與奸。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七日於三峽

附：三峽  
工地之行  
（三首）

① 八十年代後期三峽論證期間，黃萬里曾兩次來我家，談及他三十年代曾親自踏勘四川各水系，了解推移質（河床卵石）滾動情況。如水庫形成，必抬高諸河床水位，最後淤塞重慶港。

② 一九八〇年曾邀請美國水電代表團到三峽考察，其結論為如此通航河流，不可修五級船閘。

## 附：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 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中共中央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  
全國人大吳邦國委員長，暨環境與資源委員會，  
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暨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  
全國政協賈慶林主席，暨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提要：今年三峽工程開始蓄水至一百三十五米，永久船閘通航，首批機組也將發電。二〇〇六年將移民至一百五十六米，實現初期蓄水位運行，發揮防洪、發電、航運等相當巨大的綜合效益。為了保證三峽工程盡可能減少不良後果，特就：（一）堅持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運行；（二）位置較低的導流底孔不要封堵，供有效泄洪排沙之用；（三）溢洪道堰頂不要築高至一百五十八米，先填筑至一百三十九米，加裝閘門達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四）重慶市庫區應按水庫淹沒處理規範，以五十至一百年洪水計算回水曲線，尚需增加大量移民，暫緩抬高蓄水位為妥；（五）庫區崩滑體及生態環境，隨水位抬高需陸續治理；（六）上游建庫有利於長江防洪、攔沙、發電、航運，而下泄清水沖刷河床，粗砂礫卵石可能堆積在一百七十五米蓄水位庫尾礙航，也需研究治理；等問題提出建議，請予審閱採納。

## 一、堅持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運行

三峽工程論證時，“顧及到減緩移民強度過於集中的壓力，並使水庫泥沙淤積有一個觀測驗證的時期，提出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最終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對於“兩期蓄水的間隔時間，暫定為十年”。應當經歷一次大洪水，三峽水庫為中下游防洪要求攔洪時，不能“排渾”而需“蓄渾”，驗證其庫尾淤積情況，以決定何時抬高蓄水位。

一九九二年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時，鄒家華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報告三峽工程的建設方案中說明：“初期先按一百五十六米蓄水位運用，有利於移民安置，又可驗證泥沙淤積對庫尾航道、港口的影響。”還說：“水庫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已有相當大的綜合效益，此時水庫回水不超過銅鑼峽口，泥沙淤積不影響重慶”；“且水庫分期蓄水，將留有一個對庫區泥沙淤積進行觀測、驗證的時期，這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方案”。因而取得三分之二人大代表投贊成票通過。近見許多報道，二〇〇九年即擬達到最終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而未考慮分期蓄水。希望堅持執行既定方針，不要急於抬高至最終蓄水位，而違反人大決議時國務院對建設方案的要求。

## 二、位置較低的導流底孔不要封堵，供有效泄洪排沙之用

三峽工程在泄洪壩段設有進口底高程五十六至五十七米的二十二個導流底孔，各孔寬六米，高八點五米，在庫水位

附：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一百三十五米時泄洪能力達每秒三萬六千立方米，佔汛期調度所需泄洪量每秒五萬六千七百立方米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五，不僅是初期運行時所必需，而且在提高至一百七十五米運行時，也是泄洪、排沙、保庫十分重要的措施。有無位置較低的泄洪排沙底孔，對死水位以下的淤積位置，壩前淤積高程，向上游延伸的位置，以及對調節庫容、防洪庫容的淤積影響等關係很大；並可為應急放空水庫之用，應該預以保留，仍用閘門控制。在技術上，國內外已建水頭一百米以上的泄水孔和閘門不少，如擔心三峽底孔跨縫布置而可能產生空蝕破壞，可加襯抗磨無縫鋼管加固。

然而在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對施工進度的安排中，施工第十一至十三年（二〇〇三至二〇〇五年）將把二十二個導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回填封堵，後來改至第十四至十五年（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封堵完畢，將堵掉三峽水庫的有效泄洪排沙出路。我們認為這樣做十分不妥，可以史為鑑：

黃河三門峽工程的經驗教訓：三門峽是黃河綜合利用規劃中最重要的第一期工程，以防洪為主，曾設想一舉解決下游的防洪和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的問題，擬建大水庫攔洪攔沙，同時取得巨大的灌溉、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效益，在一九五五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規劃報告後，該工程委托前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作初步設計，進行討論時，好多位中國專家提出降低水庫蓄水位或留出較低的泄洪排沙底孔，但設計單位擔心較低的底孔承受水壓較高，恐不安全而未被採納。一九六〇年大壩建成，隨即封堵導流底孔，開始蓄水後，就發現庫區泥沙淤積嚴重，並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陝西省為此向全國人大強烈反映。隨後周恩來總理召開治黃會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並檢討說：“頭腦熱的時候，總容易只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證地看問題。”經討論研究，耐

心說服維持原設計的意見，決定改建，在壩旁山體中開挖兩條大隧洞，並利用四條發電引水鋼管泄洪排沙。但由於隧洞和鋼管進口位置較高，泄洪能力不足，水庫泥沙繼續淤積。於是決定第二次改建，在水下施工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將位置較低的八個導流底孔打開，以增加低水位時的泄洪排沙能力，從而潼關以下峽谷庫區泥沙得以沖刷下泄，目前趨於沖淤平衡。但遺留於庫尾的泥沙形成潼關河床居高不下，導致渭河下游的淤積及洪澇災害難以解決。經觀測驗證，大壩進口底高程二百八十米底孔的“排沙比”，為進口底高程三百米深孔的一點三五倍；底孔的“排沙相對粒徑比”，為深孔的一點四三倍，排出粗沙更多；可見底孔的排沙作用較大。對底孔的磨損破壞也作了修復補強。原設計擔心的不安全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後來繼續打開其余四個導流底孔，進一步擴大低水位時的泄洪排沙能力。並建小浪底工程擔任黃河下游攔洪減淤問題。這些經驗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三峽工程今年已開始蓄水至一百三十五米，相當於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的汛限制水位。關於一九九七年截流至今六年來河床淤積情況，以及今後逐年汛期“排渾”運用的淤積情況，我們希望在科技刊物上公布，以便對三峽泥沙淤積關心的科技工作者了解研究。三峽的底孔進口底高程為五十六至五十七米，比所設深孔進口底高程九十米要低三十三至三十四米，這比黃河三門峽兩者相差二十米更大，其“排沙比（相對排沙量）”和“排沙相對粒徑比（相對排出粗砂量）”應該更有效，可通過運行觀測驗證不同高程的底孔、深孔的排沙能力，說明保留底孔不要封堵的必要性。

據《三峽工程建設》刊物二〇〇二年第六期發表的泥沙專家們所作“雙汛限水位調度方案對三峽工程通航條件的影響”（在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相應的汛限制水位一百四十五米之外，還保留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相應的汛期限



制水位一百三十五米，稱爲“雙汛限水位”)一文，通過泥沙數學模型計算和科學分析，在結論中說：“它對於改善三峽水庫上下游長期的通航條件具有重要作用，具體體現爲：(1)大量減少變動回水區淤積，使重慶河段的通航條件得到保障；(2)明顯減少壩區河段的淤積，大洪水期較粗的高濃度的泥沙通過較低水位下泄。壩區長期未決的通航泥沙問題可以得到全面解決；(3)它在減少下游河道沖刷幅度，增加三峽水庫對枯水期航深調節能力有一定的有利作用；(4)還可降低水庫近壩段的水流速度，對於保證航行安全、降低運營成本有一定的幫助。”這項研究充分說明了保留初期運用汛限制水位一百三十五米的重要性。

但文中說：“在一百三十五米水位運用期間，三峽船閘和升船機需要斷航。”建議引航道和第一級船閘的上下閘首底坎不要由現高程一百三十米用混凝土築高至一百四十米，而考慮增加上閘首後期人字門的高度或採用其他措施，不要斷航。

### 三、溢洪道堰頂不要築高至一百五十八米， 先填築至一百三十九米，加裝閘門達 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

施工時泄洪壩段所留臨時溢洪缺口，初步設計對施工進度安排中，計劃於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七年回填至溢洪道堰頂高程一百五十八米，比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還高，將使初期運行遇大洪水時不能通過溢洪道泄洪，這是無視初期蓄水位安全運行的要求。考慮初期蓄水位運行，溢洪道堰頂應先填築至一百三十九米，加裝十七米高的溢流閘門達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以後需抬高蓄水位至一百七十五米時，再填高溢洪道堰頂至一百五十八米，並上移閘門，這樣做才

比較合理。

#### 四、重慶市庫區應按水庫淹沒處理規範，以五十至一百年洪水計算回水曲線，尚需增加大量移民，暫緩抬高蓄水位為妥

據《水庫淹沒處理設計規範》要求：“對水庫淹沒對象為重要城市的設計洪水標準定為五十至一百年一遇洪水。”而設計中僅按二十年一遇洪水計算，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的水庫回水末端，僅達重慶朝天門下游三十公里的木洞鎮彈子石，而重慶市主要城區沿長江和嘉陵江兩岸受回水影響的眾多居民、房屋、商店、中小工廠、碼頭、倉庫等都未計及。在長江防洪規劃中，對中下游防洪標準按一百年一遇洪水，甚至考慮更為稀遇的一八七〇年特大洪水；而對三峽水庫淹沒回水區僅考慮二十年一遇洪水，重下游而輕上游，既不合規範又不合理。

查近百年來洪峰較高、泥沙較多的一九八一年洪水，“重慶市（玄壇廟站）實測最高洪水位一百九十三點三八米，洪峰流量每秒八萬五千七百立方米，居歷史第三位，洪水頻率五十年一遇。全市（重慶主城區）受災三縣七區，受災人口十三點七萬人，淹沒耕地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四畝，受淹城鎮房屋二百六十六萬平米、農村住房五十七萬平米；受災工廠企業八百五十七個，當年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一點九億元”（據重慶市防汛辦公室一九八六年三月報告）。三峽工程建成後，回水壅高水位淹沒勢必更大。而三峽水庫一百七十五米蓄水位僅計及二十年一遇洪水的回水高程一百八十三點五米；比一九八一年實達洪水位一百九十三點三八米還低十米。將來再遇一九八一年洪水時，隨著回水位的壅高和人口自然增長，重慶主城區將有二十余萬人要逃洪，這是很不合

附：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理的。建議根據《水庫淹沒處理設計規範》所要求的設計洪水標準，以一九八一年實測洪水和泥沙資料，三峽壩址天然洪水位約七十米，考慮水庫調洪要求，攔蓄超過每秒五萬六千七百立方米的四天洪量約二十九億立方米，由汛期限制水位一百四十五米抬高至一百五十點六米，比天然洪水位高出八十米。由此重作水庫回水曲線和泥沙淤積情況，對受淹地區安排增加移民，以確保庫區重慶主城區人民財產的安全。

據報道，自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一年底，十三年來累計搬遷安置移民四十五點八四萬人。如果按設計單位擬從二〇〇六年達初期蓄水位後，至二〇一〇年抬高至一百七十五米，在四年內需移民規劃數四十六點六萬人，還要考慮提高設計洪水標準所需增加的城區移民數，將比過去的移民任務艱巨得多，移民費可能還要大量增加，因此暫緩抬高蓄水位為妥。

大水電站建設，包括水庫和發電廠房，有的分屬不同地區，各做出巨大貢獻。現政策全部的稅均歸屬發電廠所在地區，很不合理，應按合理的比例分配，也希予以研究解決。

## 五、庫區崩滑體及生態環境，隨水位 抬高需陸續治理

三峽庫區周邊新老崩滑體很多，有些很大。歷史上曾發生“山崩塞流，江水倒流百里。”近年來又發生雲陽雞扒子、秭歸新灘、巴東黃土坡，烏江下游武隆等處大滑坡，給人民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影響移民工程建設，必須慎重對待。

據中國科學院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科研領導小組，一九八五年所作《三峽工程不同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和一百八十米）對生態與環境影響的初步論證報告》中，所附《三峽工

程與庫區環境地質的相互影響》中說：“水庫蓄水後由於基腳被水體長期浸泡軟化，如遇暴雨或水位急驟消落時，在靜、動水壓力的影響下，必然加劇現有滑坡岩崩的活動，並有可能觸發新的滑坡和岩崩，從而危及庫尾城鎮居民和工農業生產的安全。在狹窄江段崩滑體可能影響航道暢通。”對庫岸大型崩塌體下滑時的涌浪，可能危及兩岸居民區的安全，也需注意防護。

據《中國環境報》、《中國水利報》、《中國三峽工程報》二〇〇一年報道：“據統計，二〇〇〇年重慶市累計發生地質災害達三點三萬余處，總體積超過五十億立方米，受災群眾達三十三萬多人，直接經濟損失七點六七億元。”“三峽庫區有四大滑坡地區，重慶地區佔三個。”“二〇〇〇年度，三峽湖北庫區發生一定規模和危害的滑坡、崩塌、泥石流五十二處。”“為積極防治滑坡等地質災害，國家在原六億元治理地質災害資金的基礎上，又從三峽工程建設基金中安排四十億元專項資金，今明兩年內用於治理各種地質災害。”“三峽庫區建成蓄水後，庫區水位漲落變化對江岸和山體的沖刷、侵蝕，也可能誘發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還需繼續治理。

環境影響報告中對於水污染問題說：“建壩後，庫區水體流速減慢，混合稀釋自淨率降低，污染物質在底部和底棲生物中的累積將逐漸加重。一百八十米方案與一百五十米方案相比，庫水流速度更慢，被淹沒的有害礦產更多，入庫污染物更多。”隨著三峽蓄水位的抬高，庫區範圍擴大，也需陸續治理。

## 六、上游建庫有利於長江防洪、攔沙、發電、航運，而下泄清水沖刷河床，粗砂礫卵石可能堆積在一百七十五米蓄水位庫尾礙航，也需研究治理

黨中央最近提出“西部大開發”和“西電東送”等戰略方針，促使長江上游幹支流眾多大水電站能夠快速開發，對長江三峽防洪、攔沙、發電、航運等效益將大增。但也要看到另一面，上游水庫攔沙後，下泄清水將沖刷其下游河床的後果。如葛洲壩雖然水庫較小，因對其下游沖刷而降低水位，使已建船閘下閘坎水深不足而影響航運。三峽水庫大量攔沙後，下泄清水將沖刷長江中下游河道，影響更大；橫向沖刷將影響兩岸堤防的安全，沖起來的泥沙又將淤積在其下游的河道內礙航或抬高洪水位，必須預作關注。長距離的相繼沖刷，淤積物陸續下移可輸送入海。

更應關注的是：將來上游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壩水庫攔沙後，下泄清水將沖刷金沙江下段和長江上段河道。在幾百公里內，沖刷起來的河床質粗砂礫卵石下移，將受到三峽水庫一百七十五米回水影響而難以下排，將堆積在江津附近的寬淺河段，必然礙航。國外多沙河流上所建高壩大水庫，如美國科羅拉多河胡佛、埃及尼羅河阿斯旺、巴基斯坦印度河塔貝拉等，泥沙淤積縱剖面都受水庫回水影響，呈翹尾巴現象而不能通航。漢江丹江口上游相繼建成石泉、安康水庫，對丹江口水庫的淤積影響，可作為三峽的現實模型。希加強調查研究。

根據上述，希望按照《一九九二年三峽工程決議案》最後一句話“對於已經發現的問題要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建議組織審議設計、建設情況，堅決貫徹“分期蓄水，初期

先按一百五十六米蓄水位運用”，實事求是地解決存在的問題，以免給子孫後代遺留嚴重禍害。

建議執筆人：陸欽侃（三峽工程論證防洪專題組顧問，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建議贊同人：

吳傳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前理事長）

青長庚（原三峽工程論證機電設備組顧問，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何格高（原三峽工程論證綜合和經濟組專家，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專家）

葉永毅（原三峽工程論證水文專家組專家，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諮詢委員）

翁長溥（原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綜合規劃與水位組專家，廣西自治區發計委總工）

張有實（原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水文與防洪組專家，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考會副主任）

朱藻文（成都勘测設計研究院技術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安申義（中國勘测設計研究院高級諮詢）

張進謙（華夏水電能源研究所所長）

溫善章（黃河水利委員會技術委員）

錢汝泰（黃河劉家峽工程局前總工程師、三門峽工程局前副總工程師）

金永堂（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漆富冬（中南勘测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中南機電技術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華（中國電力信息中心前所長，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副會長）

附：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趙士雲（中國電力信息中心高級工程師，源信水利水電開發公司總經理）

張哲民（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前院長）

田 方（國家計委諮詢組成員，經濟研究所前副所長）

陳國階（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區災害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宋宗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劉玉凱（國家環保總局自然生態保護司原副司長）

張秉友（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材料結構研究室原副主任）

雷樹萱（原電力工業部高級諮詢委員）

江澤佳（重慶大學教授，前校長，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張承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鮑蕙蓀（南京市浦口區政協前副主席）

沈清濂（江漢大學教授）

胡傑安（江西水電高專教授）

魯家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陳爲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周啓祥（南京港務管理局原副總工程師）

樓宇希（電子工業部南京十四研究所，西安二十研究所原副總工程師）

陶 煒（東方電機廠顧問，原廠長、總工程師）

許自達（南京水文水資源研究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羅哲文（國家文物局教授級高工，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謝辰生（國家文物局原顧問，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組長）

黃景略（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

組組長)

崔海亭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生態學系教授)

黃潤華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生態學系教授)

金紹綱 (北京第三師範高級地理講師)

姚啓明 (山西大學教授，原地理系主任)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一日

附：關於三峽工程執行先按初期蓄水位一百五十六米運行的緊急建議



## 《莫讓江河空自流》序言

《莫讓江河空自流》，這本“淺說水力發電”的科普讀物，由雲南的十位老專家編纂，這是他們老年發揮“余熱”的結晶，認為我國還必須極力宣傳優先發展水電，可謂用心良苦。主編青長庚讓我為本書寫篇序言，欣然應命，原因就在我們是志同道合者。我今年已進入八十五歲，平生最長的工作崗位是水電建設，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先後共十一年。

雖然到二〇〇〇年底，全國水電裝機容量達七千六百八十萬千瓦，年發電量二千四百億度，分別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但我們決不能滿足於此。如果過去我們能一直做到優先發展水電，取得的成績會倍於此數。中國應當優先發展水電但又未能優先發展水電，我曾身歷其間，很是痛心，至今耿耿於懷。因此，雖離開這個崗位已經二十年，一有機會還是要嘮叨幾句。

水電如同煤炭、石油，是一次能源（火電是二次能源），而且是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更是毫無污染的清潔能源。水電站所形成的水庫，多具有防洪、航運、養殖、灌溉、供水以及旅游等綜合利用效益。在電網運行中，水電易於調峰、調頻等，比火電具有靈活性。在一般情況下，水電造價比火電高，周期也較長。但由於地勢西高東低，高原多峽谷，落差大而集中，我國水電造價低於各國，這是一個特

殊的優越性。從世界範圍說，水電是十九世紀末的產物，廿世紀上半紀就廣泛發展了，中國卻少為人知。一九四八年沈陽解放後，我曾隨陳雲參觀過豐滿水電站，聽說鴨綠江早建了大水電站。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工作。一九五二年知道國家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即以自己上大學時讀工科為由，堅決要求離開多年坐而論道的崗位，於這年秋天調到北京，分配在當時的燃燒工業部主管水電建設。這個部有部屬煤、電、油三個總局，水電則是一個部內局，不為人重視，實際受計劃司管轄。我到任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即不怕人家議論“鬧獨立性”，讓水電隨即成為第四個總局——水力發電建設總局，這樣就便於在全國範圍內“呼風喚雨”了。

當年水電技術力量是很有限的。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有個水電處，有幾十位包括留學過美英的工程師，抗戰時在四川、雲南、貴州歷盡艱辛，修建過幾座裝機容量幾百幾千千瓦的小水電站，他們大部分留在總局，少部分在四川、福建和武漢幾個地方水電單位。這時，蘇聯正熱火朝天修建大水電站，從伏爾加河轉向西伯利亞山區；思想認識上以為河流的綜合利用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得到最好的貫徹。可是，燃料部的蘇聯電力專家組組長卻向中國領導告誡：蘇聯有教訓，不要輕易發展水電，尤其不要建大水電站。原來，蘇聯歐洲境內多平原河流，落差有限（伏爾加河的總落差只有二百多米），因此，工程浩大，工期過長，投資比火電貴好幾倍。有的年份電力投資大都被水電佔去，而投入容量有限。為具體了解蘇聯水電開發的經驗教訓，燃料部派出一個電力代表團去蘇聯“取經”，劉瀾波任團長，我任副團長。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間，我們在蘇聯訪問四個月，該去的地方都去了。在莫斯科逗留近兩個月，在水電設計總院，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拳拳之心，終於感動主人，談了些他們失敗的教訓。回來後，在《水力發電》月刊發表了五萬字的

長文《蘇聯水力發電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主要經驗》。當年我們爭取各種機會大力宣傳水電的優越性，中國水力資源及其開發條件世界第一，我們有能力做到多快好省地優先發展水電。經過極大努力，“一五”期間就上了新安江、劉家峽這樣的大水電站，而且新安江四年建成發電，投資同火電相當。全國共建了八個勘測設計院，有五個放在水力資源最豐富的西部，以求西電東送。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南寧會議有過關於三峽上馬的“御前辯論”，中央接受了我趁此機會提出的電力建設方針“水主火輔”。隨後八大二次會議上，劉瀾波部長發言，力爭十年之內水電比重達到百分之五十。令人永遠遺憾的是，這不過是一個曇花一現的夢想而已！

一九九五年秋，參加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時，我有個講話，除開談到三峽問題木將成舟，必須預見到建成後的一切嚴重後果和如何防范外，還談到水電開發的世界形勢。根據八十年代中期的統計，除十四個計劃經濟的國家外，在一百六十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的電力，水電比重達到和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就有三十二個；水電比重達到和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國家有一百一十二個。這些國家優先開發水電半個世紀左右，已開發水力資源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高者百分之九十。我去過巴西和澳大利亞，都是煤炭出口大國，水電比重：巴西百分之九十，澳大利亞百分之五十九。而我國水力資源的開發不到百分之十七。在全國的發電量比重中，五十年來水電比重長期徘徊不前：一九五〇年為百分之十七，而二〇〇〇年降到不及百分之十六！導致此種局面，不能不令人追思、浩嘆。

我們為什麼不能優先發展水電呢？我認為有三個基本原因：

第一，當然同經濟體制有關，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一九七九年隨能源代表團訪問美國，了解到對水電有傾斜政策。水電建設由聯邦和地方政府投資的佔三分之二，還本年

限五十年，利息比商業銀行低。火電建設由政府投資的僅佔百分之十三。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水電的各種優越性容易體現出來，如它不用燒煤，運行人員很少（為火電的十分之一），成本大大低於火電；在電網運行中，常擔任峰荷、腰荷和調頻，其售價可高於火電幾倍。因此，水電股票在市場上最穩定，火電卻受煤價波動的影響。同火電相比，水電雖然造價高、工期長，政府和企業都樂於投資。

我們計劃經濟實行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電力部門的利潤全部上交，建設資金全靠國家安排。電力、煤炭和交通的基建投資分歸各部，火電投資只計電廠本身，而煤炭、運輸投資則不計算在內。水電投資大部分用在大壩等土建部分，形成水庫後的防洪、航運等綜合效益部門，都不分攤投資。電力投資水火電捆在一起，在供電緊迫的情況下，自然“急功近利”，首先安排短平快的火電項目。其實火電屬於能源工業內部的電力產業，需要解決燃料的運輸問題。水電則是開發與轉換合為一體的能源。因此，在我國最支持水電優先發展的是煤炭部。

第二，宏觀決策和具體領導的短視與失誤，這是指國家計劃和電力領導部門而言。當年成立水電總局，部內尤其管火電的反對，我只好走上層找陳雲解決。劉家峽列入勘測設計計劃，部計劃司都不同意。上猶江水電站能較早建成，是因為江西沒有煤。四川水力資源全國第一，卻長期屁股坐在火電上，近年二灘建成，大量電“窩工”運不出來。一九七九年我回京復職後才知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於煤炭緊張，竟興建了六百三十五萬千瓦的燒油電廠，將五百八十四萬千瓦燒煤電廠改為燒油，一時油電比重超過水電。幾年之後油價上漲，油源緊張，又全都改回燒煤。這一折騰，如果將損失的資金投入水電，估計能建上千萬千瓦。電力投資中水電比重逐年下降，從七十年代的三分之一降到一九八

八年的六分之一。火電用煤的急劇增長曾使得煤炭工業難以承受，電廠紛紛被迫停機減產；這種惡性循環更加劇電力緊張局面。

《電力法》第五條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利用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電”。水電理應同水利一樣屬於公益事業，同樣享有各種優惠政策。實際上水電火電在政策上沒有加以區別，過去和現行的財稅和信貸政策都不利於水電開發，如進口設備關稅、耕地佔用稅、水資源稅、投產後的增值稅、信貸還款期、還貸利率等，都極不利於水電開發，造成資金難籌，還本付息負擔過重，造價大幅上升等等。水電的綜合效益，世界各國早已遵循工程投資合理分攤的基本原則，如防洪部分資金多由財政直接撥款支付，不要還本付息。我們可憐的水電，卻一直被有關部門和電網吃大鍋飯，不僅所有優越性視而不見，反而長期戴著“投資大、工期長、造價高”三頂大帽子。在宏觀決策上還有兩個問題值得提出，一是我國人均能源相對匱乏，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專家測算能源的缺口量，廿一世紀初期將超過一億噸標準煤，以後會逐步增加。二是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問題。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煤炭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中火電為燒煤大戶，許多大城市酸雨頻頻發生，據統計每年由於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已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以上，尤其同人民的健康直接有關。為這兩個問題，也自應盡快發展水電。

第三，水利部門難於合作且“亂點鴛鴦”，阻滯了水電的有效開發。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善於開發水利與有治河傳統的國家。可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水利部門，由於急於徹底解決大江大河的防洪問題，且以修大水庫片面防洪為主導方針，跟水電開發形成許多矛盾。最早修官廳和淮河上游水庫時，都沒有考慮發電。同電力部合作規劃黃河時，才統一了綜合利用思想。長江規劃守住一個三峽，一直幻想以三峽

大水庫一勞永逸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五十年代由此發生的種種磨擦，不再來追述了。最大的水電災難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廬山事變之後，我被列入“彭德懷反黨集團”，“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水電部（當時水利、電力兩部合並）也打出一個“李銳反黨集團”。從總局領導到全國水電系統，受批斗、撤職等影響的有二百多人，而且對這個“反黨集團”加了三項大罪名：反水利、反三峽、反火電，個個都是“三反分子”，整個水電事業蒙冤“三反”。“文革”十年，水電系統更成爲全國最重的重災區。從總局到科研、勘測設計、中專學校等，所有水電機構，通通被“砸爛”、撤銷（總局的全部資料都燒掉了）。當時一直在位的水電部那位女部長下了撤銷的死命令，八大勘測設計院只有成都和昆明兩院，被院黨委書記在“開除黨籍”的威脅下頂住了，而保留下來。這段歷史的詳情我不清楚。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回京復職後，三年中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恢復所有這些機構，召回原來的工作人員。其中種種困難，一言難盡。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調離水電部時，爲了水電和水利的順利發展，我向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份萬言書：《對水利工作的意見》。當時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了一個水利的討論會，我這份意見書被印發爲會議的一號文件。其中主要批評“三十二年來，水利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相當根深蒂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爲葛洲壩出問題國務院召開的三次會議上，周總理曾嚴厲指出，水利工作二十年不願總結經驗，吃了大虧，走了許多彎路。像財政部調查報告中的逆耳之言，我就擔心能否聽得進去。毛主席的功過和‘左’的思想都做了總結，難道水利工作就不需要徹底總結一下嗎？做好這個總結，不僅水利工作需要。也關係到今後水電建設能否加快發展。”然而積習難改，病灶依然。一九九八年長江發生大洪水，造成嚴重災害，暴露了水利部門仍在走

老路，總是不切實際，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當時受武漢《今日名流》的特邀，寫了一篇《談一九九八年長江防洪問題》的長文，登在該刊一九九八年十一至十二期。其中談到：“幾十年來，水利部門的防洪主導思想是嚴重脫離實際的，一直重水庫，輕堤防；重建設，輕管理；重工程措施，輕水土保持；重大江幹流，輕支流小河；重下游，輕上游。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來水，減輕荊江大堤所受威脅，對武漢不起什麼作用。”“三峽水庫形成後，按一百七十五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過一百至二百億立方米（這個數目相當於堤防加高一米後河道下泄的流量）。何況一百七十五米方案遺留問題極多，主要是泥沙淤積對重慶的影響，因此許多專家建議水位控制在一百六十米。”去年十五大我的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的末尾談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壞事？有關部門應當總結治水的經驗教訓。三峽工程要接受三門峽教訓，水庫形成後，可能出現哪些嚴重問題，怎樣防范？”

上述一九九五年參加水電學會講話時，結尾我念了這樣四句，現在仍以這四句結束我的嘮叨：

老去無窮遺恨篇，至今水電未優先。

嗚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煙灰滿地天。

最後應當為這本書說的話是：如何把水電專業的知識和開發方針、方法等，寫成生動、有趣、有文采的科普讀物，於科技知識中融入人文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社會發展和現代水電科學技術進步的需要，要了解有關水電的基本常識和我國水電建設情況，讀一讀這本書，我認為是大有裨益的。我所說的水電未能優先發展的問題，這本科普讀物是不涉及的。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九日

## 《我嫁了個烈士遺孤》序

妻子爲丈夫寫傳記，有無先例？我不知道。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傳記，是我見到的第一本。

傳記主人羅西北和作者趙仕杰是半個世紀以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尤其一九五九年廬山事變後，傳主受我的牽連也受苦受難，“文革”時曾一度精神失常。應作者之命，於公於私，我自應爲這本書說幾句話。首先想到的一句話是：由於當代歷史造成的命運，夫妻一起工作與生活相伴近五十年，甜酸苦辣患難與共，到了晚年，覺得應當將這個平凡又不平凡的丈夫的一生寫出來，爲歷史留下某種典型的痕跡，免得雪泥鴻爪而消失。我很贊賞爲人之妻的這份情誼。

當知道國家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我即以自己上大學時讀工科爲由，堅決要求離開多年坐而論道的工作崗位，於這年秋天，從湖南調到北京，分配在當時的燃料工業部主管水電建設。一九四八年沈陽解放後，我曾隨陳雲去參觀過豐滿水電站，知道日本一佔領東北就大力開發水電；但在新中國水電還是一個新事物，上上下下對此都沒有什麼認識。當時燃料工業部有部外的煤電油三個總局，水電是一個部內局，不爲人重視，實際受計劃司管轄。我到任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即不怕人家議論“鬧獨立性”，讓水電成爲第四



個總局——水力發電建設總局，這樣就便於在全國範圍內“呼風喚雨”了。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水利部已開工修建官廳水庫，只是爲了防洪，我們要利用其防洪工程的某部分作發電之用，怎麼也談不通，於是只好在左岸另起爐灶，並補做水庫地質調查（水電站怕水庫漏水）。當年水電的技術力量是很有限的，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有個水電處，有幾十個包括留學過美英的工程師，抗戰時在四川等地歷盡艱辛建過幾座小水電站，他們大部分都留在總局和地方水電單位。關於西方優先發展水電的情況，我還不知其詳。這時蘇聯正熱火朝天建大水電站，從伏爾加河轉向西伯利亞，從而思想認識上就以爲河流的綜合利用（發電同防洪、灌溉、航運等相結合），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得到最好的貫徹。還知道蘇聯有“水能利用”這個學科，在大學是獨立專業。一九五三年，羅西北從莫斯科動力學院水電專業畢業回國，分配到水電總局。我當時的心情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喜出望外。

在擴大組織、爭取項目的同時，我極力作宣傳工作：中國水力資源特別豐富，開發條件特別優越（地勢西高東低，大小河流落差大而集中），一九五四年經初步調查，兩者均爲世界第一。可是，燃料部的蘇聯電力專家組組長卻向中國領導告誡：蘇聯有教訓，不要輕易發展水電，尤其不要建大水電站。蘇聯歐洲多平原河流，落差有限（伏爾加全流域只二百多米，黃河、長江皆五千多米），工程巨大，工期漫長，投資比火電貴好幾倍。爲了具體了解蘇聯水電開發的經驗教訓，經過努力，燃料工業部派出一個電力代表團向蘇聯“取經”，劉瀾波任團長，我任副團長，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間，在蘇聯訪問了四個月，該去的地方都去了。團員水電佔多數，羅西北作爲翻譯，始終同我一起活動。在莫斯科兩個多月時間內，我主要在蘇聯水電設計總院訪問，打破視

鑄問到底的拳拳之心，終於感動主人，跟我們談了些他們失敗的教訓。設計總院一位副院長特別同我談到，羅西北在動力學院是高材生，他做了兩個畢業設計，很得評審專家的稱贊。從此，關於應當優先開發水電，主管電力的劉瀾波部長同我意見一致了。當年水電必須做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勘測設計必須先行，正如演戲光有劇團不行，得有供選擇的劇本。一九五五年以後，除北京早有的總院外，在全國建立了八個勘測設計院，重點放在水力資源最豐富的西部，尤其是“水力甲天下”的四川，以求西電東送，計有西北、成都、雲南、貴州、廣西五院。任務是勘察河流，確定開發程序，設計具體項目；於是將北京有限的技術骨幹，分散下去。成都勘測設計院派了老少兩位總工程師，羅西北是其中之“少”。對於西北的委任，曾引起議論，“提拔得太快了”；不久以後，他在四川的老技術幹部中也得到了認可。雖然水電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但還未能得到公認。經過各種努力，終於新安江、劉家峽這樣的大水電站，都在“一五”上馬了。（新安江四年建成發電，投資同火電相等）。

水電難於優先的阻力，主要來自部內尤其是計劃司，因火電快幹易上，便於救急；同時水利系統強調防洪（有國家關注），又亂點鴛鴦，如一九五五年以後就急於催促三峽工程上馬，水電難以配合，一九五六年同長江水利委員會有過公開爭論。一九五八年初的南寧會議是“大躍進”的序幕，毛澤東主席寫過“高峽出平湖”，提出要上三峽，知情者說有個反對派，於是立即召我與長委領導人到會。經過當面辯論又各寫一篇長文，毛主席和會議採納了我的意見：三峽乃長遠之事（毛主席在世時對三峽沒有點過頭）。利用這場“御前辯論”，我力言中國應優先開發水電，且可以做到多快好省；會議接受了我提出的“水主火輔”電力建設方針。（隨後八大二次會議上，劉瀾波發言，力爭十年之內水電比重達

到百分之五十)意外的是，毛澤東命我當他的兼職秘書。更意外的是，一九五九年發生廬山事變：個人事小，國家事大，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從此升級，最後導致十年“文革”動亂。廬山下來後，我這個“追隨者”遭到批斗，開除黨籍，二十年流放坐牢不要緊，水電部也打出了一個“李銳反黨集團”，受牽連的全國有二百多人。除開“右傾機會主義”外，這個“集團”另一罪名是“反水利、反三峽、反火電”，個個都是“三反分子”。羅西北屬於這個集團，他所在的成都勘測設計院打出一個有羅在內的“三人反黨集團”，全院受牽連的達一百多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歷史的不幸就在“水主火輔”曇花一現，整個水電事業蒙冤“三反”，“文革”十年更成爲全國最重的重災區，從總局到科研、勘設、中專學校等所有水電機構，通通被“砸爛”(如總局全部資料被燒掉)撤消。八大勘測設計院只剩下成都院和昆明院，當時水電部的負責人，下了撤消的死命令，被兩院黨委書記硬頂住了，成都院的書記說：“開除我的黨籍也不撤消”。

一九七九年一月復職後，我仍在電力部主管水電，直到一九八二年調離。三年中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恢復所有這些機構，召回原來的工作人員。整個水電受災受難的情況沒有多去過問，羅西北的情況只知道他曾經得過精神病。現在趙仕杰的這本書，不僅寫了羅西北個人的情況，同時也從個人的側面，反映了水電這個“重災區”的一些情況。有的情節，讀來真是催人淚下。西北已七十四歲，從在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他的一生全是爲了我國的水電事業，爲了優先發展水電而日夜操勞。離開水電領導崗位，他晚年退居二線，擔任諮詢職務，仍跋山涉水，深入調查。八十年代後期，他參加三峽論證，敢於講真話講實話，並在政協開會時發言直陳其利害關係，主張建設從緩。三峽開工之後，他仍上書，

力主蓄水位按一百六十米高程；爲解決三峽水庫泥沙淤積問題，他爲快上金沙江溪洛渡等工程而奔波。近年來，他還極力促進抽水蓄能電站的發展。

一九七九年春，我隨能源代表團到巴西和美國考察，才弄清楚一個事實：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水電一直能優先發展，主要是由於“水電的利潤比火電高”。在美國水電股票比火電穩定，因爲火電要受煤價的影響；在電網中的售價，水電能負擔尖峰負荷，價格比火電高，甚至可以高一二倍。我們搞計劃經濟，在電網中吃大鍋飯，水電的優越性完全埋沒了。一九九五年秋，我與羅西北一起在成都參加中國水電學會第四次大會，我有個講話，除開談到三峽問題，必須預見到建成後的一切嚴重後果外，還談到水電開發的世界形勢。根據八十年代中期的統計，除十四個計劃經濟的國家外，在一百六十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的電力，水電比重達到和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共計三十二個；水電比重達到和仍在百分之五十的國家有一百一十二個。這些國家優先開發水電半個世紀左右，已開發的水力資源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高者百分之九十。我去過巴西和澳大利亞，都是煤炭出口大國，水電比重巴西百分之九十、澳大利亞百分之五十九。我國水力資源的開發不到百分之十七。水電容量比重爲百分之二十四，電量爲百分之十七，這個水平還不及第一個五年計劃。

傳記主人現在還在爲我國的水電建設努力奮鬥，我祝他漸入佳境，晚年心情愉快。

二〇〇一年七月

## 《程學敏水電論文選集》序言

在老一代水電專家中，勤於善於動筆且又長於經濟思維的人，不是很多的，程學敏同志是這兩方面拔尖的一位。十年浩劫結束之後，他更致力於引進國外有關水電的新科技，同時不斷向海外介紹中國水電的成就和經驗教訓。到一九九四年為止，作者共有四十篇英文文章在英美等國刊物發表，從而促進了西方對中國水電建設的關注和有關交往。將這些文章結集起來，對我國水電建設的發展，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這本由作者自選的文集中，最早的一篇《洪水演算的新圖解法》，是作者一九四三年在英國一個設計公司工作時的“一個小小的發明”，刊於一九四六年美國《土木工程》雜誌，並收入美國周文德教授著《應用水力學》教科書中。文集的中文部分選了十四篇，主要是一九七七年後介紹國外水電開發新的經驗，如在河流與電力規劃中，如何利用電腦和系統分析方法，以及內部報酬率和動態效率等。英文部分選了三十四篇，可說是對中國水電建設半世紀來的全面介紹：包括黃河、長江、鴨綠江、大渡河、紅水河、瀾滄江以及西藏等河流的規劃和開發；水電建設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水電在能源開發中的地位；與水電有關的洪水問題、泥沙問題、移民問題；近年建設的重要水電站的突出經驗，如烏江渡的壩基灌漿，魯布格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還有多篇介紹小水電發展的情況，以及潮汐電站與圍壩工程結合問題，

等等。過去海外對我國水電建設了解不多，這些文章在國外有廣泛影響，從而對我國水電建設的成就和技術水平，得到比較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目前國外水電建設處於低潮，在建工程不多。英國的《水電與壩工建設》雜誌曾多次出版中國水電專刊或專輯，介紹中國的水電建設；許多國外水電設備製造廠家用中文刊登廣告，刊登中國水電站照片；有的文章認為：“中國是今日世界水電的黃金之國”。

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作者就為人民日報著文《論新中國的水電建設》，但五十年代有關水電的二十多篇文章，都未收入集中，作者大概認為這些是宣傳文章，時過境遷，沒有保存的價值了。可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水電不同於其他工業，國人一般不知道“水還能夠發電”，國家有關領導部門包括電力部門的領導對水電也都陌生，此時宣傳水電的優越性，尤其中國發展水電所具有的特殊優越條件，自是非常迫切和必要之事。一九五二年，我剛轉業到水電建設崗位，就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因而不倦操觚鼓舌，一有機會就為此作宣傳。記得一九五三年，科普協會找我向群眾作水電報告時，有關落差與流量等水電基本知識，就是請程學敏提供的。這個報告還以小冊子出版過。

五十年代時，大家常談“水電在夾縫中奮鬥”，這是指一方面，國家投資有限，火電易於上馬，水電排不上號；另一方面，管河流的水利系統偏重防洪，不講綜合利用和合理規則（水電或不在話下，或事後補課，或亂點鴛鴦）。面對這一複雜困難的形勢，首先需要從經濟上作出充分論證，例如水電造價問題，是否真低？水火電造價對比，外國尤其蘇聯，水電比火電要高一、二、三倍不等（但由於水電成本大大低於火電，西方一直盡快開發水電）；我國豐富的水力資源和特殊的地理條件，水電造價同火電相差無幾，甚至還要低廉。這已為當年的劉家峽，上猶、獅子灘、新安江一大批

水電站的實踐所證明。《關於我國水電站造價問題的商榷》，這篇一九五六年發表的文章，作者對這個問題作了充分的論述，實具有長遠的意義。中國的能源政策必須優先發展水電，多年來已逐漸為國人公認，八十年代初，中央黨政領導也都為此言之鑿鑿，作過號召。然而事實上就是做不到，“夾縫中奮鬥”的形勢，並未根本改觀。原因究竟何在呢？除開火電易於上馬和一些老問題外，根本原因還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束縛了水電的發展，使水電的種種優越性無從在國家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

關於障礙中國水電優先發展這一根本問題，作者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水電動能經濟問題》一文中（刊一九九四年《水能技術經濟》），有初步探討，提出許多重大問題：如水電站作為巨大的國有資產，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實行還貸電價？隔河岩水電站模式能否普遍推廣？大中型水電站經營體制急待解決，如何從“建管分家”過渡到“建管合一”？關於不同能源方案的比較中，如何進行水電的比較？有關“投資期”、“償還期”、“運行期”的年限劃定，怎樣才比較合理？水火電成本比較問題，等等。作者認為，過去水電上網電價低到不足以償還投資（成本），建水電站簡直像辦慈善事業、福利事業；全靠國家撥款，其取捨先後，全由領導決斷，而缺少嚴格的科學與經濟依據。這篇文章的修定稿，作者今年年初寄給我時，信中還特別談到隔河岩水電站上網電價改變以後的重大意義。

關於水電的命運問題，關鍵在過去水電電價一直定得太低，乃投資不計入成本，也不計利息所致，終使水電在經濟上沒有獨立自主發展的能力。隔河岩實行還貸電價，初定每度零點三五二元，高出一般水電站十多倍。該電站每年發電平均三十億度，收入十多億元，不僅可在十三年內還清貸款及利息四十五億元，還可以接著修建上下游兩座各為一百六

十萬千瓦和二十五萬千瓦的水電站。隔河岩投資湖北省佔百分之七十，省電網和華中電網終能接受這一電價改革，並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

程學敏最近給我寫的一封信中，還談到中型水電站的開發大有前途，這是水電學會在八十年代中期策劃號召的，在四川、福建、雲南等省已取得顯著成效。如太平驛水電站二十六萬千瓦，三年建成，已開始發電。投資由華能公司承擔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四十，國家百分之十。這些中型水電站，造價都不高，工期三四年，還貸能力強。這也是隔河岩的經驗：“貸款建站，賣電還債，建管合一，滾動開發。”看來，只有認真依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中國的水電優先發展才有希望。

程學敏同我是老同事、老朋友，又同庚、同月，我只比他早來到這個人世幾天，可說很有緣分。關於發展中國的水電事業，四十多年來，我們是志同道合、執著入迷的，與此有關的觀點始終一致。他一直參加三峽工程的論證，對這個工程的看法，我們也是幾十年來一致的；他是在論證報告書上沒有簽字的九專家之一。

程學敏近年身體多病，行動已不大方便。今年水電學會春節團聚時，我們碰了面，都快八十歲了，大家感慨頗多。三峽開工後，水電面臨新的殘酷形勢：許多急待開工的工程，如龍灘等，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我即席口佔一絕，道出共同的心聲：“無窮遺恨篇，水電未優先。大禹嘆何在？煙灰滿地天！”中國水電的命運，什麼時候才能從夾縫中脫離出來呢？

祝賀這本選集的出版。希望水電系統中青年專家，所有的後來人，學習老一代專家的執著精神，奮進精神；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水電優先，壯心不已。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



## 《王伊復水電論文集》序言

王伊復同志是我國水電建設的老專家。從一九三五年大學畢業到一九九五年辭世，從抗戰期間在西南開創水電事業到晚年規劃華東電網抽水蓄能電站，整整六十年，他沒有離開他熱愛的事業；他尤長於水能技術經濟專業，從這方面孜孜不倦論證中國優先發展水電。

一九五六年全國成立八大水電設計院時，王伊復由北京總院派往廣州水電設計院任總工程師，負責廣東第一座大型水電站新豐江的設計。一九五七年廣西成立水電設計院時，又被調任廣西水電廳兼水電院的總工程師，負責西津水電站的設計，該工程建有我國第一座大型兩級船閘；之後為發展廣西水電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美國壑務局幫助研究三峽工程計劃時，王伊復是中國派去的技術人員之一，分工負責水能經濟。一九五六年九月《水力發電》“長江規劃專號”上，對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的文章，他著文提出不同意見。八十年代又一次掀起興建三峽工程熱潮時，根據工程經濟分析的原理，一九八五年他又寫了《試論長江三峽工程的規模和興建時機》（已編入中科院匯編的《長江三峽工程爭鳴集》總論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要求水電部廣泛組織各方面專家，進一步論證修改原來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明確指出“要吸收不

同觀點的專家參加，發揚技術民主，充分展開討論。”水電部領導指定參加討論的四百一十二位專家中，來自京外的有一百七十餘位，就是不邀請有不同觀點的王伊復等老專家參加，令人深感遺憾。

八十年代初出差到上海時，我去看望過伊復同志，他患胃癌開刀，不顧病體仍勤奮工作。之後多次與我通信，並寄來他新寫的論文《關於電力建設方案經濟論證的若干問題探討》。此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介紹西方和蘇聯常用的經濟計算方法，雖然形式不同，但實質漸趨一致。第二部分研討替代方案的可比條件，著重說明兩點：一是建設方案的比較範圍，必須包括一次能源的開採、運輸，轉換成電力，輸送到供電點的全過程。電力工業的規程規範中，對此應有明文規定。二是關於使用價值相同的電力電量，考慮到過去水電建設，容量不分可靠容量與重復容量，電量不分穩定（保證）電量和季節性電量，只是講究單位千瓦（或千瓦時）的投資（三峽可行性報告便如此），以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中重復容量的比重很大（葛洲壩最突出），需要增建火電或其它電源以補充枯水期用電，這對優先發展水電並不利。因此建議水電站的技術經濟指標中，增加可靠容量和年穩定電量兩項，取消傳統的“保證出力”一項；特別強調水電穩定電量可以頂替的煤礦投資，可靠容量可以頂替同容量的火電投資，重復容量與季節性電量則給予一定評估。從而根據這種比較來評價水電的經濟性。此種評價方法，美國早已實行。

一九八二年春，我正式調離電力工業部時，王伊復特地寄來這樣一篇“送別辭”，我從未示人。現趁《王伊復水電論文集》出版時，附於序言之後，作為一種紀念（我一字未移，只在《水力發電》後加了“月刊”二字）。這篇意遠情深的文字，不僅是對我的激勵，實簡述了我國水電創業艱難的歷史。

一九九六年十月

一九八二年春李銳副部長將調離電力工業部，余擬作文送別。奈三十年往事，從何說起？握筆再三，迄未成文。今聞大作《論水力發電與河流規劃》即將問世，並賦詩一首，有“但願波濤都化電，同床同夢意綿綿”之句。同人傳誦。感慨繫之。憶自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中央畀以重任，領導全國水電建設。當時水能資源不明，技術人員不過二、三百人。豐滿險工亟待修復，古田、龍溪、官廳、上猶均待興建，頭緒紛紜，莫衷一是。首先籌建水電總局，逐步成立大區設計院，調查河川資源，制定開發規劃；出版《水力發電》月刊，倡導學術爭鳴；舉辦水電展覽，宣傳發展前途。對於施工項目，成立工程局主其事，抓質量，抓工期，抓造價，抓實效。獅子灘、流溪河以及古田、上猶均於兩三年內次第建成，每千瓦造價不過七、八百元。效益顯著，不留病患，為水電事業樹立了信譽。於是風起雲湧，新安、新豐、柘溪、西津以及黃河梯級一齊躍進。邕寧垂詢，聘辯當庭，水電為媒，兩部合併，更是影響深遠，難於評估。從此襄助中樞，參與機要。不意急風驟雨，廬山變色，初則北徙烏蘇里，繼則南遷大別山，十年動亂，禁閉京郊，日讀經典著作，蘸龍膽紫以述懷。迨雨過天青，官復原職，駕輕就熟，收拾殘局。曾上書百言，再為水電呼籲，重建設計院，整頓工程局，狠抓前期工作，講求經濟效果。二十萬員工正引領北望，遽聞驪歌，七字抒情，八方惜別。夫以赤誠之心，忠於職守，辛勤創業，慘淡經營。但問國家之利益，不計宦海之浮沉。艱貞卓異，微斯人吾誰與歸？惟是三十年來，虛擲年華念載，醉於斯而未能舒展所懷，令人扼腕不置。所幸調任新職，組織中青幹部，但願全國英才，各得其所，安定團結，振興中華。年老造退，無怨無尤。任重而道遠，謹馨香祝之。

王伊復 一九八二年春



《世紀之交留言》

李 銳 / 著

封面設計：曉 溪

發行人：周和生

特約編審：金楊朋容

責任編輯：黎 民

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香港九龍太子道西 287 號實堡大廈 12A)

香港楚源國際印務公司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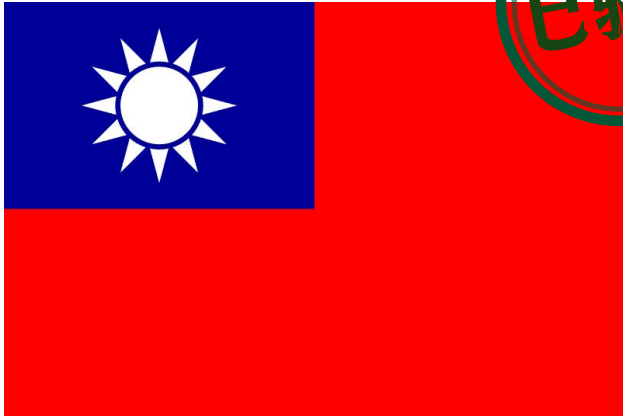
國際中文書店經銷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ISBN988 — 97107 — 1 — 4.

定價：HK\$ 七十八元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